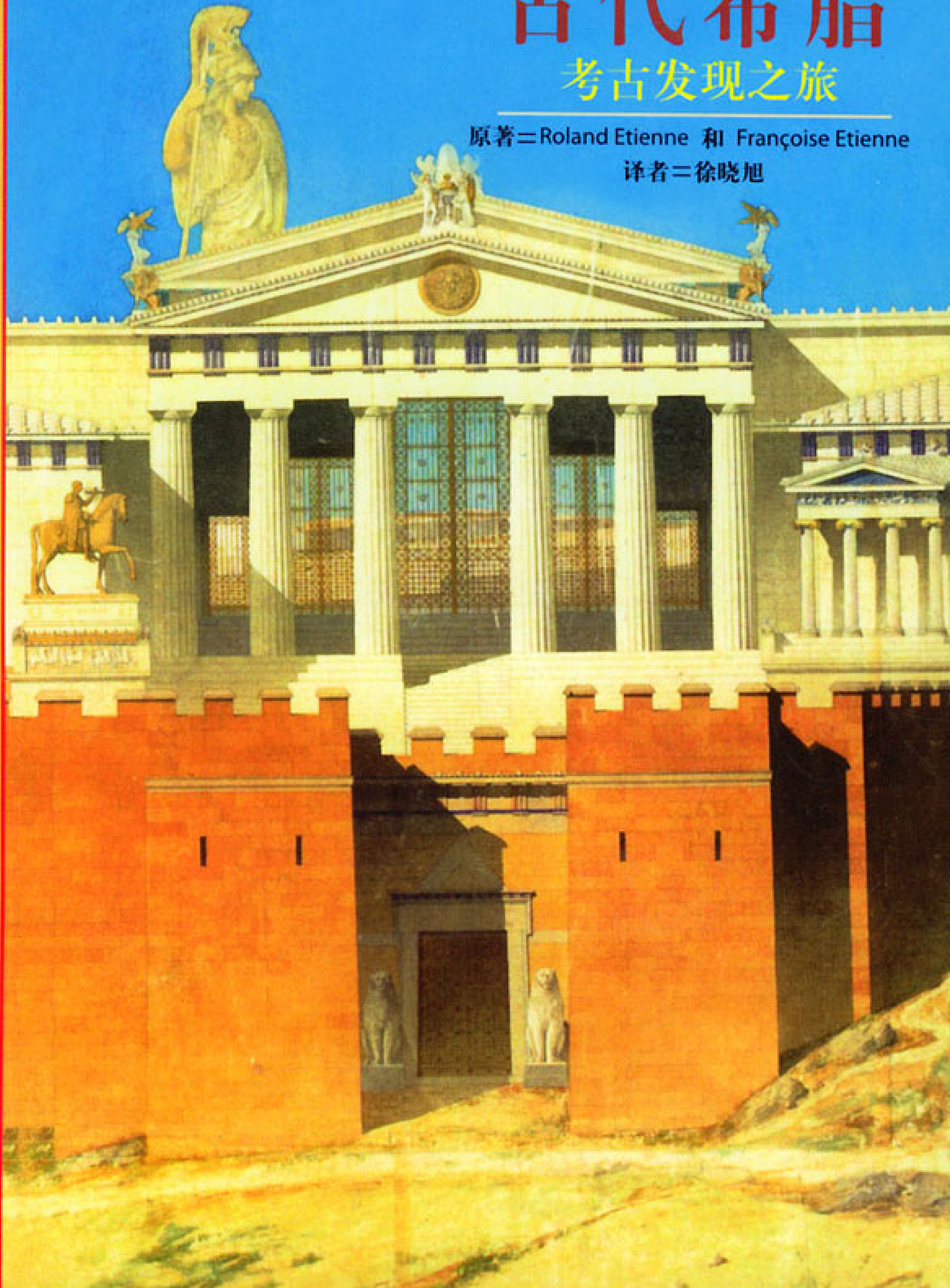
VOYAGE D'EXPLORATION

# 古代希腊

## 考古发现之旅

原著：Roland Etienne 和 Françoise Etienne

译者：徐晓旭



LA GRECE ANTIQUE

发现之旅

# 古代希腊

考古发现之旅

原　　著：Roland Etienne 和 Francoise Etienne
译　　者：徐晓旭
出 版 者：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教育出版社
　　（上海永福路 123 号　邮编：200031）
责任编辑：盛志光
印　　刷：上海精英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2004 年 7 月初版
印　　次：200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6,100 册
书　　号：7-5320-9454-5/K·0010
定　　价：38.00 元

La Grèce antique
Copyright © 1990 by Gallimard
Chinese language publishing rights arranged with Gallimard through
Bardon - Chinese Media Agency（版权代理——博达著作权代理有限公司）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4 by Shanghai Educational Publishing Hou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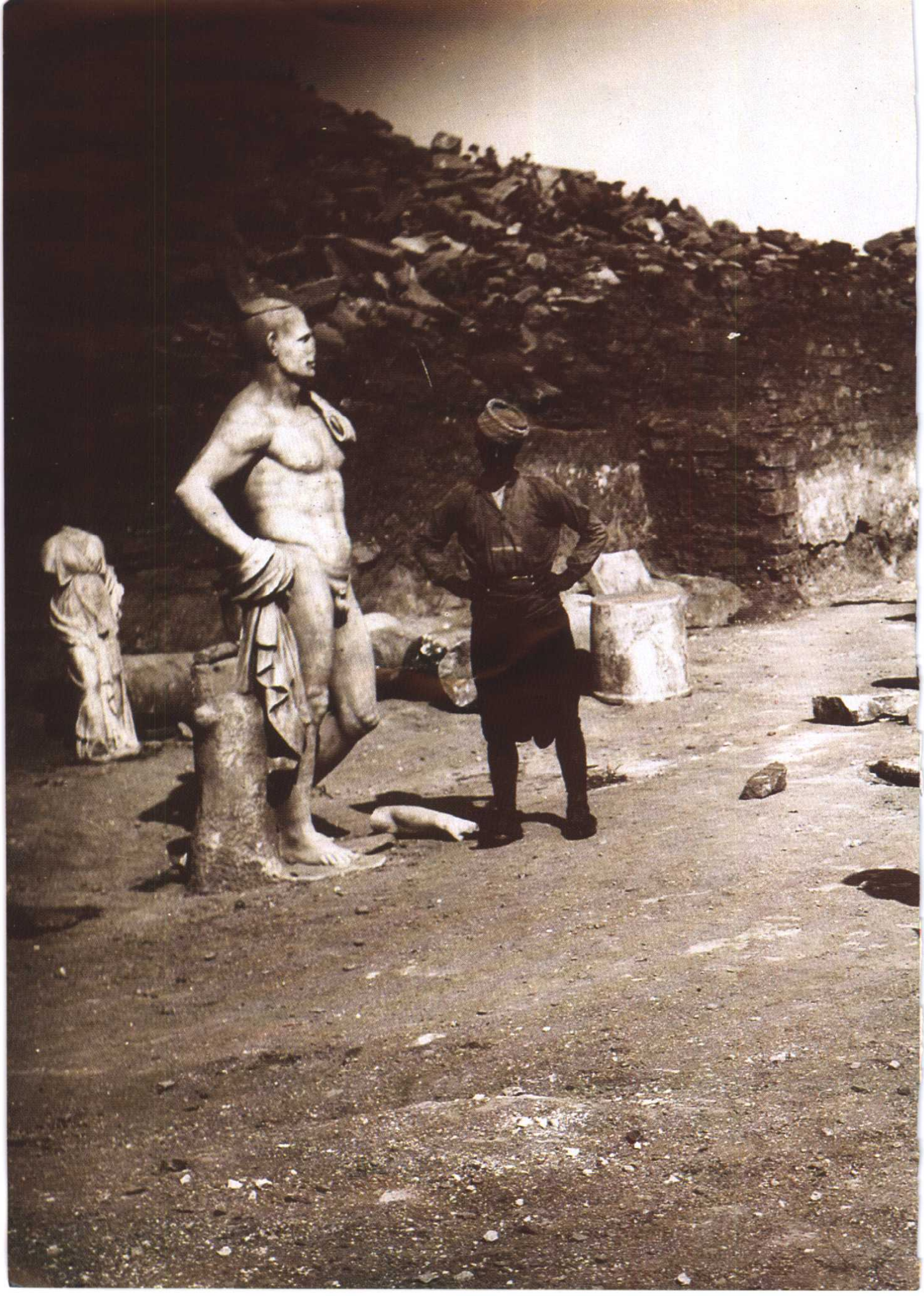


奋斗的考古学，
镐头和铁锹的考古学，
它是一门需要学习的行业，
更确切地说，是一门有其自己规则的学科，
这些规则只是到19世纪中叶以后才真正确立。
某些发掘是由缺乏经验的考古学家领导的，
并且没有训练有素的建筑师的帮助，
其唯一的目的是
尽可能多地拿光动产性器物和小玩意儿，
并把它们放置在安全的地点，
特别像有组织的入室盗窃。
所以希腊避免了这种过早
而且有危害的发掘举动反而更好；
总之，覆盖在遗址上的泥土
是一面很好的盾牌。”

法国众议员、法国希腊研究促进会主席
泰奥多尔·雷纳克（Théodore Reinach），载于《被希腊人
重新发现的希腊》（*La Grèce retrouvée par les Grecs*），1907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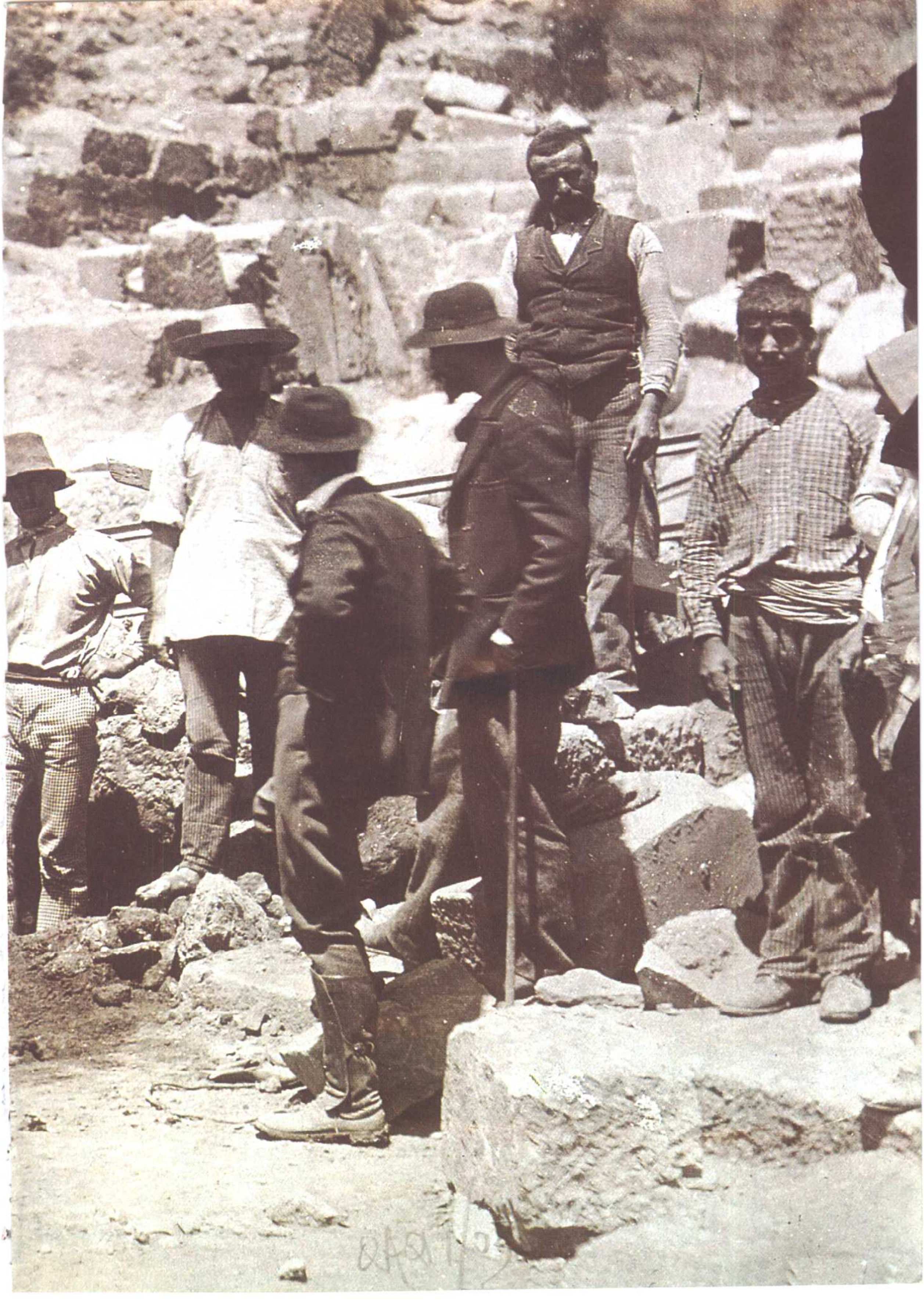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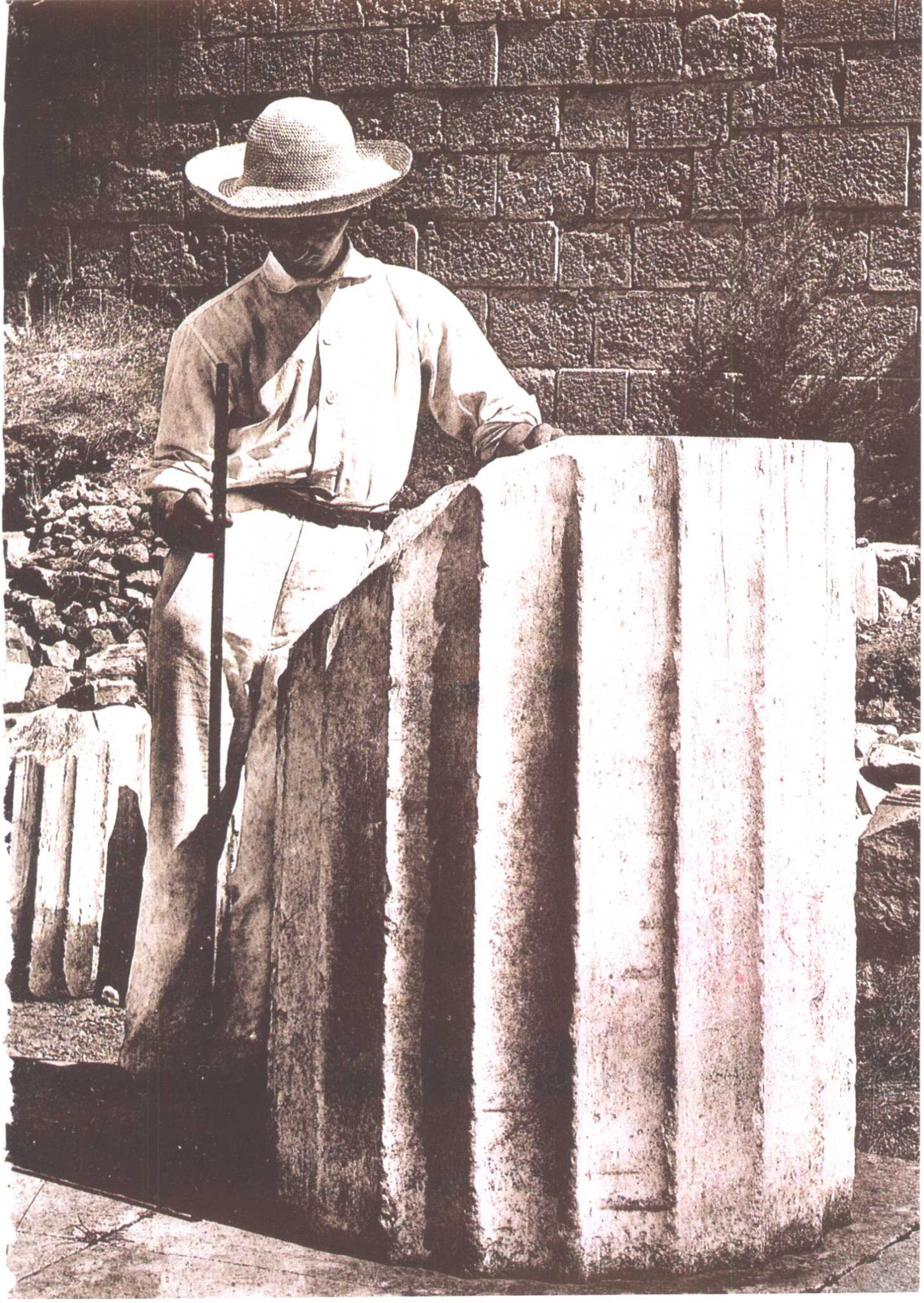












# 目 录

13 第一章：罗马构想希腊
21 第二章：考古学先驱——安科纳的齐里亚科
31 第三章：贵族与学者
43 第四章：希腊的神话
63 第五章：强大的掠夺者的时代
85 第六章：民兵的时代
101 第七章：红红火火的考古学
117 第八章：两次大战之间：思考成熟的时代
129 见证与文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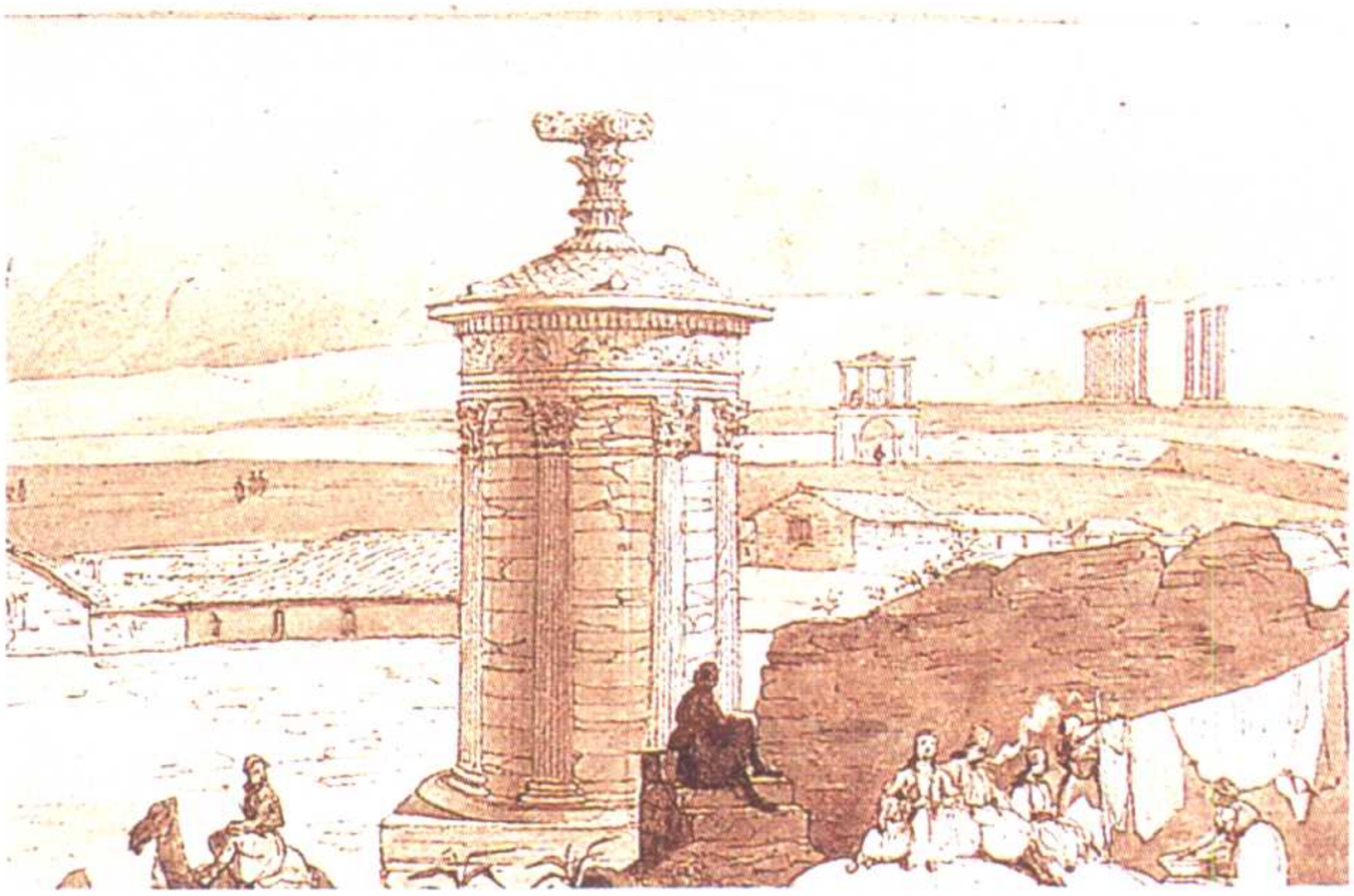
Roland et Françoise Etienne

罗朗·艾蒂安和弗朗索瓦兹·艾蒂安于1972年到1976年之间曾在希腊居住。罗朗·艾蒂安曾在法国雅典学院(l'Ecole française d'Athénes)的考古现场从事发掘。其学位论文是一项关于基克拉迪斯群岛(Cyclades)中的泰诺斯岛(Ténos)的研究。R. 艾蒂安和F. 艾蒂安已取得大、中学历史教师的学衔，从事高等教育〔里昂第二大学东方学院(Lyon II-Maison de l'Orient)〕和中等教育。无论是在研究领域内，还是在课程科目上，古代和现代希腊尤其是他们共同感兴趣的课题。

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图书馆
207313067
K125
A340

# 古代希腊

## 考古发现之旅



原著 =Roland Etienne 和 Françoise Etienne

译者 = 徐晓旭

上海教育出版社

1311348

FIDES

CHARITAS

# ΠΑΥΣΑΝΙΟΥ ΕΛΛΑΔΟΣ ΠΕΡΙΗ-ΓΗΣΕΩΣ §

SPES

PRVDENTIA

“伽图（Caton）曾预言，罗马人将在沉湎于希腊文学的时刻失去他们的帝国。然而时间证明这一忤逆不敬的预言落空了，因为罗马在将希腊的知识和全部文化据为己有的同时也达到了繁荣的顶峰。”

普鲁塔克（Plutarque），公元2世纪

# 第一章
# 罗马构想希腊



《持矛者像》（Doryphore）是波吕克莱泰斯（Polyclète，公元前460-前420年）的杰作之一。该雕像经常被临摹复制：这里是其头部复制品，如铭文所注，它出自阿尔奇亚斯（Archias）之子、雅典雕塑家阿波罗尼奥斯（Apollonios，公元前1世纪）之手。

左页上为鲍萨尼亚斯（Pausanias）著作的一个编订本的书名页。

之所以很早就有了希腊考古，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对于希腊及其作品的狂热之情。这种狂热有其传统。此传统滥觞于公元前5世纪，到了希腊化时代，也就是说，从公元前3世纪开始，它业已获得发扬光大。

## 希腊人模仿雅典

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re le Grand）从公元前336年开始对波斯帝国的征服和整个地中海东部地区希腊人领导的王国的建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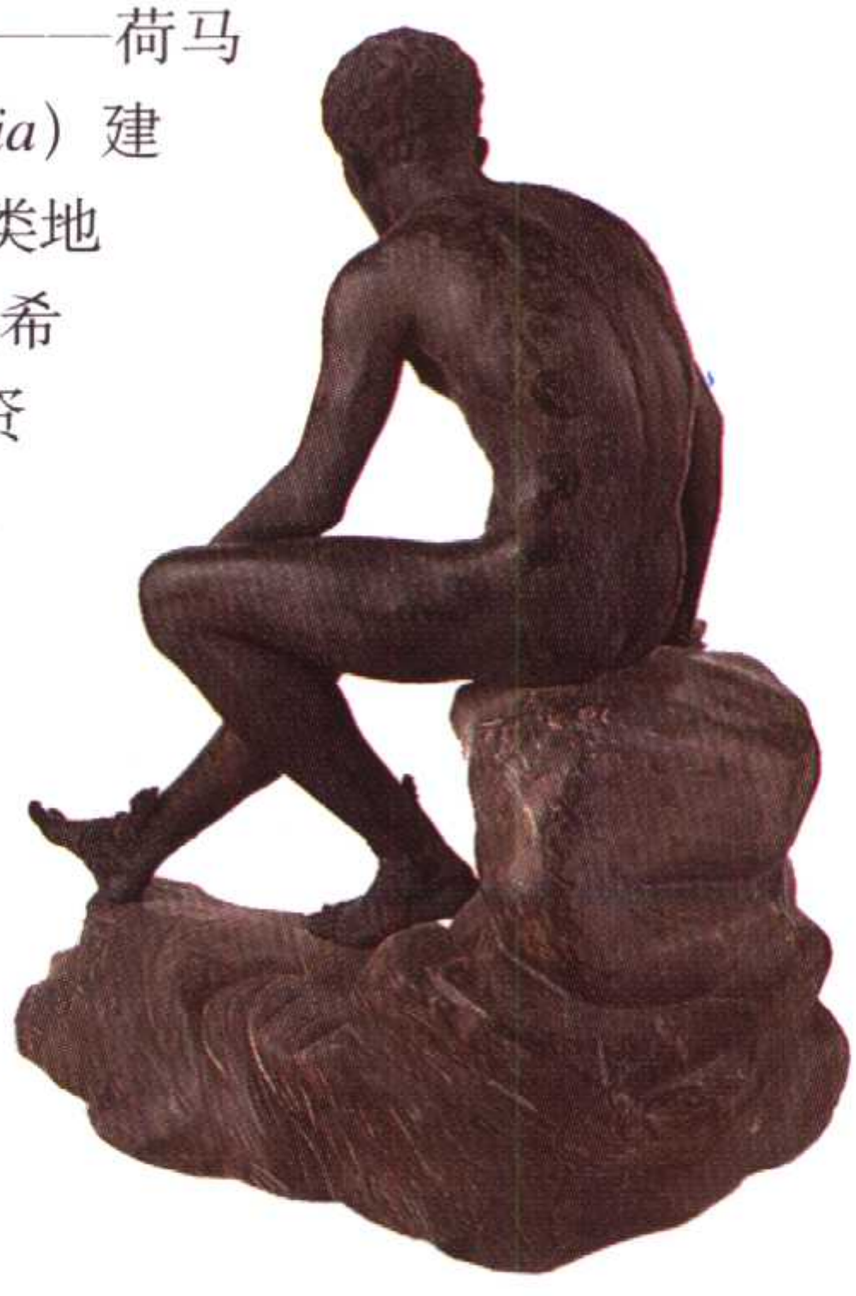


这三件文物是希腊原作的罗马复制品，来自海尔库拉纽姆（Herculanum）的“纸草别墅”（la Villa des papyri）。人们在海尔库拉纽姆发现了一个雕像群，由38尊雕像组成，前页的《持矛者像》就在其中。左图为一尊古风风格的《阵前的雅典娜像》（Athéna Promachos）。她挥舞着长矛，正准备投入战斗。右面两图分别为达那奥斯之女（Danaïde，？）的青铜像和长期被认为系吕西波斯（Lysippe）之作的《静坐的赫耳墨斯》（Hermès au repos，公元前340-前310年）。



从公元前1世纪末开始，室内的雕像布置都依照周密的规划进行。发现于这座房屋中的纸草文献证实，房产的主人是一个伊壁鸠鲁(Epicure)的信徒。这所别墅如同一座体育馆，房主远离了喧嚣的生活，退隐于此，建造了这片“乐园”景致。他把精选的伟人雕像汇集一处，他喜爱缅怀伟大的伊壁鸠鲁生活的时代（公元前4世纪末-公元前3世纪初）。

带来了三个后果：一种颂扬往昔作品和前人——荷马(Homère)是这一切的奠基者——的文化（*paideia*）建立了起来，对艺术品的收藏开始出现，分门别类地研究作品和艺术人才的最初的艺术史也已起步。希腊统治者的确拥有扶持艺术家和购买艺术品的资金；他们对最精美的珍品毫不放过而掠为己有。



## 罗马劫掠希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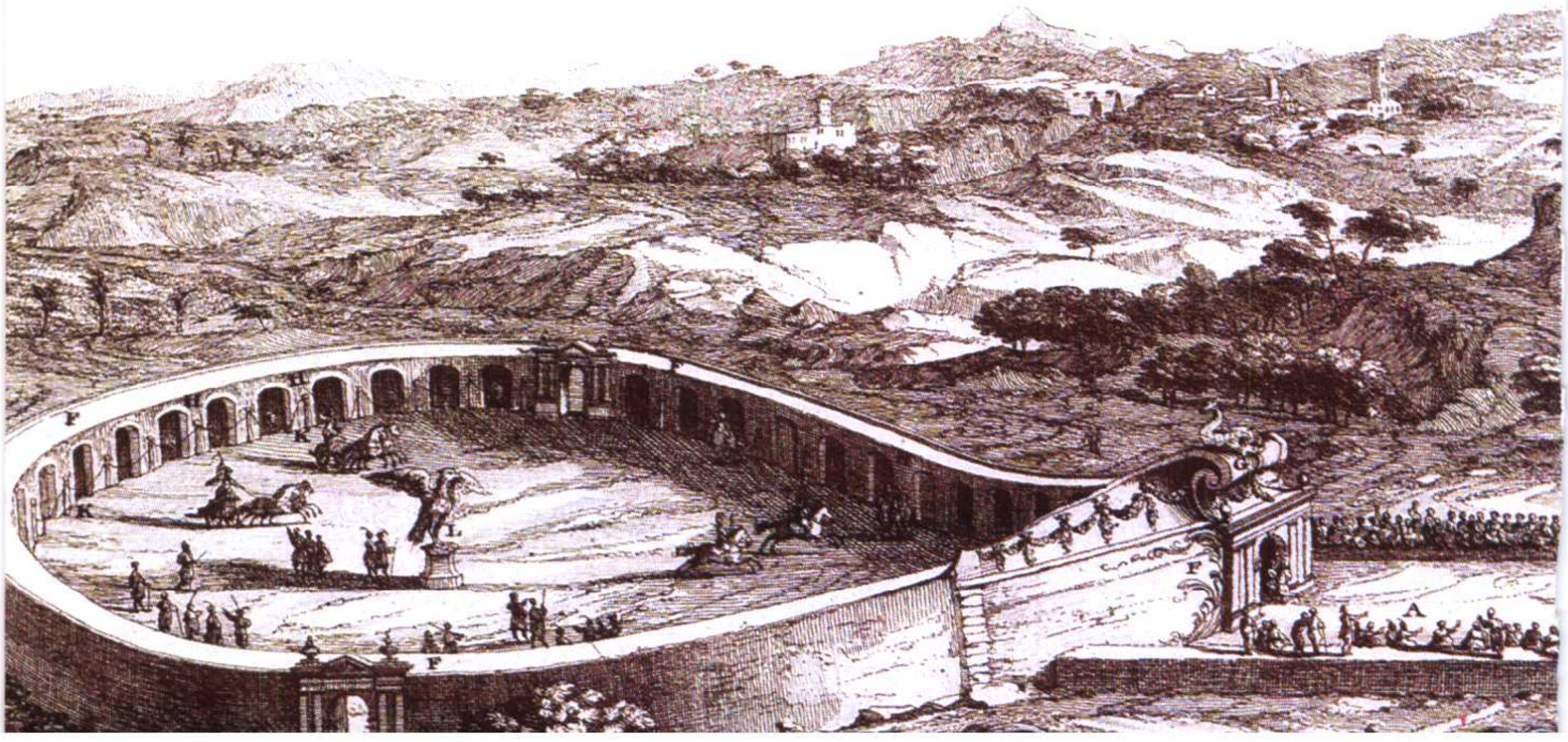
遵循着希腊化诸王的这条“王道”路线，从公元前2世纪中期开始，依靠对人类世界的剥削而发财致富的罗马人也广泛搜罗收藏艺术品，抬高古典希腊的身价，并参与了对她的掠夺。

在帝国最初的两个世纪中，诸如奥古斯都（Auguste）、尼禄（Néron）和哈德良（Hadrien）这些皇帝都以各种各样的名义，有意无意地延续了共和时代精英们对希腊的癖好。奥古斯都和哈德良两人都让人复制了埃瑞克透斯神庙（Erechthéion）的女像柱（Caryatides），前者用它们来装饰他的罗马广场（Forum de Rome），后者则以之点缀他的提沃里别墅（villa de Tivoli）。

## 鲍萨尼亚斯撰写第一部旅游指南

希腊变成了一家博物馆，公元2世纪的鲍萨尼亚斯为之所著的10卷书即是这一点的明证。他写的这部书是一本《周游指南》（*Périégèse*），也就是说，这是一部引导读者同他一起周游所有名胜的著作。鲍萨尼亚斯为我们开创了这种游记写作的先河。一直到19世纪，撰写游记都是探索希腊的特有方式。他的影响是巨大的，即便他既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惟一一个撰写这种导游书的人。他的著作是惟一完整保存下来的导游书。18、19世纪那些严肃认真的旅行家们手中捧的正是一本鲍萨尼亚斯的著作，他们是通过对它的学习来重新发现希腊的。鲍萨尼亚斯是一个可靠的导游吗？人们说了他很多坏话，人们怀疑

下图为J．里戈（J．Rigaud）为修道院院长热杜安（Gedoyn）编辑的鲍萨尼亚斯著作编订本（1731年）所作的一幅插图：这位艺术家带着一定的想象复原了作为当时几大运动会之一的奥林匹亚（Olympie）运动会的赛马场。鲍萨尼亚斯的著作写于公元155-175年间，他对自己情况交代得寥寥无几。他是个小亚细亚的希腊人。既然他从幼发拉底河一直旅行到意大利，他肯定出身于一个能支付得起这种旅行的富裕之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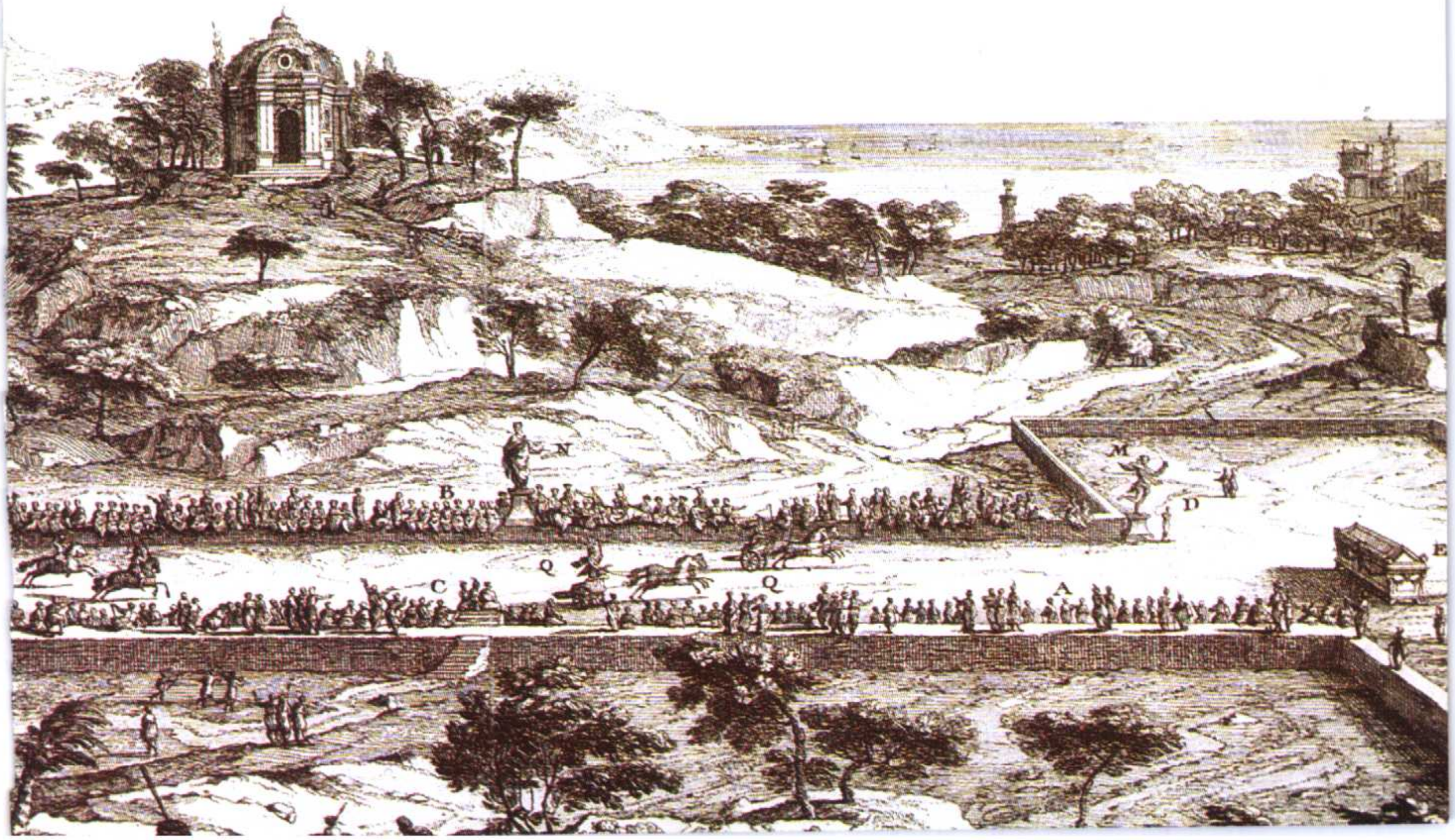


他的严肃性和他的知识，然而这些可能是错怪他了：当人们能够检验他提供的资料时，发现这些资料常常是正确无误的。最近还得感谢鲍萨尼亚斯，人们利用他的著作找到并发掘了彼奥提亚人（Béotiens）同盟在昂凯斯托斯（Onchestos）的神庙。人们有时候认为他不具备完全的艺术鉴赏力：他在描写和讲述当中很少做出个人的赏鉴。他依照公元前2世纪学者的传统对于古典时代希腊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菲狄亚斯（Phidias）是最优秀的雕塑家，阿尔卡麦奈斯（Alcamène）仅次于他。不过，他也懂得对古风时代的作品表达一种虔诚的尊重，在进行比较之时，他能辨认出某位伟大艺术家的风格。

以其质朴、以其甘愿成就难事的意志、以其对自由之热爱和对任何形式的暴政的反对——即便他敬重圣明的皇帝——，这位旅行家之父成了一个颇受人喜爱之人。人们之所以还能谈论一点关于希腊遗迹的东西，无论怎么说，都多亏了他。

鲍萨尼亚斯身后八十年，希腊部分地区遭受了蛮族的蹂躏，雅典在公元267年被黑鲁利人（Hérules）洗劫。基督教帝国确立时代的灾难引发了漫长的破坏过程，更严重的是导致了创作中心的转移；与此同时，艺术情趣的变化也促使人们遗忘了希腊的伟大古迹。

然而，《周游指南》只涉及到了希腊的部分地区，而且也无法解释他为什么遗漏了一些地方（马其顿、色雷斯[Thrace]、埃托利亚[Etolie]、阿尔卡那尼亚[Acarnanie]和各岛屿）而没有加以记述。不过，凡是他所到之处，他都详加描述其文物古迹，开列雕像名录，引证当地向导讲述给他的传说。鲍萨尼亚斯的著作在古代被提及不多。




亚德里亚海
意大利
爱奥尼亚海
爱奥尼亚海诸岛
科孚
科孚
琉卡斯
伊大卡
凯法洛尼亚
扎昆托斯
多多那
埃庇罗斯
阿克西奥斯河
奥欧斯河
阿拉克托斯河
马其顿
佩拉
式尔马
维尔吉那
合利亚克蒙河
斯特律蒙
佩内奥斯河
式撒利亚
菲莱
迪米尼
迪米特里亚
塞斯克洛
阿凯洛奥斯河
斯佩尔奇奥斯河
凯菲索斯河
埃托利亚
佛基斯
德尔菲
奥尔科美诺
彼奥提亚
那夫普里翁（莱庞托）
科林斯湾
凯罗内亚
昂凯斯托
西库昂
科林斯
伯罗奔尼撒
内美亚
埃庇道罗
奥林匹亚
迈锡尼
阿哥斯
阿尔菲乌斯河
提林斯
特罗伊
麦伽洛波利斯
莱尔纳
式该亚
巴塞
美塞尼亚
米斯特拉
斯巴达
墨多内
马尼


奈斯托斯河
色雷斯
海布罗斯河
普罗蓬提斯
安菲波利斯
塔索斯
萨摩色雷斯
赫勒斯滂
的
特洛耶
弗吕吉亚
莱姆诺斯
北斯波拉
迪斯群岛
帕伽马
莱斯波斯
斯居罗斯
优卑亚
海尔摩斯
埃勒特里亚
开俄斯
奥罗波斯
拉姆努斯
艾琉西斯
马拉松
雅典
布劳隆
苏尼昂
安德罗斯
伊卡里亚
萨摩斯
以弗所
迈安德罗斯河
吕底亚
米利都
卡里亚
式诺斯
凯阿
艾吉那
叙德拉
居特诺斯
提洛
南斯波拉
迪斯群岛
帕罗斯
那克索斯
阿摩尔戈斯
科斯
米洛斯
（米洛）
铁拉
（桑托里尼）
林多斯
罗德斯
卡尔帕托斯
克里特海
马利亚
克里特
克诺索斯
高尔提斯
拉托
法伊斯托斯
卡托·扎克罗斯
0
100 km




Ostendimus Lencatum nunc adulubrias transimus que olim Archa et nunc
ein Idecompare nominatur a lris cupiby circumsepta que monnisole et
minute: nisi nimedie exigue planue a liquib arboribz castisq habetur: et riv
cum vera pochiosa fatis decoriente adoriculum yxyp et m lacustrine ug mit
amplatur: cuius quidem due extrema inducbus apercuntur cornibz a nautis in
nete periculosis: Fluit enim hinc ut asserut ille eloquentissim gyrorum Vbyp

“一种强烈的愿望曾推动着我去周游世界，以便完成对于遍布世界各地的古代遗迹的探索——这些古迹很久以来就是我研究的主要对象——，并且也是为了能够用笔记载下那些因岁月的摧残和人们的漫不经心而日益湮灭却又值得记忆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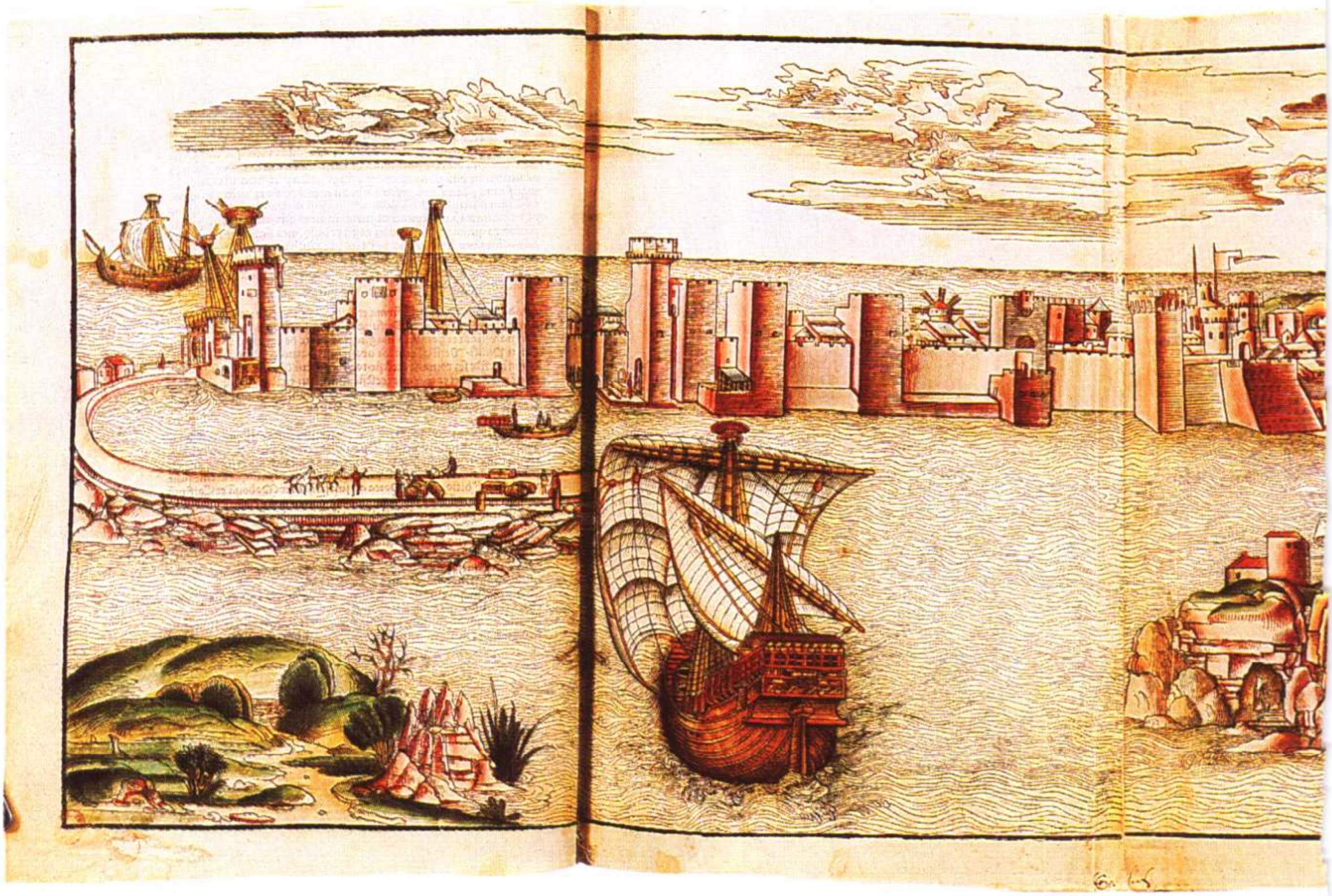
安科纳的齐里亚科（Cyriaque d'Ancône），1441 年

# 第二章

# 考古学先驱——安科纳的齐里亚科



这张琉卡斯岛（l'île de Leucade）的地图是布昂戴尔蒙蒂（Buondelmonti）的《海上列岛之书》（*Liber insularum Archipelagi*, 1420 年）中的插图。这本描述希腊岛屿的书开创了关于地理和古代的游记的传统。



罗马帝国于395年分裂后，希腊成为东部帝国即拜占廷帝国（Empire byzantin）的一个行省，希腊人生活的重心由雅典转移到了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而后，6 - 9世纪斯拉夫各族（peuples slaves）的入侵标志着希腊进入了一个混乱的时期。斯拉夫人定居在了马其顿和色雷斯，逐步走向希腊化。1204年十字军占领君士坦丁堡，将希腊置于被统称为“法兰克人”（Francs）的西方封建主的统治之下。这一事件标志着希腊陷于外族人统治时期的开始，在这一长达六个世纪之久的时期当中，希腊人对外族统治者展开了英勇不懈的反抗斗争。

## 被埋没的希腊

中世纪从未把古代希腊遗忘得一干二净，但是由于宗教和文化的原因，它对古代希腊的东西保留得却一个世纪比一个世纪少。中世纪精神当中渗透着信仰，明确地说就是基督教意识形态同已经成为异教同义语的希腊文化大相径庭。优斯提尼亚努斯（Justinien）于6世纪关闭了各哲学学校，这标志着基督教的胜利和与古代的决裂，神庙也相应地变成了教堂：芭苔侬神庙（Parthénon）成了圣




墨多内（Modon）城坐落在美塞尼亚（Messénie）南端伸入海中的一个岬角上。它和邻城科罗尼（Coron）一样，都是1204年瓜分拜占廷帝国时分给威尼斯人的属地。墨多内是威尼斯帝国及其在东方的商业的主要阵地："尊贵的共和国"（la Sérénissime）小心戒备地守卫着它，以防无论是希腊人的还是土耳其人的任何进攻。它还是"圣地之路"（le chemin de Terre sainte）上的一个中途站。"墨多内是一座有着良好的炮兵装备的强固城市，它四周围绕的城墙固若金汤；在这座城前有一个优良的小港口可以保藏双桅战船和海船，它还修筑有阻挡海浪的坚固城墙。"一位无名的法国朝圣者在1480年的这段记述与旁边的素描图同属一个时代。

母（Vierge）的圣堂，"忒修斯神庙"（Théséion）则被奉献给圣乔治（saint Georges）。信仰基督教的希腊人抛弃了他们的"希腊人"（Hellènes）之名，而在长时间内自称为"罗马人"（Romains）。

1054年教会分裂以来，希腊国家在西方激起的不是兴趣和好奇，而是猜忌和敌视。在教皇英诺森三世（Innocent III）的眼里，另立宗派的希腊人难道不"比撒拉森人（Sarrasins）还坏"吗？于是十字军肆无忌惮地洗劫了君士坦丁堡，瓜分了帝国。

拉丁人（Latins）国家的建立只不过是在表面上打破了希腊的孤立。传统上通往耶路撒冷的朝圣之路、与利凡特（Levant）地区进行贸易的商路都沿伯罗奔尼撒南海岸延伸，并经由爱琴海群岛，但却没有深入内陆。13世纪以来使用的航海图较为准确地标出了海岸线；因为从比雷埃夫斯（Pirée）港可以看到雅典卫城

（Acropole）的城墙，所以雅典也以“塞提奈斯”（Setines）——系“雅典”（Athina）的读音讹变（译者注：更确切地说，Setines 这个名字应该是从当时的希腊语口语短语 se Athinas，或更可能是从日益取代它的更新的词形 se Athines[意即“在雅典”]的读音讹变而来）——这个名称出现在这些航海图之上。然而这类地图没有提供很多关于内陆的信息。

朝圣者唯一感兴趣的是宗教遗迹和圣物。无论是经由陆路——通过科林斯（Corinthe）——还是经由海路，他们都不会偏离自己的路线而去参观异教的偶像崇拜的遗迹。

热那亚和威尼斯都是强大的商业城市，他们都开辟了自己的势力范围：热那亚的势力范围在爱琴海北部和黑海；威尼斯则靠南在贝鲁特和亚历山大里亚建立势力范围。同这些重要的贸易中心相比，希腊大陆仍处于边缘地位。



左面是阿斯提帕莱亚（Astypalée）的地图：“这座岛屿中间非常狭窄，两端相当广阔，人们在其两端发现了几座设防城市的遗迹。”右面是桑托里尼（Santorin）的地图：“人们认为它曾十分肥沃，有着稠密的人口；但是在深成侵蚀的作用下，它有一半坍塌落入海中。我们今天能够在海中看到这座岛屿的一部分被烧成了石灰，这部分呈新月形，我们将它称为‘铁拉西亚’（Thérasia）”。以上为布昂戴尔蒙蒂的明确讲述。

## 重被发现的希腊

14 世纪末，两个重要人物打破了几个世纪的沉默，成为重新发现希腊的先驱，他们是克里斯托佛洛·布昂戴尔蒙蒂（Cristoforo Buondelmonti）和安科纳的齐里亚科。两人都是意大利人，均参加了蓬勃发展的意大利人文主义运动。但是人文主义几乎只感兴趣于古代作家的文献和对新手抄本的搜罗，而我们的两位旅行家对地面有着好奇心，热衷于忠实地修复他们发现的东西。人们需要感谢布昂戴尔蒙蒂这位佛罗伦萨修道士率先尝试为希腊绘制历史地图。作为地理学家和文人的他游历了爱琴海诸岛。



## 商人齐里亚科

齐里亚科的成就更加丰富多样，我们完全有理由把这位不知疲倦的旅行家视为考古学的奠基者。齐里亚科·迪·皮奇科利（Cyriaque di Pizzicolli）大约于1392年诞生在意大利最富有活力、最为繁荣的港口之一安科纳。他出身于一个专营长途贸易的批发商家庭，还是在非常年轻的时候，他就操起了商业旅行家的生涯。

作为他所属的阶级及时代的代表人物，他赋有创业精神，喜欢冒险，胸怀对财富的渴望，他介入了那个时代的政治事件，他被委以外交使命，多次出任大使，这使他得以与某些有影响的人物接触：1438年，他出席了旨在结束希腊-拉丁宗派分裂的宗教会议。1444年，他在君士坦丁堡参与了反对土耳其人的瓦尔纳（Varna）十字军远征的准备工作。他之所以是这次十字军远征的一个积极的宣传者，既有商业上的原因——夺回落入土耳其人之手的某些市场——，更有延续古代世界的生命力，抵制土耳其推进和威胁的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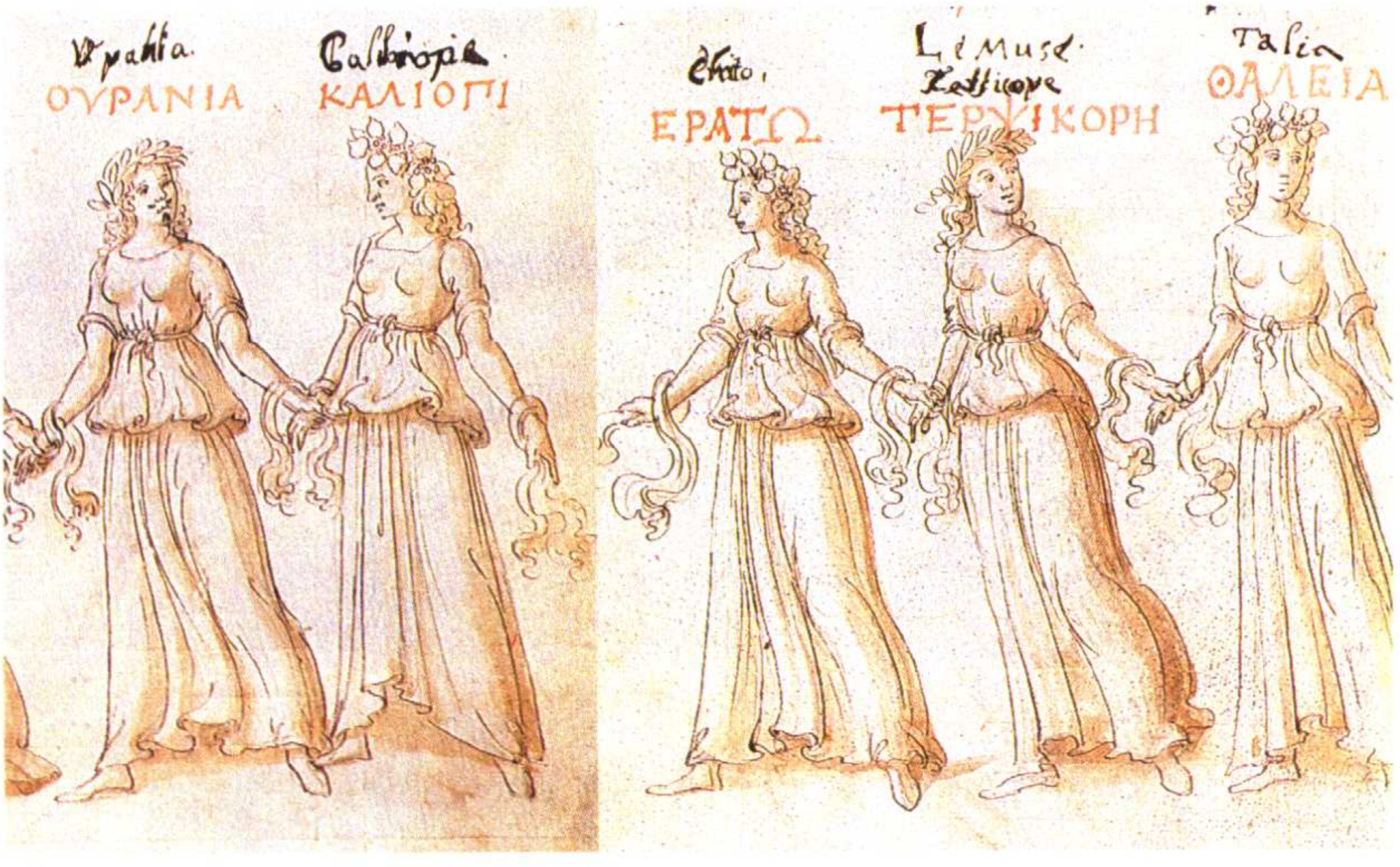
像多数15世纪的意大利商人一样，齐里亚科醉心于经营购于利凡特地区的手稿和小件古物的生意。他会以最昂贵的价格将纪念章、钱币和凹雕宝石出售给富有的文艺事业的资助者和艺术品收藏家。这枚表现雅典娜的大水晶凹雕便是这样被齐里亚科买卖的；这位安科纳人于1445年在一艘威尼斯双桅战船上释读了它上面的铭文[“埃盖(Aigai)的狄奥库里戴斯(Diokouridès)之子优提凯斯(Eutychès)制作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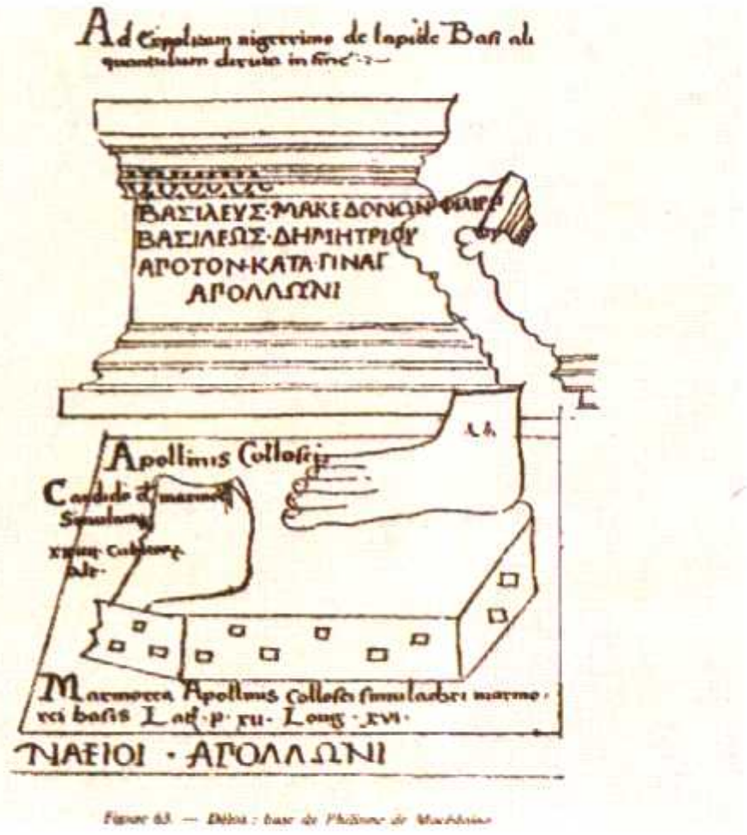
## 考古学家齐里亚科

这位谨慎的商人是怎样在三十岁左右时成为一名考古学先驱的呢？他所受的教育并没有要把他培养成这样的目标，他大学上得不多。正是最初的几次旅行激发了他对所遇到的古迹的好奇心。大约1420年，他开始在波拉(Pola)和罗马抄录铭文，作为一个自学者，他在实地获得了考古学和铭文学的知识。而这也使他认识到“古迹和铭文是比古典作家的文献更可靠的关于古典古代的证据”。对他的时代而言，这是一种创见。当他决定把他在游历中发现的所有证据汇编成一本书的时候，他便将这种原则付诸应用：他的这本书是《古物注释》(*Antiquarum rerum commentaria*)。此书已佚，仅存某些残篇。不过，要是认为这些开启了齐里亚科的第二生涯，即探险家兼学者的生涯，那就错了。他丝毫没有放弃他的生意；恰恰相反，他的商业旅行会为他的考古学研究提供便利。他以这种考古学研究为理由，在一些鲜为人知的地区探险，深入一些被废弃的城市，抄录铭文，绘制古迹图录。

在这幅萨摩色雷斯(Samothrace)的宁芙（Nymphes）浮雕的素描图上，齐里亚科用希腊字母在每个人物形象的上方写上了缪斯(Muses)的名字。只是到了很晚，在40岁的时候，他才着手研究古希腊语，但是他在这方面取得了不断的进步。他的拉丁语掌握得尚不够完善，文笔简陋而欠得当。他曾接受过几何学、算术和地图绘制术的基础实践训练。






从他写给朋友的一些信件中，人们知道他的行程准备颇具科学性。除了地图和航海图以外，一些著作还充当了他的向导：如托勒密（Ptolémée）的《地理学》（*Géographie*）和普林尼（Pline）的《自然史》（*Histoire naturelle*）就是这样的著作。一直到他生命结束之时，他都没有离开一本斯特拉波（Strabon）的著作的帮助。不过，他没有鲍萨尼亚斯著作的抄本，他对一些遗址的错误认定证明了这一点。齐里亚科能够毫无困难地深入希腊各地得惠于他对现代希腊语的通晓和他同当地权贵的友好关系。他很擅长建立这种关系：在雅典，他住在了阿齐埃奥利公爵（ducs Acciaioli）的宫廷当中。在米斯特拉（Mistra）的君主那里，他度过了一个冬天，新柏拉图主义哲学家盖米斯托斯·普莱松（Gémistos Pléthon）就是在那里讲学的。

齐里亚科于 1434 年和 1435 年之间在希腊做了一次伟大的旅行。在这次旅行以及随后在 1444 年和 1447 - 1448 年的两次旅行期间，齐里亚科除几个地区没到以外，游历了组成今日希腊的所有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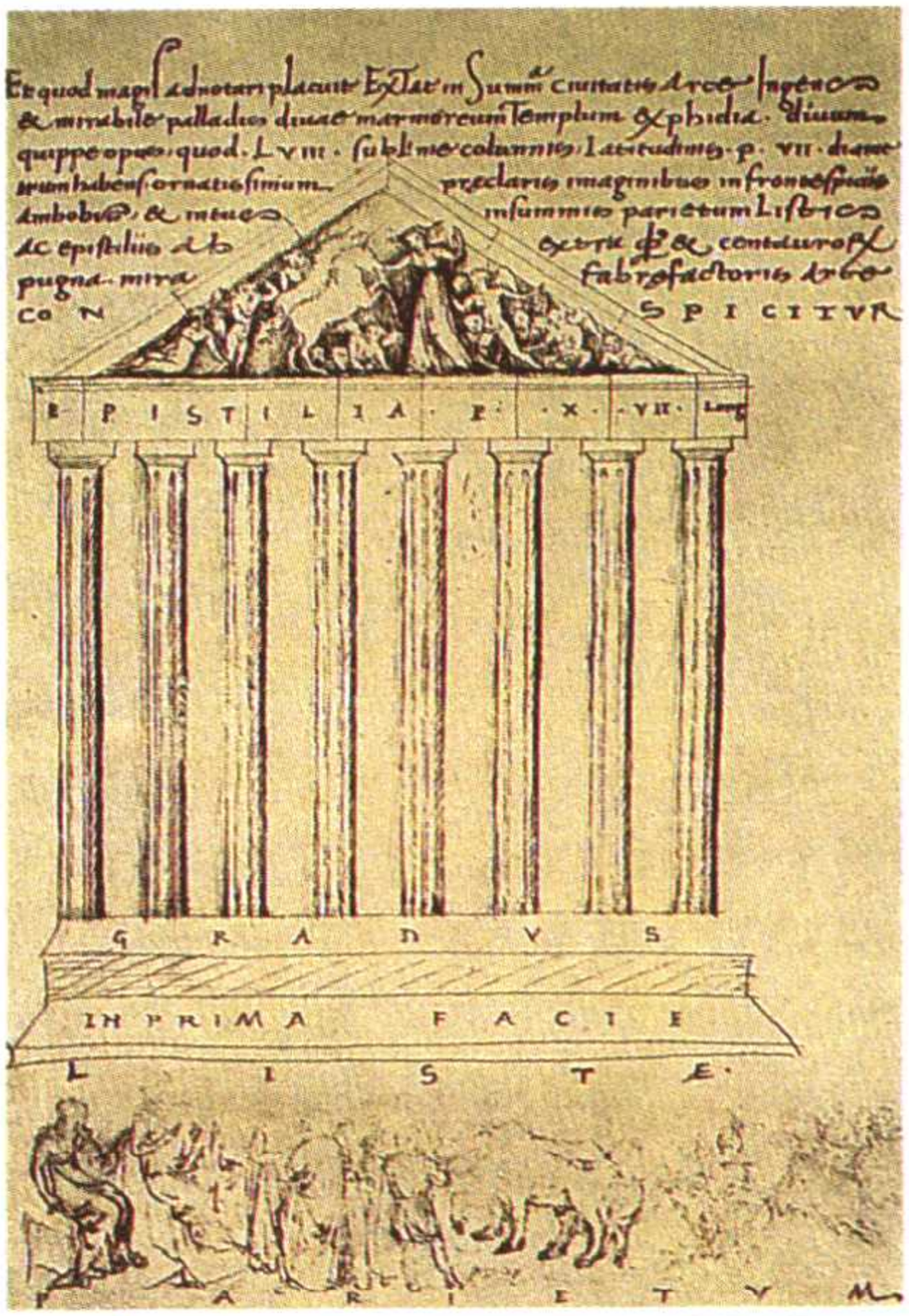
《古物注释》主体部分的失传是无法弥补的；然而，凭借其幸存的残篇和书信，人们能够对这个安科纳人的治学方法形成一个足够清晰的印象。

他对在提洛岛（Délos）发现的资料所绘制的素描图往往是非常精确的，然而他对铭文的解读并不十分令人满意，这也许是他理解得不太好，也许是原文很难释读。

这6份资料来自提洛岛；齐里亚科在1445年到过那里。这位安科纳人很费劲地绘制了幼稚的素描图：那克索斯人（Naxiens）的长发妇女雕像和巨像（Colosse）的腿部不过是很不完善的略图。相反，标有尺寸的巨像底座——当时还有一只脚在原位，现已遗失——的速写却更为接近实物；所有铭文均被仔仔细细地摹写下来，即使对之释读并不完全。人们识别出的是那克索斯人对阿波罗（Apollon）的祭献品、本都的密特里达提（Mithridate du Pont）奉献的两件祭品以及马其顿的腓利普五世（Philippe V de Macédoine）的祝圣品。

尽管他的铭文学成就很大，他还是因无所顾忌和毫不犹豫而犯了一些错误。人们有理由怀疑他所抄录的德尔菲（Delphes）神谕的可靠性，这些神谕希罗多德（Hérodote）也讲到了，只不过是文本上有某些出入而已。这似乎表明他的神谕抄本直接取自希罗多德的著作。同样，他所声称的在石头上读到的一些小诗和讽刺短诗的词句实际上是从普拉努狄斯（*Planude*）的《诗集》（*Anthologie*）中借用来的。不过我们要为他辩白：他那时候科学中的道义规范尚未确立，人们也没有很明显地意识到有引证资料的必要，这种习惯延续了很长时间，这也是考古学的史前史所具有的特点。

依据现代方法批评齐里亚科的工作并不是把他的学术著作说得一无是处。他是第一个意识到物质遗存的历史意义把它视为复原文明史时头等重要的证据的人。而这种证据为人们所重视则要等到几个世纪之后。




## 喜爱幻想的齐里亚科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齐里亚科意识到，随着奥斯曼人（Ottomans）的推进，古代世界的末日即将来临。他于是急急忙忙尽可能多地收集尚能得到的希腊遗产。他呼吁进行十字军远征的深层目的是想延迟希腊文化存活下来的部分的毁灭。与他同时代的人文主义者对此感到不可思议，有时还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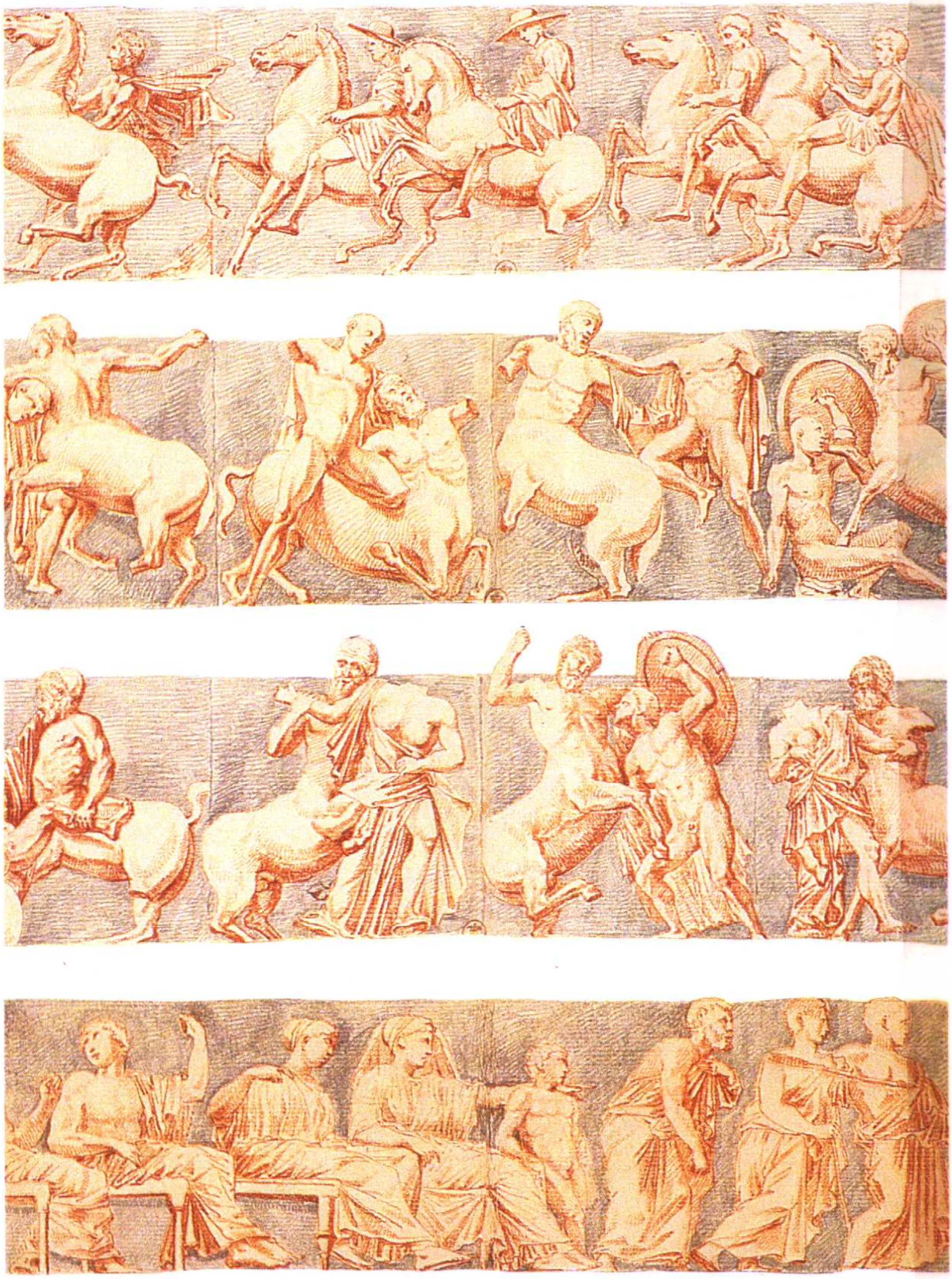



为他试图复活古代的想法是一种可笑的空想。历史学家波吉奥（Pogge）不无恶意地写道："安科那的齐里亚科这个废话连篇的人、喋喋不休的演说家有时在我们面前哀叹罗马帝国的衰落和瓦解，他似乎正饱受着这场苦难。"

也许是齐里亚科的想法有点不现实，也许他感到自己担负着一种救亡的使命；他在一座教堂中释读一些墓志铭时，有一个教士询问他此举的意图，他不正是这样回答的吗："让冥府的死者复活正是我的职业。我已经学会了皮提娅女祭司（Pythie）的这门技艺，即阿波罗的神谕。"异教和基督教在齐里亚科的宗教感情的表达中自然而然地相互融合在了一起。作为一个真诚的天主教徒，他捍卫基督教徒阅读异教作家作品的权利，他认为基督与朱庇特（Jupiter）相似，他祈求他的神灵墨丘利（Mercure)的保佑，他为提洛岛上的一幅墨丘利的浮雕绘制了素描图，在他于一个暴风雨的夜晚离开该岛时，他向墨丘利做了这样的祈祷："墨丘利，乐善好施的艺术、精神、智慧和雄辩之父，你用你那非常圣洁的神性重振了我们的灵魂和我们的勇气，你在海洋上和陆地上保障我们穿越拉丁姆（Latium）、伊利里亚（Illyrie）、希腊、亚洲和埃及的愉快旅行吧。啊，高贵的神灵，你现在还保护着我们的智慧、我们的精神和我们的雄辩术。"

在这幅齐里亚科作的芭苔侬神庙的西正面的素描图（左页上图）中，除了柱子的准确数目和对多里斯柱式（l'ordre dorique）的描绘外，从建筑学的视角来看，没有一处遵守比例。而且，排挡间饰也没有了，台基被减少为两层。在带有表现波塞东（Poseidon）和雅典娜争夺阿提卡（Attique）画面的三角楣的复原图中，人们也能看到同样的空想手法。这两个主角只剩下了雅典娜一个，她处于中间，她的长长的衣裳让人更多想起的是文艺复兴而非古代。齐里亚科把波塞东和他的车马从画面中弄丢了，却将三角楣上添满了与实物毫不相符的裸体有翼的小人物形象。

安科纳的齐里亚科的两幅素描：左页下图为亚里士多（Aristote）胸像，上图为拟古风格的提洛岛的墨丘利像。



“在希腊旅行的时候，应该有一本鲍萨尼亚斯的著作在手，以便发现那些引人注目的事物，因为以前鲍萨尼亚斯就是以同样的好奇心进行这种旅行的；以便了解忒撒利亚（Thessalie）的坦佩（Tempé）、帕尔那索斯（Parnasse）山、德尔菲神庙和雅典的废墟这些景致；以便收录尽可能多的铭文。”

科尔贝尔（Colbert）于1679年送交M.加朗（M. Galland）的《关于在利凡特地区旅行当中可以从事的考察的研究报告》

# 第三章
# 贵族与学者



这幅芭苔侬神庙排挡间饰和中楣的素描图被认为是J.卡雷（J. Carrey）的作品（1674年）。在神庙的很多雕像和浅浮雕遭到严重破坏严重或者丢失的情况下，这些图画构成了完整复原神庙雕刻饰件的必不可少的原始资料。



这幅莱姆诺斯（Lemnos）被围的图画表现了15世纪奥斯曼人闪电般的进军。继阿提卡（1456年）、摩里亚（Morée, 1460年）、优卑亚（Eubée）之后，莱姆诺斯（1478年）也落入奥斯曼人的奴役之下。这些次战争使利凡特地区的海水被鲜血染红。穆罕默德二世（Mahomet II）以一支庞大的海军对奈格莱蓬提（Nègrepont，在优卑亚）发动进攻，该地居民展开英勇抵抗，妇女也登上城头作战。土耳其征服者屠杀了该城的男子，将妇女和儿童掳掠到君士坦丁堡变为奴隶。

在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前，土耳其人就已开始了对希腊某些地区的征服。随后没有几年，他们就吞并了整个希腊大陆。继而罗德斯岛（Rhodes）、塞浦路斯和基克拉迪斯群岛（Cyclades）也于16世纪沦陷；只有克里特岛（Crète）坚持抵抗到17世纪；1571年基督教徒仅在一日之内便取得了对土耳其人的“莱庞托（Lépante）胜利”。持续不断的战争、害怕报复的恐惧感、土耳其人对间谍活动的敏感、警觉以及猜疑心理，更不用提海盗劫掠所带来的危险了，所有这一切都使旅行家的形影变得寥寥无几。



## 旅行中的人文主义者

不过，新的政治环境即将使西方人能够更容易到达利凡特地区。外侨权利协定的签定、若干天主教传道团，特别是耶稣会（Jésuites）和嘉布遣会（Capucins）的建立都促进了同希腊各地的联系。



在16世纪，希腊本身并非一个旅行的目的地，人们是在前往耶路撒冷或君士坦丁堡的途中顺路到那里参观的。因此人们总是能在那里遇见很多朝圣者、一些批发商以及作为新现象的外交使团的成员。旅行者不但人数更多了，而且还都受过更好的教育。他们共同拥有一种新的精神状态，这种精神状态的特点是发现新事物的好奇心、对地理情况——托勒密的著作被大量出版——和古代历史的兴趣。一言以蔽之，他们正在投身于人文主义思潮；这种思潮已发展至意大利境外，在土耳其征服后逃难到西方国家的拜占廷知识分子又进一步推动了它。

在这些旅行家当中，有些人学识颇为渊博，例如博物学家兼医生皮埃尔·博隆（Pierre Belon）。1546年，他开始在爱琴海群岛上研究植物、动物和矿物，核实古代博物学家和地理学家传授的知识。象他一样把从中世纪继承来的传统和迷信隐藏在古代文化的美丽外表下者还有人在。安德列·泰韦（André Thevet）便是这样的人。这位修道士地理学家于赴圣地朝圣完返回的途中在几座岛屿上做了逗留，并提到了提洛岛。总地说来，流传到我们手上的记述非常贫乏而又平淡无奇，人们对于希腊的情况，不但对内地，而且对雅典，仍停留在一种十分无知的状态当中。同样，图宾根（Tübingen）的著名的希腊学家马丁·克劳斯（Martin Kraus）与君士坦丁堡的某些希腊人曾有书信往来，他问他们雅典是否已被破坏而代之以一座渔村。1554年，西奥多洛斯·吉果马拉斯（Théodore Zigomalas）的复信虽然证实了它仍是一座依然有人口居住并且一直有其古建筑装点的城市，但并没有提供更多的详细信息。



这3幅素描出自国王亨利二世（Henri II）的内室侍从、地理学家尼古拉·德·尼古莱（Nicolas de Nicolay）之手。他曾为阿拉蒙（Aramont）领主的随从中的一员，并担任过法国驻土耳其帝国大使。1551年，他到希腊旅行，收集了大量的关于该国及其居民、风俗和服装的资料。这几幅生动的略图是他用来装饰他的描述文字的，这些略图使他的报导获得了成功［左页下图为希腊“贵族”；旁边图为开俄斯（Chios）贵妇；下图为希腊商人］。

## 收藏的热情

在希腊进行伟大旅行的时代要等到17世纪才开始，这些旅行经常受到收藏家的资助。收藏的癖好、占有稀世珍品的欲望从弗朗索瓦一世（François Ier）时起普及开来。收藏意识对于强国和富有的博学之士来说是声誉的表征，而且还是对过去遗迹的更为客观的兴趣的标志，过去的遗迹不再被从稀有的角度加以考虑，而是被看成是科学资料。自16世纪以来，意大利有了某些引人注目的古物收藏。17世纪初在英国，这一领域内的先驱是阿伦德尔（Arundel）伯爵，他为国王查理一世（Charles Ier）和白金汉

提香（Titien)于1568年绘制了这幅雅科波·斯特拉达（Jacopo Strada）的画像。画面指明了雅科波·斯特拉达身为罗马公民和“古物收藏家”。作为他那个时代的收藏家，他的兴趣在于收藏纪念章、钱币——人们可以看到桌子上有这些东西——和雕像——他手里拿着一尊维纳斯(Vénus)雕像。他有机会就为巴伐利亚和奥地利宫廷买卖他发现的东西。



（Buckingham）公爵所仿效。作为一位热爱艺术的外交家，他构想出了前往希腊搜求雕像和铭文的计划。他真可谓是想“把古代希腊搬到英国”；为了这个目的，他雇佣了一批给他积极搜寻古物的中间人，建立起了一个中间人网络，他还把他的宅邸和花园变成了供收藏家参观的博物馆。

## 一位大使的离奇游历



法国也不甘寂寞；马扎兰（Mazarin），随后是路易十四（Louis XIV）和科尔贝尔都有利用法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来增加他们的收藏品和图书馆藏书的想法。在他们当中，努安特尔侯爵(marquis de Nointel)表现得颇为突出：他是一位才子和伟大的古物鉴赏家，他具有一种难以满足的好奇心，他于1670-1679年出任大使，他大使任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旅行中度过的。在航海周游利凡特期间，他在后来翻译《一千零一夜》（*Mille et Une Nuits*）的东方学家安托万（Antoine）的陪伴下，在基克拉迪斯群岛上停留了很长时间。利凡特之行是对他所游历地区各方面情况的一次全面认真的考察。此外，这位侯爵还一心想要把这次行程变成一次科学旅行，他要求驻希腊的各位领事和传教士提供关于该国历史和现状的资料汇报。不幸的是，努安特尔的这些严谨品格当中还羼杂着珍宝收藏者甚或寻猎者的贪婪。凡是在他所到之处，他都要收集石碑、浅浮雕、铭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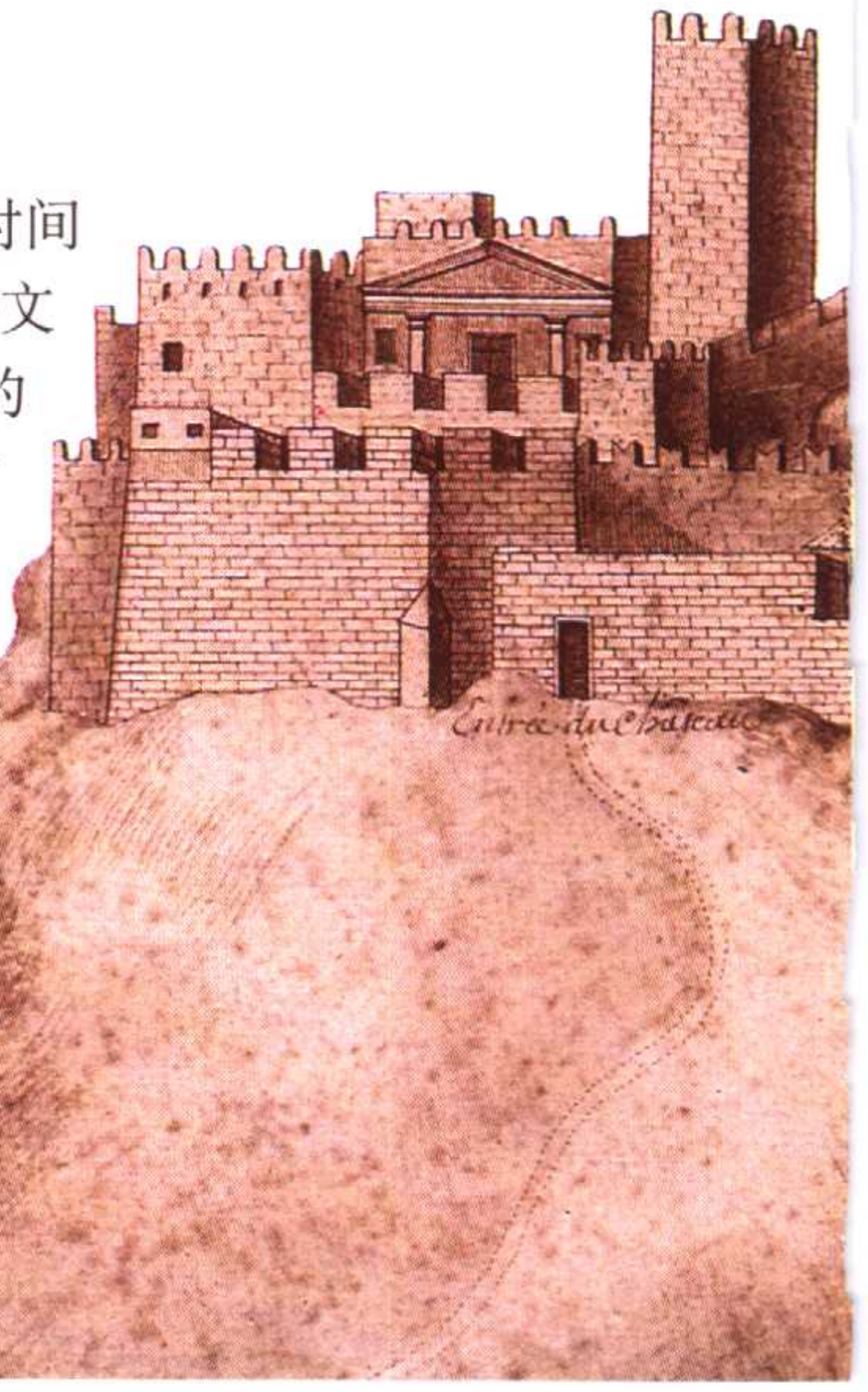
当努安特尔侯爵在1674年参观芭苔侬神庙的时候，神庙的西三角楣几乎是完整的。现在人们只能通过J. 卡雷的素描图才能了解其总体构成。威尼斯总督摩洛西尼（Morosini）于1687年包围雅典后，想为威尼斯夺取一件战利品，便让人拆下了表现雅典娜的车马的雕刻群。由于施工不当，这些雕刻在山岩上面被摔碎了。

1674年11月4日，这位大使以其一贯的豪华排场来到雅典。他被允许参观卫城——这个在威尼斯和奥斯曼帝国之间由武力维系的和平时代中少有的特权——，面对那些辉煌的建筑物及其装饰，他赞叹不已，他是第一个认为这些东西比罗马的同类东西更为高超的人："任何人都没有像我一样遇到了这么多机会来仔细鉴赏所有这一切艺术财富，可以说存在于密涅瓦（Minerve）神庙周围的城堡中的这些东西超过了罗马的浮雕和雕像中的至美者。[……]人们对于这些真品所能作出的最高评说就是：它们若被置于陛下的陈列馆或者画廊之中，将是当之无愧的。在这些陈列馆和画廊里它们会享受到这位伟大的君主给予各种艺术以及创造艺术的各门知识的保护。"人们原谅了努安特尔侯爵以他进行的是头等重要的工作为名的渎圣企图——还有另外一些人也有这种企图——，而他的这种工作也令他声名卓著：他为芭苔侬神庙的三角楣、排档间饰、中楣上的200个人物形象绘制了素描图，而这些东西中有一部分在1687年的轰炸中毁于一旦。

17世纪时，雅典卫城是一座坚固的要塞，由在其山岩的天然陡坡上加固的一个复杂的防御工事系统进行防卫。低处修筑的一道围墙与海罗戴斯·阿提库斯剧场（le théatre d'Hérode Atticus）连接在一起；处在上面的第二道防线沿着古代的城墙延伸。图中左边，出现于筑有雉堞的城防之间的是卫城的山门和法兰克人的塔楼，自中世纪以来，山门被加高并围上了城墙。

## 博学者与传教士

整个一场探索运动都是在17世纪最后三分之一的时间内发生的，法国人是这场运动的排头兵。在具有重要文献价值的作品当中，芭苔侬神庙的素描图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同时还应该提到雅典的平面图，即所谓的嘉布遣修士的平面图（1670年）、神甫巴班（Babin）的记述（1672年）和领事吉罗（Giraud）的记述（1675年）。这一系列紧密关联的文献和地图并非某些旅行者的功劳，而应归功于某些居住于雅典的人，他们对该国达到了深入的了解。他们全都是博学之士，所从事的事业也不为一己私利。领事吉罗曾受过良好的教育，会说希腊语和土耳其语。对于一切旅行者来说，他都是他们的学识渊博的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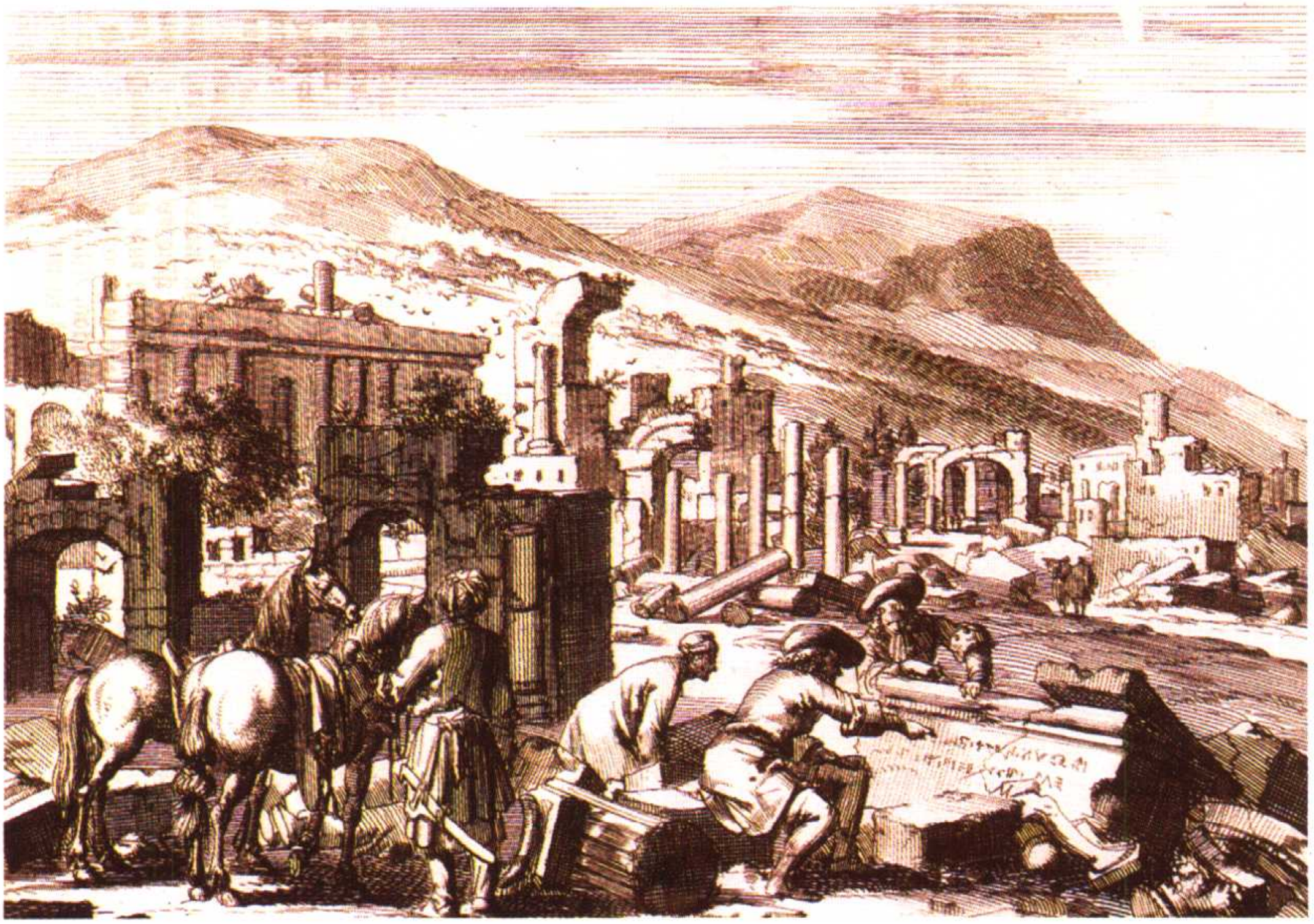


游。据雅各布·斯蓬（Jacob Spon）说，他带领游客穿过这座城市，没有人比他更熟知雅典的古代；他是第一个把芭苔侬神庙的雕塑归为菲狄亚斯之作的人。

被派到希腊的法国传教士都接受过踏实的知识培训，他们在古迹保护和研究方面发挥着积极有利的作用。嘉布遣会修士购得了吕西克拉泰斯歌舞队纪念碑（monument chorégique de Lysicrate），该纪念碑通常被称为“德摩斯提尼灯塔”（Lanterne de Démosthène），它也随之被那么经常地加以描述和艺术表现。土耳其人对外国人心存猜忌，禁止他们绘制图片和做任何记录，而这些神甫则利用他们的身份绘制了哪个时代的第一幅最详细、最精确的雅典城全图。

稍后，一位赴希腊的耶稣会传教士神甫巴班发表了他的游记。他对于雅典的描述与嘉布遣会修士所绘制的地图不谋而合。在学者雅各布·斯蓬看来，这一描述是全面而严谨的，足以令他亲自将之公布于众。几年之后，他正是一只手拿着鲍萨尼亚斯的著作，另一只手拿着神甫巴班的小书来到这座伯里克利（Périclès）之城的。

雅典卫城的台地上布满了卫戍部队居住的房屋。芭苔侬神庙在这一片混乱的场景的衬托之下显得颇为突出。画中并未表现神庙的房顶和东三角楣，但神庙的建筑结构是完整的。神庙的东南角加筑了一座尖塔，这也是神庙自 1460 年以来被改做清真寺的明证。这幅素描描绘了 1687 年时卫城的情况，也正是在同年卫城蒙受了那场巨大的灾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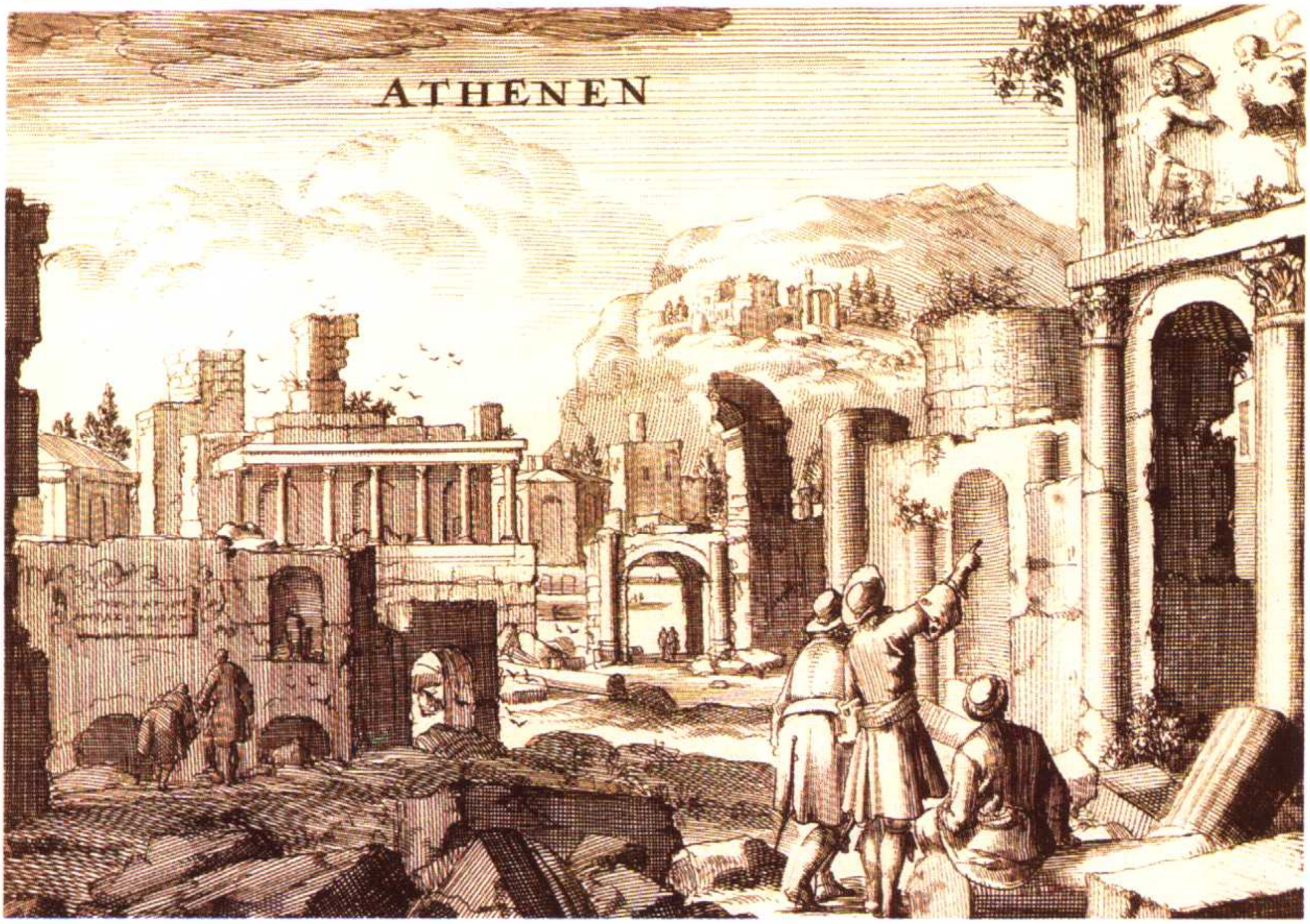


## 雅各布·斯蓬的考古学方法

在为考古学的诞生做出贡献的学者当中，斯蓬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考古学”（archéologie）这一名词就是由他在其铭文学著作《古代杂识》（*Miscellanae eruditae antiquitatis*）的前言中首次使用的。他认为古典语文学提供的资料不足以推动历史科学的发展，人们还须借助诸如铭文和墓碑等其他资料。古代的遗迹是用铁器和凿子在石头和大理石的书页上写就的书籍。系统地利用铭文、不断地将文献与地面上的可视资料进行比较构成了斯蓬考证方法的原则。在无官方使命的旅行期间，他运用这一方法来满足他的好古之心；也是在这种方法的指引下，他由英国植物学家乔治·魏勒（Georges Wheler）陪同，经意大利和小亚细亚抵达了希腊。

斯蓬给我们留下了关于穿行于这些国家的简朴无华的记述。他每到一个地方，无论是提洛岛，还是德尔菲，抑或是斯米尔纳（Smyrne）……，他忙着做的事情只是发现和抄录铭文。

在旅行过程中，斯蓬抄录了2000多篇希腊和拉丁铭文。这里人们看到的是他在以弗所（Ephèse）专心致志地进行他的释读工作；但是考古学不只限于研究纪念章和铭文，“古人也正是通过这些东西来传达他们的宗教、历史、政治、艺术和科学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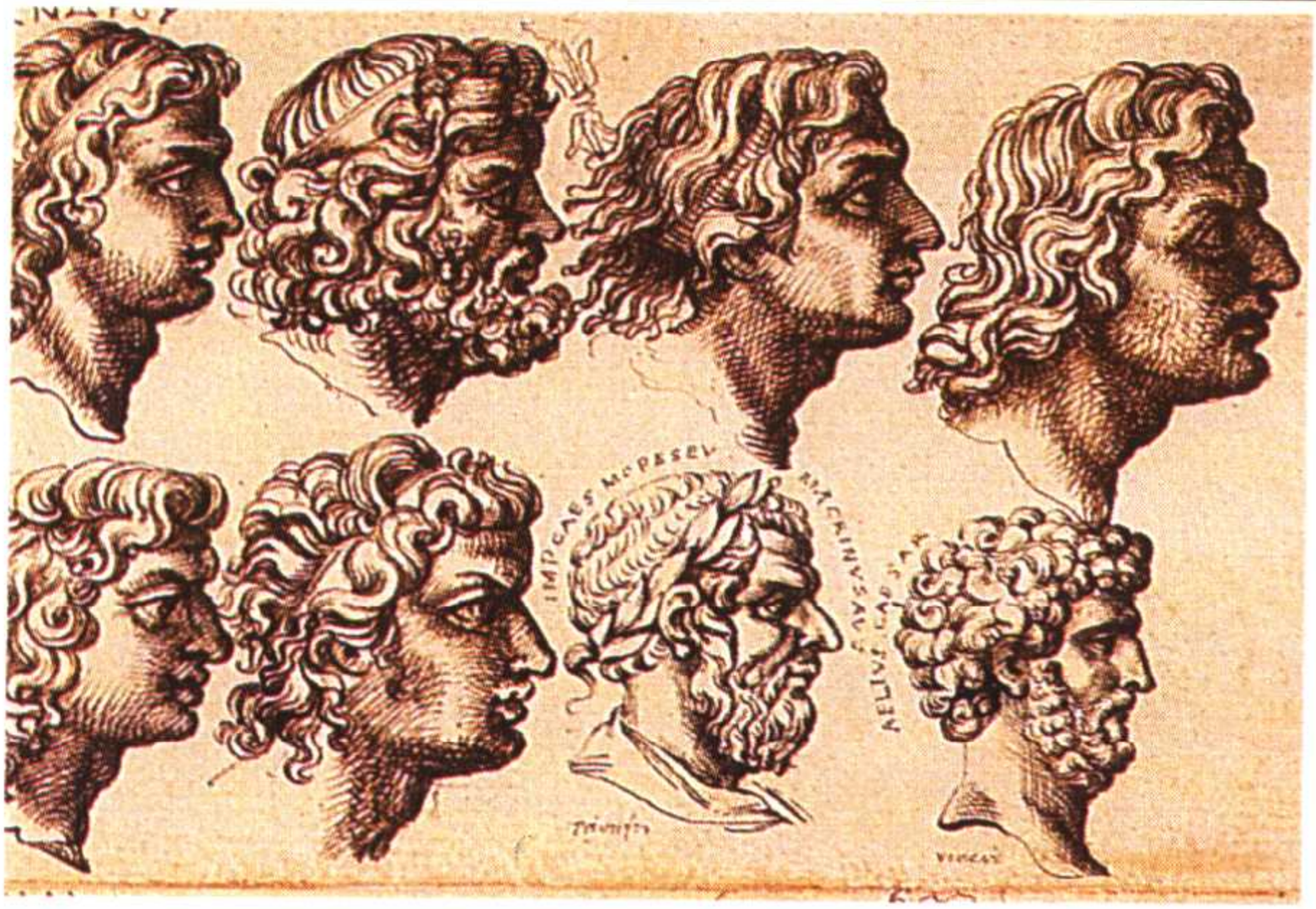



## 1676年旅居雅典

由魏勒陪同，斯蓬在雅典进行了第一次伟大的考古探索。17世纪的雅典不再是鲍萨尼亚斯看到的那个雅典了，地面上布满了住房，拜占庭时代的教堂、清真寺，还有废墟！在卫城上，驻扎着士兵的破房子拥挤在古迹之间。在这种没有清理的地面上进行调查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还应当考虑到驻军的监视和居民的敌意。不过在同时，古迹要比今天数量多，保存得也更为完好。它们并没有因为奥斯曼土耳其人的到来而遭受太大的破坏。在权威人士的眼中，与这座城市的历史相联系的伟大纪念物无疑保护了这座城市，“偶像神庙”——穆斯林就是这样称呼芭苔侬神庙的——的雕塑是被禁止接触的。

在旅程中，斯蓬利用古代作家著作中的证据和现代旅行家的某些描述来核对他的考察，努力复原遗址和古迹的原名和原貌。此外，他还成功地纠正了很多业已为

在领事吉罗的带领下——这幅版画中表现的第三个人物无疑就是他——，斯蓬和魏勒探访了雅典。斯蓬超越了传奇和传说，“利用古迹来揭示历史”。“在这些方面，最正确的做法是，如果没有亲身考查它们，如果没有用理性的天平来称量它们，就不去接受任何一种通常的成见。”



在很年轻的时候，斯蓬就在里昂开始收藏纪念章；他有时会做些生意，因为这位“身兼古物收藏家的医生”不太有钱。他自费出版了他的《古代杂识》的第1卷，而第2卷没有问世：斯蓬是一位宽容的人文主义者和一名被证实犯有罪行的新教徒，《南特敕令》（l'édit de Nantes）触及到了他，他于是流亡瑞士，于1685年死在那里。

人接受的看法：他最先认出了无翼的胜利女神（la Victoire）神庙，即雅典娜·尼凯（Athéna Niké）神庙，该神庙于1687年被推倒，其原址建起了一座防御工事；他还对吕西克拉泰斯纪念碑做出了正确的解释：“为颂扬那些在一次这种著名的活动（戏剧比赛）中取得胜利的人而树立的一座荣誉纪念碑”；在通常被称为“苏格拉底墓”（Tombeau de Socrate）的“风塔”（la tour des Vents）中他认出了一座水钟。

但是这位考古学家也犯过错误:他把女像柱误认为是鲍萨尼亚斯在卫城山门（Propylées）下看到的“苏格拉底的美惠三女神”（les Grâces de Socrate）；他在芭苔侬神庙前抒发了他的赞赏之情：“它的景致令我们心生崇敬，我们的眼睛会不知疲倦地长时间凝视着它。”然而也正是在这里他犯下了他最严重的错误。他搞反了三角楣的方向，因为他没想到神庙是正门向东的。他不同意把那些雕塑归为菲狄亚斯之作，而且将其年代向后推至哈德良时代，因为他相信他认出了雕塑所表现的人物：“那一侧最后面的两尊雕像，坐着并半裸的一尊为皇帝哈德良，他身旁是他的妻子萨宾娜(Sabine)。我想没有人在我之前注意到了这一值得注意的特殊情况。”这是一个令人遗憾的错误。因为它很快就被人们接受了，而且在19世纪芭苔侬神庙的



风塔在17世纪的雅典就已是受人喜爱的一处古迹。这座八角形的白色大理石塔上装饰有各个方向的风的象征形象，其中掩蔽着一座公元前1世纪时建造的水力钟。

大理石被运抵伦敦之时，它还是通行的看法。尽管斯蓬有这些不好的习惯做法，他的记述仍是一项重要的成果；读者给予他以极大的好评，在这一点上，读者做得毫无错误。《意大利、达尔马提亚、希腊和利凡特游记》(*Le Voyage d'Italie, de Dalmatie, de Grèce et du Levant*)被译成几种语言，一直到浪漫主义时代，它都是受过教育的旅行者的导游书。

一场始料未及的灾难即将降临于这件作品的盛名之上：斯蓬这位作家是最后一批看到并描述尚未破坏的芭苔侬神庙的欧洲人之一。1687年9月26日，在威尼斯人包围雅典期间，一枚炮弹落在了神庙之上，神庙当时正被土耳其人用来存放弹药，爆炸使神庙遭到了毁坏。“我们将永远哀叹一座建筑完美，历经两千载，岁月的摧残和人世中的野蛮行径都不能将它奈何的宏伟古迹竟毁在了基督教欧洲的手里。”拉博德伯爵（comte de Laborde）对意大利人这一恶行的谴责也适用于法国人、英国人和德国人，他们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成功地拆毁了芭苔侬神庙，并将希腊古典时代建筑的雕塑饰件运到他们的国家。

威尼斯工程师维尔内达（Verneda）的这幅素描图再现了雅典卫城被炸的情景，他曾亲眼目击了这一幕。先是起火，随后一场巨大的爆炸把芭苔侬神庙变成了废墟：房顶被炸掉，内殿的墙和众多的柱子崩塌散落，这使神庙断开成两部分；菲狄亚斯雕刻的中楣的一部分也被炸得粉碎。这次爆炸如此强烈，以至于这座建筑的残骸被抛掷到了围攻者的营地当中。





“当我离开巴黎去游历希腊的时候，我只是想满足我年青时代对于古代那些最著名的地方的热爱之情。我在一种贪婪的求知欲的驱使之下前去饱览奇迹；一本荷马的著作和一本希罗多德的著作在手使我事先品尝着游遍这一著名而美丽的地区的乐趣。最后，我决定让自己持续不断地沉醉于一个连最小的悬岩都能让人联想到那里有神和英雄居住的国度之中。”

舒瓦瑟尔 - 古菲埃侯爵（Comte de Choiseul-Gouffier），1782 年

# 第四章
# 希腊的神话



画家 J. 斯图亚特（J. Stuart）和建筑师 N. 瑞维特（N. Revett）的游历以及他们著名的作品标志着人们对于雅典古建筑的认识历程中的一个决定性阶段。左页为“雅典人”斯图亚特的自画像，画中的他正在画埃瑞克透斯神庙的素描图。



18世纪，对希腊的爱好成了一种时尚，旅行者们纷纷涌向那里。除了传统类型的观光者外，前来参加旅行的还有某些艺术家和富有阶级中的年轻人，这些年轻人在完成学业以后又通过环游地中海来完善他们的教育。将这种环游称作“伟大的旅行”则是恰如其分的。旅行回来后，这些人全都拿起了笔，出版了旅行文集，这些旅行文集的插图也愈来愈精美，这也是图书业的成功。他们对希腊的这种迷恋是与时代精神相一致的。启蒙哲学信奉两种主要思想，即本性思想和理性思想。不过人们最终还是承认这两种思想都是古代文化的特性。于是在1750年以后，人们致力于向古代及其审美的和道德的价

忒撒利亚人阿尔凯达摩斯（Archédamos）自称得到了宁芙女仙们的启示，整修了地处瓦里（Vari）附近、叙美托斯山（Hymette）斜坡之上的这座岩洞。这种糅合在一处的自然之美和考古好奇心吸引了昌德勒（Chandler）和帕尔斯（Pars），而将这两种东西糅合起来也正是他们的同时代人的感受的特点。

值观回归。作为“艺术的祖国”、“审美观的导师”，希腊成为了欧洲的学校。

希腊则在一个不同的领域内，走出了黑暗，出现在政治舞台上。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削弱了奥斯曼帝国，帝国的式微为列强的野心开辟了道路。列强正考虑着瓜分帝国和实现“希腊计划”。这一计划则意味着希腊人的解放。俄罗斯一心想向南扩张，以东正教的保护人自居，策动了若干次起义。18世纪的几次俄土战争使奥斯曼帝国政府的衰落急剧加速。

## 旅行更加便利

这种形势引起了土耳其人对外国人态度的变化。监视变得松驰了，观光者得益于此，更容易在希腊往返巡游和进行考察，以及深入内陆，一直到达马其顿、忒撒利亚或者马尼（Magne）。正是这一时刻出现了一股探索古物的潮流，土耳其当局对此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当然，每次旅行还都有其危险——需要让土耳其近卫军士兵陪同以保障不受土匪（*klephtès*）团伙的袭扰，并且时常还有瘟疫流行——但是这个危险的探索时代已接近尾声，而浪漫主义的旅行时代的号角正在吹响。

在希腊人方面，他们也不是与这种新的形势毫不相干的。俄国人的保护使他们的海上和商业力量得到加强；经济的良好发展有助于资产阶级的产生和民族意识的成长，特别是启蒙思想和流散海外的希腊人努力发展的教育事业也为民族意识的发展提供了营养。

阿扎曼狄奥斯·科拉伊斯（Adhamandios Coraïs）就是这样在巴黎普及希腊古典著作，并使现代希腊语得以定型的。在希腊人民族认同感建立的过程当中，这位海外旅居者也发挥了自己的作用。凭借他对古代文化的顶礼膜拜，他唤醒了一个被压迫民族对祖先的记忆。



上图为菲洛帕波斯（Philopappos）的墓碑，系公元2世纪雅典人为纪念作为其城市恩主的一位叙利亚君主而竖立的。它单独矗立于缪斯山丘之上。其正面内曲，饰以壁柱和雕像，并朝向雅典卫城，它以这一切为艺术家们提供了灵感。斯图亚特的这幅水彩画极为忠实逼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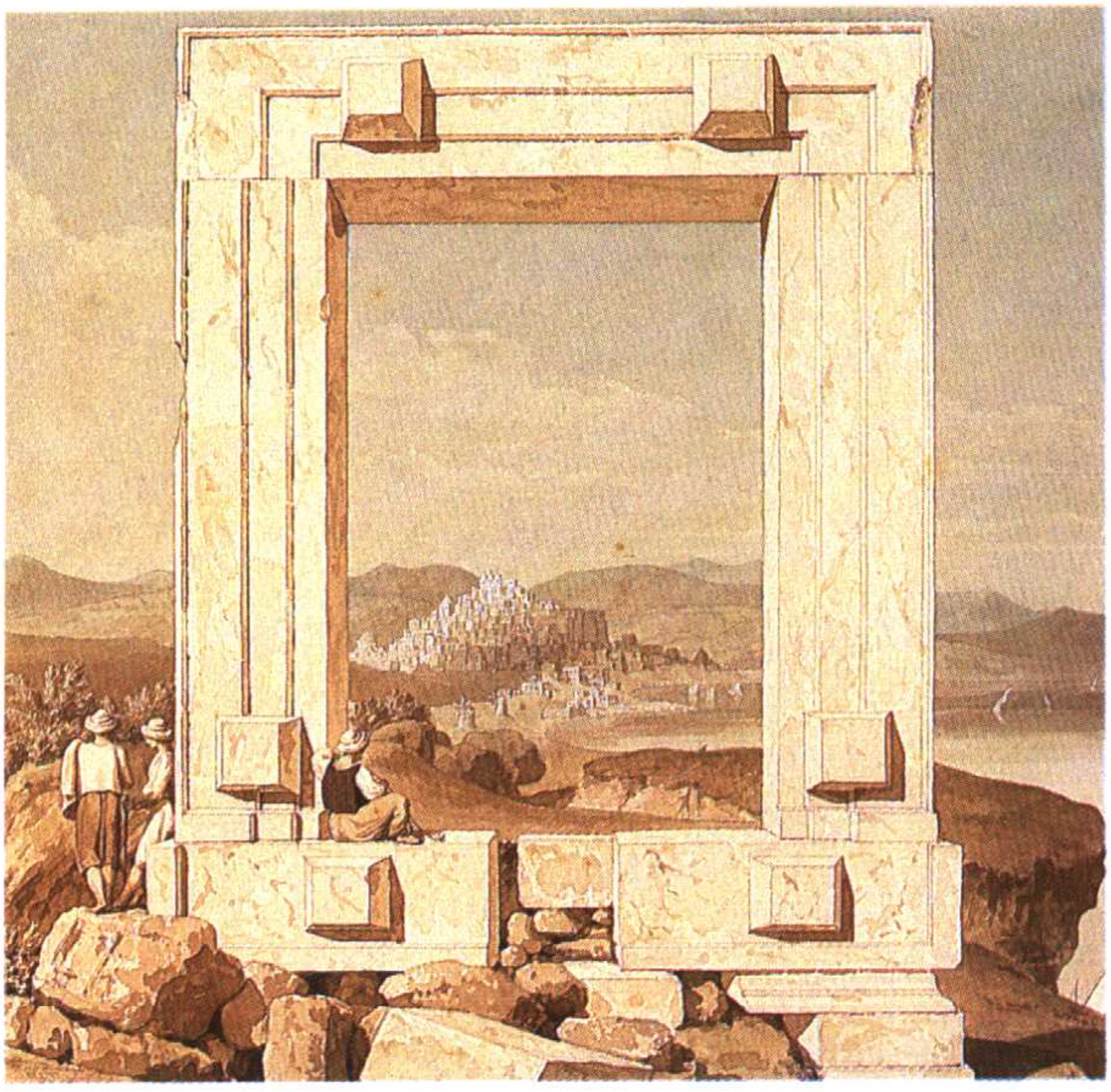
直到18世纪末，希腊都是利凡特之路上的必经之地。这也导致了旅行者们前去发现小亚细亚的希腊遗址。希腊学家昌德勒和画家帕尔斯于1765-1766年间来到了米利都附近的狄迪马（Didymes）阿波罗神谕圣所。旁边图画为帕尔斯的作品，他准确地描绘了神庙的柱头，但又把它置于一种具有异国情调的背景之中。这种将考古学的精确性和对如画景致的喜爱杂糅在一起的做法一直到19世纪都是游记文学的一个特点：法国人普克维尔（Pouqueville，1770-1838年）在这一文学体裁上成就卓著。不过，在同时，英国的利克（Leake）上校（1777-1860年）提出了科学报导的原则，创立了历史地理学。

## 奉命考察的学者和语文学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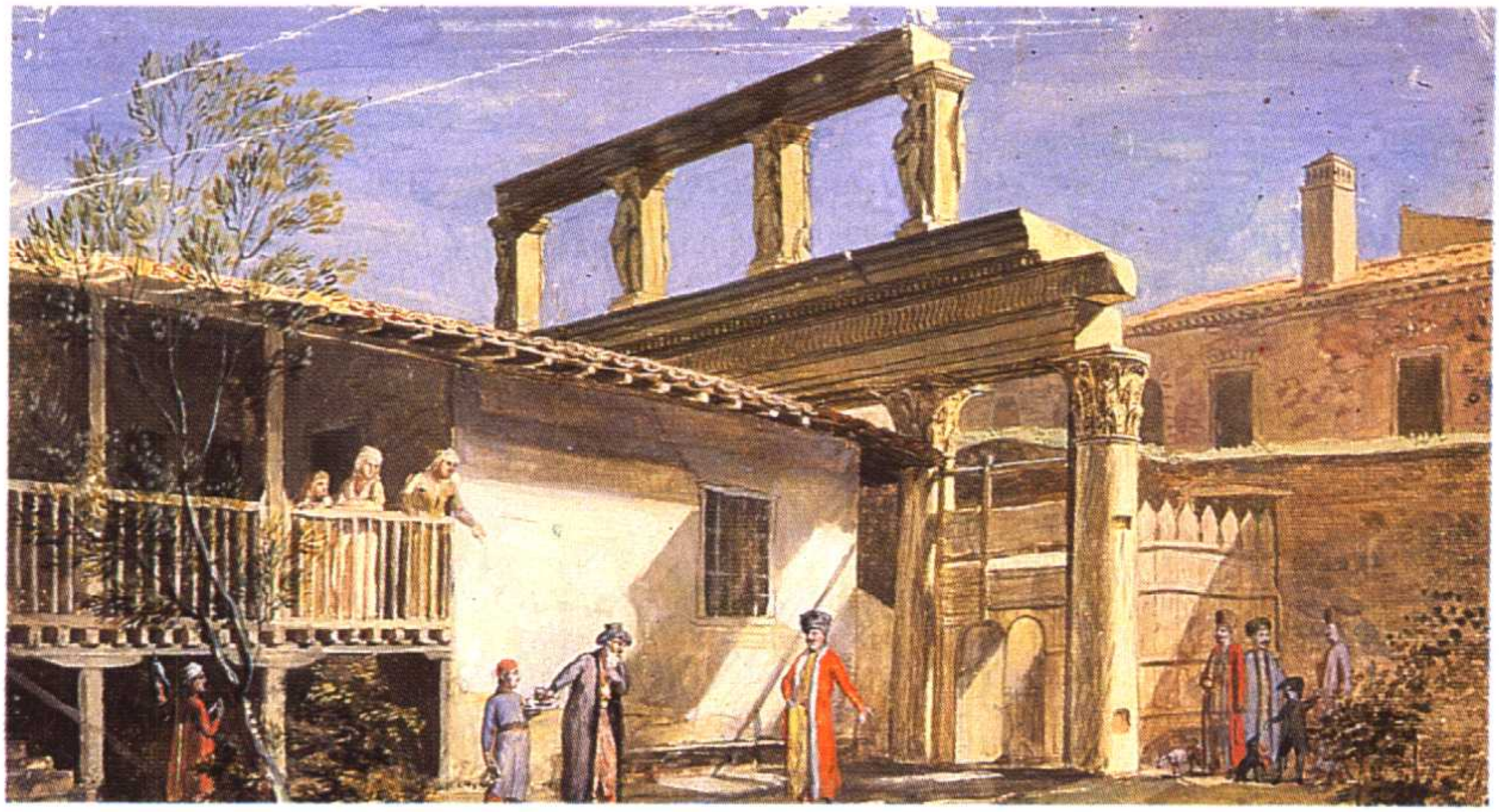
所有这一切在18世纪没有发生变化。官方考察团继续被派往东方。约瑟夫·皮通·德·图尔讷佛尔（Joseph Pitton de Tournefort）是当时一个著名的博物学家。他于1700年前往爱琴海群岛，“实地核实古人的知识，而且特别是关于自然史，主要是关于植物的知识”。然而这位植物学家并没有忽视古物，他以一种批判的精神对古物的情况做了报导。其他考察团大多以为王室图书馆搜罗古代的纪念章和手抄本为目的。路易十五（Louis XV）统治时期修道院院长富尔蒙（Fourmont）所进行的就是这样一种考察；对于其考察，至今仍存争议。他以破坏了斯巴达（Sparte）为自豪，他带回的收获是一批真伪参半的铭文。在这个世纪末，伟大的启蒙主义希腊学家让-巴蒂斯特·当斯·德·维优瓦宗（Jean-Baptiste d'Ansse de Villoison）继续从事对手抄本的这种坚持不懈而又颇不可靠的搜寻工作，他又亲自带回了一些古代铭文。然而，语文学不再能够激起人们那么大的兴趣了。



在最近各次不事文学浮夸的伟大的科学旅行中，图尔讷佛尔参加了一次。上图为来自凯阿(Kéa)的一尊妇女雕像，她被认为是复仇女神[Némésis](？)。该素描图为奥布里埃（Aubriet）所作，他曾陪同图尔讷佛尔。



旁边图为那克索斯的阿波罗神庙的神龛内门（公元前6世纪）。“这座门只由三块纯白大理石建成，具有一种寓于简朴之中的高贵风格：其中两块大理石作门柱，第三块做过梁。”这一精确而枯瘦的描述正是图尔讷佛尔的笔法，旁边托马斯·霍普（Thomas Hope，约1795年）所作的一幅水彩画则展示了这一笔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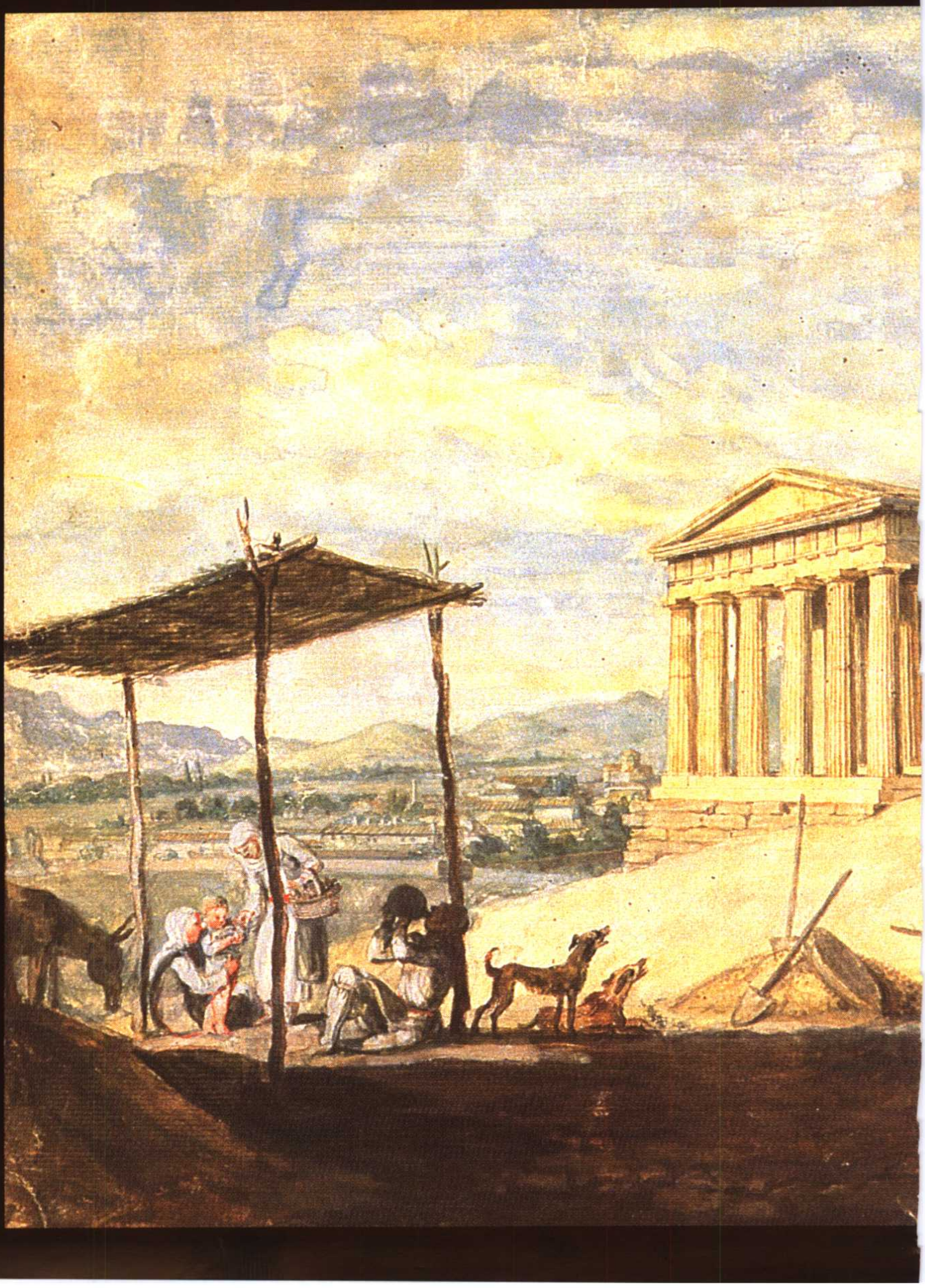
这道科林斯式柱廊凌驾于一座阁楼之上，阁楼的柱子则装饰着神话形象的浅浮雕。该柱廊坐落于塞萨罗尼基(Thessalonique)的西班牙犹太人居住区，它的现代名字的词形（“Las Incantadas”，意即“中魔法者”）让人感到奇怪的原因也正在于此。这幅素描图中的斯图亚特和瑞维特受到了犹太教教士的接待。1865年，该遗迹被拆卸开来运往卢浮宫。

## 英国建筑师的参与

寻找新的参考资料的建筑师们为考古学研究开辟了道路。这一推动力来自意大利。1738年海尔库拉纽姆城的发现、1784年庞贝（Pompéi）城的发现，以及对这两座城市的发掘更新了人们关于古代的认识。学者和艺术家能够直接接触到这一深受古典时代和希腊化时代的希腊影响的文明：该文明有着临摹希腊雕塑原件的复制品，也有从希腊绘画中获得了灵感而绘制的壁画。

同样，人们还考察了南意大利派斯图姆（Paestum）的神庙，苏弗洛（Soufflot）于1750年为之绘制了素描图。在对这些神庙以及随后对西西里诸神庙的考察中，人们发现了一种无柱础的希腊多里斯柱式（le dorique），这种柱式的比例让建筑师们感到费解，它起初被认定为是一种原始式样。

正是在这一时刻，研究领域扩展到了希腊。先行者是两个英国人，分别为画家詹姆斯·斯图亚特（James Stuart）和建筑师尼古拉斯·瑞维特（Nicolas Revett），他们相识于罗马。两人都对考古学感兴趣，并且制定了对雅典古物进行了鉴定、测量和绘图的计划。伦敦艺术爱好者协会（la société londonienne des Dilettanti）对他们的事业提供了资助，委托他们汇集供英国建筑师运用的装饰式样。







## 斯图亚特和瑞维特在雅典

“忒修斯神庙”（前页）是雅典保存最好的一座神庙（公元前5世纪）。当斯图亚特1751年绘制它的素描图时，它矗立在距当时城区不远的地方，处于农田的边上。它虽然是奉祀赫法伊斯托斯（Héphaïstos）的神庙，却因中楣上描绘了忒修斯的业绩而在传统上被称为“忒修斯神庙”。它曾被改做教堂，并且没怎么遭到土耳其人的破坏。图中近景是日常生活的场面：阿尔巴尼亚农业工人正在土耳其总管的监督下簸扬谷物。

哈德良拱门（旁边图）是一座大理石纪念门。它将古代城区与罗马时代的城区即“新雅典”分开。人们今天看到的拱门差不多与斯图亚特描绘的一样。其正面分层而建，下面的拱门洞支撑着开有3个门洞的科林斯式柱廊。





斯图亚特笔下的海罗戴斯·阿提库斯音乐堂（L'Odeon d'Hérode Atticus）

这座音乐堂曾同时被用作音乐厅和剧场。它位于雅典卫城的西南面，是公元前2世纪由“雅典的亿万富翁”海罗戴斯·阿提库建造的。18世纪中叶，它虽已十分残破，外观依然宏伟，双层拱廊尚存。斯图亚特绘制了其内部的素描图，并在《雅典的文物古迹》（*Les Antiquités d'Athènes*）中描述了它：“前台、讲台、舞池今天已为泥土和瓦砾所覆盖[……]岁月用一层长满植物的泥土将空场盖满，空场边上是逐层递升的观众席：今天人们在这里种上了大麦，这些大麦的青苗是供狄斯达尔阿加（Disdar Agha）的马吃的。”

这个协会起初是一个上流社会的俱乐部，由三明治伯爵（comte de Sandwich）于1733年建立，其目的是为了鼓励美术的发展，而后该协会在重要性日益增加的情况下汇集了最优秀的古代艺术鉴赏家。它那时对英国人的审美观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它资助了某些考察活动，并为这些考察成果的出版提供了资金——斯图亚特和瑞维特在希腊的考察、之后瑞维特和希腊学家昌德勒在小亚细亚的考察都获得了它的资助。

从1751年到1753年，斯图亚特和瑞维特先是在雅典居留，而后游历爱琴海群岛，在那里他们也同样做了考察记录。他们从事了十分重要的活动。他们测绘了一幅雅典卫城的平面图，精心细致地绘制了建筑物的素描图，并对这些建筑物给予学术分析，甚至为了核实其分析而进行了发掘，例如他们测探了风塔这座纪念性建筑物的地基。他们的这一切考察也难免会犯一些错误：他们把雅典娜·尼凯神庙的地点重新认定为位于卫城山门的南翼之内，并相信自己纠正了斯蓬的错误。在芭苔侬神庙，他们则没有发现柱子的倾斜和柱座的弯曲。但是他们的工作是划时代的和具有权威意义的。他们的成果是一部配有多幅版画插图和地图的出色著作，其第一卷出版的于1762年。后来，意大利伟大的考古学家维斯康蒂（Visconti）会写道："斯图亚特是欧洲第一个表现出对希腊建筑具有真正鉴赏力的人。"

"狄德罗说道，'废墟在我心中唤醒的那些理念是伟大的'。……这正是勒·鲁瓦的素描图中透露出来的观念：他要追还灵感上的自由和修改比例和透视关系的权利；这样废墟就能更深地感动观众，令他们心中充盈着看到宏伟壮丽的建筑时为之打动而产生的那种赞叹之情。"



## 大卫·勒·鲁瓦的美丽的画中废墟

斯图亚特和瑞维特的著作的后面部分拖了很长时间才出版，而身为建筑师和法兰西学院（l'Académie de France）在罗马的领酬研究员的儒利安·大卫·勒·鲁瓦（Julien David Le Roy）在出版著作一事上抢在了他们的前面。与这两位英国人的行动同时，他也在希腊做了一次研究性旅行。他非常傲慢，于1785年急着赶在他的竞争者之前出版了《最美丽的希腊古迹废墟》（*Ruines des plus beaux monuments de Grèce*）一书。这是人们对希腊建筑的第一次描绘再现，也是人们第一次从比例关系角度来研究希腊的多里斯柱式及其演变——人们过去不是硬说芭苔侬神庙的建筑逊色于它的雕塑吗？勒·鲁瓦成为巴黎建筑学院（l'Académie d'architecture de Paris）

的教授后，努力硬性界定了希腊艺术的诸种范式。

但是勒·甑的素描图缺乏精确性，有很多想象和奇思的成分。显然，大卫·勒·鲁瓦 受到了 18 世纪在表现废墟主题时以突出感受为特征的艺术倾向的影响，皮拉奈兹（Piranèse）为这种艺术倾向的传播做出了贡献。废墟作为时间流逝、文明消失和自然永恒的象征，在构成一件作品的主题或一幅图画的朴素的背景时，总是一种冥思苦想的框架。艺术家们热衷于营造一种“浪漫”氛围，很少忠实于希腊风景和古代遗址的原貌。

这个世纪出版的最后一部不朽巨著是后来出任驻君士坦丁堡大使的舒瓦瑟尔 - 古菲埃伯爵的《风景如画的旅程》（*Voyoge pittoresque*）。他的某些行为很容易让人想起他的前辈努安特尔候爵，像该侯爵一样，这位伯

下图中，两根伊奥尼亚式柱子（colonnes ioniques）支撑着一块柱顶盘。这是哈德良渡槽的唯一一处遗迹，其地点在利卡维托斯山（Lycabette）上。它于1778年被毁。





卡萨所作的雅典全景图（1784年）。中间矗立的是奥林匹亚的朱庇特神庙的两丛宏伟的柱子，两丛柱子之间呈现出了雅典卫城的身影；山坡上层迭分布的是阿尔巴尼亚人居住区。左边是海罗戴斯·阿提库斯的音乐场、“忒修斯神庙”和菲洛帕波斯纪念碑。凌驾于神庙的下楣之上的是柱头隐士的的壁龛，一位拜占廷时期的隐修修道士居住在那里。

爵供养了一批研究者和艺术家，画家佛沃尔（Fauvel）和卡萨（Cassas）都在他们之列。他的讲述虽无考古学意图，却含有某些极有价值的资料，从而反映了一个存在于整个一代人心目中的灿烂辉煌的希腊形象；这一形象与神话相一致，由教育所造就。

## 梦想出来的希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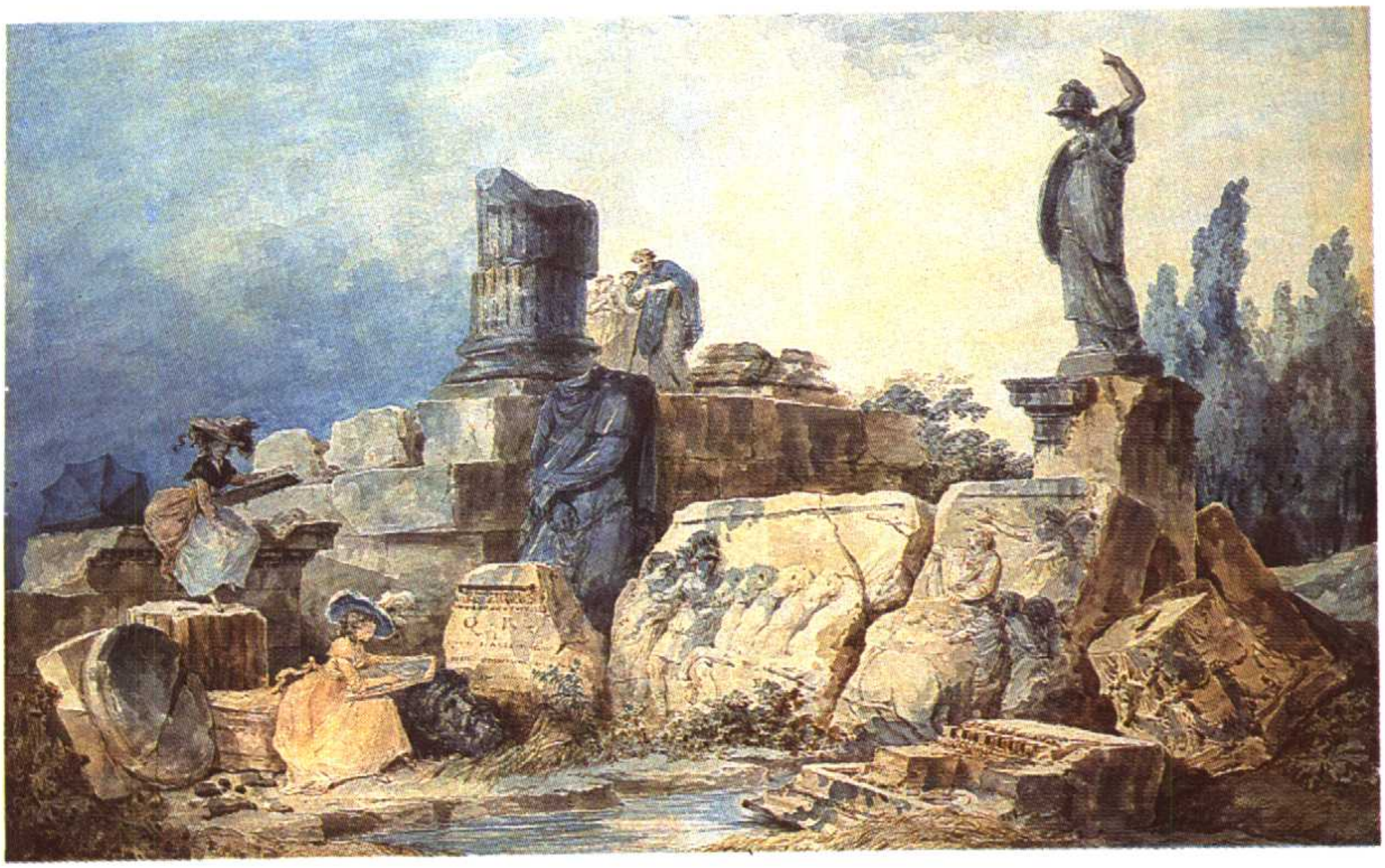
不过，没有一部作品能像修道院院长巴尔泰勒米（Barthélemy）于1788年出版的《青年阿那卡尔西斯的旅行》（*Voyage du jeune Anacharsis*）一样激起读者的好奇心。这本半是历史半是小说的书在欧洲范围内获得了不同凡响的成功——它是首批被译成现代希腊文的著作之一。它描绘了一个优美、雅致、可爱，堪称适于享受生活的希腊。贯穿于这些家庭生活或“泛雅典娜节（Panathénées）”的图画的是古今风尚和精神的融合，“一个斯基泰人（Scythe）的此番旅行与一个巴黎人的旅行极为相似。”作者并非不博学——这位古代语言的专家通晓文明史，熟谙古典作家的著作——，而是没有去过希腊，没有“感受”过希腊人，作为18世纪的人，他赋予了希腊以一种落入俗套的错误形象，以至于司汤达

(Stendhal) 评论道：“世界上对希腊人了解最少的国家就是法国，这是因修道院院长巴尔泰勒米的著作所致。”

一方面是那些出版了的伟大著作，另一方面是《阿那卡尔西斯的旅行》，对海尔库拉纽姆和庞贝两城日常生活的最深刻的了解，伊达拉里亚墓葬中的器物——其中包含大量的希腊陶瓶——这一切在这个世纪末激发了一种喜爱希腊的“好古狂”时尚。

对希腊的喜好并不只是一种狂想，它也是一种作为对行将就木的巴洛克艺术的反动而出现的文学艺术以及风尚革新的需要。这场革命在建筑方面表现得最为显著：在英国，斯图亚特在哈格利公园 (Hagly Park) 建造的楼阁和“忒修斯神庙”这座多里斯式神庙的重建宣告了这场革命的到来；瑞维特在萨利斯伯瑞 (Salisbury) 附近仿造了提洛岛上的一道柱廊。在法国，多里斯柱式出现于苏弗洛所绘的圣—热内维埃芙教堂 (l'église Sainte-Geneviève) 之中和勒·鲁瓦的学生安托万 (Antoine) 的作品《仁慈》(la Charité) 中修道院的柱廊上。

于贝尔·罗贝尔 (Hubert Robert) 的绰号为“废墟的于贝尔”。他在这幅拟古的作品当中，人为地将一些建筑和雕塑的组成部分重组在一起：柱子、破碎的浅浮雕、密涅瓦的雕像、柱头的残骸。一些细小的人物形象使场景具有了生气：近景中有一位正在作画的妇女。这处虚假的画中废墟，这种哀歌式的展现，表现出了浪漫主义前期好古狂的特点。



## 崭新的艺术眼光

在现代考古科学的形成当中不单单只有建筑师们的功劳。同时代的凯吕斯伯爵（le comte de Caylus）和约翰·约阿西姆·温克尔曼（Johann Joachim Winckelmann）两人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们用各自的方法，把古物研究的方向确定在对艺术的研究之上。两个人都是希腊的崇拜者，但两人谁都没去过希腊。作为一位考古学家，凯吕斯伯爵占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在传统的语文学看来，文献证据是复原历史的惟一具有价值的史料，器物和古迹在作用上只不过是对文献的补充。凯吕斯在同这种语文学传统决裂的同时，提出了“将古迹视为一个时代和一个国家中主流风格的证据和表达”的主张。他在他的《埃及、埃特鲁里亚、希腊和高卢古物集成》（*Recueil d'antiquités, égyptiennes, étrusques, grecques et gauloises*）中运用了这一方法。他感兴趣于技术、工具和材料，这些对他来说要比美学鉴赏更为重要，这也使凯吕斯的著作具有一种现代倾向。



在收藏家陈列室的背景当中，一个身穿室内便袍的猴子正用放大镜观察一枚奖章。夏尔丹（Chardin）打算嘲笑的正是凯吕斯伯爵（1692-1765年），伯爵这个人“复活了希腊情趣”，他是古董收藏家们的排头兵。画家以这种方式诠释了哲学家和古董收藏家之间的冲突：在哲学家看来，古董收藏家不过是书呆子和疯子，他们的研究对象不过是“锈迹斑斑的有柄平底锅和破碎的坛坛罐罐”。

在同一时刻，温克尔曼“发明”了希腊艺术史。他被德·斯塔埃尔夫人（Mme de Staël）视为“艺术认知方法上的一个革命者”。他在生前和一个世纪当中都享有不同凡响的声誉。温克尔曼作为这样一位革命者的生涯开始于他的处女作《关于绘画和雕塑当中临摹希腊作品的若干看法》（*Réflexions sur l'imitation des oeuvres grecques en peinture et en sculpture*）：在一个希腊-拉丁的古代被看成一个整体的时代，温克尔曼以直觉感受到了一个没有为罗马传统所篡改的希腊文明的存在。“希腊杰作的鲜明的总体特征是一种高贵的纯朴和一种静穆的伟大。”温克尔曼把他的美学理论建筑在了研究理想的“美”的基础之上。对他来说，《贝尔维戴里的阿波罗》（l'Apollon du Belvédère）、《拉奥孔》（le Laocoon）、《美第奇的维纳斯》（la Vénus Médicis）是这种理想的“美”的体现。他建议艺术家们临摹这些作品：“要想变得伟大而又无可效仿，如果可能的话，我们拥有的惟一办法就是效仿古人。”

温克尔曼在他的杰作《艺术史》（*Histoire de l'art*）中表达了艺术演化的观点：“艺术发展于文明的内部，伴随着文明产生、繁荣和衰亡。”他尝试以辨认风格为基础对希腊艺术做了这样的分期：古代风格即古风时期的风格、崇高风格即菲狄亚斯的“高雅伟大的风格”、优美风格即普拉克西泰莱斯（Praxitèle）的风格（公元前4世纪）、颓废风格即模仿者的风格（公元前1世纪）和罗马时期的风格。这种分期在今天看来有一些明显的错误。温克尔曼把他的希腊艺术史建立在对罗马复制品的研究和某些被他搞错年代而误认为系古典时代作品的雕像（例如《拉奥孔》）的基础之上。

温克尔曼做了一个考古学家需要做的全部工作：他出版了某些古物收藏的辑录，他对海尔库拉纽姆和庞贝的新发现给予了密切的关注——他对发掘方法提出了很严厉的批评——，最后他梦想着到奥林匹亚去发掘；他是最先主张根据鲍萨尼亚斯的记述来研究希腊神庙的人之一，这种主张在19世纪变成了现实。



温克尔曼（1717-1768年）其人如其书一样令人着迷。几近贫寒的出身、艰难的青年时代、令他讨厌的神学学习、低级的职业都丝毫没有摧毁他的精神冲力，也没有动摇他的艺术信念。他在罗马依附于教皇宫廷时获得的成功、在艺术界中安逸的生活、他的名望和最后悲剧性的死亡——他在的里雅斯特遇刺——都增加了他生平的传奇性。



“那神殿坐落在那边的山岗，/那山岗曾是帕拉斯(Pallas)〔雅典娜〕驻足的地方。/她古老的王国只剩下这最后的遗迹，/她还要哀伤，哀伤地从这遗迹上逃亡。/一切洗劫神殿的家伙们，/最后一个，最坏一个，最愚蠢的一个，由谁来充当？/这人是你的儿子，喀里多尼亚(Calédonie)啊！耻辱在你头上。”

拜伦（Byron），1812年

# 第五章
# 强大的掠夺者的时代



《艾吉那（Egine）战士》和《米洛的维纳斯》（la Vinus de Milo）。前者在1812年由巴伐利亚购得，后者在1821年由法国购得。

在希腊解放前的二十年中，爆发了四个属于在国际范围内进行的掠夺古物性质的“事件”，这四个事件同时也在希腊雕塑鉴赏领域内引起了极度的混乱：学术界从中得到的收获——甚至这种收获被重新置于时代精神中时——不能证明将芭苔侬神庙的三角楣、艾吉那神庙的三角楣、巴塞（Bassae）的中楣和《米洛的维纳斯》运抵伦敦、慕尼黑和巴黎的行径也是正确的。而当时的列强并不满足于掠夺希腊，他们彼此之间也相互掠夺。考古学成了战争竞赛的一部分，或是其并不亲临

慕尼黑新绘画陈列馆（la Nouvelle Pinacothèque de Munich）的这幅壁画颂扬了以收藏者角色出现的巴伐利亚的路易一世（Louis Ier）。这位国王黑影似的形象处在中间，突现于雕刻馆正面的映衬之下；国王正看着一群古代雕像。这群雕像的第一排中出现的是一个执竖琴的阿波罗像，温克尔



现场的帮凶：波拿巴（Bonaparte）率兵远征埃及时就是如此，随行的还有一个科学考察团。对法国人来说，这次战争的惟一收益就是1799年罗塞达（Rosette）石碑的发现、象形文字的释读和埃及学的诞生。

## 欧洲各大博物馆的创立

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公共博物馆的需求推动了人们

曼还把手扶在了它的上面。处在第二排的是最近刚进入馆藏的3件著名的古物：《艾吉那战士》、《巴尔贝里尼的牧神》（le faune Barberini）和《维莱特里的帕拉斯》（Pallas Velletri）。国王的左边是哈勒尔·冯·哈勒尔施坦因（Haller von Hallerstein）递过来第一只陶瓶。这位建筑师曾为路易一世在雅典进行发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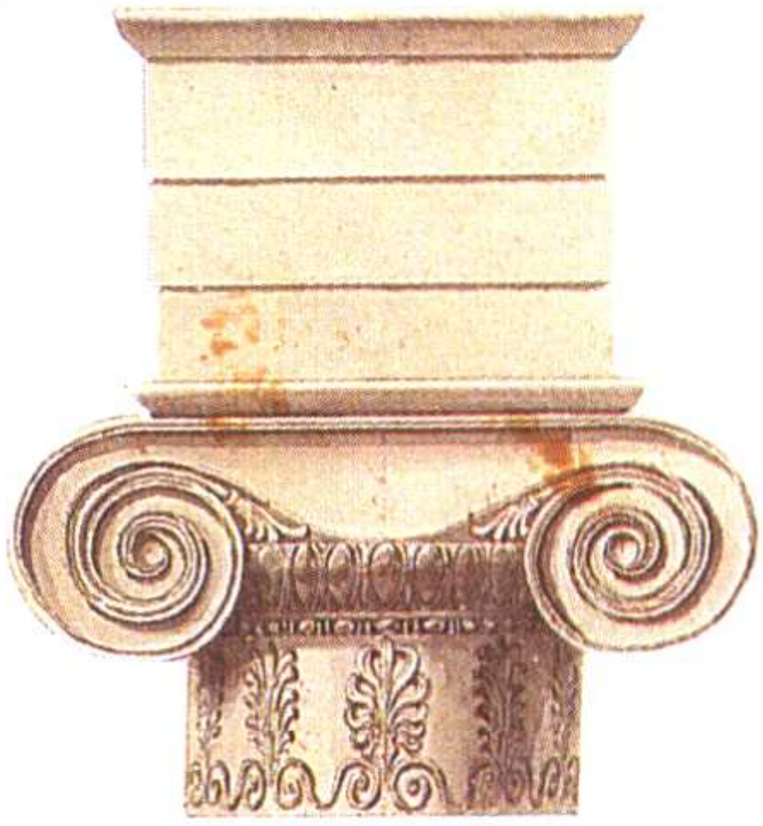
对艺术珍品的追求。公共博物馆在增多：梵蒂冈的皮奥 - 克莱门提诺博物馆（musée Pio-Clementino）的第一份目录的年代为 1792 年；大英博物馆（British Museum）于 1753 年建立；拿破仑博物馆（musée Napoléon）建于 1801 年；慕尼黑雕刻陈列馆（Glyptothèque de Munich）建于 1830 年。这些公共博物馆满怀渴望获得精美的藏品，而这些藏品会以其辉煌而为拥有它们的国家增光添彩。这样，波拿巴毫不犹豫地攫取了意大利的藏品：他凭借着征服者的权利，于 1797 年把从《拉奥孔》到《受伤的高卢人》（Gaulois blessé）等被温克尔曼作为其艺术史研究基础的所有伟大的希腊雕塑作品都征调到法国；这些雕像在卢浮宫中一直陈列至 1816年，充分表明巴黎已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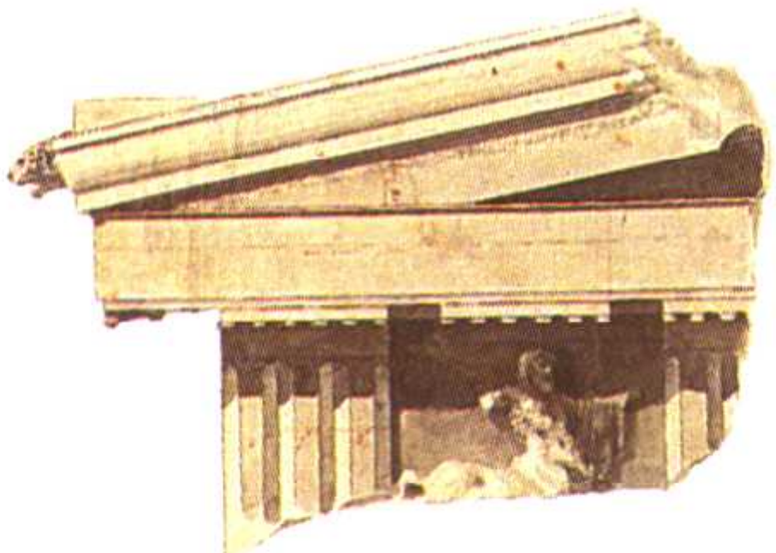
下图为《拉奥孔》进入卢浮宫。这些艺术品的转让引起了1796年的一场大争论。虽然卡特勒梅尔·德·坎西（Quatremère de Quincy）把波拿巴比作为瓦雷斯（Varrès），其他人却支持这位将军的行动："现在是所有这些出于希腊人的天才的珍品离弃一片再不配拥有它们的土地的时候了。它们是在一个自由的国度中被创造出来的；今天只有在法国它们才能够重新找到祖国"（研究院成员 J. 勒布雷顿[J. Lebret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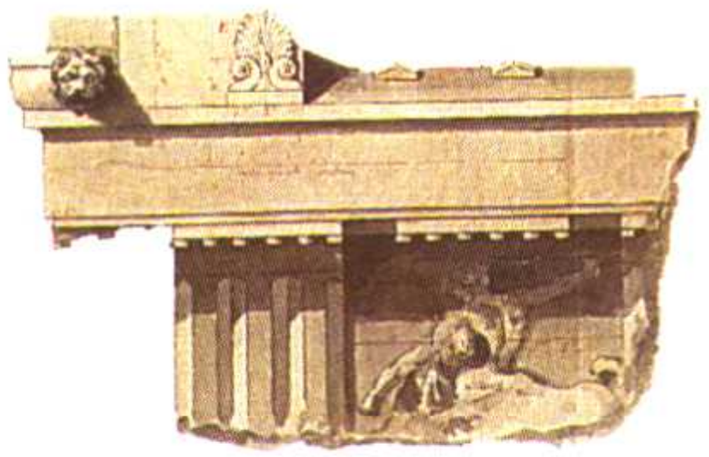


为新罗马和新雅典——如果没有波拿巴从厄尔巴岛囚禁中的逃回，东山再起和旋即失败，这些雕像可能还陈列在卢浮宫里！强国——以及次强国——竭尽全力希图获取的正是这些希腊真品。博物馆对真品的渴望在我们今天仍是维系显性及隐性文物市场存在的因素。

若干政治因素也导致了希腊文物的外流。当时缺乏一种足以制止掠夺文物行径的强有力的政府力量。土耳其素丹政府在与俄、法、英等国连绵不断的战争当中被拖得精疲力竭，素丹无法拒绝接受英国作为其







在 1799-1806 年这段时间内的保护国。在希腊本土则不难通过贿买手段取得地方当局对于发掘的许可。至于希腊人的各类社群，他们也未采取任何措施来阻止其祖先遗产的外流。

希腊成了一个对各国“旅游者”，尤其是英国人，颇具吸引力的重要地方。政治形势也有助于使前往希腊旅行成为一种时尚。在意大利因被法国征服和大陆封锁而与英国隔绝的时刻，土耳其与英国之间的接近便利了这种旅行。

佛沃尔的笔记和素描图只有极少数保存下来。这个最为了解雅典古物的人没有出版他的著作（旁边及后几页中是几幅未刊行的水彩图）。这位杰出的导游认为有学问的旅行家给城市带来了荣誉，他还把他的研究成果散发给他们。有些人，例如考克瑞尔(Cockerell)在其著述中运用了这些研究成果。佛沃尔总是在其来访者面前不懈地揭露艾尔金的野蛮行经，但他本人也攫取了某些有价值的艺术品。

## 艾尔金勋爵（Lord Elgin）在东方

在这种特殊的形势下，艾尔金勋爵出任驻君士坦丁堡大使。根据某些人的说法，是英国政府企图获取艺术品和

阻止法国垄断文物市场，发起了向希腊派遣一支类似的考察团的行动，因而此次行动的责任者是英国政府。另一些人的看法则相反，他们认为这是艾尔金勋爵的一项个人计划，降临于他头上的好运激发了他“利用其大使职务来推动大不列颠美术发展”的热情。无论



佛沃尔自1803年受命担任法国驻雅典领事。他住在这座位于古代广场(agora)上的宅邸当中。图中表现了正在作画的他，他的周围是一些古物（左边是芭苔侬神庙的一块排档间饰）。他的收藏品在独立战争期间散佚。



如何，在雅典古迹被破坏劫夺的过程中，英法之间的对抗都构成一种影响因素。对于任何一位观察者来说，显而易见的是，雅典卫城上的大理石在19世纪初就注定了不是流落到伦敦，就是流落到巴黎。1784年，驻土耳其首都的大使舒瓦瑟尔-古菲埃伯爵任命画家佛沃尔担任他在雅典的代理人。法国大革命致使舒瓦瑟尔-古菲埃被迫流亡，佛沃尔则对君主制保持着忠诚，他仍居于雅典，并建立了他的个人博物馆，占有了文物市场，堵塞了外国人的购买渠道。但是在1798年8月，佛沃尔和所有在希腊居住的法国人一样都被监禁，财产被查封。英国实施自己计划的道路因此也变得畅通无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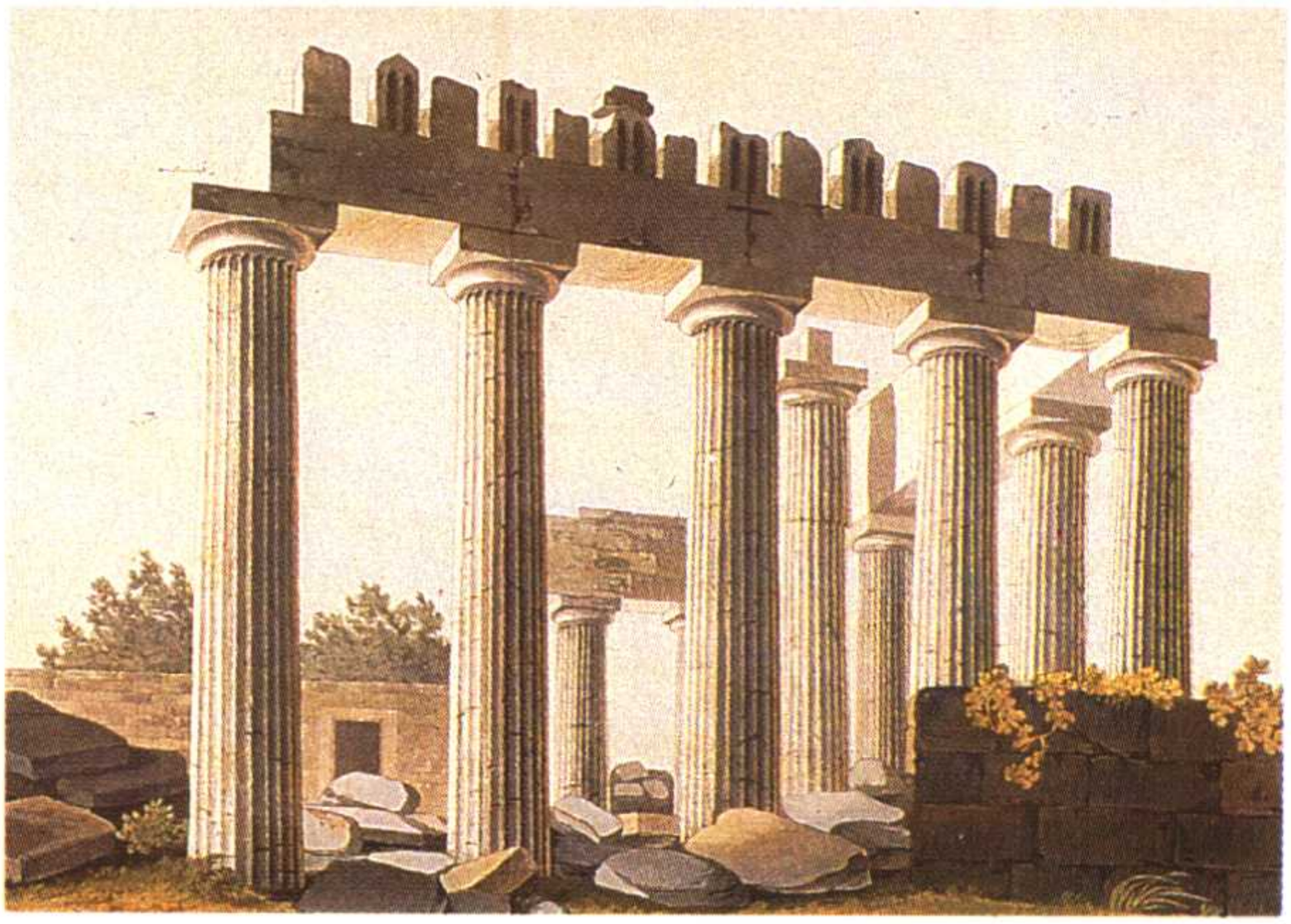
## 雅典卫城的拆毁

对芭苔侬神庙以及更为普遍地对雅典卫城的掠夺始于1801年7月；掠夺一直持续到1805年，而在此时任何

抢夺和发掘行为都是被禁止的。艾尔金的代理人意大利画家卢西埃里(Lusieri)率领了若干队工人攫取了残存于三角楣上或埋藏于废墟中的12个雕像，夺取了56个中楣石板和15个排档间饰，这还不算雅典娜·尼凯神庙的中楣和埃瑞克透斯神庙的一个女像柱，而这些被提到的也只不过是最有名的艺术品。似乎没有什么东西能阻止英国人的越来越大的野心。艾尔金的牧师亨特(Hunt)甚至提议拆除埃瑞克透斯神庙而在英国重建它；在迈锡尼（Mycènes），他用贪婪的目光盯上了狮子门；但因距海遥远，运输困难，他被迫放弃这一打算。







旁边是芭苔侬神庙的两幅风景画，它们使人们能够看到该神庙毁坏的程度。第一幅出自画家盖尔（Gell）之手，年代在1801年；第二幅系拜伦的朋友霍布豪斯(Hobhouse)的作品，他于1810年参观了神庙。两幅风景画证实了多德威尔(Dodwell)的记述：“在芭苔侬神庙的最精美的雕刻被抢走，其某些建筑部位被推倒的情况下，亲临现场的我有种难以表达的不快。我看到神庙东南端的几块排档间饰已被摘掉[……]；要想抢走它们，就得拆掉覆盖它们的华美的上楣。”





埃瑞克透斯神庙是雅典卫城（公元前5世纪）上最具创新性的建筑物，它重新集合了雅典城邦最古老的崇拜。多德威尔所作的这幅水彩画表现了体现出其建筑复杂性的部位：具有女像柱的廊台、采用伊奥尼亚半圆柱封闭的中央主体部分和北柱廊的开端部分。神庙内部因神庙先后被改作教堂和穆斯林后宫而被搞乱，但外部在艾尔金一伙到来之前一直保存得相当完好。卢西埃里于1801年让人拆除了第二根女像柱，并用一根砖柱来代替它。人们一致为这件东西的被抢走而感到悲痛惋惜，据说这次抢夺行径在雅典引起了一场骚乱。

不仅有掠夺行径，而且还有破坏艺术的汪达尔主义(vandalisme)。工作是在仓促之间进行的，人们毫不犹豫地推倒建筑的某些部分以便抢走某些雕塑。英国希腊学家克拉克（Clarke）目睹了一块排档间饰被拆下的情景，据他所言，土耳其人自己都对这种毁坏忧虑不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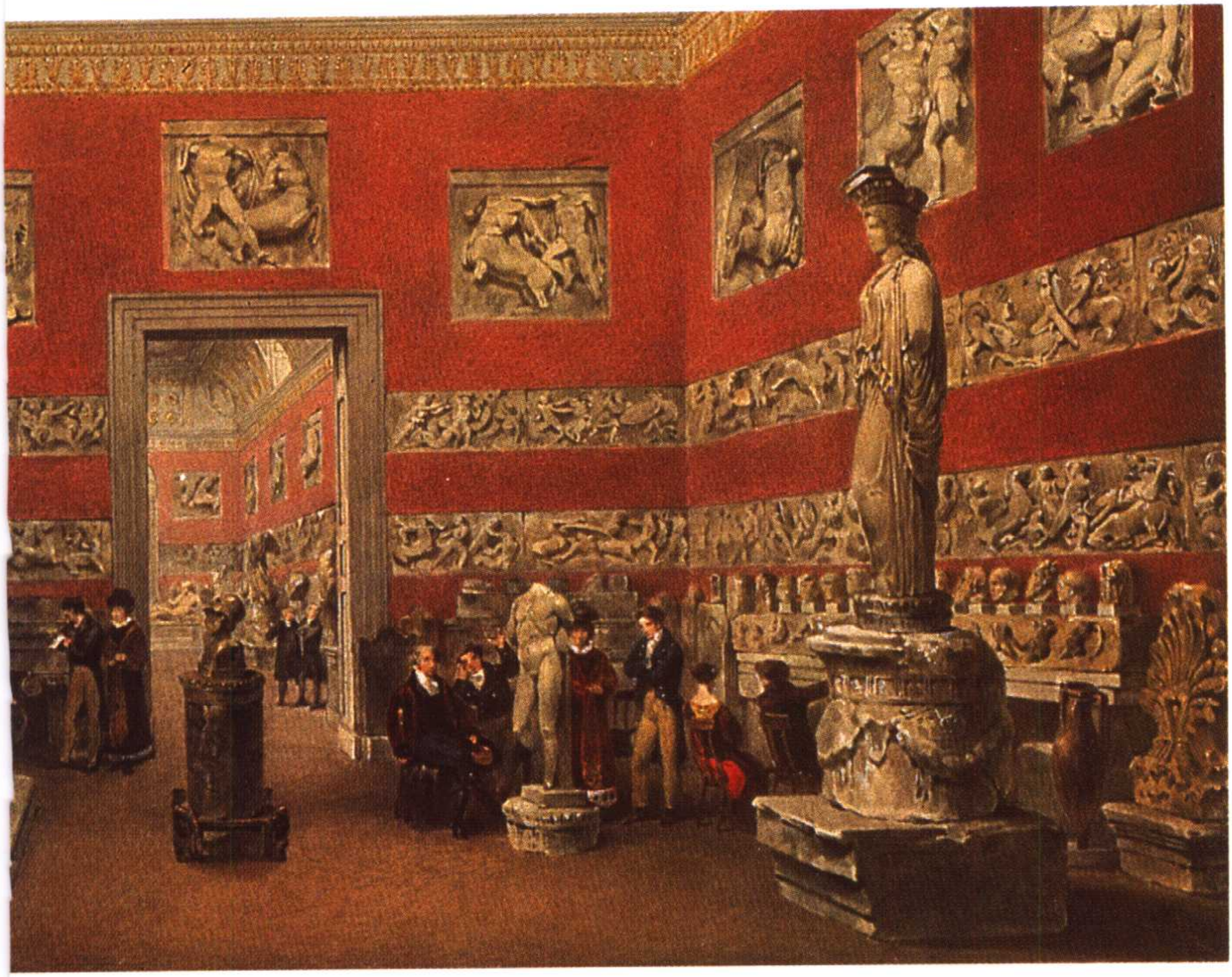


## 面对掠夺的激情

早在那些大理石雕刻还没有离开希腊的土地之前，艾尔金的掠夺就已激起了人们对他一致谴责的浪潮。最尖锐的批评者是那些目击了雕塑遭到拆卸的外国人，如多德威尔、盖尔和克拉克。那些来得较晚的人，如夏托布里昂（Chateaubriand），看到的则是遭受洗劫，已成废墟的芭苔侬神庙。在那些提笔抒写对这些破坏的哀叹之情的人当中，正是某些顽强的收藏家运走了一些富有价值的古物残片，今天这些残片业已散落，乃至最终丢失。夏托布里昂不是其中最坏的人，他非常坦白地承认："在从这座城堡（雅典卫城）上下来的时候，我从芭苔侬神庙上拿了一块大理石，我采到一块阿伽门浓(Agamemnon)墓石的碎片；此后我总是从我登上过的古建筑上窃取某样东西。我旅行中得到的这些美丽的纪念物没有德·舒瓦瑟尔（de Choiseul）先生和艾尔金勋爵夺取的纪念物多，但它们对于我来说足够



拜伦在1824年逝世于米索隆伊(Missolonghi)。在成为热爱希腊的英雄之前，拜伦(旁边图中他身着东方装束)在他的"伟大的周游"期间发现了希腊。



了”。(《自巴黎至耶路撒冷旅行记》[*Itinéraire de Paris à Jérusalem*]，1811年)。而对艾尔金的声誉给予致命一击的抨击者正是拜伦。1812年，他发表了《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Le Pélerinage de Childe Harold*) 和《密涅瓦的诅咒》(*La Malédiction de Minerve*)。对后世来说，艾尔金勋爵将是“抢劫者”，是夺走“一片流血的土地上少得可怜的遗物”的渎圣者；此后，认识强者是凭借什么权利来掠夺弱者的艺术遗产的这一问题被提了出来。

芭苔依神庙的大理石雕刻到达英国时激发了当时人的想象力，对这些收藏品的异想天开的陈列说明了这一点。绘画学院的院长曾致信艾尔金说：“您把这些珍宝带到了伦敦[……]，建立了一个新雅典，从而成为英国学者仿效的榜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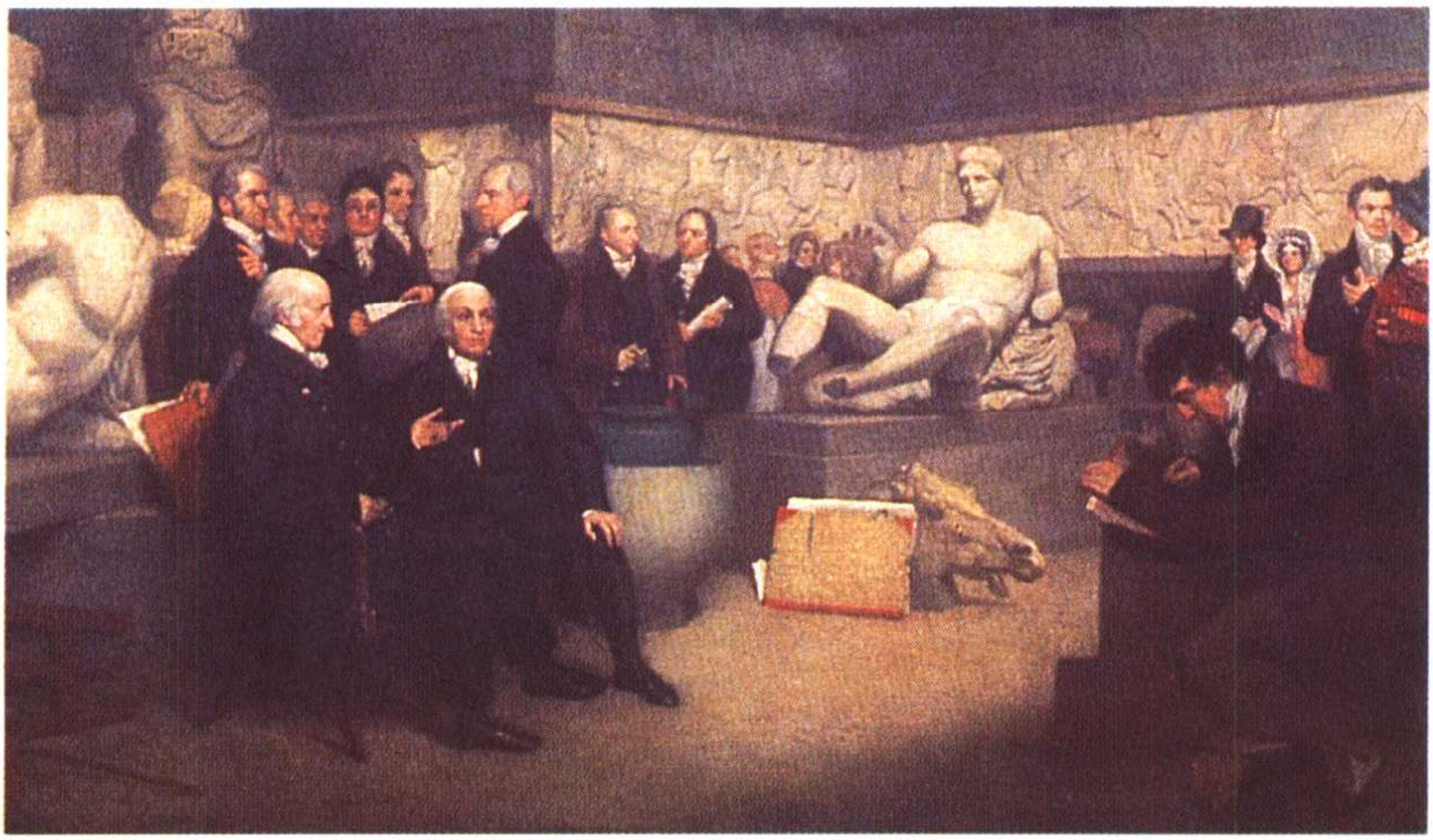
## “他们是罗马人，老爷！”

“艾尔金大理石”(les marbres Elgin)引起了另一场论战。从它们到达伦敦的时候起，伦敦城中所有的艺术家、鉴赏家和

文艺资助者都将蜂拥而来观看它们。这在艺术界内的影响是惊人的:“‘艾尔金大理石’远远胜过意大利的所有瑰宝。”很奇怪，古董收藏家，也就是那些业余的艺术爱好者却没有分享这种兴奋之情。他们的代言人里查德·佩恩·耐特（Richard Payne Knight）是一位杰出的美学专家，他提到了一种类似于终审判决一样的意见:这些大理石雕刻质量很次，远非出自菲狄亚斯的雕刻室，正如斯蓬已经断言的那样，它们是罗马哈德良时代的东西。这些业余的艺术爱好者们所做的只不过是复述了由温克尔曼表达的他们那个时代的审美观。在菲狄亚斯的中楣上表现出来的对实体的模仿即现实主义使他们很反感，也与他们心目中的完美观念相抵触。

这场论战有使由国家收购艾尔金的收藏品的计划搁浅的危险，国家也正陷于债务，无力负担这项开支。1814年，为了恢复这些大理石雕刻的声誉，艾尔金请维斯孔蒂对之进行鉴定。对这位无比出色的鉴赏家来说，这是一件绝妙的珍品，他竭力反驳了耐特的全部批评。雕塑家卡诺瓦（Canova）以及随后的卡特勒梅尔·德·坎西都赞同他的看法。后者写道:“谁没见过‘艾尔金大理石’，谁就什么都没见过”，而且对于三角楣，他说:“这是一个令人感到害怕的事实。”这些专家的观

图为1819年安置“艾尔金大理石”的大英博物馆展厅的图景。人们可以认出，右边是东三角楣上的狄奥尼索斯(Dionysos)像，左边是西三角楣上的凯菲索斯(Céphise)像；中楣和排档间饰被嵌在了墙上。观众当中出现有首批尊崇菲狄亚斯的天才的艺术家们的身影。



点促成了购买决定的做出，但购价——35000 镑，合 70 万法郎——让艾尔金很失望。

1816 年 8 月，这些成为英国国有财产的雕刻被转让给大英博物馆。自从它们被放置在那里以来，其素描图、模塑品和版画便在英国和外国传播开来。尽管不能说他们引发了一场象艾尔金勋爵所希望的那种公众审美趣味的改变，它们至少引起了对于希腊艺术的认识上的革命。



上图为“爱好者协会”（Xenéion）会员的签名；旁边左为哈勒尔所作的考克瑞尔的肖像，右为施塔克尔堡（Stackelberg）所作的哈勒尔的肖像。P. O. 布隆施泰特（P. O. Brönsted）说明了这些爱好者的目标：“哈勒尔、林克、施塔克尔堡和我，我们联合起来的目的是为我们在希腊各地亲眼所见、亲身感受和亲耳得知的一切绘制素描图和撰写其历史，尤其是关注古代希腊历史和艺术的不朽的珍品。”





## 杰出的古物搜寻者们发现艾吉那和巴塞

1811 年 4 月 22 日，最新一些来自芭苔侬神庙的大理石雕刻被由一艘船运往马耳他，卢西埃里和拜伦勋爵都坐在船上。在比雷埃夫斯，这艘船与运送四位古物爱好者前往艾吉那的轻型小艇交错而过。这四位爱好者或是建筑师，或是画家。其中，罗伯特 · 查尔斯 · 考克瑞尔（Robert Charles Cockerell）和约翰 · 福斯特（John Foster）两人是英国人，卡尔 · 哈勒尔 · 冯 · 哈勒尔施坦因（Karl Haller von Hallerstein）和雅科布 · 林克（Jacob Linck）两人是德国人。同年，他们发现了艾吉那的三角楣，还同其他同伴一起在阿卡狄亚（Arcadie）的巴塞进行发掘。

这是考古学家们的第一次国际合作，某些人称之为古物盗贼们的合作，这无疑是错误的。事实上，这些英国人和德国人都不想把经营古董生意作为他们活动的基本目标；他们都属于对希腊感兴趣的文人和艺术家圈子里

的。英国人被另外撂在了一边，他们只是在雅典加入的小组，而艾吉那和巴塞的“发现者们”则在罗马相互结成了友谊：其中，哈勒尔·冯·哈勒尔施坦因是位终日操劳的德国贵族，也是位富有天才的建筑师。他是在柏林接受的教育，在那里他结识了冯·克兰策（von Klenze）——巴伐利亚的路易(Louis)的建筑师——和辛克尔(Schinkel)。追求美学的和精神的至善至美的宏大愿望造成了他的焦虑不安的个性。他也是一位可靠而忠实的古物爱好者。此外，还有两个丹麦人和一个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男爵奥托·马格努斯·冯·施塔克尔堡（Otto Magnus von Stackelberg)。这位男爵既赋有语言天才——他会说至少10种语言——，又赋有艺术天才——他于1826年用自己的素描图将巴塞神庙的有关情况公布于众。

1810年，这两个丹麦人把他们的朋友也吸引到了希腊。前往希腊是需要勇气的，首先要不怕船只失事，还要避开英国人和躲避突尼斯海盗。在雅典他们遇到了福斯特和考克瑞尔，这两个人都出身于富裕的建筑师家庭。他们建立了一个协会，即“爱好者协会”（Xénéion)，其章程表现了它所鼓励的精神：属于它的唯一本色就是“对于希

下图为施塔克尔堡所作的巴塞的中楣（希腊人与阿玛宗妇女[Amazones]作战）的素描图。J. 福斯特在1812年9月25日的一封信中生动地表达了面对该中楣所发出的赞叹：“一条如此完美的中楣，它有着这样的长度，它是这么的美丽，它不存在于巴黎，也不存在于罗马。在其很多部分当中，人物、动物和马人等形象的肢体完全突起，从背景中脱颖而出，这些具有如此高超技艺的作品给人们留下了最不同寻常的印象。”





这幅由J. 福斯特作的水彩画汇报了巴塞神庙在其被发掘时的状况。建筑师哈勒尔以抒情诗般的笔触描写了它的发掘：“我们每天有五六十个还多的工人劳动，为的是让工作不至于繁重而让人厌烦，相反却能进行得兴高采烈和富有活力。他们会在音乐声[……]中自娱自乐和片刻小憩。夜晚他们则醉心于同美丽的阿卡狄亚牧羊女一起在逐渐被发掘出土的神庙柱廊下翩翩起舞。”

腊、古代文学和艺术的热情”；“民族间的偶然差别被消除了”。他们的意愿慷慨大方，他们工作的成效则是最终使整个19世纪，无疑还有20世纪的大部分时期内在希腊研究中居于突出地位的国际竞争持续不断。

艾吉那的雕像是这些爱好者在1811年4月发现的。英、法、巴伐利亚都准备好了要参加它的拍卖，而这个德国人的集团在格罗皮乌斯(Gropius)——他是个有争议的人物，曾相继担任英国、普鲁士和奥地利的领事——的阴谋手腕的帮助下，终于占据上风，使雕像落入巴伐利亚的路易之手，其购价为13万金法郎。就某些原件——18尊相当完好的雕像和大量的残片——而言，这是一个相对低廉的金额。法国虽然报出了最高的竞价，却受到了愚弄。这些雕像被从马耳他转运至罗马，在托尔瓦尔岑（Thorvaldsen）的雕刻工作室内接受完型修复。1812年7月发现的巴塞中楣则没有逃脱英国之手，它被以30万金法郎的价格拍卖给了英国的摄政王。





上图为艾吉那的西三角楣上的雅典娜雕像的头部（约公元前500年）。

## 旧思想与新思想

这些引起轰动的举动所具有的几个特点是属于前科学思想和前科学考古学范畴的。发掘被视为寻宝——即使寻宝也能让埋没于地下的建筑物重见天日——和一场出征行动。当这些年青人的每一天变成了诸如船只遇险、劫匪、热病和死亡等——考埃斯(Koes)和哈勒尔就死在了希腊——各种各样的危险的时候，人们就不会责备他们曾从某些田园牧歌般的时刻中得益了。他们出卖他们发现的古物应该受到指责吗？我们看到考古学还没有丢掉它自中世纪以来所具有的商业目的性，但是我们也承认，这些真诚地热爱美术和希腊的人也助长了建筑的破坏。首先，他们从泥土中拣出的建筑物的石块也正是他们提供给石灰窑的极好的烧灰材料：这样，今天人们了解到的关于在巴塞发现的伊奥尼亚式柱头和科林斯式柱头

——科林斯柱式系列的原型！

——的情况超不过哈勒尔·冯·哈勒尔施坦因的素描图所提供的信息。

最后，在这方面也打上了时代的印记。托尔瓦尔岑对艾吉那的大理石不像卡诺瓦对芭苔侬神庙雕像那样的尊重：他同意根据他那个时代的审美情趣来把它们修补完整；他断言，采用这种办法，古代的雕塑艺术基本上还会有一种装饰功用，并且艺术爱好者的趣味会胜过学者的要求。但是，既然“艾尔金大理石”和《米洛的维纳斯》都没有被修补完整，那么对于原件的尊重正在成为大势所趋。相反，在1966年和1971年之间那位丹麦雕塑家在慕尼黑举行的符合一个时代审美情趣的展览的撤除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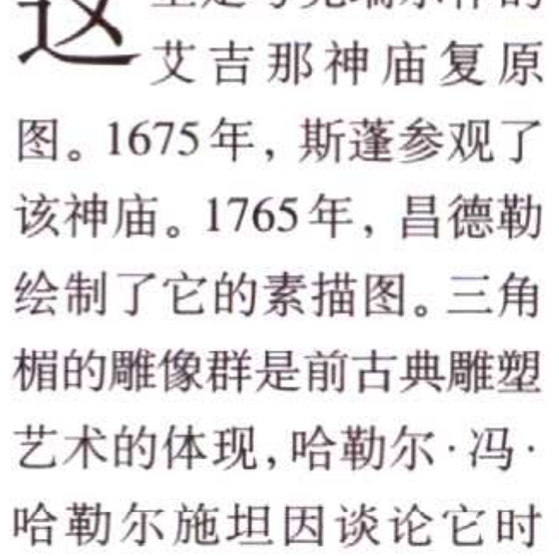


考克瑞尔的素描图展现了建于公元前5世纪的巴塞的“援助者”阿波罗（Apollon Epikourios）神庙中的发现物的全景。素描图作者出于构图的需要，将各重要物件随心所欲地安排在了内殿的内部：科林斯式和伊奥尼亚式柱头如同内中楣石板一样，完全都是原件，均被加以突出强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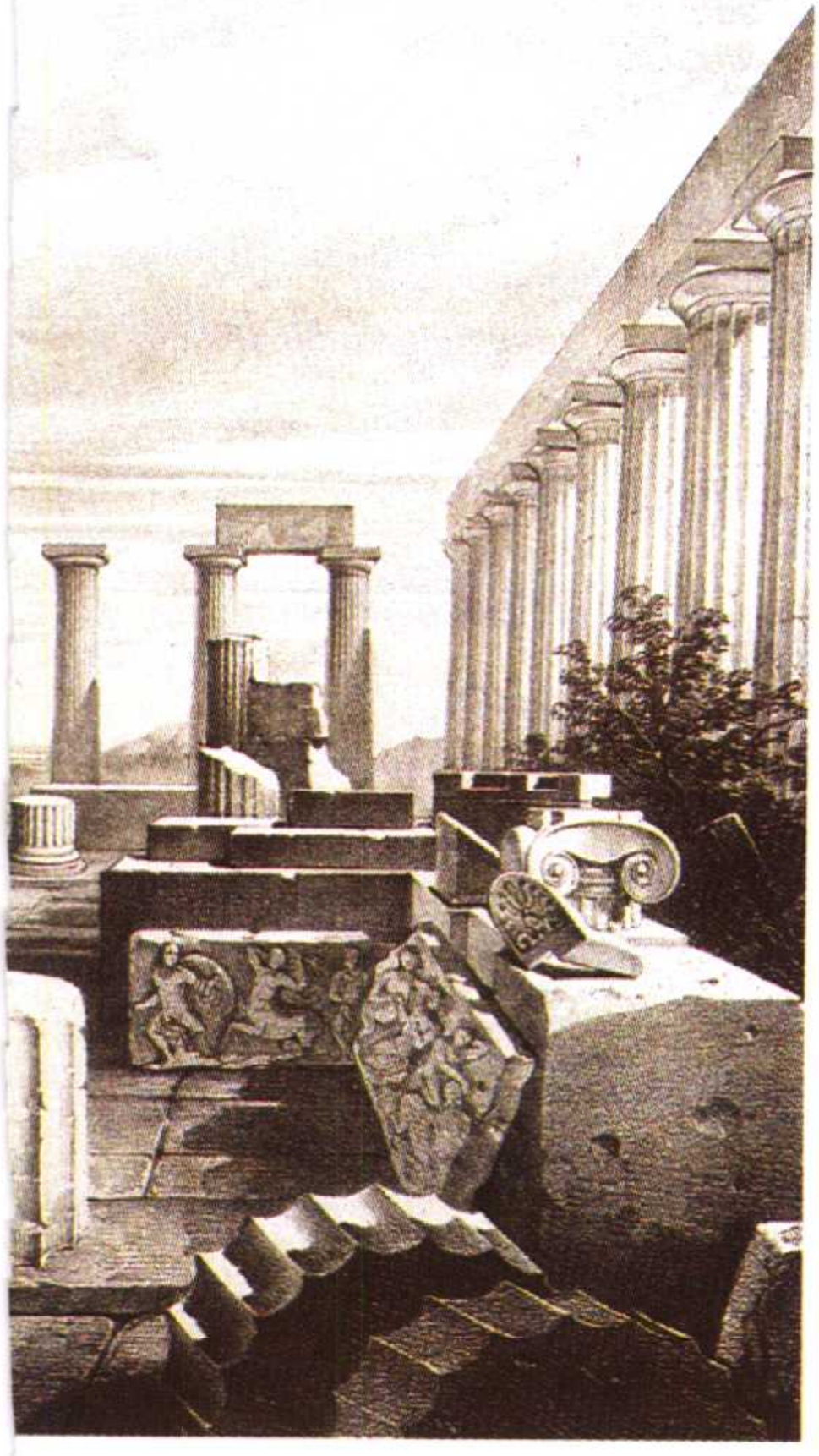
证明完全正确吗？当代博物馆学的发展趋势使原初的东西得到了特殊的关注，从而损及了革新进步的因素。艺术史在其中不一定能获得发展。

## 面对掠夺，希腊是怎样做出反应的？

对于希腊人来说，从他们的土地中发掘出来的雕像自然具有魔力：各村子的显要人物前来要求考克瑞尔停止发掘，“因为害怕这会给艾吉那带来灾难”。他向他们付了钱来减小他们的害怕。而付钱是一种极其廉价地抵销新生的民族意识的方式；这种民族意识没有使其目的成功实现的手段，人们也没有努力来引导这种民族意识。不过我们注意到“缪斯之友协会”（la Société des amis des Muses）在这一方向上已做出了努力。该协会于1813年在雅典成立，它以教育年青人和保护古物为目标。



这里是考克瑞尔作的艾吉那神庙复原图。1675年，斯蓬参观了该神庙。1765年，昌德勒绘制了它的素描图。三角楣的雕像群是前古典雕塑艺术的体现，哈勒尔·冯·哈勒尔施坦因谈论它时说：“其周身为一种古拙的风格和一种崇高的精神所主宰。”



然而，与当时考古学实践的这些消极方面并存的是关于希腊的科学性研究开始确定。那个“爱好者”（*Xenioi*）团体跑遍了这个国家的四面八方，收集略图和素描图。不幸的是哈勒尔的素描图保留下来的只有描绘巴塞的那些，这些素描图却证明了建筑师的精益求精；若以大卫·勒·鲁瓦那家伙的绘画见解来看，这种精益求精则不再有什么可观看的了。这些古建筑已被准备好来公布于众；它们的所有细部都被细致地标注出了尺寸，并且还经常被加以评述。

## 艺术的色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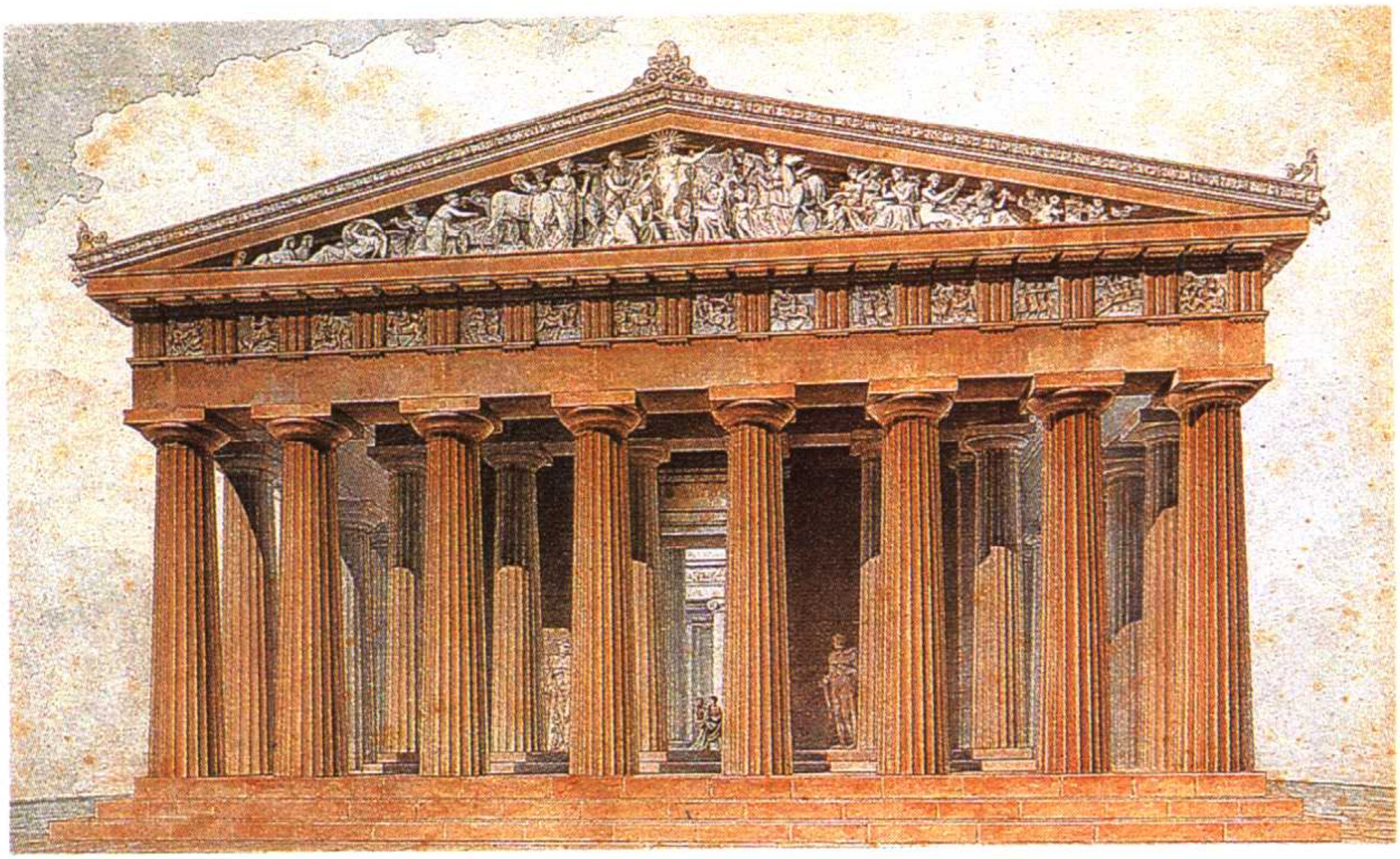
哈勒尔及其朋友们的这些发现在震荡20世纪初的学术界的两场争论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两场争论的内容是神庙的房顶和希腊人在雕像和建筑上使用的颜色。长时期内，人们在修复希腊神庙的时候，都要在房顶上留出一个或大或小的开口以使崇拜偶像闪亮，或是像在巴塞的情况一样，留置一条室内中楣。卡特勒梅尔·德·坎西这位“法国的温克尔曼”在1805 - 1806年的一篇学术论文中充分发展了这种观点——总之，在大多数情况下（甚至在巴塞一例中，尽管那里有室内中楣）这种观点都是完全错误的；此外他还在对苏弗洛设计的先贤祠（Panthéon）实施的改建工程当中运用了这一原则，他仅仅利用房顶天棚来采光。

卡特勒梅尔还在法国确立了关于希腊雕塑是多色的基本论调。他是在其1814年的《奥林匹亚的朱庇特》（*Jupiter olympien*）中确立这一论调的。在这部书中，他系统化地整理了一直到那时都处于零散状态的一系列笔记；但他在这一点上还未能对冯·瓦格纳（von Wagner）——巴伐利亚的路易的代理人——和考克瑞尔关于艾吉那的大理石雕刻的意见给予重视。在这些大理石雕刻上，涂过颜色的痕迹很容易看到。尽管关于建筑物涂色的争论尚未发生，但是雕塑是多色的却是一个获得了一致承认的事实。

而且，大约在1820年，人们对于希腊艺术的认识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展：由艾吉那雕刻室的、菲狄亚斯的和巴塞的原作——人们甚至相信《米洛的维纳斯》出自普拉克西泰莱斯之手或其雕刻室人员之手——所显示的新信息搞乱了当时人们关于希腊古典艺术的知识，并且也表明目前已是从根本上修正J. 约阿西姆·温克



这幅淡彩画是《奥林匹亚的朱庇特》中的图示；卡特勒梅尔·德·坎西复原了一组表现乘二轮马车的波塞东和安菲特里忒（Amphitrite）的群雕。它是由身为皇帝马可·奥里略（Marc-Aurèle）的家庭教师的富有的雅典人海罗戴斯·阿提库斯奉献给科林斯地峡圣所的。这组群像只是通过鲍萨尼亚斯的描述才为人所知的。



尔曼所提出的那种艺术史观念的时候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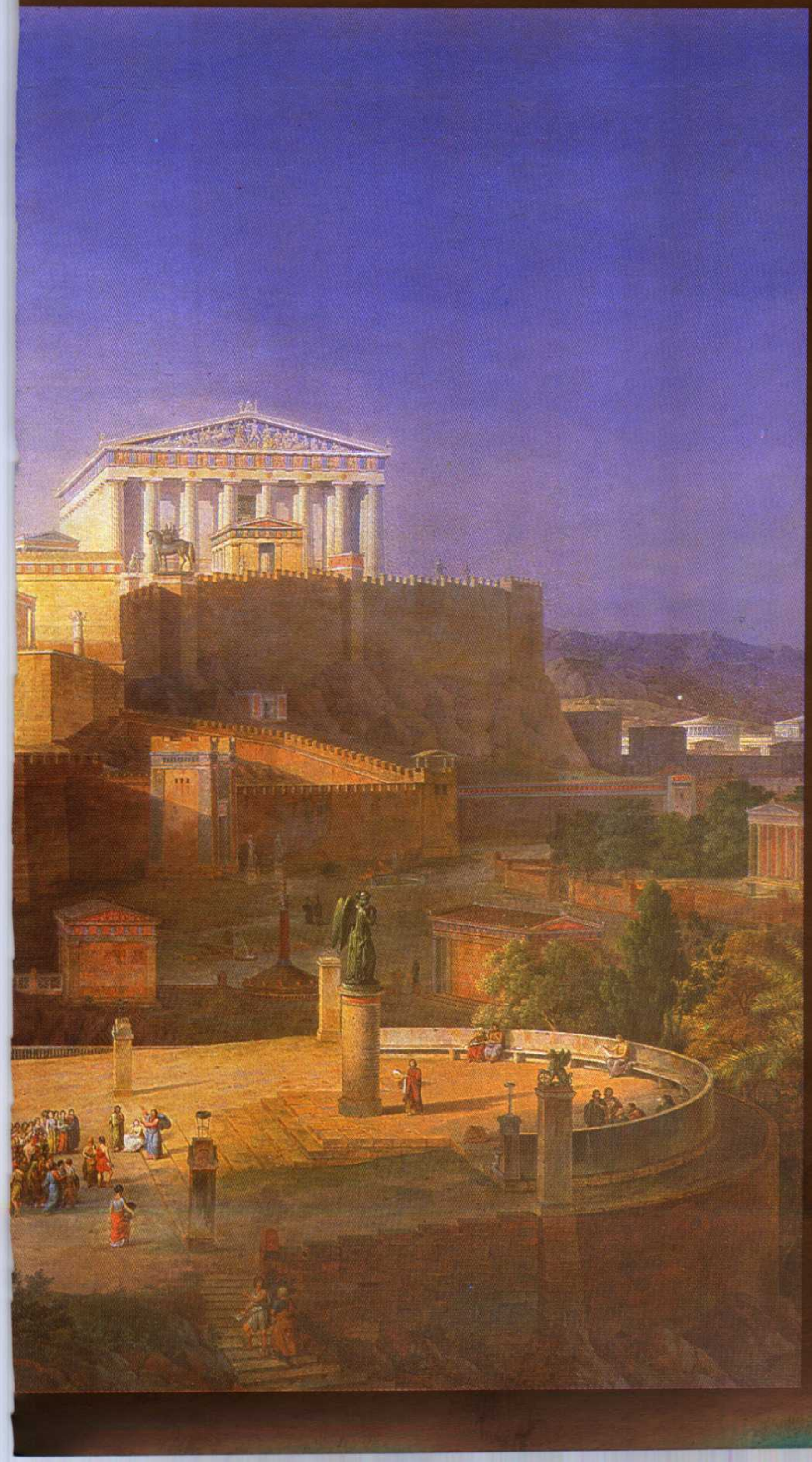
## 希腊的新古典主义

甚至在1821年打响的解放运动之前，更为人们所了解的希腊就已是关于艺术的争论的焦点，它为一切古典主义的捍卫者，如卡特勒梅尔·德·坎西或冯·克兰策，提供了参照。巴伐利亚的建筑师正是依据“希腊风格”的原则，着手建立了慕尼黑雕刻陈列馆(la Glyptothèque de Munich)，设计了拉提斯伯纳（Ratisbonne）的瓦尔哈拉圣堂（le temple du Walhalla），该圣堂是用来供奉德国的伟大人物的。

在英国，自1790年以来，希胆柱式受到尊崇。威廉·威尔金斯(William Wilkins)为剑桥的唐宁学院(Downing College)发展了一种注重考古学实际的风格，该风格在1801年到1811年之间被部分地付诸应用。威尔金斯和考克瑞尔——分别为皇家科学院教授和皇家建筑研究院院长——则将斯图亚特和瑞维特的著作补著完整，该著作是关于“希腊的复兴”（greek revival）的圣经。1821年解放和巴伐利亚籍君主在雅典登基导致了希腊风格在希腊的普及。

德国战胜法国后，巴伐利亚的路易一世计划在拉提斯伯纳附近建造一座希腊神庙式样的纪念性建筑物，以纪念德国的伟大人物（瓦尔哈拉圣堂）。上面这幅略图出自哈勒尔·冯·哈勒尔施坦因之手，他尤其是从芭苔侬神庙的比例关系中得到了灵感。这座建筑物实际上是由冯·克兰策在1830年和1842年之间建造的，其三角楣上表现的是拿破仑在莱比锡的失败和公元前9年奥古斯都被日耳曼人打败的场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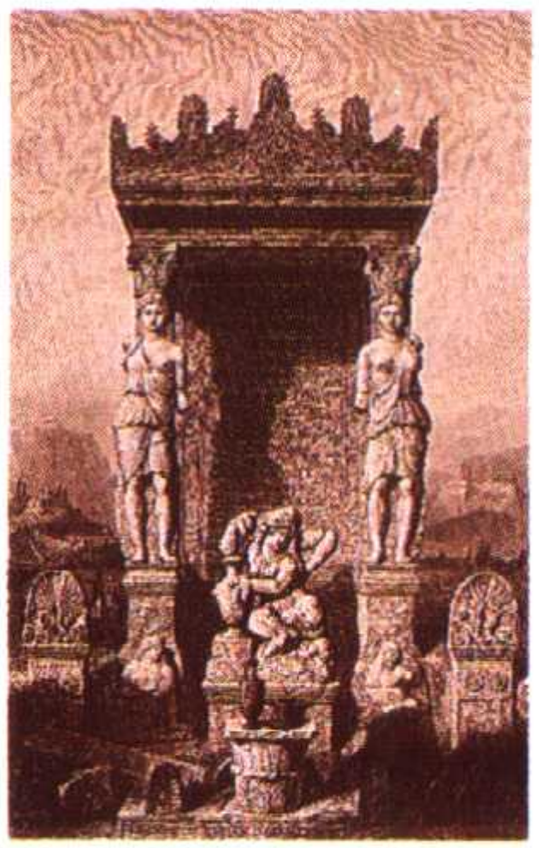
列奥·冯·克兰策（Leo von Klenze，1784-1864年）在这幅作于1846年的画中表现了他对于雅典卫城地形的认识，他曾与路德维希·罗斯（Ludwig Ross）讨论过卫城的地形。这是第一幅，也是唯一的一幅描绘使徒保罗(Paul)在阿雷奥帕果斯(Aréopoge)山丘上发表演说的场面的复原图。而其整个场景确切地说更是一座建筑式样博物馆的场景。冯·克兰策于1834年作为巴伐利亚国王的建筑顾问出现在雅典。继爱德华·肖伯特（Eduard Schaubert）和斯塔马提奥斯·克莱安提斯（Stamatios Kléanthis）之后，他提议在卫城北面建立一个考古保护区。这一大胆的想法并没有受到重视。不过，退而求其次，他还是比较顺利地着手彻底清理了卫城，拆除了其上所有的中世纪建筑物。


ΤΩ
ΝΙ ΚΑ.

“我们，勇敢而宽厚的希腊人，保存着对希腊古代自由、马拉松（Marathon）战役和温泉关（Thermopyles）战役的记忆；我们在祖先的坟茔上战斗，祖先曾为我们的自由而战死。”

**亚历山大·伊普西兰提斯（Alexandre Hypsilantis），1821 年**

# 第六章
# 民兵的时代



该图为《摩里亚科学探险》（*Expéditions scientifiques de Morée*，1831 年）的卷首插图。图中可以看到，在女像柱的脚下有卢浮宫中收藏的奥林匹亚的排档间饰的残部。这次包含有 3 方面内容（自然科学、考古学、建筑和雕刻）的探险是在希腊解放的最后几次战斗期间匆匆结束的。



在《米洛的维纳斯》到达巴黎的时刻，希腊独立战争的第一批起义爆发。这场独立战争持续了7年，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关注。各“亲希腊委员会”向国际舆论详实地报告了独立战争的一切事件。在这些“亲希腊委员会”中，我们能看到拜伦的身影，1824年他逝世于米索隆基；还能看到艾尔金、夏托布里昂……“亲希腊委员会”的成员都是自由主义者、基督教徒，他们对希腊感怀至深，推动了希腊人的起义。这些激愤英勇、身着短裙的战士——他们被称为“民兵”（Palicares）——成了传奇人物，他们复活了马拉松战役的精神，他们是浪漫而又古典的英雄。

希腊人进行了艰苦的浴血奋战：他们在最初几年（1821-1824年）当中取得了胜利，继而土耳其人反攻得手（1824-1827年）。英、法、俄几大国又联手在纳瓦兰（Navarin）歼灭了土耳其舰队，制止了土耳其的反攻。到1829年希腊独立才成定局。从1827年到1831年，沙皇的前大臣让·卡波狄斯特里亚（Jean Capodistria）被任命为希腊政府的领导人，政府试图组织起国家。而该领导人的遇刺和随后的无政府状态又使列强得以把一个巴伐利亚君主强加于希腊：这位尚未成年的国王奥托（Otton）于1833年入主希腊；他一直掌权到1862年，是年的一场自由主义运动废黜了他。

“用几句话来描述，雅典民兵的装束是这样的：一件高级密织薄纱大翻领衬衫，不扎领带；一条棉布短衬裤；偶尔穿长袜；总是着一双齐膝的用扣子扣上的护腿罩，此护腿罩颇类荷马史诗中战士的胫甲；一双红拖鞋；一条短裙或一条颇为宽大的裙子，其腰间束紧部位环绕以小褶；一条腰带和若干彩色丝绸的窄松紧袜带；一件坎肩；一件敞袖短上装外套；蓝流苏红便帽；一条大皮带上拴挂着绣花手帕、钱包、烟袋、文具盒和刀剑。短上装外套和护腿套几乎总是用丝绸制成，并且常常绣着金线。”

埃德蒙·阿布（Edmond About）：《当代希腊》（*La Grèce contemporaine*），1855年

## 希腊人收回他们的遗产



“当国王[奥托]身着民兵的服装，以优雅的姿态骑着一匹矫健的马穿过雅典街道的时候，他可能给人们造成了某种错觉。他的高高的身材、他的清瘦和一种烦恼的威严神情深深打动了站在远处观望他的外国人。这与二十年来欧洲对他的看法相去甚远。”

埃德蒙·阿布：
《当代希腊》，1855年

这一时期也正是希腊民族收回他们文物的时刻：希腊人组织了他们的第一个考古管理部门，并制定了反对文物掠夺者的法律。1833年雅典被宣布为首都，其古建筑成为希腊人和德国人双双关注的焦点。这些古建筑令希腊人想起了他们往昔的光荣和独立，对德国人来说则是他们新政权的象征。六十年后，民兵一代或已过世或被接替；继这些先行者的时代而来的是文人和学者的时代。

革命当中，建筑物未能幸免于难：雅典卫城为一支土耳其驻军所占据，1822年他们才首次被驱逐。而后在1827年土耳其反攻时，希腊人遭受了猛烈的围城之难。据一位目击者所言，此间有180枚炸弹和350枚圆炮弹落于山岩之上。当土耳其人在1833年最终撤离当地时，建筑物的情况可以说是很糟糕；芭苔侬神庙的西边再次遭到破坏，埃

瑞克透斯神庙失去了它的一根女像柱——我们看到，战争并没有艾尔金造成的损失大，艾尔金已经把一根女像柱夺走运到了伦敦！

## 文物的保护

在创建一个国家中必然具有的一切困难当中，希腊人对文物采取了若干措施：1827年他们在特罗伊曾(Trézène)开会，决定禁止文物的外运。而在希腊人商谈一笔借款的时刻，又由于卡波狄斯特里亚本人的整个外交手腕和法国的全面影响，会议又同意法国运走奥林匹亚的排档间饰——它们今天陈列在卢浮宫中。这些排档间饰是由一支在摩里亚与麦宗（Maison）将军率领的法国远征军

卡尔·弗里德里希·辛克尔（Karl Friedrich Schinkel，1781-1841年）的《希腊的鼎盛时期》（*L'Apogée de la Grèce*）这幅画在希腊发生变革的时刻激起了人们很大的兴趣（1825年）。它以浪漫主义的手法表现了想象中的雅典。对于其中蕴涵的精神价值，辛克尔赞叹道："这幅风景画让人们看到了一个赋有卓著教养的民族的极其丰富的文化，这个民族善于娴熟地运用本性中的每一要素来从中为个人并且更经常地是为群体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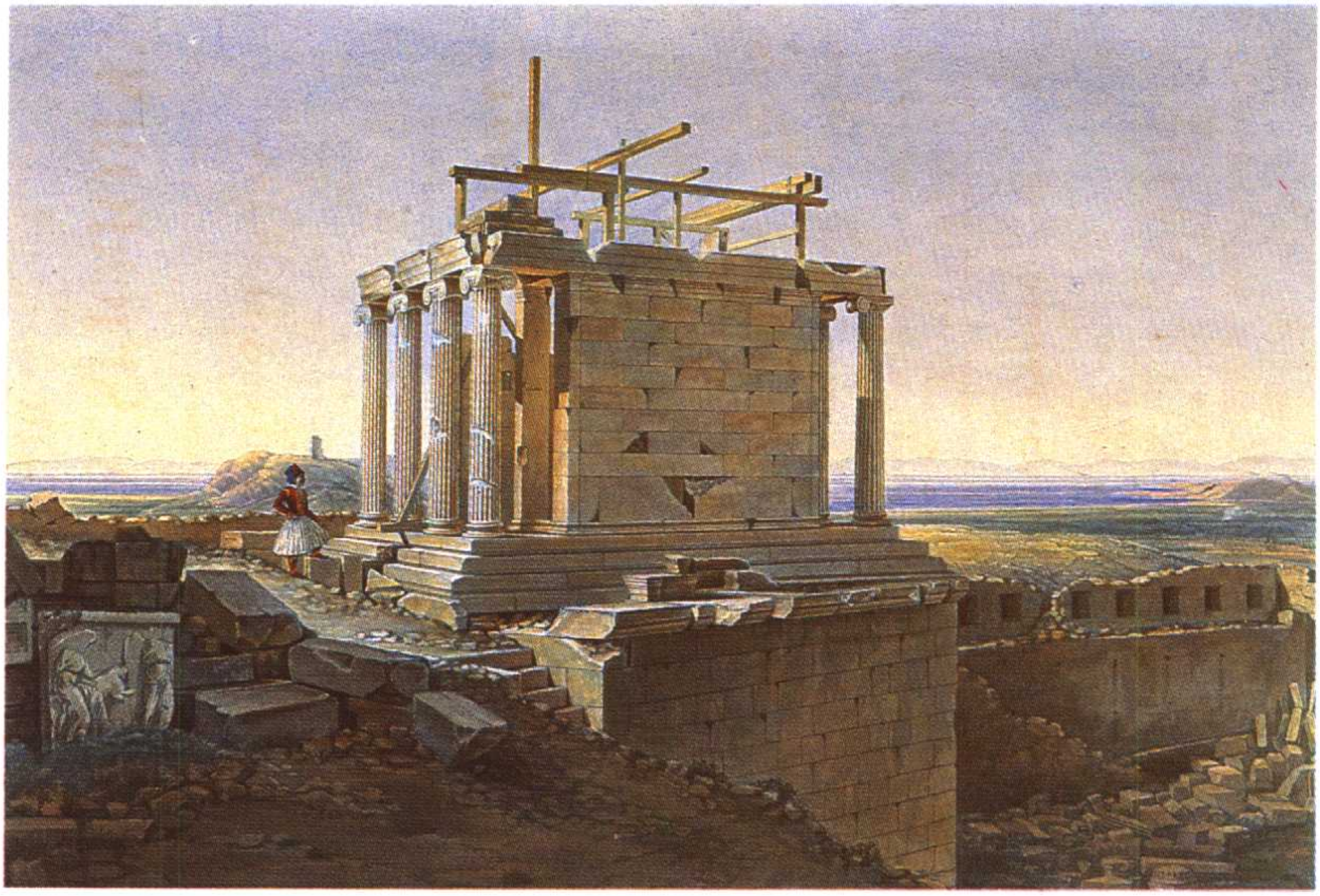


汇合的科学考察团发现的；麦宗负责将土耳其人驱逐出伯罗奔尼撒，此外他还在那里轻而易举地被晋升为元帅。

埃德伽尔·基内（Edgar Quinet）当时是一个富有热情和天才的非常年轻的希腊学家，但还不是一个具有那个时代自由主义思想的大师。作为一个铭文学家他受雇参加摩里亚远征。他记述了自己旅居希腊的情况，撰写了《现代希腊》(La Grèce moderne)，此书于1830出版。正如夏托布里昂曾使优美如画的游记体裁蔚然成风一样，基内的作品则是这一游记传统中的最后一批好书里的一本。这种希腊游记体裁衰落的原因在于：这些优美如画的记述走的都是同一路子，随着其数量的增多势必变得枯燥乏味和令人厌烦，从而走入了穷途末路；另一方面，正如德国考古学家路德维希·罗斯在其1835年的《诸岛游记》（*Voyages dans les îles*）

得一种高雅的乐趣。在这里人们可以通过这幅图景同这个民族一起享受生活，可以跟随他们从事一切纯粹人文的和政治的活动。”辛克尔作为建筑师的成就要超过他作为画家的成就，尤其是他在柏林建造了某些现代仿古希腊风格的建筑。他甚至还应巴伐利亚宫廷的要求绘制了拟在雅典卫城上建造的王宫的设计图。





伊奥尼亚式的雅典娜·尼凯的小神庙（约公元前430年）在1676年时依然伫立；它于1687年围城期间被拆毁来为土耳其人修筑防御据点腾出地方。1835年，德国考古学家和建筑师罗斯、肖伯特和汉森（Hansen）着手对它进行重建。北面和南面中楣的浅浮雕已被艾尔金勋爵抢走，故以模塑品作为替补。

的导言里指出的那样，它还是一种不太适合科学性出版的体裁。罗斯的书是这一体裁的最后一批经典著作中之一。关于希腊的引人注目的出版物越来越是一些科学论文。

## 考古管理局（Service archéologique）的建立

自1834年到1836年，罗斯是新建立的考古管理局的领导人。考古管理局下辖三个区——大陆希腊、伯罗奔尼撒和爱琴海诸岛——和雅典“忒修斯神庙”里的一个中心博物馆。目前人们尤其关注雅典卫城的古迹，1834年冯·克兰策在卫城上修复芭苔侬神庙的一根柱子便是这一点的象征，柱子周围为爱神木和橄榄的枝条所装扮。一年以后，巴伐利亚驻军撤离山岩，卫城最终由考古管理局控制。这些年当中的大事是雅典娜·尼凯小神庙的重建，其所有石块均从奥斯曼人的堡垒中被找回。卫城于1835年最终向公众开放。其崭新的旅游前景得以确定：人们可以购买个人票或家庭票，这些门票许可参观

的期限由2天到9个月不等。

即便德国人很活跃，他们也不是唯一活跃的人。罗斯年方27岁，是位优秀但性格傲慢的年轻学者，他鄙视其部门上司——如亚历山大·朗加贝（Alexandre Rangabé）——和其下属——如奇里亚考斯·皮塔奇斯（Kyriakos Pittakis）——是不对的，这两人都够得上是先锋年代的代表。这两位希腊人最终一致决定摆脱高傲的罗斯。罗斯占据雅典考古的主导地位一直到1843年。他不得不离开了这一位置，因为一场民族主义革命决定了要把外国人和在希腊境外出生的希腊人逐出政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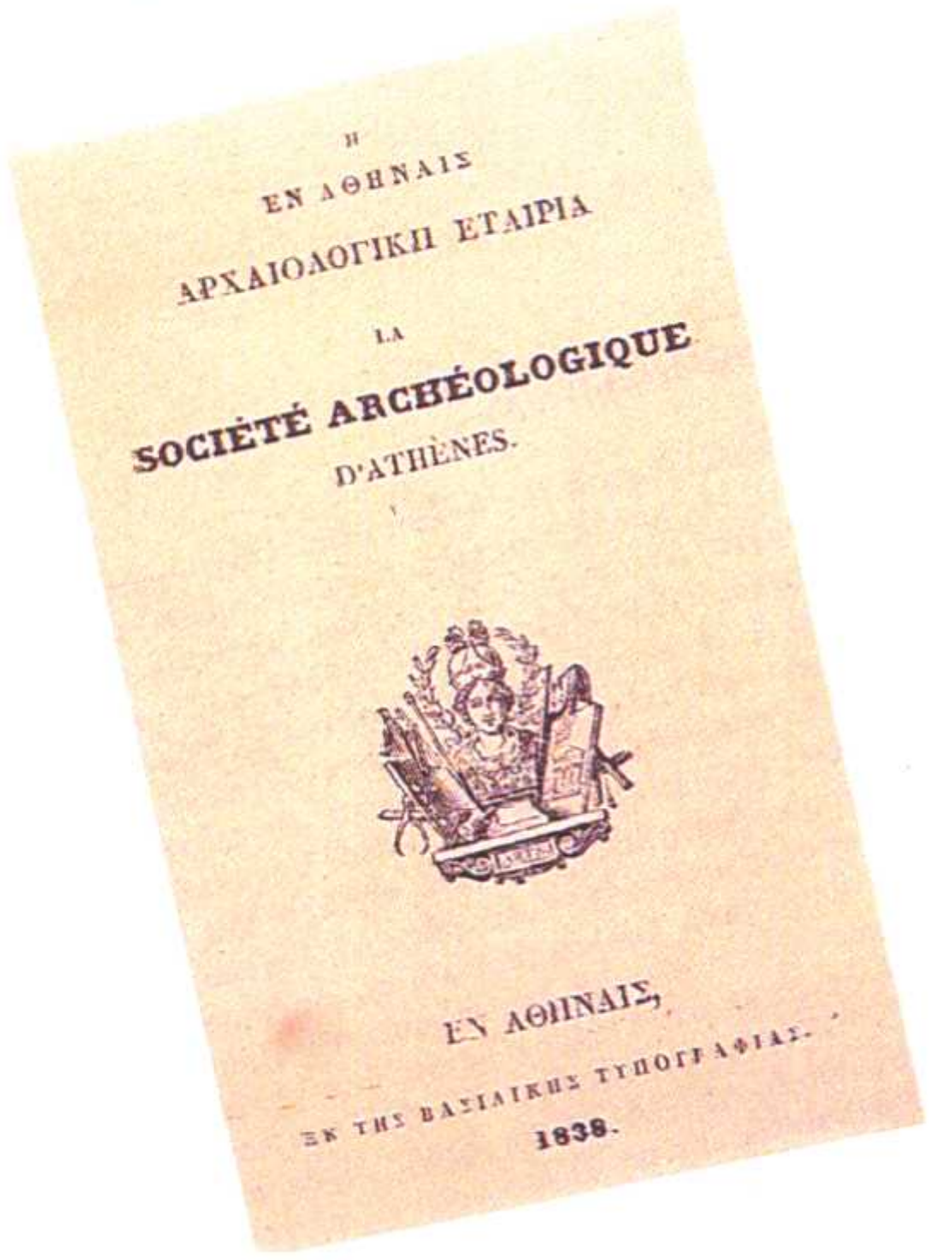
也是由于朗加贝和皮塔奇斯的合作，1837年希腊的第一本考古学杂志《考古公报》（Ephéméris Archaiologiki）创刊，希腊考古学会（*la Société archéologique grecque*）亦于同年成立。这两项体制一直存在，标志了希腊国内的研究水平。考古学会招集到了一些会员，会员的会费用于发掘和汇集文物，以弥补国家经费的不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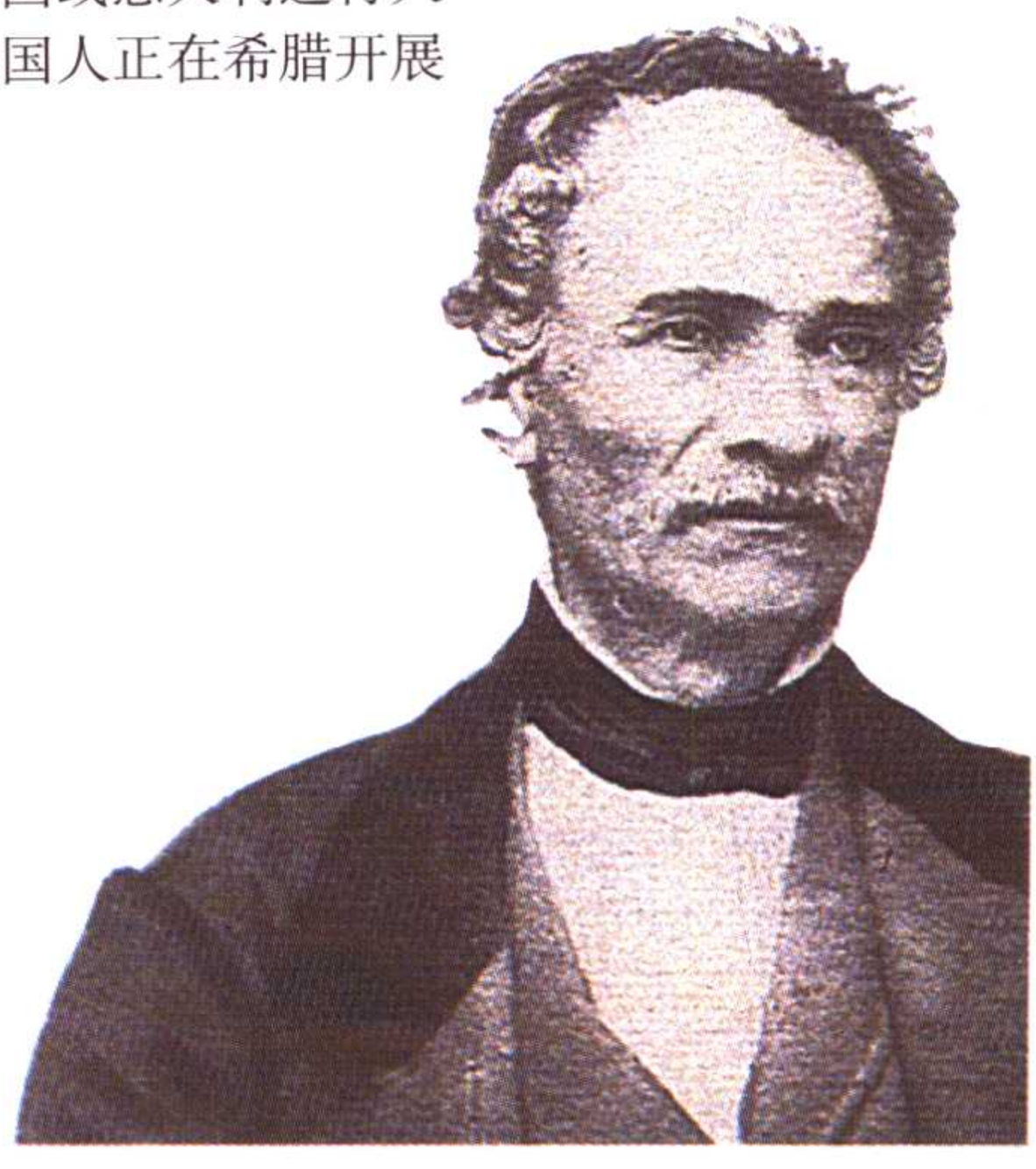
## 法国人的兴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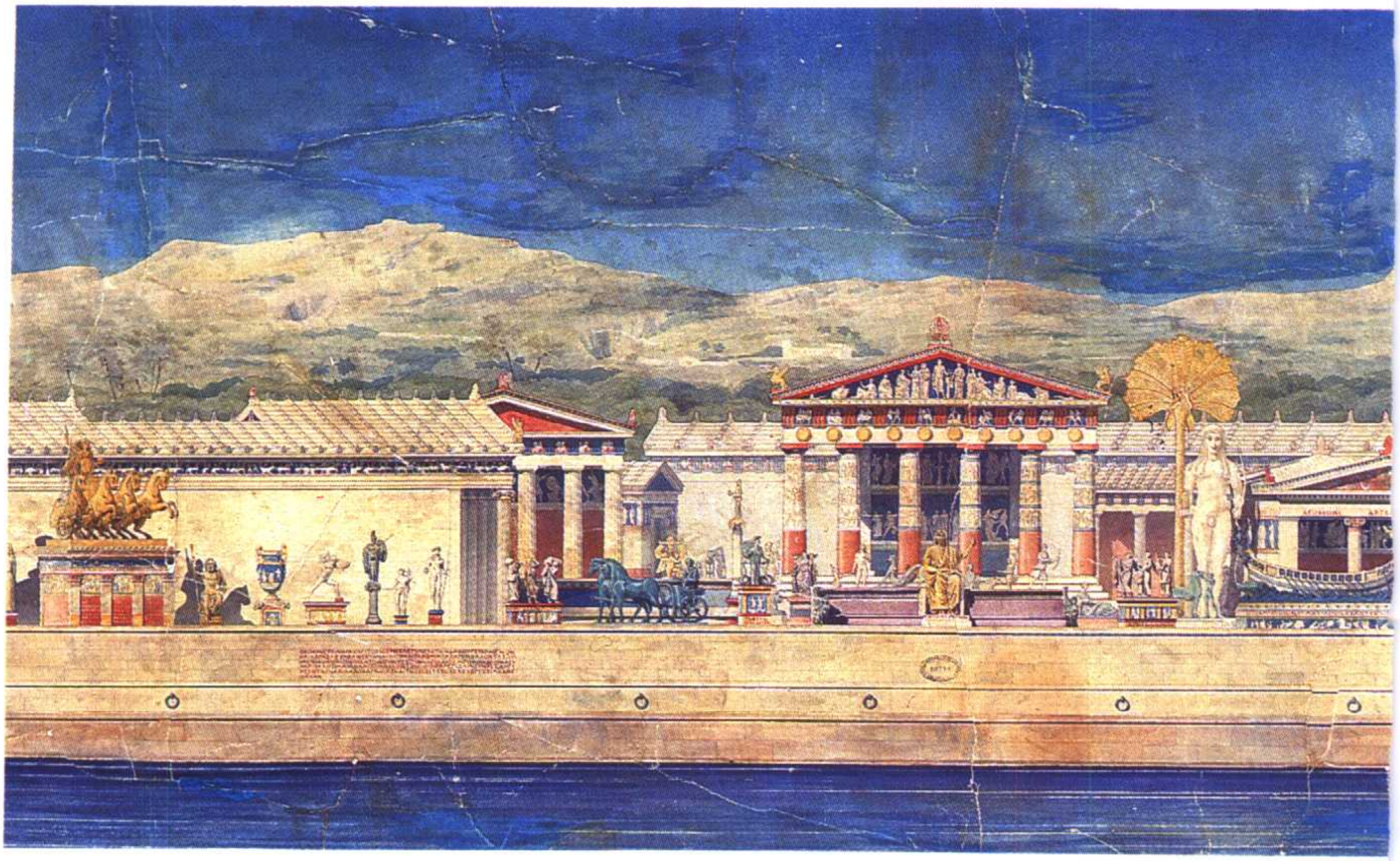
在外国考古学家当中，当德国人从德国或意大利进行大规模汇集资料的奠基工作的时候，法国人正在希腊开展活动。

鉴于他在战争期间保护古物的热情，“应当表扬雅典博物馆现任馆长M. C. S. 皮塔奇斯[下图]。人们可以看到他在这个动乱的时代里，手执民兵的步枪，仔细寻找着所有残留的古物，在那些岁月当中，他冒着生命危险保护这些古物免受敌人野蛮的蹂躏，并将它们精心收集起来，放置于安全的地点。”

（A. 朗加贝，1842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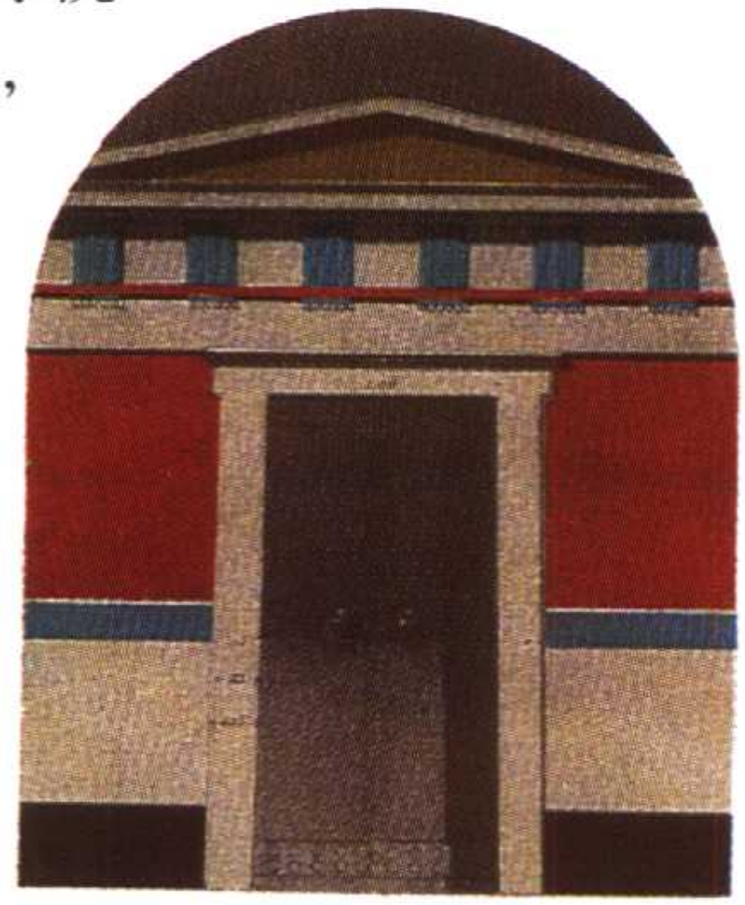





18 61年赴马其顿考察团为卢浮宫提供了若干精美的文物，从而使其馆藏得到进一步充实。皮德纳（Pydna）的马其顿墓葬（下图）的墓穴于地下掘成，上面覆盖以坟墩，该墓葬由一条墓道、一座多里斯式的门面和一间墓室组成。

法国有两项首创之举：为建筑师提供外派考察的机会，为希腊学家建立了一所学院。从1845年起，来自罗马的获奖的建筑师被邀请前去研究希腊建筑——妨碍赴希腊旅行的禁令在卡特勒梅尔·德·坎西死后已被解除。这导致了一系列关于雅典和阿提卡古建筑及其地面状况和修复的极为优秀的研究著作的出现。

这些艺术家自1846年起在法国雅典学院（l'Ecole française d'Athènes）受到接待，这所学院是为保护年青的希腊学家而建立的，而艺术家和这些希腊学家也在有机会的时候进行了合作。法国雅典学院是一所具有创新性的学校。在一开始，其章程中就对其使命做了颇为自由的规定。其中涉及到要促进“关于希腊语言、历史和古物的研究臻于完善”；还涉及到要加强法国在实地的影响，对抗英国集团。在一个希





腊首相已被完全争取到倾向于法国利益的时期，那些在希腊居住两、三年的寄宿生展开了旅行，阅读雅典卫城上的古代诗句，（短期）教授法语，有时还从事一些考古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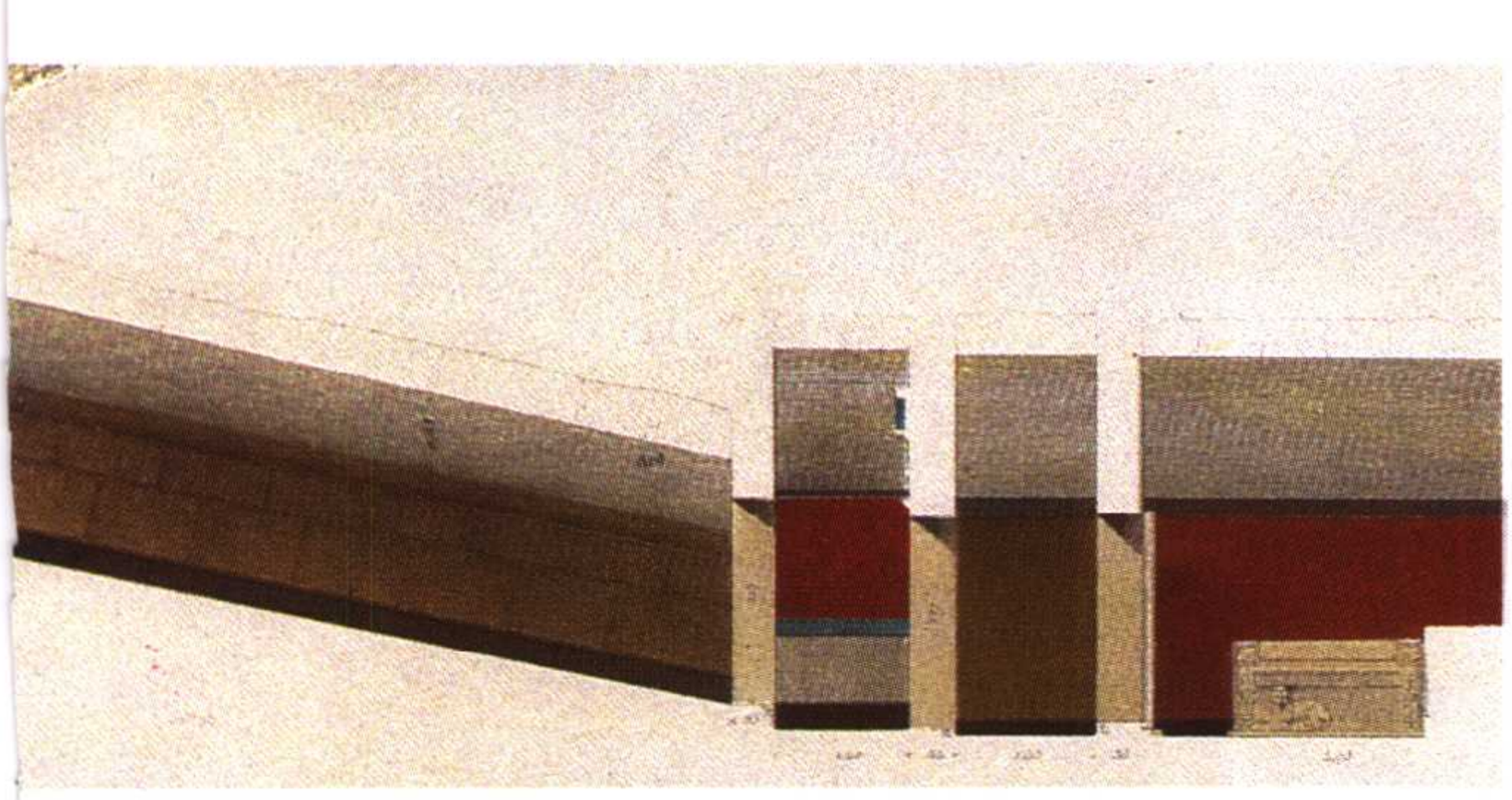


## 德国人的学术

德国学者要比法国人更少地亲临实地，人数众多、训练有素的德国学者都待在正在增多的大学教授职位上，他们是在这两个方向上展现其首创业精神的：编制博物馆或收藏目录，编辑资料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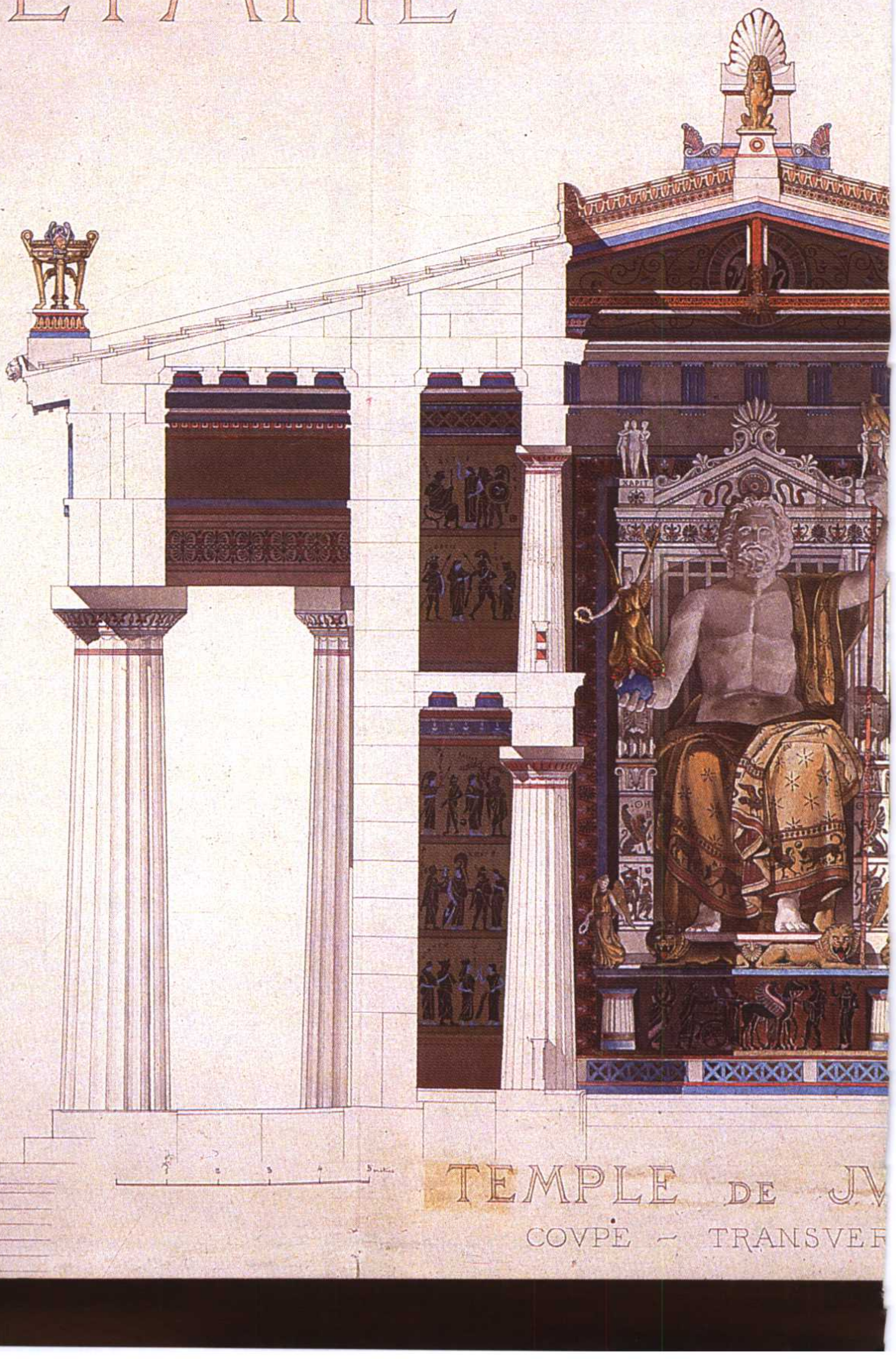
1829 年在罗马建立了一个考古学家联络组织。它是一个在德国人推动下建立起来的国际联合会，而直到 1848 年它才接纳了一个法国分部。这个组织的工作在两方面与希腊有关：某些学者被送到雅典编制“忒修斯神庙”和私人收藏品的清单；另一方面，该组织的核心人物爱德华·盖尔哈特（Eduard Gerhard）促使人们在对于 1828 年在乌尔奇（Vulci）的埃特鲁里亚人墓葬中发现的大量希腊陶瓶的认识

这一时代的复原图中建筑物的色彩并不总是与实际情况相符：左页上图为德尔菲圣所；上图为芭苔侬神庙的上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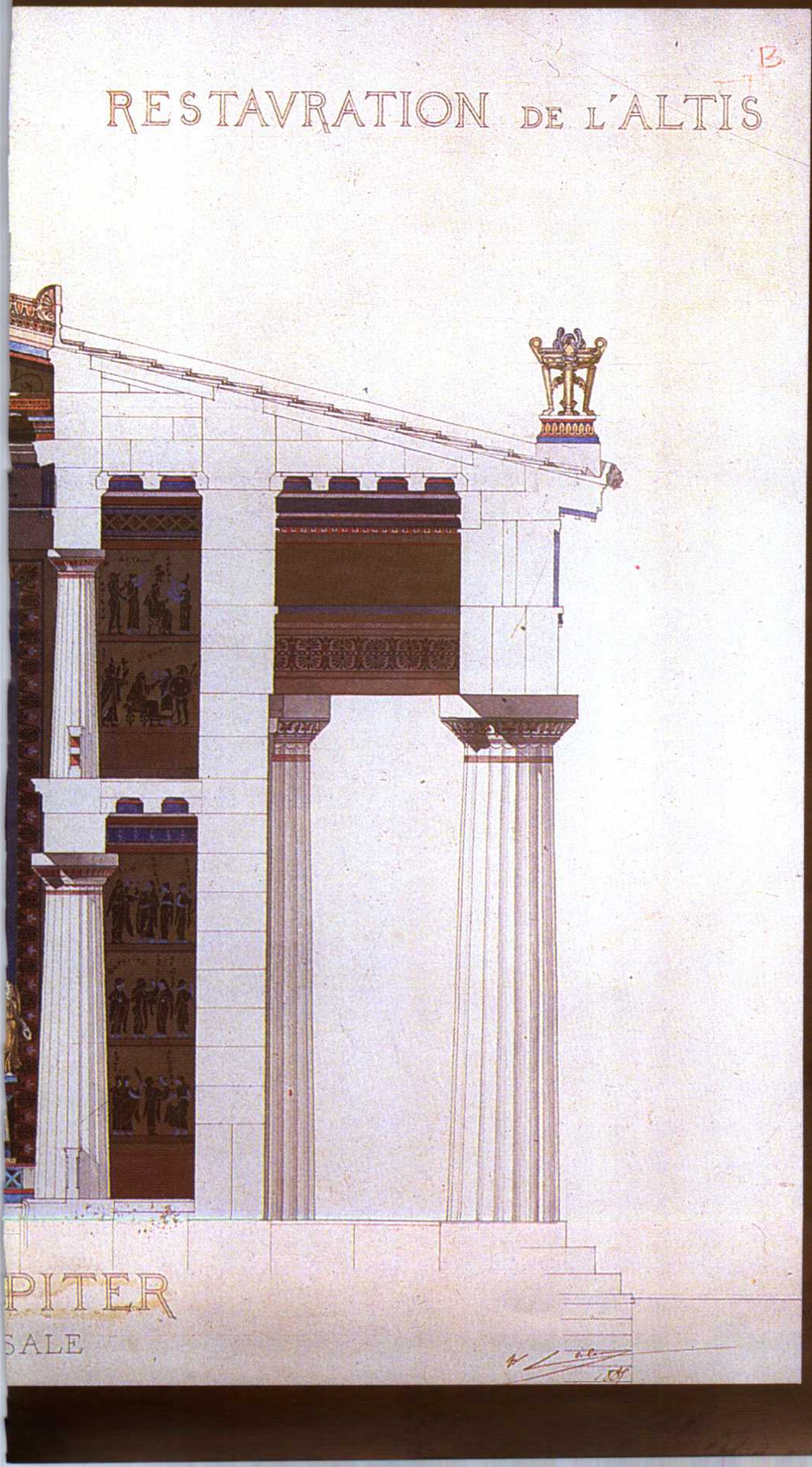


# OLYMPIE




TEMPLE DE JV

COVPE — TRANSVER




## 从罗马寄来的送审作品

法兰西学院在罗马的寄宿建筑师绘制了希腊古建筑的复原图。这幅奥林匹亚宙斯(Zeus)神庙的剖面图为维克多·拉卢（Victor Laloux）于1883年所作。该图并未关心和严格遵守科学的精确性。房顶上开的以让神像采光的天窗、对于室内装饰的过度喜爱、对建筑物上大理石的谨慎而洒脱的设色，这一切更多体现的是当时的审美观而非对遗址的观察。同样，下页一图对德尔菲的描绘在缺乏学术准确性的同时，却不乏灵感和生气。


TEMPLOS D'APOLLON


ECHEL

上取得了某些决定性的进步。这些陶瓶的产地——科林斯、雅典——一直到本世纪中期都是一个争论的问题；不过，对于其上带有的铭文的研究使人们能够最终证实它们是从希腊进口到意大利的，而不是当地希腊人或其他人制造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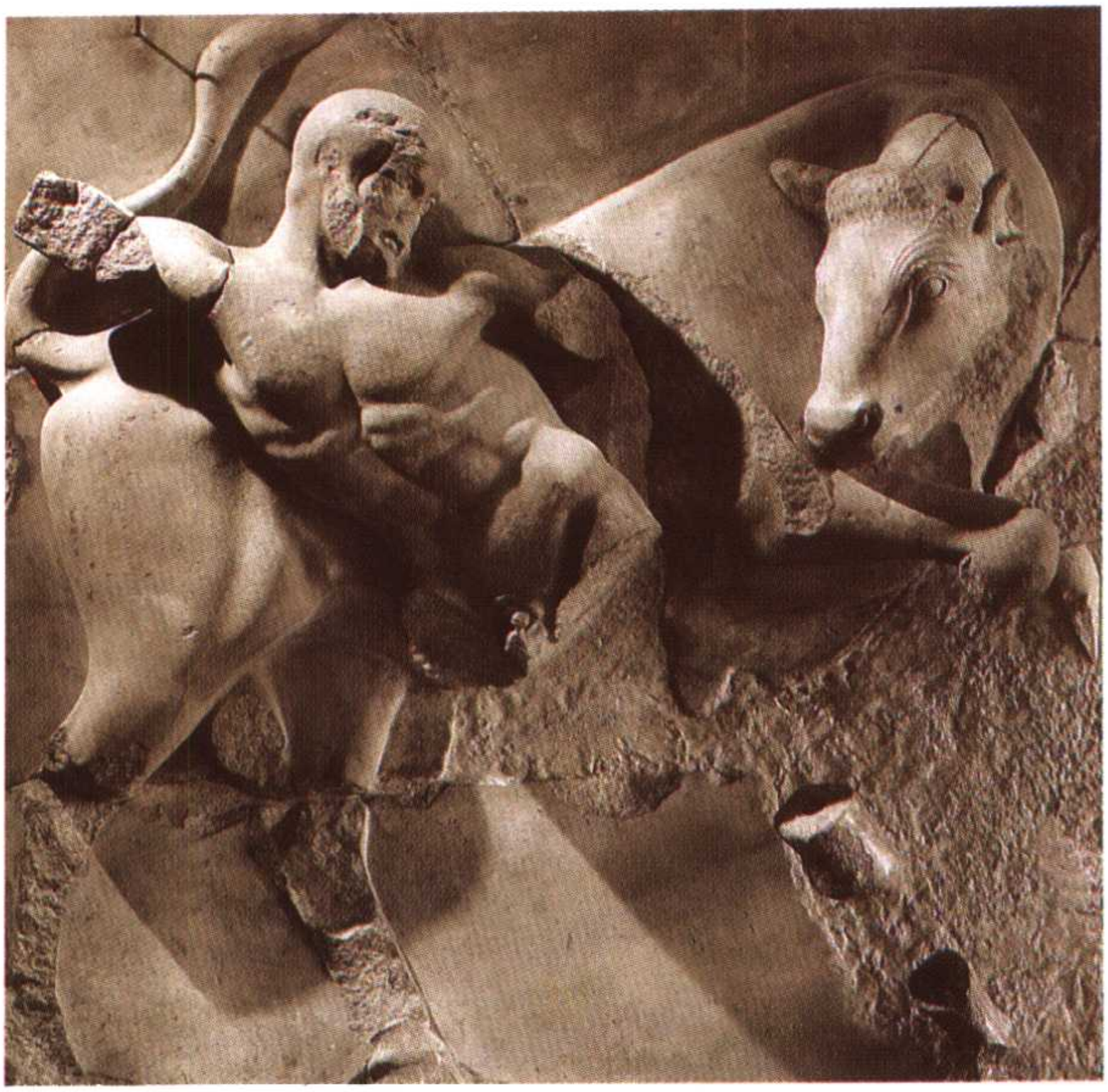
对于铭文，德国人采取了一项令人叹为观止的创举。柏林科学院（l'académie de Berlin）委托奥古斯特·博克（August Boeckh）把所有已经发表的铭文汇编成一部铭文集成。这些铭文不少于6000篇！人们还考虑到了该著作的定期增补。自从1825年第一卷出版以来，《集成》（*Corpus*）就成了一部必不可少的著作，以至于基内抱怨道，在他启程前往希腊的时刻，他在土伦还没有得到这一著作。

德国的语文学影响了一切研究。在雕塑方面即是这样，人们不再按温克尔曼的路子对“美”感兴趣。人们从描述艺术大师的作品的文献——例如老普林尼的著作——的原文出发来进行研究，而且力图在大量不知名的复制品当中鉴定出著名的原件。人们就是这样认出了吕西波斯的《刮污者像》（*Apoxyomène*）、波吕克莱泰斯的《持矛者像》和《束锦带者像》（*Diadumène*）以及普拉克西泰莱斯之父凯菲索多托斯（*Céphisodote*）的《抱着财神的和平女神》（*Eirené portant Ploutos*）。正是这种鉴定一直到20世纪初都将引导着研究工作。



## 伊奥尼亚人（Ioniens）和多里斯人（Doriens）

某些希腊雕塑的发现——艾吉那的三角楣到1830年雕塑陈列馆开馆时才为众人所知，奥林匹亚的排挡间饰在1829年被带到卢浮宫——使关于希腊艺术大趋势的讨论得以延续：在卡尔·奥尔弗里特·穆勒（Karl Orfried Müller）及其关于多里斯人的论



旁边图为被赴摩里亚探险队抢走运至卢浮宫的奥林匹亚宙斯神庙的排档间饰；它表现了与克里特公牛搏斗中的赫拉克勒斯（Héraclès）。构图上几何般的严谨、英雄的肌肉表现出的强劲的力量，对某些人来说，正是公元前5世纪60年代“多里斯”美术的特征。

左页图中的大理石雕像表现的是一个用刮皮具刮汗污的运动员。它是1849年在罗马的一座帝国时代的房屋废墟中发现的。E. 布朗（E. Braun）立即就认出它是吕西波斯的《刮污者像》的复制品。《刮污者像》是一尊青铜雕像，老普林尼曾描述过它。其原件被运到了罗马，并一度存于皇帝提比略(Tibère)的卧室之中。

文的影响下，人们把多里斯人——斯巴达和伯罗奔尼撒——的艺术和文明同伊奥尼亚人——雅典、基克拉迪斯群岛、小亚细亚——的艺术和文明对立起来。这种对立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但是人们从种族方面所作的论证却无论如何得不到证实。伊奥尼亚艺术和多里斯艺术作为两种艺术类型看起来是相当清楚的，本世纪末发现的丰富的古代文物也一再加强了人们在这一点上所取得的共识的确实性。但这又有什么要紧的！

至少一直到50年代，希腊艺术在学术界都被捧上了天，以至于罗马艺术呈现出日益丧失其地位的趋势，致使后来罗马艺术的地位几乎需要被重新树立。这种对希腊的迷恋也表现在那个时代的建筑上：虽然希腊风格从30年代起在英国开始衰落，但它在苏格兰、巴伐利亚却继续流行了更长的时间，在希腊则持续至大约1890年。在人们对于希腊艺术的认识由于重大的考古发掘而取得长足进步的时候，希腊范式终于不再风行。


COLLECTION of
SKETCHES from
MYCENÆ
TROY
& EPHESUS
made during a visit to GREECE to illustrate the Explorations of
D. H. SCHLIEMANN and J. T. WOOD.
By WILLIAM SIMPSON
To Which are added Photographs and other illustrations
having a reference to the same localiti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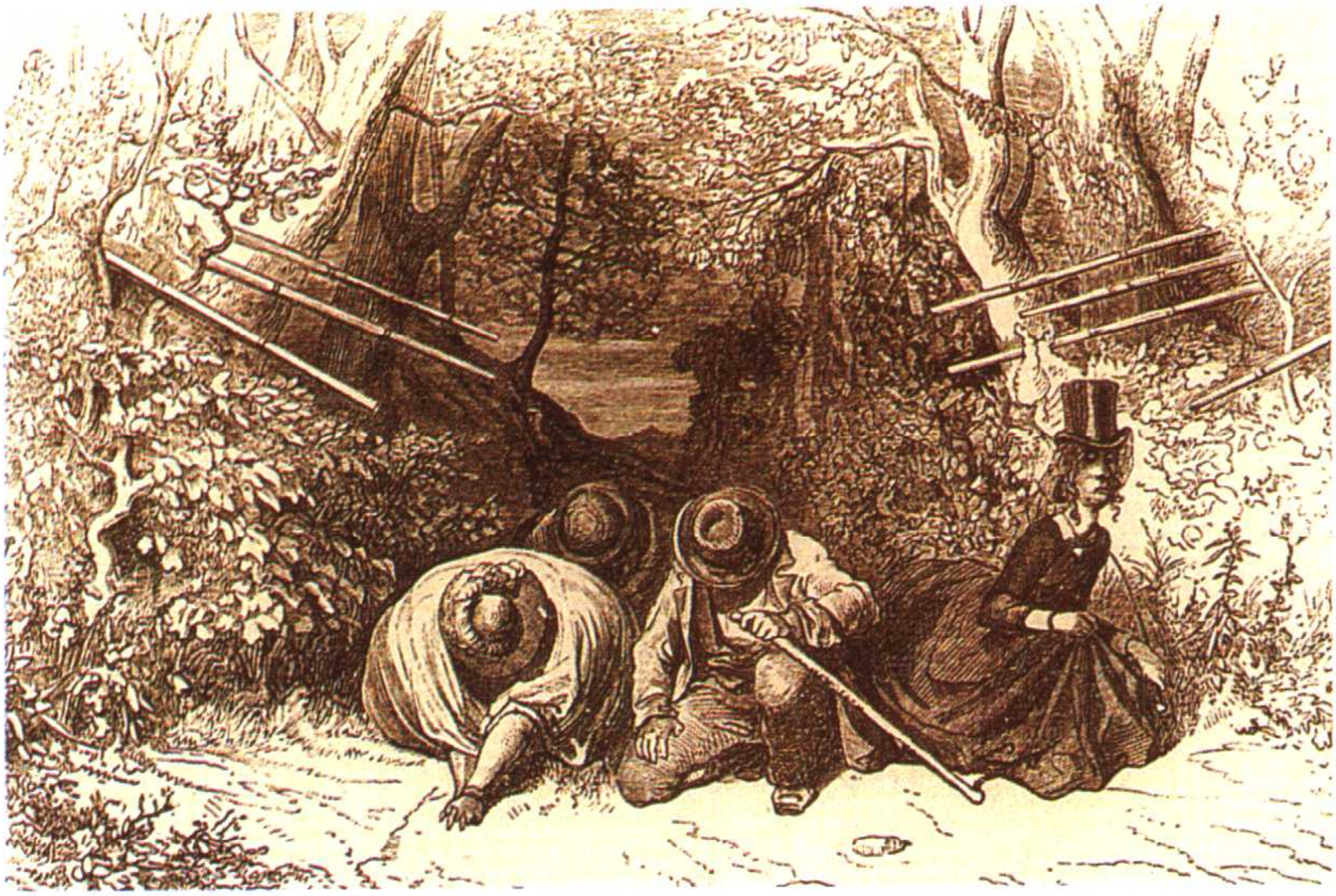
“我怀着极度的兴奋向陛下报告我找到了传说中提到的阿伽门浓、卡桑德拉(Cassandre)、优吕美东(Eurymédon)及其伙伴的坟墓。在这些坟墓中，我发现了实际上由古代的纯金器物构成的巨大宝藏。仅仅这些宝藏本身就能占满一个巨大的博物馆，而这座博物馆将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奇观。”

施里曼（Schliemann）致希腊国王乔治一世（Georges Ier）的信，1876年



# 第七章
# 红红火火的考古学

《萨摩色雷斯的胜利女神》(la Victoire de Samothrace)是夏尔·尚普瓦佐（Charles Champoiseau）在1863年发现的。这件公元前2世纪罗德斯岛派的艺术杰作起初被认为是一件质量平庸、时代较晚的装饰性雕刻。



埃德蒙·阿布在《山地之王》(*Le Roi des montagnes*，1857年）当中以幽默的方式谴责了希腊的强盗；居斯塔夫·多雷（Gustave Doré）的插图（上图）也为这本书的成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阿布是曾就读于法国雅典学院的唯一一位幽默作家，在那里他关于艾吉那的科学著作被以各种方式引用。

## “大跃进”

人们对于19世纪60年代的考古学和希腊知道些什么呢？当然，那时有一些重要的发现，但是这些发现只涉及到历史学领域的一个很小的局部。当时还没有对任何一个遗址的系统发掘。人们只满足于浅尝辄止地零星挖掘，其目的是为博物馆寻找收藏品，而不是为探索城市和圣所，人们其实还应该为这些城市和圣所测绘完整的地形图。所以，希腊和外国学者蜂拥而入的正是一个几乎属处女地的领域：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他们会把关于希腊的知识增加到如此之多，以至于我们对其发现物还没有全都做出结论——有些新发现我们还一直没来得及公布呢！

希腊考古学的飞跃发展得益于历史学和地理学的发展以及与这些年青的人文学科相联系的求知欲，这种飞跃主要是由大学界人士领导的。然而，在这个关系到诸多方面的先驱时代，希腊考古也引起了某些非凡人物诸



这幅画表现了1877年在科林斯的秘密挖掘，也能够说明古物盗贼在彼奥提亚（Béotie）的活动。在彼奥提亚，从1870年到1873年，有8000多座墓被打开；尤其是这些墓中出土了成批的希腊化时代的陶器，这些陶器被冠以“塔那格拉”（Tanagra）之名而为人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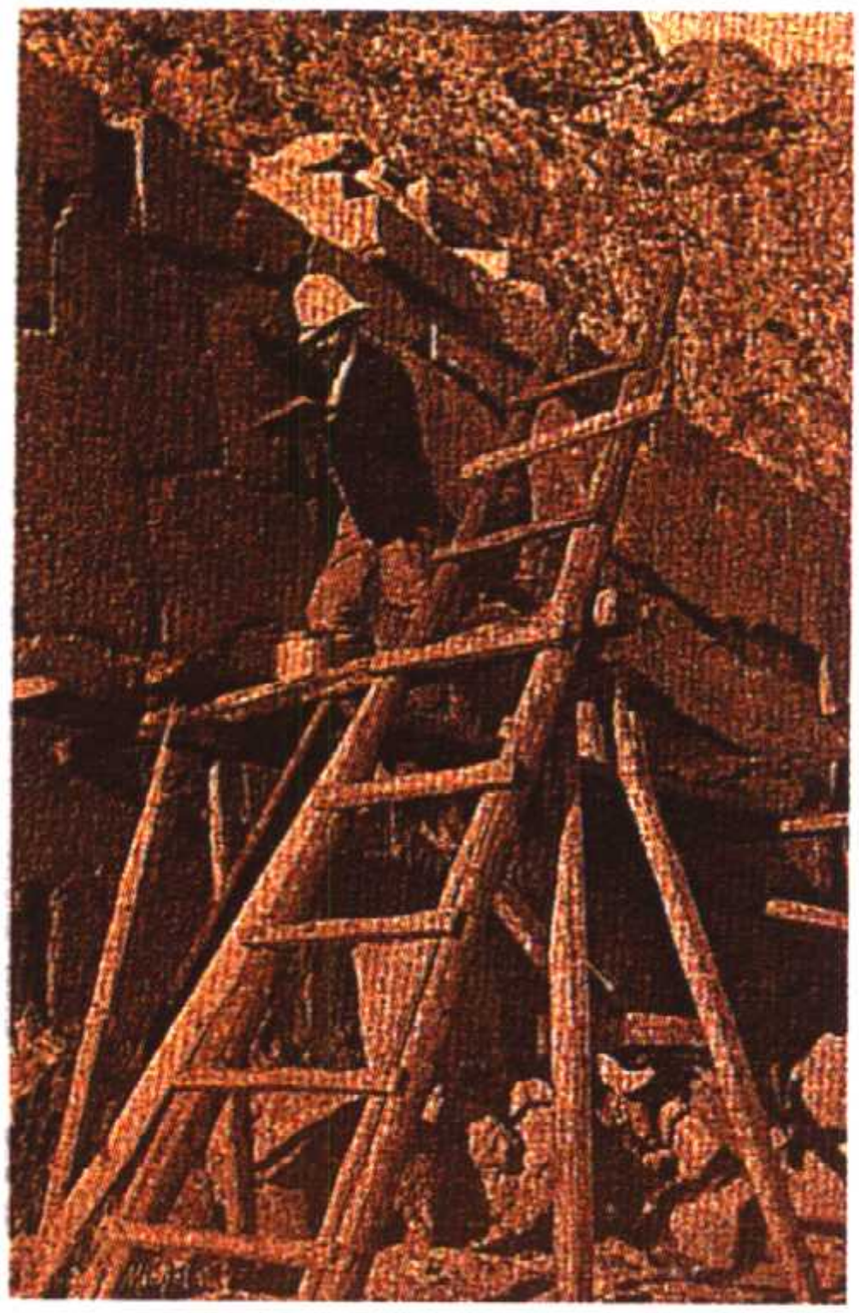
如海因里希·施里曼（Heinrich Schliemann）和亚瑟·约翰·伊文思（Arthur John Evans）的兴趣。

## 一个政治极不稳定的国家

说这是一个先驱时代，当然是因为在希腊工作还存在某些危险，乡村是那么地不太安全。甚至在雅典周围，旅行时也需要与士兵同行，以免落入匪徒之手。然而，虽然有人护送，这种厄运还是在1870年降临到了一群英国人和意大利人头上。这些人士的被杀所引起的不安颇为强烈；在舆论看来，埃德蒙·阿布说过的关于苏格拉底的祖国的所有讽刺之辞都得到了证实。1909年，在《若阿纳旅游指南》（guide Joanne）——《蓝色旅游指南丛书》（Guides Bleus）的先祖——的前言当中，居斯塔夫·富热尔（Gustave Fougères）还打算让旅行者们对安全状况放心呢！他说八年来安全状况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不过，最好不要到边境省份旅行，尤其是到那些还处在土

耳其人控制之下的希腊领土内，地方性的动乱在那里持续，以“伟大理想”（Grande Idée）名义进行的公开暴动经久不衰，“伟大理想”旨在把希腊人口占多数的所有地区皆并入希腊。幸亏大国的仲裁，希腊才于1864年收复了“七岛”（Heptanèse）——处在英国保护下的伊奥尼亚地区的七座岛屿——，于1881年收复了忒撒利亚。克里特岛于1897年实现自治，于1912年并入王国。马其顿在1913年遭受了第一次瓜分。如果认为此次解放运动中取得的这些成就是由一种出现于本世纪初的亲希腊思潮所致，那就错了。法国的亲希腊派于1904年组成了一个协会，但在第一次集会时不超过20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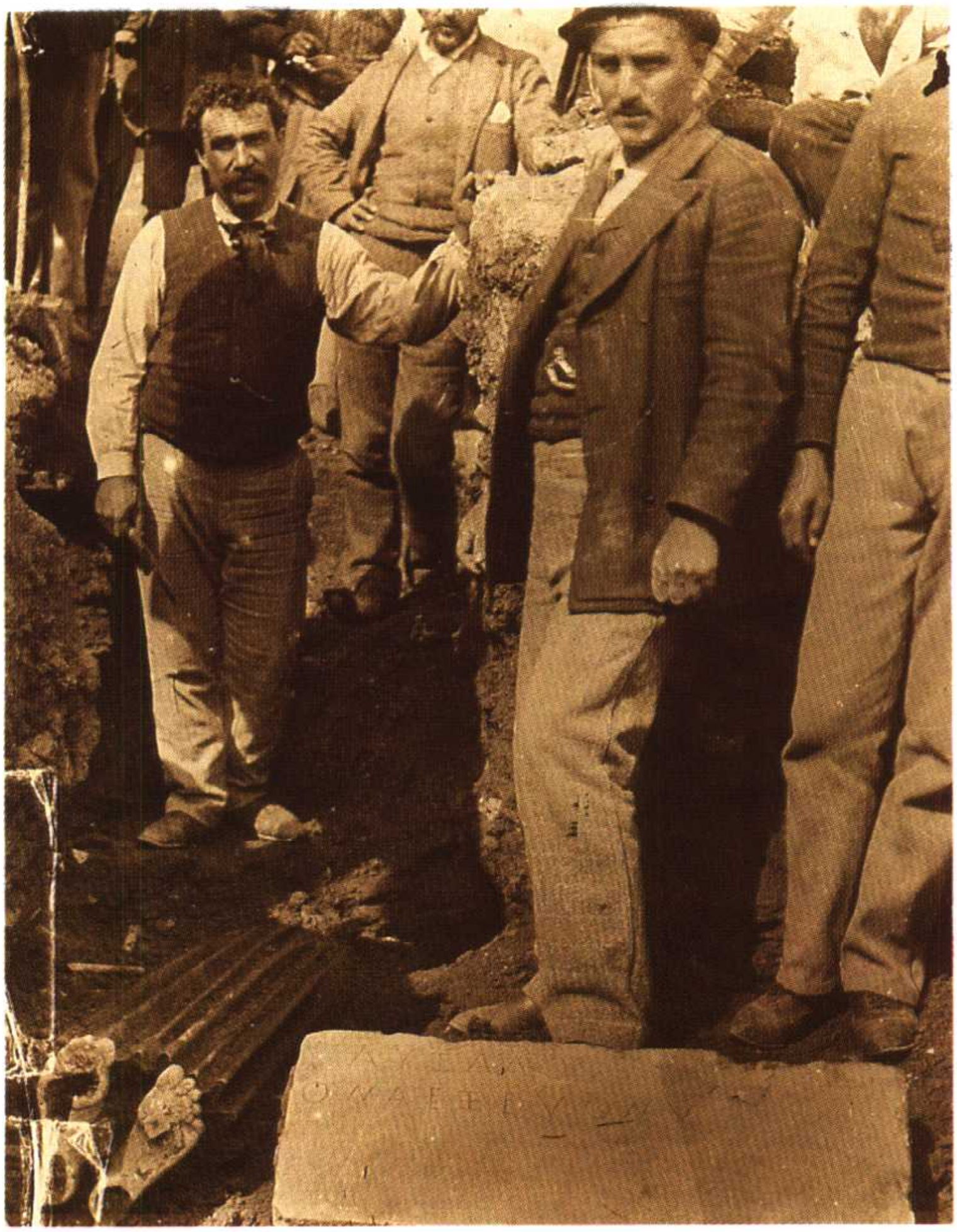
人们能够在该协会的纲领中读到：“希腊文化需要受到保护；而且不管一些有偏见的反对者或者看破一切的爱好者发出什么样的不利于希腊人的议论，都应当如此。重要的是，这样是为了保持在东方和在欧洲共同利益当中的势力均衡。”在东方这个复杂的问题当中，考古学具有一种支持巴尔干诸国领土要求的作用，这种作用又常常是不合理的。同时，大国——尤其是1870年战争以后的法国和德国——也把在希腊进行的研究纳入了他们的竞争范畴。



## 德尔菲之争

德尔菲遗址被特许出让给法国发掘的历史饶有兴味地展现了在希腊的国际和当地考古工作状况。德国人能够要求拥有在德尔菲的权利，穆勒已于1840年在那儿进行了

希腊人当然是好客的，但是居民们还是不信任前来在他们房屋中进行发掘的外国人。德尔菲的阿波罗神庙便是这样被覆盖在卡斯特里（Kastri）村之下的。以前为法国学院成员，后来任其院长的泰奥菲尔·奥莫尔（Théophile Homolle）会说道：“您在德尔菲吗？取得多角墙要比取得特洛耶（Troie）所需要的时间多两倍，并且付出的竞争、苦工和计谋都不会更少。”旁边图为法国人保罗·富尼埃（Paul Fournier）在1896年抄录多角墙的铭文。



发掘。法国人在 1861 年和 1880 年感兴趣于支撑神庙平顶并刻有大量铭文的多角墙。他们要求得到在该遗址的发掘特许权。由于诉讼程序的时间很长，1887 年德国人汉斯·珀姆托夫（Hans Pomtow）还在那里顺利地进行着发掘。首任希腊首相特里库皮斯（Tricoupis）这位杰出的人士打算将遗址的发掘特许权与销入法国的科林斯葡萄干的关税特权的取得联系在一起。法国拒绝对这一惟利是图的商业诡计做出让步，面对这种拒绝，他提出让德国人来发掘。尽管某些学者，例如占据斯特拉斯堡教授职位的阿道尔夫·米哈埃利斯（Adolf Michaelis），曾指出，法国人刚洗劫完提洛岛，为了整个同行之间的情谊，他们还是不在德尔菲发掘为好，柏林科学院(l'Académie de Berlin)还是礼貌地拒绝了特里库皮斯的提议。



德尔菲大规模发掘期间的发现是非常惊人的：上面图中的《御者》(l'Aurige）是少数几件青铜原作之一。它与它底座的一部分（在近景中）同时出土：铭文表明这尊四马二轮战车御者像属于一个雕像群，该雕像群是由西西里僭主波吕扎罗斯(Polyzalos)在皮提亚运动会上获得马车竞赛胜利时奉献的。

新近突然来到希腊的美国人没有得到多少公平竞赛的机会，他们也在谋求自己的利益。最后，法国人得到了他们需要的发掘特许权，并且没有在葡萄干关税问题上做出让步，但也不是没有付出垫款。发掘需要征用建在此遗址之上的拥有1000户住宅的卡斯特里村的土地，并在更低处重建该村。居民们对施于他们的粗暴行为非常愤怒，他们举行了暴动：发掘是在军队的保护下于1893年开始的！幸运的是该发现行动所获投资高达50万金法郎。不过，德国人并没有完全松手：珀姆托夫曾出版过一部有关德尔菲的书，其中充满了攻击法国人的不逊言辞；他还不停地让这种科学上的争吵变得更加历害。

## 外国学院的增多

国家能从这些花费很大的事业中获得什么物质利益呢？什么物质利益也得不到。希腊宪法禁止古物输出；德国人有理由夸耀自己在1875年同希腊签定了第一个“不为私利的”发掘协议而取得了奥林匹亚的发掘特许权；所有的发现物均保留于希腊，只有复件才能够外运。俾斯麦(Bismarck)并没在这一交易中上当受骗，他于1881年断绝了拨款。不过皇帝们比首相更懂得可以从考古当

图为1910年法国建筑师和考古学家小组在提洛岛“发掘之家”房前。提洛岛阿波罗圣所的发掘始于1873年；发掘工作在1904年和1914年之间由于卢巴伯爵（duc de Loubat）的援款而得到特别加强。发掘的成果相当可观：人们可以重建一座圣所，并且还可以复原公元前2-前1世纪时一座城市中的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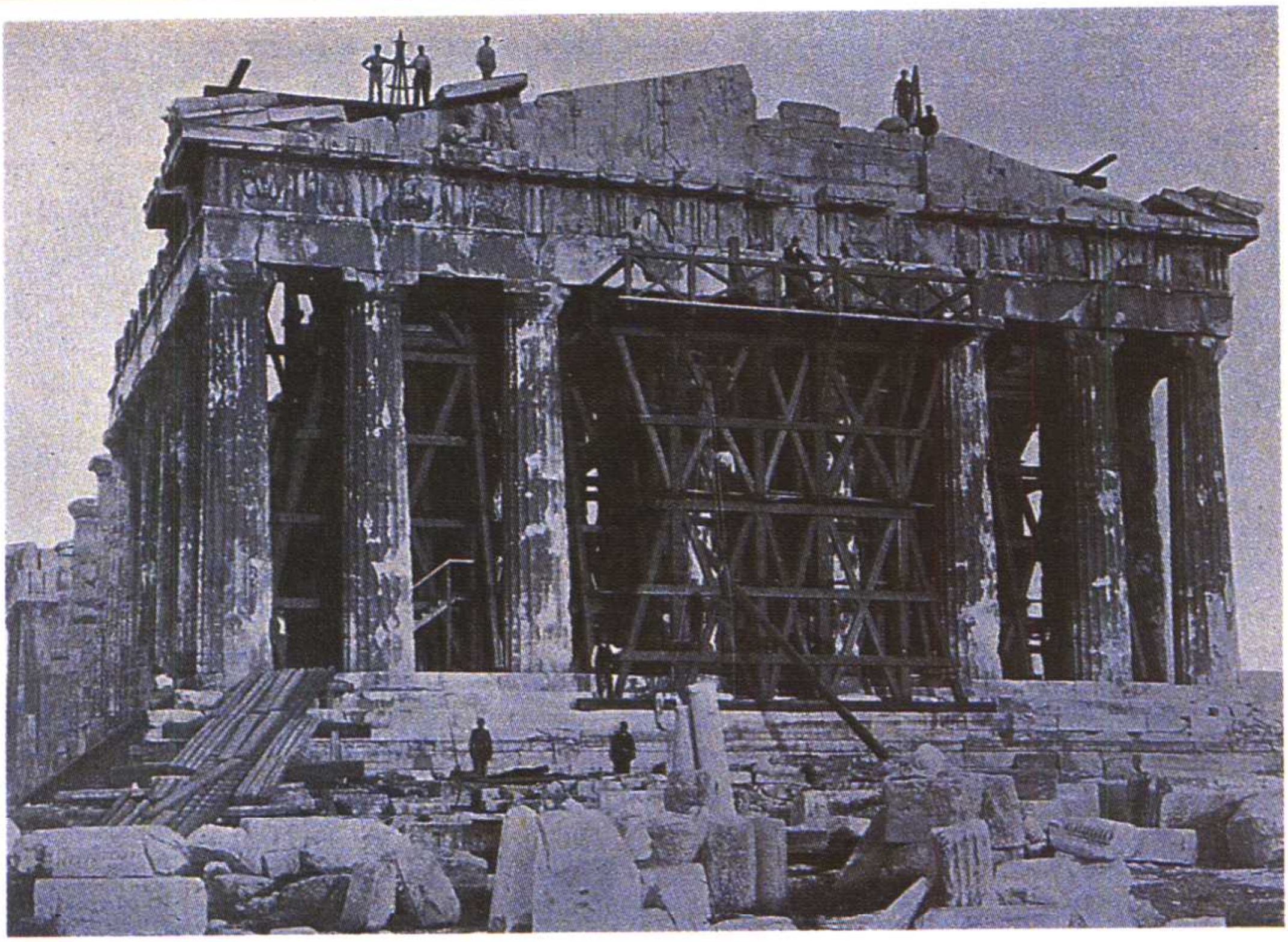


图为1891年希腊发掘工人在拜占廷时期的达芙妮（Daphni）修道院中。这些中世纪的建筑物没有立即引起重视，甚至当它们妨碍到发掘更古老的建筑物[芭苔侬神庙、哈德良图书馆]的时候，它们便被拆毁。在19世纪90年代，希腊人着手进行发掘和修复达芙妮（11世纪的镶嵌画）。

中博得荣誉，他们用自己个人的资金来资助发掘：威廉一世（Guillaume Ier）资助了奥林匹亚的发掘，他的孙子资助了科孚岛（Corfou）的发掘。至于法国人，他们也认识到了在这一点上的利益，以至于他们开设了一个能够接待外国学生的分支结构。

发达国家都想效仿法国和德国。美国人在1882年，英国人在1885年建立了他们独立的机构。然而，由于有关的基金会基本上是以私人基金来运作，这些机构与国家机构的联系较少。奥地利人在1898年，意大利人在1909年建立了他们自己的学院，这两个学院的资金根本无法与德国人或法国人拥有的资金相比。这样，19世纪最后一个三分之一期便是以外国学院和发掘的增多为标志的。

直至今天基本上没有很大改变的发掘地理格局就是在那时奠定的。自1914年以前起，仅就大型遗址发掘现场的占有情况而言，法国人在德尔菲、提洛岛、塔索斯（Thasos）和阿哥斯[Argos]（城市），德国人在奥林匹亚、忒拜（Thèbes）的卡比里翁（Kabirion）、萨摩斯（Samos）、雅典的陶工区（Céramique），美国人在科林斯和阿哥斯的赫拉神庙（Héraion），英国人在伯罗奔尼撒（Péloponnèse，麦伽罗



波利斯[Megalopolis]和斯巴达），意大利人在克里特（高尔提斯[Gortyne]、伊达[Ida]、法伊斯托斯[Phaistos]）开展了工作；奥地利人则在萨摩色雷斯进行了开拓性工作(该遗址已由美国人再次发掘)。

## 希腊人的积极行动

如果认为当时希腊的考古完全被外国人殖民化了，那是不准确的。考古学会在斯泰法诺斯·库马努狄斯（Stéphanos Koumanoudis）这位杰出人士的促进下得到了发展；斯泰法诺斯·库马努狄斯于1859年至1894年间担任学会秘书。而后学会又得到了最具有争议的极端保皇主义者帕那伊奥提斯·卡瓦狄亚斯（Panagiotis Kavvadias）的推动；帕那伊奥提斯·卡瓦狄亚斯是雅典卫城上少女雕像（Korés）的发现者，他于1885年至1909年间担任古物主任。一直到20世纪初学会都掌握着相当充裕的资金，这使得希腊人能够增加专业考古学家的工作岗位，并且能够发掘大量的

芭苔依神庙在1894年的地震中遭到毁坏而需要修复。1905年，第一届国际考古学大会（Premier Congrès archéologique international）在雅典召开，会上讨论了对之修复需要达到什么程度的问题。艺术界抗议考古学家打算触动这样一个奇观的意图。

遗址，特别是雅典和阿提卡——艾琉西斯（Eleusis）、拉姆努斯（Rhamnonte）、奥罗波斯（Oropos）——埃庇道罗斯（Epidaure）、埃托利亚，更不用提那些已取得重大发现的地点了。

这种资金的宽裕也使大量的省级博物馆得以开办起来——这些博物馆给古物管理局（Service des antiquités）带来了荣誉——，也使雅典卫城、巴塞、凯罗内亚（Chéronée）的狮子和马拉松的陵墓的若干重要的修复工作得以进行。这些活动的资金是通过一种创新性的手段筹得的。考古学会获得了发放“赞助古物事业彩票”（Loterie en faveur des Antiquités）的权利；你要是知道这种彩票在1887年到1904年间在希腊境内享有专营权，你就很容易想象得到其成功了。随后，彩票开奖所得又要有一部分分配给海军，这就导致了收入的减少。而且，1909年革命引起的动荡令考古学会的财政陷入了低谷。

## 狂热的研究

希腊人和外国人都为这场知识爆炸做出了贡献；这是一场有点杂乱无章的爆炸，因为没有一项总的计划来指导对于遗址和发掘的选择。但是我们非要抱怨这些已被引入四面八方的大量研究工作吗？1914年以前，由于希腊王国的扩张，在希腊文化所及的各地区当中，几乎没有一个地区其重大遗址未招来人们对之进行发掘的。在遗址的选定上，人们以古典作家、鲍萨尼亚斯和以前的考察先例作为向导，对器物和铭文格外丰富的地区展开了研究。这就是被发掘的古典遗址大多为宗教圣地的原因：德尔菲、提洛岛、埃庇道罗斯、奥林匹亚、奥罗波斯（Oropos）、萨摩斯、萨摩色雷斯等均为圣地。



自从1885年以来，卡瓦狄亚斯就已着手清理雅典卫城，清理范围一直达到悬崖。这尊手执水果的年轻姑娘的大理石雕像——《少女像》——是1886年在一个坑中发现的，同时还发现了14尊同类的雕像。雕像的衣服上还保留着涂色装饰的痕迹（公元前530－前520年）。

知识在空间中扩展的同时也在时间中得到了扩展。就“古典”各时代而言，雅典卫城、德尔菲、提洛岛几地的雕像和科孚岛带有雕刻的三角楣的令人震惊的发现使人们对于古风时期造型艺术的认识发生了革命。萨摩色雷斯和提洛岛为人们关于希腊化时代建筑艺术的知识提供了必不可少的补充，更不用说仅仅是在德尔菲和提洛岛遗址中新发现的7000则铭文了！此外，我们还要提到的是，藏于卢浮宫里的排档间饰就已经给了人们一个对于奥林匹亚的雕刻装饰的印象，上述三角楣的发现则进一步展现了公元前5世纪60年代伯罗奔尼撒雕刻家高超的技艺。然而，这一时代的标志与其说是上面列举的大量发现，不如说是对于传统文献中没有记载的文明或某些在文献中仅留下了一些蛛丝马迹的时期的揭示，这样的文明和时期有几何陶时期（période géométrique，公元前10－前8世纪）、迈锡尼文明（civilisation mycénienne）、米诺斯文明（civilisation minoenne）、基克拉迪斯文化（culture des Cyclades）、帖撒利亚的塞斯克洛（Sesklo）和迪米尼（Dimini）新石器遗址。希腊的历史上推了几千年。在这种对于从前的追溯当中，有两个迥然不同的非凡人物发挥了首要的作用：一个是麦克伦堡（Mecklembourg）的商人施里曼，他是一位自学成才的考古学家，也是一个擅长虚构传奇的人；另一个是身为自由派大资产阶级的伊文思，他受教育于牛津，是一位丝不苟的学者。两人的唯一接近之处就是他们对于前期考古的热情和投资于希腊考古发掘的举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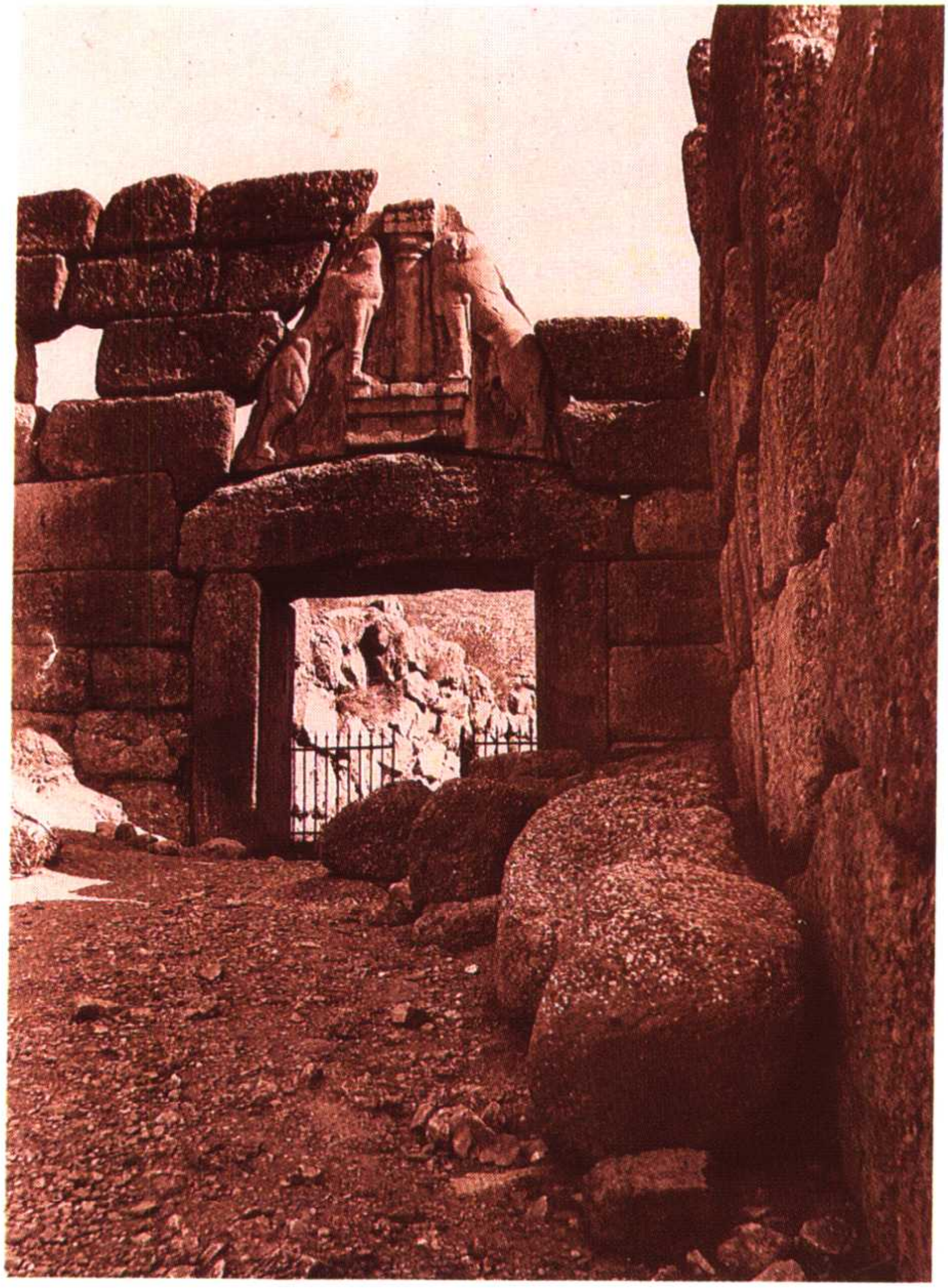


施里曼（左下图）是一个牧师的儿子。由于他的语言天赋和不择手段，他获得了商业上的成功。1868年，他鸿运当头，周游世界，决心贡献其一生来追寻荷马文明；他是通过与一位希腊姑娘结婚实现的这种对希腊文化的皈依（上图为戴着特洛耶首饰的索菲娅·施里曼[Sophie Schliemann]）。

## 施里曼、神话与非议



施里曼具有坚持不懈地实施这一项连贯的研究计划的优点，在这一计划的引导下，他于1868年来到伊大卡（Ithaque），而后又于1872－1873年到达了土耳其的希萨利克（Hissarlik）遗址。他证实了该遗址无疑与特洛耶城有关系，他使一笔传奇般惊人的宝藏重见天日，这笔宝藏随即被命名为“普里阿摩斯（Priam）的



施里曼对奥林匹亚发掘的这些看法表露了他本人的观念："他们把一切都翻动了一遍；他们是清除一个土层后去挖下一个土层。他们要在这上花掉无数的时间和金钱；他们应该立即挖到底儿，这样他们就会有所发现了。"在迈锡尼只有施里曼夫妇监督着大约120个工人发掘，这对夫妇还同希腊考古管理局的代表斯塔马塔齐斯发生了争执（旁边图为迈锡尼狮子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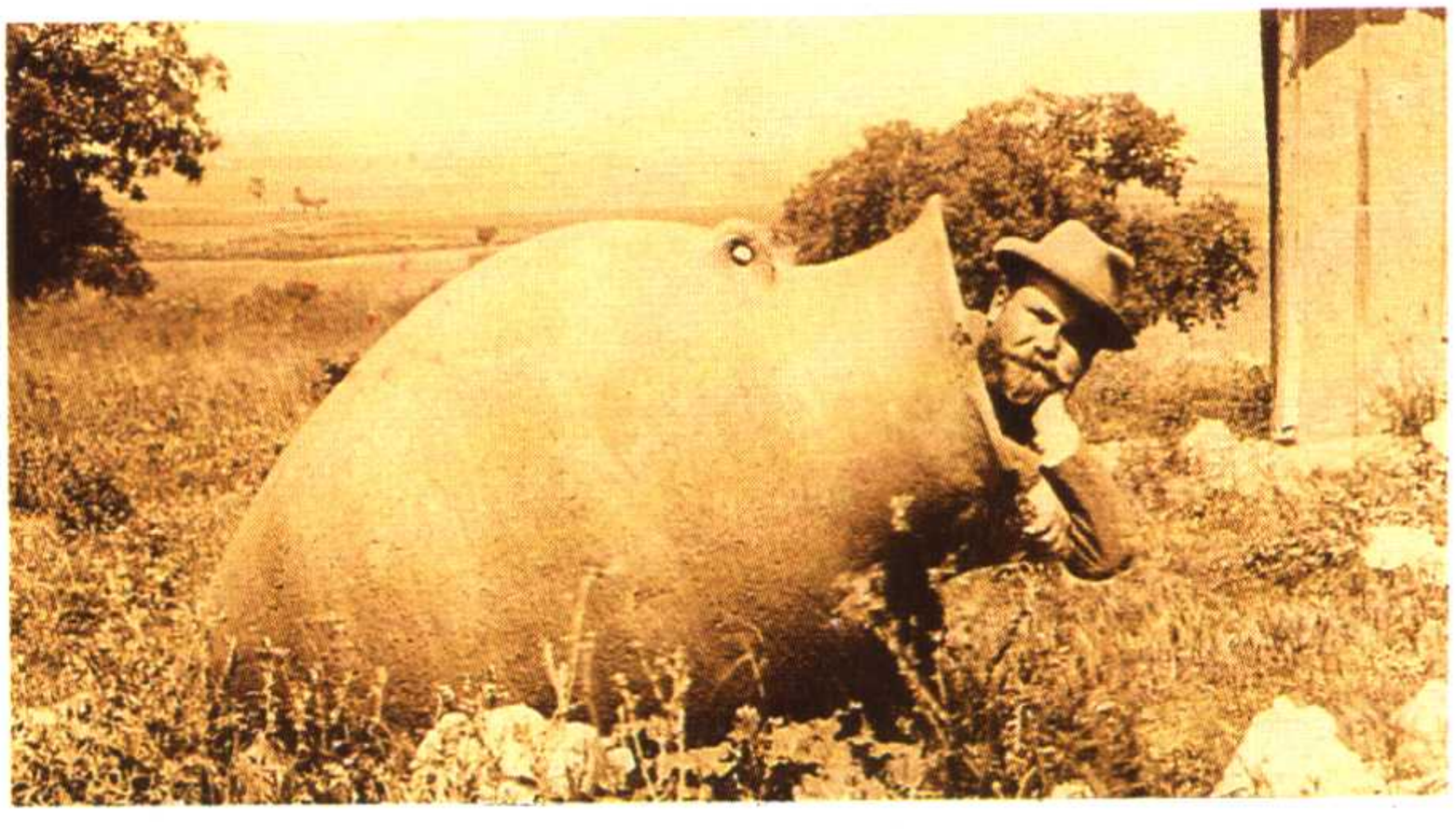
宝藏"或"美女海伦（Hélène）的首饰"——这时正值奥芬巴赫（Offenbach）的时代（译者按：奥芬巴赫系德裔法籍音乐家，以其浪漫的轻喜剧而蜚声乐坛。此处提及他，旨在说明与他同时代的施里曼的考古活动及其考古发现命名也象他的轻喜剧一样富于浪漫色彩）！

他偷偷地将这笔珍宝从土耳其带回希腊，他也不得不抵挡土耳其政府提起的一桩轰动性的诉讼。多亏是他自己出了钱，他才从这桩讼案中脱身。随后他在1874年到迈锡尼，鲍萨尼亚斯著作文本中的一处错误使他在迈锡尼卫城内部发现了一个坟墓圈：他根据这位游记作家的著作原文发掘了其中的5座墓，而漏掉了出乎他所料的第6座。



这一座将由希腊人来发现！施里曼向学术界和广大公众揭示了一个直到那时还不为人知的文明的非同寻常的宝藏：丧葬用的金面具、黄金和青铜的杯子、金银丝嵌花匕首、带有最古老浮雕的墓石。所有这一切都被迅速地用德语和英语展出和公布于众。施里曼于1881再赴特洛耶，并把他的一部分发现物——“普里阿摩斯的宝藏”即在其中——捐献给德国。随后他在彼奥提亚的奥尔科美诺斯（Orchomène）发掘。1884年他发掘了梯林斯(Tirynthe)遗址：他把迈锡尼时代王宫的砖墙错当成了新近的墙；如果没有德国雅典研究院秘书长，自1882年以来就与之合作的维尔海尔姆·道尔普菲尔特（Wilhelm Dörpfeld）的劝告，他就会把这些墙拆掉。也正是这件事使有些人不无道理地说，施里曼最成功的发现就是道尔普菲尔特。

而施里曼应该是懂得人们今天称之为“传媒意识”的东西的：使用欧洲所有语言组织展览，召开研讨会，出版著作。所有这一切他一样都没有放过，目的是为了让全世界都知道自己。他甚至在1878年请求英国首相格莱斯顿(Gladstone）为其关于迈锡尼的书作序。在确保个人荣誉



左侧图为施里曼在迈锡尼发现的墓葬内明器当中的5副黄金面具之一（公元前16世纪）。这些面具是将金箔蒙在木雕面模上制作成型的。这是一种完全新颖独创的器具；在爱琴海地区人们还看不到与这一初次尝试制作的国王肖像同样的其他东西。标记坟墓的墓碑也同样异乎寻常，其上装饰着战争和狩猎的画面。

这个从坛子中伸出头的人是道尔普菲尔特，他是德国学派中那些具有创新精神的杰出的建筑师和考古学家当中的第一人。他在奥林匹亚试点性发掘工地中接受过培训。从1887年到1912年，他担任德国研究院的领导。特别是由于他采用了一系列新技术——地层学、摄影，他对施里曼的影响最大。他个人也领导了一些考察，尤其是在雅典和琉卡斯岛的考察。



图为克诺索斯王宫北入口。王宫占地1.3万平方米（这是克里特最重要的王宫）。各项设施均围绕一个中央庭院（1250平方米）安排起来。宗教仪式和公牛杂技应该都是在中央庭院举行的。这一颇为独特新颖的建筑有多重的走廊、众多的台阶，从而引发了迷宫(Labyrinthe)和米诺牛(Minotaure)的神话。

的同时，他也为希腊考古的利益和希腊的利益贡献了力量。他最后的功绩是在雅典建造了两座具有19世纪末现代希腊仿古风格的建筑杰作——他的住宅和他的坟墓。

## 伊文思：身在米诺斯（Minos）宫中的学者

施里曼和伊文思的命运在克诺索斯(Cnossos)相交了。前者在那里没有能够取得发掘场所，后者在这方面则由于克里特独立政府中主管考古和教育的约瑟夫·哈基达齐斯(Ioseph Hazzidakis)的帮助获得了成功。于是，米诺斯文明的发现属于了英国人。伊文思优于施里曼的地方在于他是一个有教养、有学问的遗产继承人。施里曼是旅行推销员兼征服者的德国的化身；伊文思则是得益于工业革命成果的资产阶级英国的体现。1893年伊文思赴希腊旅行，在雅典的古董店中发现了一些来自克里特的刻有象形文字符号的古代石头。这是米诺斯文字的首次发现。伊文思决定到克诺索斯进行发掘。他自己掏腰包为发掘场地付款。1899年他挖下了第一锹，这便是米诺斯王宫的非同寻常的发现。



亚瑟·约翰·伊文思（下图为他在克诺索斯）是一个工业家的儿子，他是一个钱币学家、富有才华的史前史专家。他走遍了世界，作为一名记者，他支持年轻的斯拉夫国家的事业，这也招致他于1882年锒铛入狱。一回到英国，他就开始了他的考古学生涯，担任牛津阿什莫尔博物馆(Ashmolean Museum)馆长。他收集了若干私家藏品，从而丰富了博物馆的馆藏。

这位伟大的英国学者怎能不叫人佩服呢？他不满足于揭示一个新文明，他的才干使他建立的年代学，无论是对于米诺斯时期的克里特，还是对于公元前三千年代和公元前二千年代初的基克拉迪斯，至今仍在运用。他也是最后一位能够以个人身份到希腊满足自己考古热情的人。先行者的时代最终过去了。而伊文思的人格也常常令人忘记了那些在同一时期也为人们认识克里特文明做出了贡献的意大利、美国和希腊的学者。



## 考古学的荣誉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希腊考古颇为国际化，这也正是它繁荣的原因；同时，它还非常“巴尔干化”（balkanisée，译者按：“巴尔干化”一语系一种比喻说法，指多样、分裂、缺乏统一性的格局，如同巴尔干半岛民族和国家的复杂情况一样）：在希腊的外国研究院没有采取任何共同行动，人们也列举不出一次希腊人和外国人之间的合作发掘。每位发掘者都

心怀嫉妒、惟恐有失地照看着他的发掘工地，以独自从中博得荣誉。1886年，德国人借“第一届柏林美术展”（le première Exposition des beaux-arts Berlin）这个百年一遇的时机，按原物大小复原了奥林匹亚神庙的正面——该神庙被安置在一座用帕伽马（Pergame）中楣的模塑品装饰的台座上。正如德国庆祝它的考古学胜利一样，法国也颂扬它在希腊的工作：在1889年“世界博览会”（l'Exposition universelle）期间，泰奥菲尔·欧莫尔在特罗卡得罗（Trocadéro）的讲坛上就提洛岛的发掘发表谈话。1900年的博鉴览会展出了刚刚发现于德尔菲的那克索斯人的斯芬克斯像（Sphinx des Naxiens）的模塑品。希腊人自己也从其祖先遗产中获得了好处：1896年，雅典承办了第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该运动会由皮埃尔·德·顾拜旦（Pierre de Coubertin）创办。




这是1896年在雅典举行的第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广告画。这届运动会是与两个法国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一是顾拜旦男爵皮埃尔·德·弗勒迪[Pierre de Fredi, Baron de Coubertin]（1863-1937年），他是奥委会主席；另一是米歇尔·布雷阿尔（Michel Bréal），他是拉丁学家、法国雅典研究院的成员，他创立了马拉松赛跑项目。一位希腊牧羊人斯皮里东·路易斯（Spyridon Louys）的胜利确保了这一项目的成功。

## 现代艺术抛弃了希腊

一直活跃于欧洲的对于考古学和古典文化的兴趣吸引着外国人前来希腊：德国（巴埃德克尔，Baedeker）和法国（若阿纳，Joanne）的导游书都由考古学家编写，并且可以一直充当指南手册。在与古典主义的准则进行决裂当中，大学界人士和游客的好奇心接替了艺术家们的迷恋之情：塞尚（Cézanne）把对希腊人和罗马人的模仿视为毒害而宣布将它摈弃，即便他在另一方面也表达了对卢浮宫内杰作的仰慕；未来主义者（futuristes）于1909年宣称，“一辆赛车要比《萨摩色雷斯的胜利女神》更美”；而达达主义者(dadaïstes)则提出要给米洛的维纳斯带上夹板，并且还想“让拉奥孔和他的孩子们在与这根用巨莽皮托（Python）做成的美丽的香肠搏斗一千年后休息休息”。然而，古代文化并没在这些嘲笑之下倾覆。要等到1968年，描画古代雕像石膏复制品的素描考试才不再是美术院校中的一项特权性作业；也要等很长时间，古代文化在学校中才不再是精英们的特权性话语。



“如果说19世纪在古代艺术史领域中应该被认为是系统研究的世纪、整理‘过去的档案’的世纪的话，那么在20世纪前半期则开始了对问题的深入研究，开始了将艺术品置于其固有价值中去理解的不断努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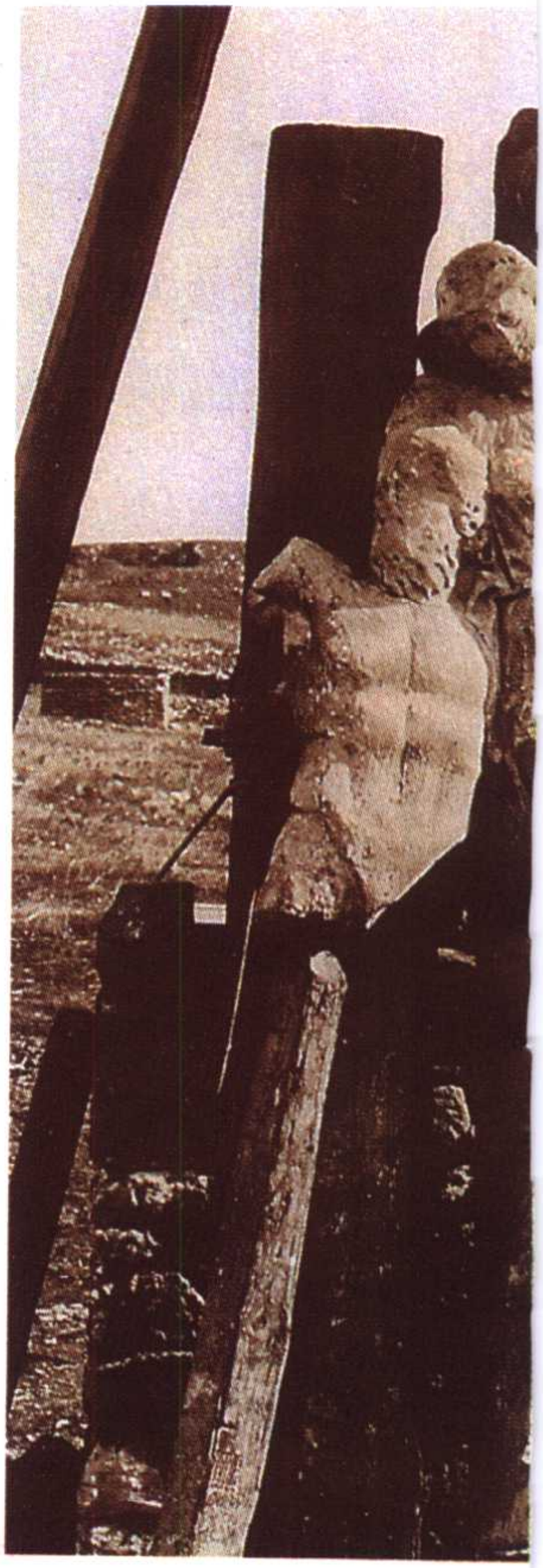
R. 比安奇 - 班迪奈利（R. Bianchi-Bandinelli），1978年



# 第八章
# 两次大战之间：思考成熟的时代

旁边图中的小马夫青铜像（公元前2世纪）发现于远离阿耳忒弥西昂（Artémision）海角（优卑亚）的海中。它是一艘沉船上的东西。在雅典国家博物馆中它被重新装配在了他的马上。

世界大战并没有打断考古工作，而且有时对它还有促进作用。占领希腊的北部的远征军于1915年在达达尼尔海峡登陆之后，设置了一个考古管理部门；马其顿的史前考古正是由该部门发起的。“东方军”（l'armée d'Orient）中的一些考古学家死在了战场上。战争结束后，1919-1920年的条约将色雷斯划归希腊，考古范围也因而扩大。相反，“十二岛”（Dodécanèse）处于意大利人的控制之下，因此在墨索里尼政府垮台之前罗德斯岛和科斯岛（Cos）的发掘决策也就一直出台于罗马。至于德国雅典研究院，则在1916年被协约国关闭，1920年又因德国的学术声誉而轻而易举地得以重开。不过，一个小事件暴露了战后不久战胜者和战败者之间的紧张关系：被委派协商德国雅典研究院重开事宜的施图特尼茨卡（Studniczka）教授极力谋求要在雅典的吕西克拉泰斯纪念碑所在地进行发掘。法国对此提出抗议，以1669年嘉布遣修会就已在此处定居为由，要求收回在该地点的权利。最后，希腊人自己拿回了发掘权。也正是战争终止了法国人在由柏林方面领导的《希腊铭文集成》（*Corpus des inscriptions grecques*）编纂中的合作行动：这样，1914年以前出版的提洛岛铭文的头两卷构成了这套德国丛书的一部分，而其余各卷均系法国人独立编辑。



这个雕像群——色雷斯（thrace）北风神（Borée）劫持雅典公主奥蕾图伊娅（Orithyie）——是用来装饰雅典人在提洛岛的神庙的屋脊的。这张照片和116页的照片为弗雷特·波伊索纳斯（Fred Boissonas，1858-1946年）所摄。他留下了一系列关于希腊的相册，其中包含一些饶有趣味、新颖别致的景色照。

## 贫困的时代

国际或希腊当地的政治经济形势在考古学工作上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反响。希腊在土耳其境内所打的战争不得不一直进行到1922年，接着它又采取种种办法接纳了来自小亚细亚的为数150万人的逃亡者，可以说几乎是没有金钱来为考古投资。而且，一些不利的政治因素也干扰了考古学界的氛围：自1912年以来，极端保皇分子卡瓦狄亚斯（Kavvadias）再度占据了考古学会秘书的职务，1920年一次新的武力行动才把他从这个职位上赶走。伊括诺摩斯（Oikonomos）是一位为人温和、富有经验的考古学家。他



在1930年和1933年之间任雅典国家博物馆（Musée national d'Athènes）馆长，从1933年到1938年获得提拔在内阁中担任某些职务。从1924年到1951年，他担任了考古学会秘书。对于学会来说，这是一件极大的幸事。政治形势是动荡不定的：1924—1935年的民主制、1936—1941年的君主制复辟、几度的独裁制经历、自1941年领土沦陷以来的战争。尽管如此，伊括诺摩斯还是成功地在考古学界内部维持了某种平衡。

如果说工作条件不怎么利于希腊人的话，那么大战的后遗症，即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也打击了外国在希腊建立的研究学院，它们的预算遭到了削减。一些“赞助人”在某些情况下暂时使资金匮乏得以缓解。例如，古斯塔夫·欧波尔兰德尔（Gustav Oberländer）给德国人提供了在雅典的陶工区进行考古作业的资金；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John Davidson Rockefeller）资助了美国人对雅典广场（Agora）的发掘。



塞姆妮·帕帕斯皮里狄（Semni Papaspyridi）在雅典和慕尼黑完成学业后，于1921年进入希腊考古管理局。她的工作岗位在那夫普里翁（Nauplie）和雅典国家博物馆陶器部。她同她的丈夫Ch. 卡鲁佐斯（Ch. Karouzos）一起为该博物馆的战后重组做出了贡献。作为国际知名的学者，卡鲁佐夫人（M^me Karouzou）是希腊考古的标志性人物。

## 女考古学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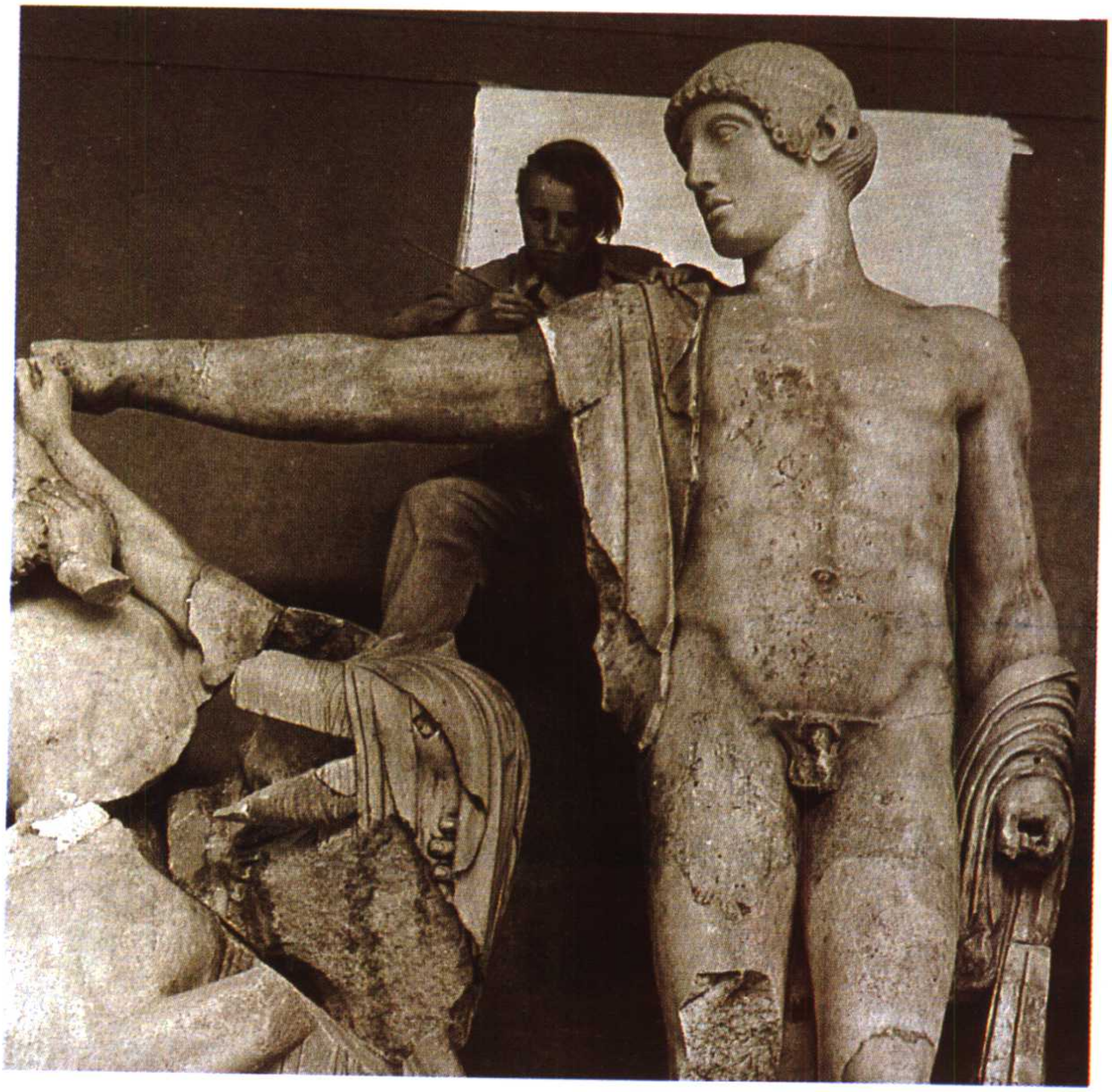
这些年代的又一特点是妇女在希腊考古中所占据的地位变得更为重要。自1890年以来，就已有英国的女大学教员被派往雅典，但是她们并未参加发掘。相反，在两次大战之间，她们在发掘现场从事了某些工作。

美国在雅典广场的考古队也有一些女性成员。希腊人对妇女也毫不欠情，考古管理局在1912年通过考试录用了塞姆妮·帕帕斯皮里狄小姐。而这位塞姆妮·帕帕斯皮里狄小姐就是后来的卡鲁佐夫人，她是一位伟大的女考古学家。这便是这一职业女性化的开始，这种女性化在最近的二十年中得到了加强。

## 学问之器物与器物之学问

虽然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困难，人们还是进行了许许多多的发掘。即使其发现物不象施里曼或伊文思的发现那样显得成果斐然，它们还是常常颇为引人入胜而又质地精良：

奥林匹亚的大理石雕像——下图为神庙西三角楣上的阿波罗像——是为1936年柏林奥林匹克运动会而被修复的。也正是在这个时刻，重新开始的奥林匹亚考古发掘在纳粹的宣传系统中发挥着一定的作用。



1924年，法国人在马里亚（Mallia）的米诺斯时期的王宫中发现了一些令人惊叹的武器，其中有一把带有衬金大水晶球饰剑柄的青铜长剑。德国人在1925年重新展开了对萨摩斯的赫拉神庙（Héraion）的发掘，获得了大量的古风时代早期的器物。1935年，希腊人在克里特岛上的德莱罗斯（Dréros）发掘出一处公元前7世纪的圣所，圣所中还藏有由阿波罗、阿耳忒弥斯（Artémis）和勒托（Léto）组成的一组早期三联神的雕像。并且，人们揭开德尔菲圣路的石板，发现了一个坑，坑里填满了圣所中贵重祭品用完后剩下的垃圾。

然而这不再是有着伟大的发掘和非凡的新发现的喧闹的时期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更像一个思考和出版的成熟时代。这一时代的特征便是对器物或古迹所进行的个别或系列研究。正是在对古风时代雕像的研究中，英国人汉弗莱·佩恩（Humphrey Payne）把自1810年以来藏于里昂的一个少女像（Koré）的上身复位于其双腿之上，其双腿当时正保留在雅典。他还把一个归卢浮宫所有的公元前530—前520年的一座贵族雕像的头部重新粘到了发现于雅典卫城的一座骑兵雕像的上半身上。

人们确定纪年，深化对器物的技术性认识，汇编史料，撰写指南手册。这些工作表现出了惊人的博学，显露出了极其非凡的才能：英国人约翰·戴维森·比兹利（John Davidson Beazley）在1925年能够对1万个阿提卡陶瓶或陶瓶碎片进行分类，鉴定出它们分别出自200名画师之手；1942年，他研究了1.5万个陶瓶，辨认出了800名画师的手笔。就他的工作而言，他被授予爵士称号属当之无愧！



不过艺术理论取得的进步也许较小。恩斯特·布绍尔(Ernst Buschor)这位卓越的考古学家于1942年对这一课题做了大胆的总结，他依然十分拘囿于一种理想主义的艺术观念：对他来说，不论文明的类型如何，雕塑都要经历若干必经的发展阶段。形式及形象的创作与社会之间关系不大，或者没有关系。

图为卢浮宫中的《拉班骑士头像》(La tête Rampin)是一尊骑马人雕像的头部，该雕像的身躯部分是在雅典卫城上发现的。他所戴的橡冠与赛马胜利的相关联。



## 观念和意识形态的危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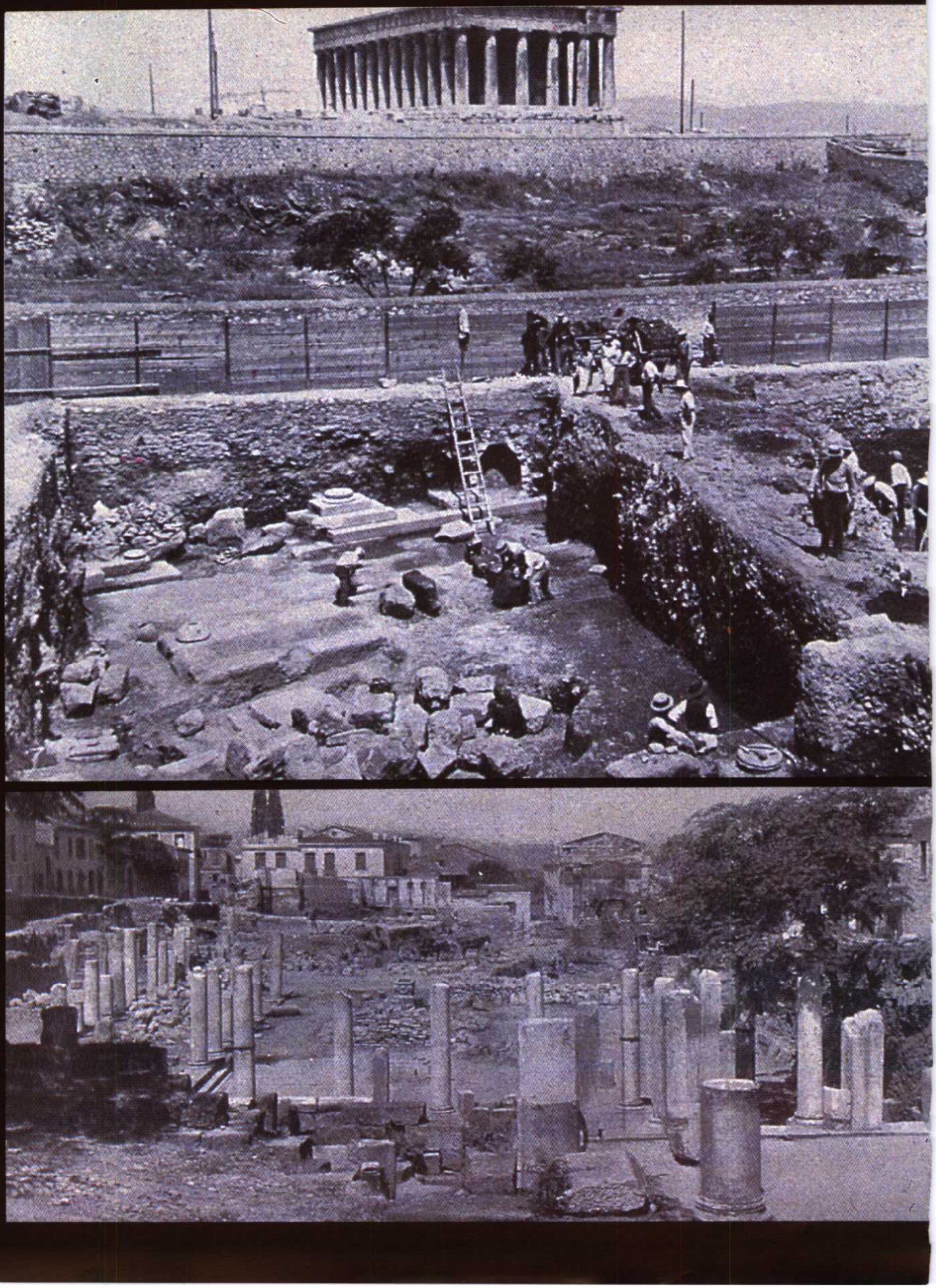
几则或多或少有危害的神话还在继续流传。伊文思关于克诺索斯王宫的著作的定本是在1921年和1935年之间分卷出版的。他不愿抛弃克里特对希腊大陆具有一种持久性影响的看法，而曾于1921年开始发掘迈锡尼的A. J. B. 维斯（A. J. B. Wace）却指出了迈锡尼文明独有的特征及其与米诺斯世界相比所表现出来的独创性。但是只有从1952年起，线形文字B（Linéaire B）泥板文书的成功释读才能彻底推翻这些观点，泥板文书证实了自公元前1400年以来希腊人占据了克诺索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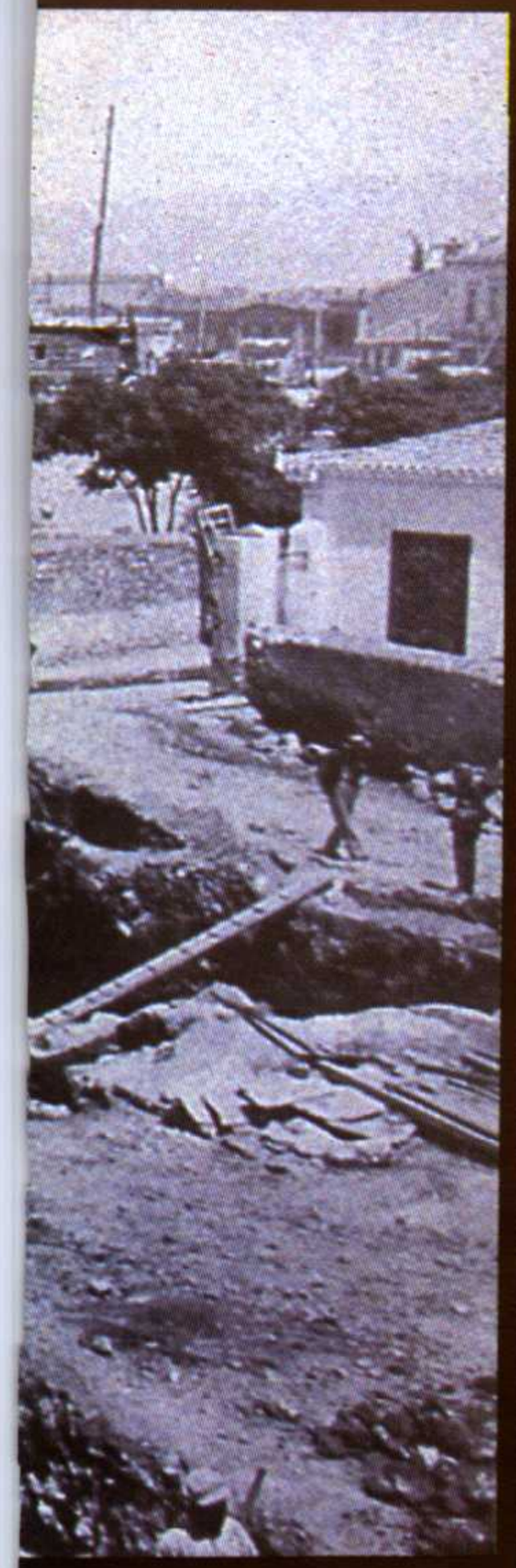
施里曼传统继续使人们对于希腊世界的认识处于一种模糊状态，在这一传统中还存在着另一场争论，即关于荷马史诗中地理描述的真实性的争论。杰出的希腊学家维克多·贝拉尔（Victor Bérard）在1924年依照亚历山大里亚诗体（l'alexandrin）的格律翻译了《奥德赛》（*Odyssée*），他声称要去重新发现奥德修斯真正到过的地方，他抱着去识别这些地方的目的周游了地中海。这种企图有点徒劳，因为《奥德赛》不是一本旅游指南，于是贝拉尔留下来的只是由陪同他旅行的弗雷特·波伊索纳斯拍摄的一册精美的照片。

最后，在艺术史界人们仍喜欢以种族标准将伊奥尼亚人和多里斯人对立起来进行比较，并且一再指出小亚细亚或伯罗奔尼撒的艺术流派之间存在着悬殊的差别。这种争论再度出现于K. O. 穆勒（K. O. Müller）于1824年出版的《多里斯人》（*Les Doriens*）一书中。并且，在某些为纳粹思想所蛊惑的学者的著作当中呈现出一种很严重的“种族主义”倾向，纳粹思想认为多里斯人属于优等的北欧民族。正是这种背景致使奥林匹亚遗址重新发掘的时间被选定在1936年于柏林召开的奥林匹克运动会期间：把奥林匹亚的发掘和奥运会联系起来并鼓舞人们第一次举行前往奥林匹亚迎取象征性圣火仪式的因素不仅仅是运动，而且还有种族，因为奥林匹亚同斯巴达一样都是多里斯文化的中心。1936年瓦尔特尔·伍雷德（Walther Wrede）被任命为德国雅典考古研究院院长，既然



这尊雕像的上部于1719年在马赛的一家私人收藏品当中被发现；1810年它进入里昂美术博物馆（musée des Beaux-Arts de Lyon）。她被认为是高卢罗马人崇拜的伊西斯（Isis），或是持枭的密涅瓦，或是持鸽的阿芙罗蒂忒（Aphrodite）。实际上它是一尊少女像（Koré，公元前6世纪中期）；它的下部是在雅典卫城上发现的。







古代广场的清理（左上图，赫法伊斯托斯神庙[Héphaïstéion]脚下）和罗马时代的广场的清理（左下图）最先是由雅典考古学会着手进行的；由于这一带的地面为居民住房所占据，只能进行有限的发掘。美国雅典学院获得了J. D. 洛克菲勒的资助，在发掘这个雅典的政治中心之前，它不得不为5000人重新安置住所。堆在考古土层之上的被清出的杂物依据地带不同厚度从1米到12米不等。不过，广场北部的地皮只是到了19世纪70年代才被征用和发掘。不幸的是，雅典-比雷埃夫斯地铁线路穿过了该广场。





他还是在雅典的国家社会主义组织的领袖，那么德国雅典考古研究院也未能避免纳粹化。不过德国专业考古学家——伍雷德本人是其中的一员——成功地限制了直接隶属于“罗森伯格局”（Amt Rosenberg）的考古队的考古活动。“罗森伯格局”这个组织除了掠夺艺术品之外，还被指定担负科研使命。它企图到希腊去找回由于多里斯人入侵而留下的北方高贵者的文化遗迹。但北欧多里斯文化胜利的神话也无力阻止纳粹德国的垮台。



## 新方法

我们需要提到预示战后考古学成型的几桩新举动。恩斯特·朗格洛茨（Ernst Langlotz）革新了研究希腊艺术的方法，他尝试从青铜小雕像原件出发来区分地域风格；他与研究“大师”的作品和由复制品来复原原作的方法进行了决裂。

事实上，也正是由于不再单单把兴趣集中在研究精美的器物上，而是重视考虑作为物质文明证据的考古物质遗存的整体状况，考古学才能够推进对于古代希腊的认识。在这一点上，美国人于1931年开始的对雅典广场的发掘便是很好的例子。在这当中，人们感兴趣的是众多不起眼的器物：简陋的成套厨具、朴素无饰的陶土灯、用来运油或酒的双耳瓶。另一支美国考古队在哈尔基迪季（Chalcidique）半岛上的奥林托斯（Olynthe）作业时采取的也正是同一种视角。关于这一房屋建筑群的出版物登载了各种各样的器物，甚至别针头都予以收录。此外，法国人在家庭建筑这一考古领域内铺平了提洛岛发掘之路，家庭建筑与宏大的公共性或者尤其是宗教性建筑一样受到了同等的重视。

力求使发掘具有完整性，对小碎片象对精美的器物一样感兴趣，对乡土建筑象对神庙或柱廊一样感兴趣，这些便是本世纪后半叶考古学开始呈现的趋势。50年代的两次考古学革命标志了战后考古学的特征：一次是技术上的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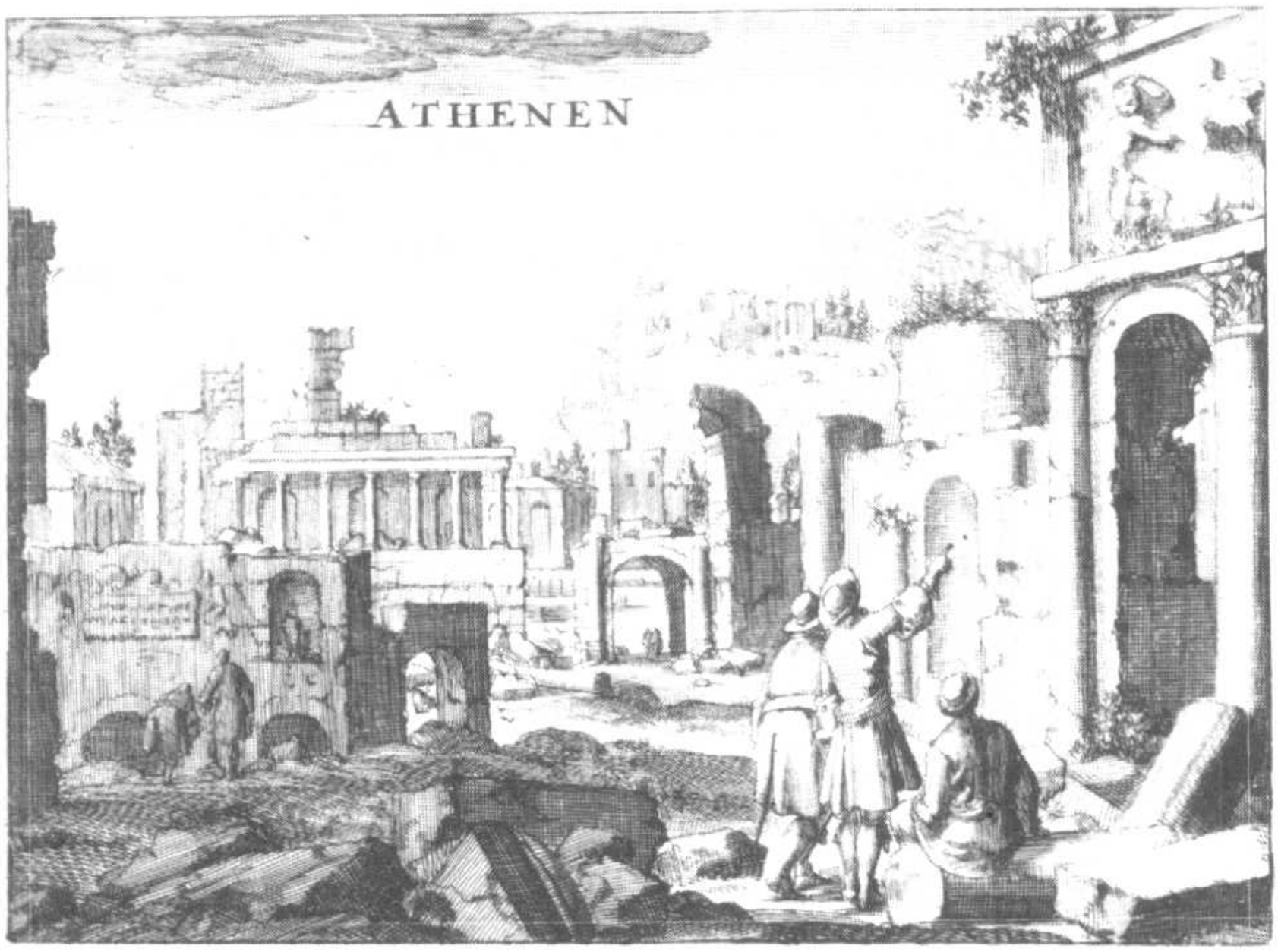
命，即引入了新的所谓“地层学”的发掘方法，该方法使人们能够确定每件器物所属的考古学地层及时间。另一次革命是一个重大的发现，即线形文字 B 的释读成功，这一成功宣告了诸多神话的终结。

在最近一个时期内，一些引起轰动的发现，如铁拉岛（Théra）的壁画、马其顿墓葬，以传统的标准来看，都证明了希腊考古的丰富多产和难以枯竭，但是这些发现也部分地掩盖了我们对于希腊的认识上所取得的决定性进展，而这种进展并非是在引人瞩目的方面取得的，并且这些发现可能还掩盖了目前和将来的问题和困难。

阿克罗提里（Akrotiri）遗址（铁拉）由两名法国人亨利·戈尔塞（Henri Gorceix）和亨利·马梅（Henri Mamet）在1870年调查清楚。亨利·戈尔塞是一位热衷于火山研究的科学家；亨利·马梅是一位考古学家。他们在这座“公元前16世纪的庞贝”进行了发掘。1967年，马里那托斯（Marinatos）再次进行发掘，发现了某些令人震惊的珍品（上图为一所仓库，其中的坛子仍在原地；128页是一幅表现两名拳击手的壁画）。



# 见证与文献



# 桑托里尼：这座公元前16世纪的庞贝城是柏拉图讲述的神话中的阿特兰提斯（Atlantide）吗？

*桑托里尼岛（古代的铁拉岛）曾毁于一次火山喷发。雅典大学考古学教授S. 马里那托斯（S. Marinatos）从1967年开始在这座岛上发掘出了一个与克里特的米诺斯文明相似的优雅的文明。爱琴海上的这次火山喷发有什么后果呢？它与克里特王宫的毁灭之间，与柏拉图在《提迈欧斯编》（Timée）和《克里提亚斯篇》（Critias）中讲述的那个被淹没的大陆的神话之间存在着联系吗？*

*雅典大学史前考古学教授C. 杜马斯（C. Doumas）自1974年以来领导了桑托里尼的发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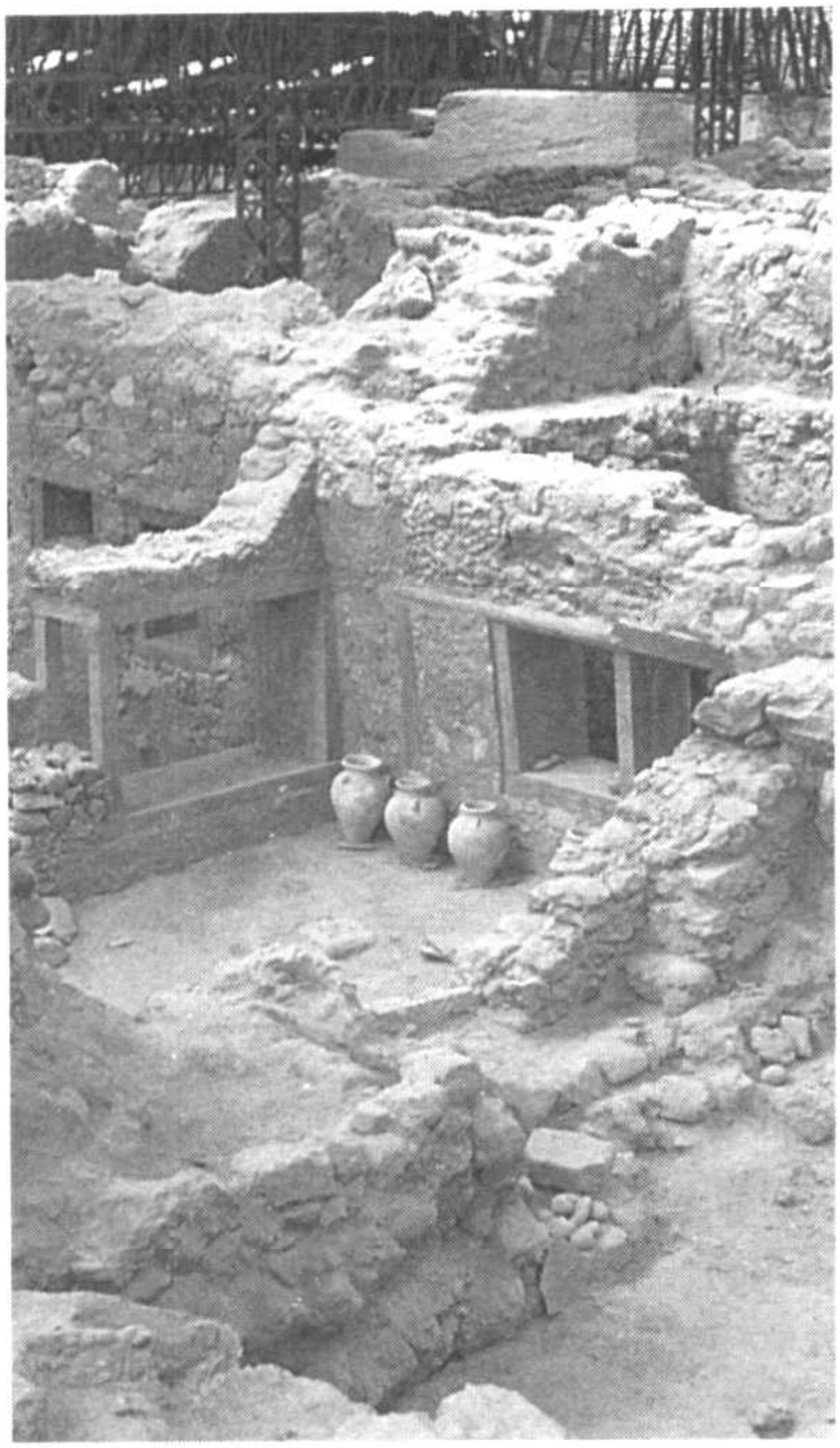
## 一次毁灭及其几个阶段

大约公元前16世纪来，阿克罗提里城被毁，桑托里尼全岛被埋在了一层厚厚的火山灰之下。根据考古资料，可以将这一系列事件的真相复原如下。

在火山喷发前的某一时间，这座城市已经遭到了某些严重的破坏，破坏的原因很可能是一些地震。继这些变故之后，人们着手进行有步骤的工作来清扫道路，拆除摇摇欲坠的墙壁，修复住房。在这些活动进行期间，火山开始喷发，可能是烟和毒气引起了居民的警觉，他们被迫从城中撤离。在他们逃离之前，他们想到了要把存粮放在安全的地方，于是便将之藏在台阶底下。他们随身携带着所有的贵重财产撤出了城市。这样就解释了废墟之中为什么根本就没有埋葬尸体和贵重物品。

在首次较小规模的喷发过程中，细小的浮石丸不仅覆盖了城市，而且覆盖了全岛，其厚度约达3厘米，形成了一层密封盖。这层覆盖物构成了人们全部活动的下限。这一浮石层的氧化使我们能够猜想到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据专家认为不超过两年）火山停止了全部活动。

在这一时期之后，主要的喷发发生了。喷发的过程中出现了种种不同的情景：在几个阶段当中某些地方浮石堆积的厚度约达6米；之后在一些区域内大量的火山灰散落开来，形成了一个30多米厚的地层。火山还把以前从火山口岩



阿克罗提里的居住区。

壁上脱落下来的巨大石块与火山灰一道抛射出来。在这次喷发之后，生命在岛上中止了，考古学表明，在大约两个世纪的时间内都没有人类存在。[……]

*人们在米洛斯（Mélos）、克里特、罗德斯和科斯见到了来自于这次喷发的火山灰。但是，特别是由于某些定年上的原因，人们再也无法推测喷发及其引发的海啸对克里特米诺斯文明的结束的直接影响。同样，也很少有人还在为阿特兰提斯神话的历史真实性做辩护。*

我们已就在阿克罗提里发现的情况及其与阿特兰提斯神话的关系谈了很多。在桑托里尼发现的情况与柏拉图对其阿特兰提斯的某些部分的描述完全一致。例如，具有白色或灰色火山岩石墙的宏大建筑物就很像他描述的建筑物。同样，阿克罗提里的艺术及其所反映的高度的生活水平也不能不令人想起柏拉图对阿特兰提斯人（Atlantes）的描述。最后，阿特兰提斯被吞没的最新校正定年约为公元前1500年，与桑托里尼火山喷发的时间吻合得再好不过了。然而，尽管我们已经准备好要完全相信柏拉图的描述，还是有其他许多方面与这种假设相抵牾。[……]

柏拉图是位政治哲学家，其目的是要建立一种在他看来对雅典社会有利的制度。他的理想城邦的典范（阿特兰提斯）由于其公民忽视了他想向他自己城邦的公民灌输的那些原则而被诸神毁灭。而这种关于其理想城邦的文字描述不能被视为一种如实的记载。事实上，很奇怪，也很有趣的是，人们可以注意到没有任何一位别的古代作家提到过阿特兰提斯城甚或暗指到它。

C. 杜马斯：《探讨》（*La Recherche*）第143期，1983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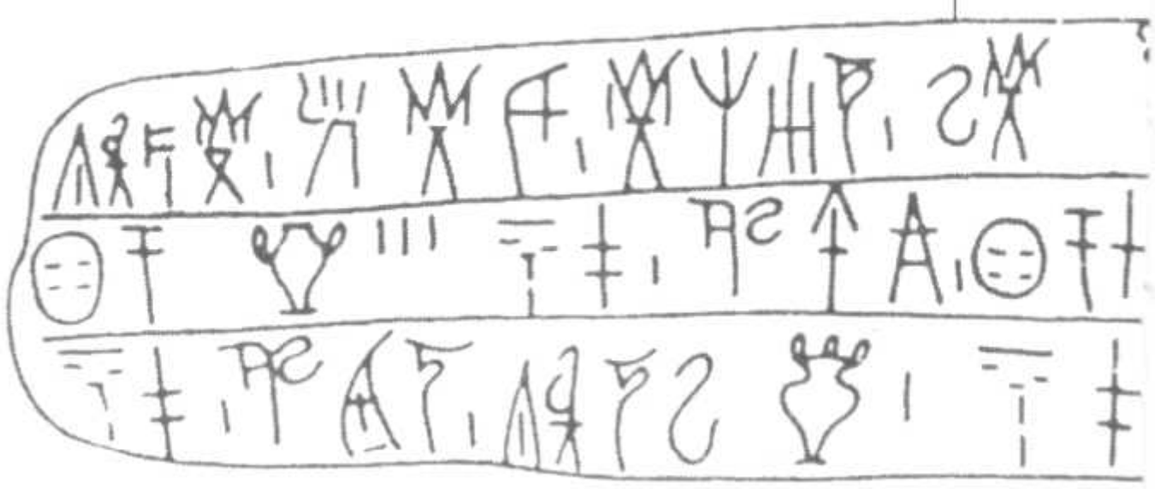
# 最早的希腊语文字：释读过程

*本世纪初，J.-A. 伊文思已经辩别出克里特岛上发现的文字分为三种：一种接近埃及象形文字（hiéroglyphes égyptiens），它使用于大约公元前2000-前1650年；另一种是被简化为一些简单线条的文字，线形文字A即由此得名，其使用年代在公元前1750-前1450年；第三种与线形文字A（Linéaire A）遵循同样的造字原则，到大约公元前1400年才出现，这便是线形文字B（Linéaire B）。*

1952年，一个天才的英国人，赋有才华的建筑师M. 文特里斯（M. Ventris, 1922 – 1956年）证明，线形文字B书写的是非常古老的希腊语。文特里斯与他的朋友剑桥大学语文学教授J. 柴德威克（J. Chadwick）一道继续释读了记录迈锡尼王宫帐目的线形文字B泥板文书。这是一场革命，它具有两个重要的后果：它证明了克诺索斯自公元前1400年开始处在希腊人的控制之下；以前少数学者已经认识到荷马文明与迈锡尼王宫文明实际上是两码事，例如M.-I. 芬利（M.-I. Finley）在其1954年出版的英文著作《奥德修斯的世界》（Le Monde d'Ulysse）中即持这种认识，而这场革命也证明了这一点。

## 最初的误读

1940年，一个新名字首次出现于关于米诺斯文明的书目当中：米歇尔·文特里斯（Michael Ventris），当时他19岁。他的题为《米诺斯语言导论》（*Introducing the Minoan Language*）的论文发表于《美国考古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文特里斯在给这本杂志编辑部的信中精心隐瞒了他的年龄。虽然他随后宣布该





论文很“幼稚”而将之否定，但它决非是缺少见地的等闲之作。他的基本想法是找到一种能与米诺斯语言建立起联系的语言，他选择来加以考虑的语言是埃特鲁里亚语（l'étrusque）。这种猜测并非毫无道理，因为根据古代的一种传说，埃特鲁里亚人（les Etrusques）是从爱琴海来到意大利的。文特里斯力图考察怎样让埃特鲁里亚语来适合于线形文字B。这项研究的结果是否定性的，文特里斯第一个承认了这一点。但埃特鲁里亚语理论对他来说依然是一种固定观念，他持有这种观点一直到1952年。这一年，希腊语解决方案牢固地占据了他的头脑。当时伊文思关于米诺斯语言的观点占有极其稳固的地位，以至于线形文字B看起来似乎不可能是希腊语。文特里斯写道：“米诺斯语言可能是希腊语的理论很显然是建立在对貌似真实历史的东西有意轻视的基础之上的。”而在那个时刻，我们还看不到有一个人敢冒此风险对伊文思提出异议。

## M. 文特里斯在英国广播公司(B.B.C.)宣布他的发现

“在最近的几周当中，我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即克诺索斯和派罗斯（Pylos）的泥板文书归根结底应该是用希腊书写的。这是一种古老难懂的希腊语，要比荷马所用的希腊语早500年，并且它是用一种简化形式书写的，但它是希腊语”（《听众》[The Listener]1952年7月10日）。我没想到人们会说这次节目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于我，我是带着激情来收听的，但因想到那么多次、那么多人就这个问题已做出的种种断言，我当时并未认为文特里斯的方案会获得世大的成功。

J. 柴德威克（J. Chadwick）：《线形文字B的释读》（*Le Déchiffrement du Linéaire B*），伽利马尔（Gallimard）1972年版

*不过，J. 柴德威克与M. 文特里斯取得了联系，这是一种友谊的开端，也是线形文字B被最终释读的开端；1956年，M. 文特里斯的过早去世致使这种合作中断。*

线形文字B泥板。



# 罗马洗劫希腊

*1972年，人们在卡拉布里亚（Calabre）区的里亚切（Riace）的海中发现了两尊希腊青铜雕像。学者中间达成了一致意见：这是在希腊被劫掠，并被运到了意大利的雕像原件。但是还有多种多样的问题需要搞清：这些青铜雕像是什么时候被从希腊运到意大利的？他们是属于什么建筑物上的？他们的作者是谁？作者生活在什么年代？*

这一发现应归功于化学家S. 马里奥提尼（S. Mariottini）。他由罗马前往莫纳斯泰拉切滩（Monasterace Marina，距里亚切几公里）度假。1972年8月16日清晨，他与两个堂兄弟一起在名叫法尔提乔港（Porto Farticchio）的地点那里淹没于海面下的峭壁附近潜水捕鱼，法尔提乔港对面便是里亚切滩的阿格兰奇别墅（la propriété Agranci de Riace Marina）。在潜水过程中，他看见“有个隐隐约约象是人的肘部和胳膊的东西”。于是，沙子中的一番挖掘便令一尊青铜雕像重见天日，那支胳膊正是这尊雕像的。并且，在挖掘当中，又在不远处发现了另一尊雕像。马里奥提尼在现场留下了一只标志球。下午，他又和他的父母一道再次来到并重新潜入这一水域；从那时起，这一发现的重大意义便清晰地呈现在了他面前。

C. 萨比奥内（C. Sabbione）：《里亚切的两尊青铜雕像》（Due Bronzi da Riace），载《艺术学报》（*Bolletino d'Arte*），1984年。

*法国最优秀的希腊青铜器研究专家，第戎大学（l'université de Dijon）教授C. 罗莱（C.Rolley）谈了他对这两尊雕像的看法。*

据我们所知，尼禄是最后一个把希腊的雕像（如奥那塔斯[Onatas]所作的群像中的奥德修斯[Ulysse]像。译者按：Ulysse为希腊英雄奥德修斯[Odysseus]的法文名字，该名来源于其拉丁文名字Ulixes）掠夺到罗马的人。图密善(Domitien)或哈德良的亲希腊主义则以别的形式表现出来。总之，鲍萨尼亚斯很可能本来就没有见过里亚切的雕像，那么在他的著作中寻找关于这些雕像的记载就是一个错误的方法。这就足以使关于这些雕像的很大一部分研究著作变得毫无意义。

于是我们在鉴定时掌握的资料也只是这两尊雕像。那么，为了确定它们的属性和地点，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雕像A的类型学，也就是说，冠冕和盾牌的结合上的类型学问题。至于其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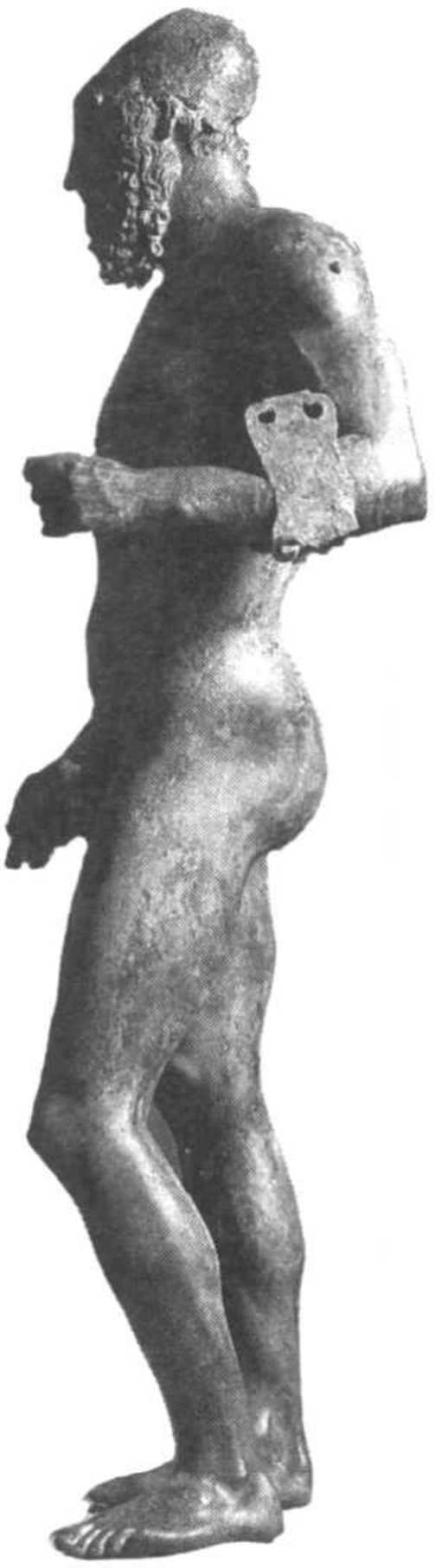
方面，则应当考虑到这些或是确实或是可能的因素：

——两尊雕像都是阿提卡风格的，一个年代被推定为公元前460年，另一个为公元前430年；它们在艺术上的相似性很明显，但它们之间也存在着技术上的差异；

——雕像B曾遭损坏，并被修复；至少就它目前的样子来看（我们无法知道它目前的样子是否与它损坏和修复前的样子一样），它酷似雕像A，仿佛是人们有意让两尊雕像一致一样；

——损坏和修复应该是发生在大约公元前430年（即雕像B制作的年代）与尼禄在位时期之间的时候。

如果需要撰写关于这两尊雕像的考古小说——这一体裁已经获得了相当大的发展——的话，那么最好让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雅典广场：



那些予名英雄（héros éponymes，译者按：古代希腊人认为，一些人和事物的名字源于某位英雄的名字；这位其名字被认为用来为其他人或事物命名的英雄便是“予名英雄”）的雕像被移走的时间在考古学上被确认为公元前4世纪。这一事件和苏拉（Sylla）的洗劫行动可能是两尊雕像人物的历险经历的因由，当然我们还可以在若干可接受的年代学断限内找到其他的情况和事件来解释之。

C. 罗莱：《里亚切的两尊青铜雕像》，载《艺术学报》，1984年。

# 芭苔侬神庙应该回归雅典吗?

*艾尔金勋爵的同时代人都不赞成他抢走芭苔侬神庙的雕刻饰件。时代创造出理应将这些大理石雕刻保留在伦敦的权利了吗？如果世界上各大博物馆都不担心它们的艺术珍品由于其原主国正当的索回要求而被突然剥夺的话，那么“艾尔金大理石”应否回归雅典一事就不会引发这么多问题了。*

## 艾尔金事件

*艾尔金勋爵聘用的一群艺术家于1800年8月到达雅典。或是出于谨慎，或是心血来潮，雅典卫城的驻军司令狄斯达尔这家伙要求素丹颂布一个敕令；没费太大的力气，他的要求就获得了批准，因为英国人前不久已迫使驻开罗的法国军队投降，素丹于是无法对英国大使做出拒绝。*

奥斯曼帝国首相致雅典民政长官（voïvode）和法庭庭长（cadi）的信：

“我们希望你们收到此信之后，要尽全力依照上述那个大使的恳求行事，条件是只要上述那5名艺术家住在城市里，听命于大使，或出入于雅典卫城，或在古代神庙周围搭建脚手架，或用石灰或者石膏塑造可视的饰物或雕像，或记录其有残垣断壁的尺寸，或在认为必要时挖掘房基以研究埋在瓦砾下面的铭文；我们还希望他们既不会受到上述那个狄斯达尔，又不会受到其他任何人，也不会受到你们这些收信人本人的干扰，希望任何人都不要碰他们的脚手架和器具，也不要阻碍他们运走任何一块带有铭文或雕像的石头。”



这项敕令准许发掘和运走发掘物吗？或者对于每一件东西，无论它来自哪里，甚至它还在古迹的原位之上，都准许运走吗？艾尔金的神甫和秘书菲利普·亨特（Philippe Hunt）迫使土耳其当局同意的正是这种附属性的解释。

14年以后，即1816年，当国家收买收藏品时，一个委员会对那些大理石雕刻的价值和它们被抢走的情况进行了调查，艾尔金辩解道："我收集古代文物是为了我的祖国。而且，土耳其人损毁它们以从中无谓地取乐，或是为了把它们一件一件地卖给过往的旅行者。如果它们还要被不怀好意的土耳其人蹂躏好多年，那么我便是把它们从严重威胁着它们的即将来临的毁灭当中拯救出来。驱使我的并非是时一已私利的追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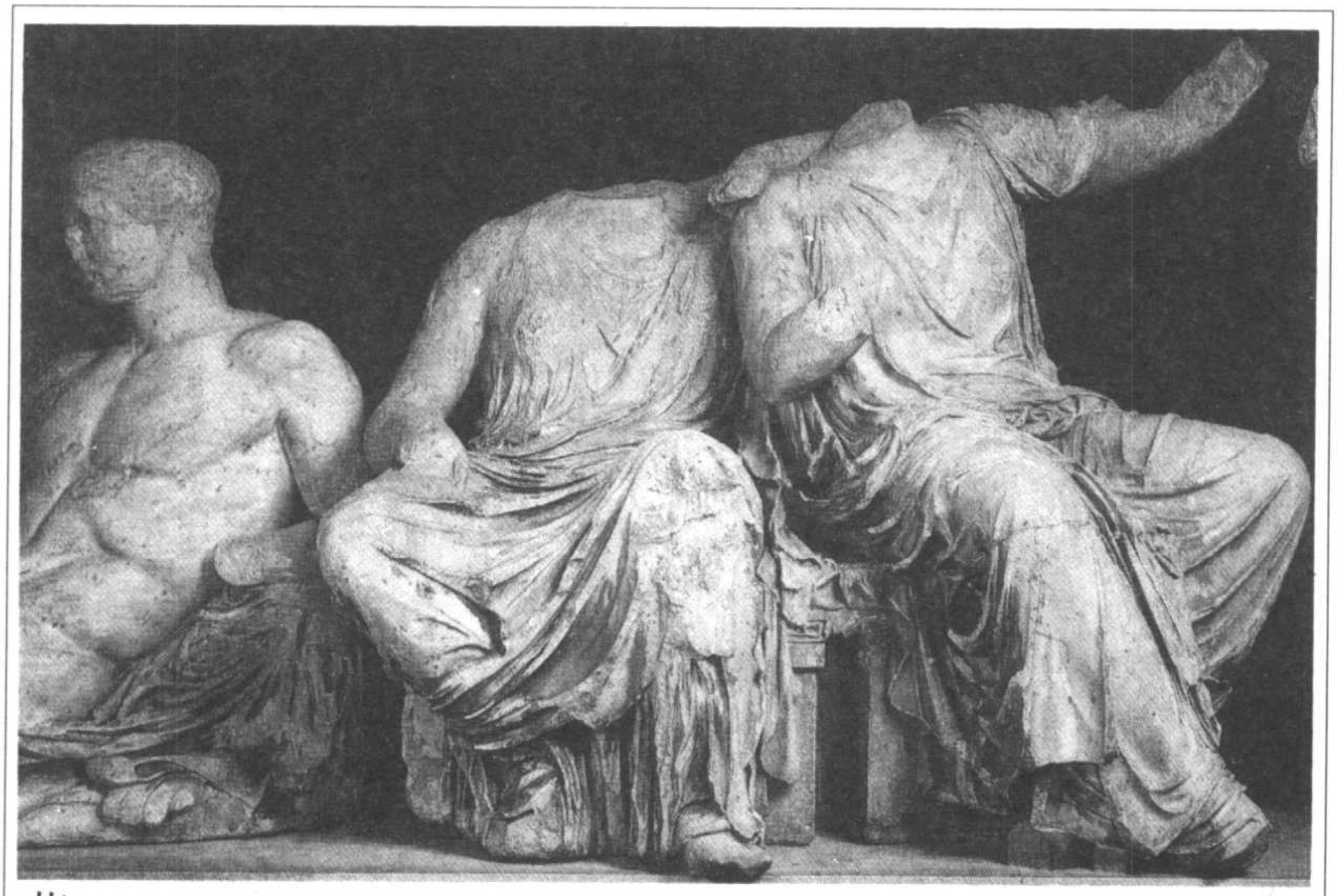
这些论据说服了舆论。人们只能听到唯一一句预示着未来的争论的话，那就是下议院议员休·汉莫斯利（Hugh Hammersley）的话。他哀叹道："国家没有制止这种掠夺行为"。他还提议，"英国不过是以委托遗赠的形式来保管这些大理石雕像，一直到雅典城的真正所有者或者将来其他什么人要求把它们归还给它时为止"。

R.艾蒂安（R.Etienne）

## 希腊文化和科学部长梅丽娜·麦尔库里夫人（Mme Mélina Mercouri）于1982年7月29日在墨西哥的演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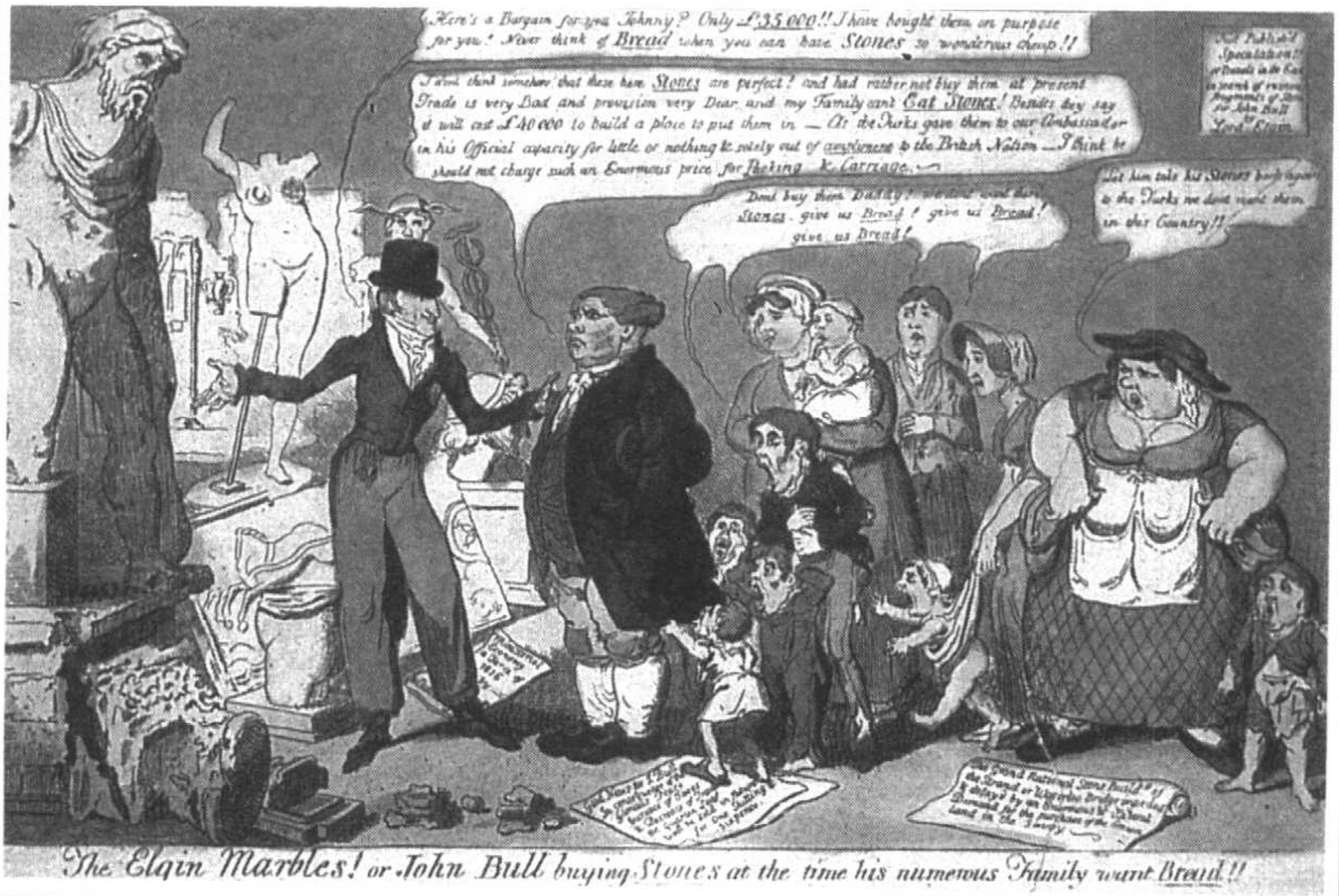
我已经大胆地提出这些大理石雕刻应该回归希腊差不多有6个月了。从那时起，一场小的风暴怒号起来了。而引起我注意的是，继在英国广播公司的一次访谈后，一些来自英国的个人和组织的信件对我给予了鼓励。在这些信件中我看到了英国人民对正义和美的热爱。此外，艾尔金勋爵的亵渎圣物之举在英国国内立即激起了谴责。英国人多德威尔在沮丧中写道："我感到在对芭苔侬神庙及其最出色的雕刻的掠夺当中，对神庙的几个优美的建筑局部的破坏当中都包含着屈辱。"而拜伦勋爵则写道："无论这种卑劣的破坏的肇事者是谁，当他掠夺和破坏这些长时期内都能免于岁月摧残和野蛮行径的奇迹时，那是不存在任何辩解的理由的。[……]我客观地说，我是同希腊站在一起的，我不认为在印度和阿提卡的掠夺是为了英国的荣光。"

艾尔金勋爵宣称，他的行为是由理想主义所致，他必须把这些大理石雕刻从那些"没有教养的手和无动于衷的头脑"中拯救出来。在这一点上，我给你们讲述一段很不起眼的小故事。



芭苔侬神庙东三角楣：狄奥尼索斯（Dionysos）、德墨特耳（Déméter）、科莱（Koré）。

“‘艾尔金大理石’！就是‘约翰牛’(John Bull)正在购买的那些石头，而他的一大家子人在要面包。”




*The Elgin Marbles! or John Bull buying Stones at the time his numerous Family want Bread!!*

雅典卫城曾被奥斯曼军队占领和被希腊国民解放军包围。占领卫城的奥斯曼人处于弹药缺乏的境地时，他们便开始破坏柱子，以便得到其中的铅来做子弹。希腊人给他们送去了一封信，在我看来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封信："你们不要碰卫城的柱子，我们将给你们送去子弹。"希腊人这样做了。正是这些没有教养的手运走了子弹，也正是这些无动于衷的头脑用他们的生命换来了对他们祖先遗产的捍卫。

我们的伟大诗人亚尼斯·里佐斯（Yannis Ritsos）表达了我们全体人民的意见，他写道："Aftes i petres den bolebontai me ligotero ourano."（"这些石头不能屈驾于太小的天空。"）。

我相信让这些大理石雕像重返阿提卡的蓝天之下复归其原位的时刻到来了，在那里它们构成了一个统一整体的一个结构性的和功能性的部分。也正是在这一时刻，希腊人在全世界的帮助下和提供的技术合作中，在雅典卫城山门、埃瑞克透斯神庙和芭蒂侬神庙周围搭起脚手架，以巨大的努力来保护遭受岁月的摧残和现代社会的污染威胁的雅典卫城。

## 英国人的论据

*J. 拉伯克（J. Lubbock）概括了大英博物馆及其馆长大卫·威尔逊（David Wilson）为让这些大理石雕像保留在伦敦而提供的论据，并且提出了他自己的看法。*

威尔逊及其受托管理人说："我们绝对没有归还'艾尔金大理石'的意图"，不过他们将考虑归还部分次要的文物和某些具有重要宗教意义的物品。他们坚持提到的事情是：他们的合法权利是"正当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收藏品已变得更多地是英国而非其最初的所属国的文化遗产的一部分；艾尔金保护了这些大理石雕刻免受破坏，大英博物馆收藏了它们。尤其是他们激动而又夸张地强调道：甚至仅仅归还一件，都会使一切藏品被轻易地剥夺，这如同撬动杠杆的终端会撬起一切东西一样；而且大英博物馆这座展现人类文化遗产的最大的博物馆将被毁灭，这是一个比芭蒂侬神庙的损失还要大，堪与亚里山大里亚图书馆的损失相比的损失。1963 年的大英博物馆章程第 5 条阻止他们让渡任何藏品，除非该藏品为一式两份。一项修正案可能会把该博物馆完全置于政府的控制之下，政府可能打算在一项双边协立的达成中做出一点温和的举措（例如关于"艾尔金大理石"一事即属这种情况）。

在这种情况下，意气之争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这种做法并不能充当一种论据。尤其是他们的凭证是建立在征服基础上的。不过，在拿破仑战争和两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历届政府都使归还战利品原则得以遵守。他们现在会抛弃这一原则吗？

J. 拉伯克：

《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

1983 年 6 月 20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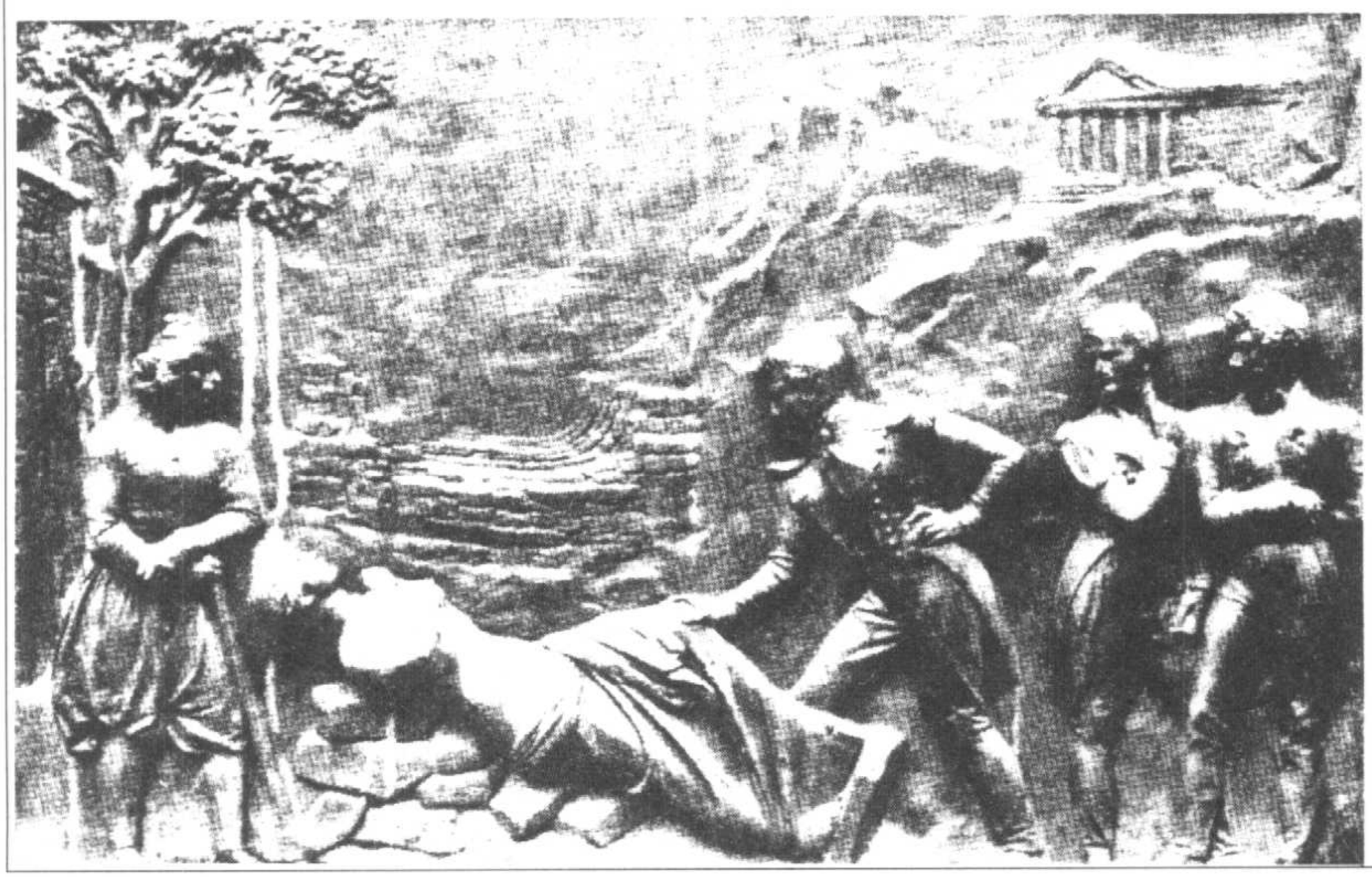
# 《米洛的维纳斯》：希腊的？德国的？还是法国的？

*卢浮宫的宝贝《维纳斯》连同《萨摩色雷斯的胜利女神》在19世纪初各大国发动的掠夺希腊的毫无节制的竞争中差点儿归属了德国。*

## 诱拐的故事

在这座岛[Mélos，米洛斯、Milo，米洛]上，很可能是在1820年4月8日，这座雕像的上半身被一个希腊农民意外发现。大多数资料都人云亦云地说这位农民的名字叫“乔治”（Yorgos），他当时正在挖掘自己的田地，他的田地离一座古代剧场的遗迹不远。他挖掘着一座半埋在地下的小建筑物的废墟，从中寻找用来垒墙的石头。这块大理石不规则的外观令他很失望，他要把它重新埋起来。但是碰巧这一幕发生在了一位法国海军见习军官奥利维埃·武提埃（Olivier Voutier）的眼前。奥利维埃·武提埃是“传令兵号”（*l'Estafette*）的船组成员。“传令兵号”是一艘双桅纵帆帆船，它一直在利凡特水域巡航，以保护法国在那里的利益。奥利维埃·武提埃这位年青人醉心于古代希腊文化，他不放过利用中途停靠的机会和他的海军士兵做了一些小的考察。因此他立即就明白了这一发现的重要性，他

《米洛的维纳斯》的发现（系迪蒙·迪尔维叶[Dumont d'Urville]墓碑上描绘的情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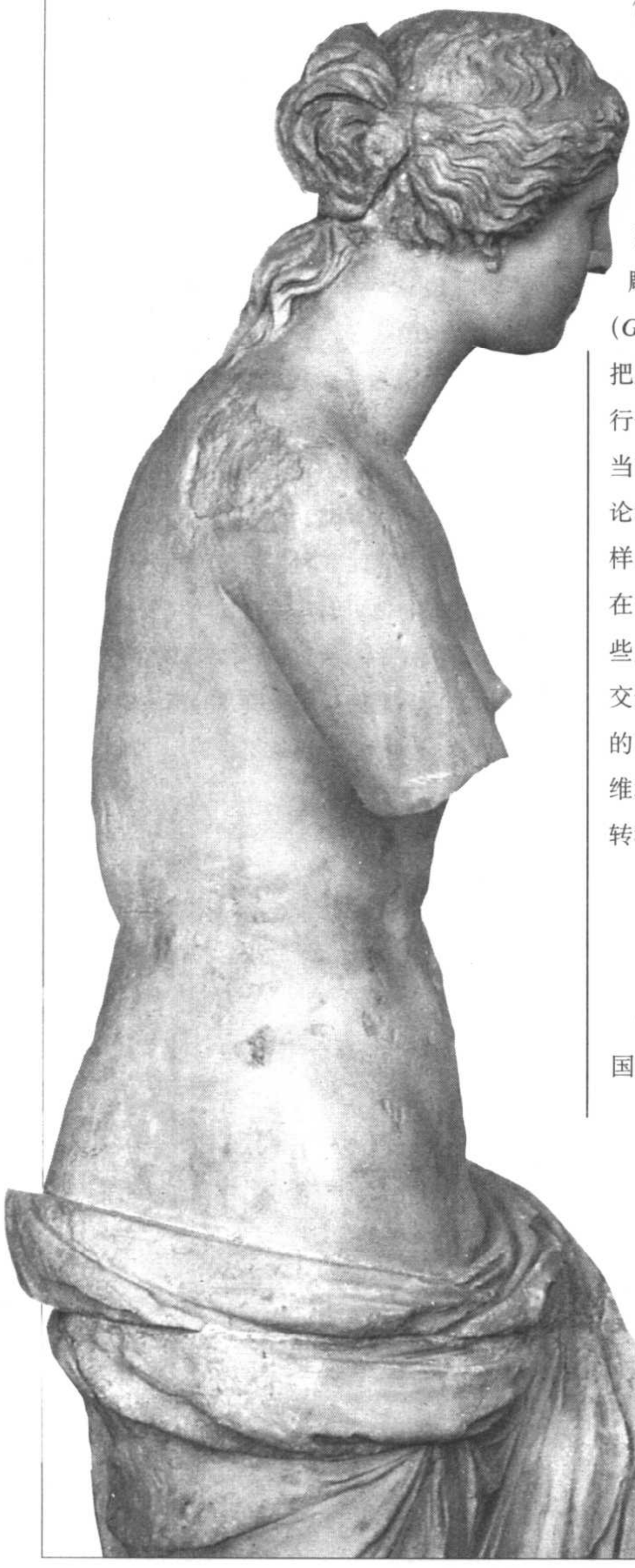
A CÔTÉS DE MÔLE EST TRANSBORDÉE L'ANCRE DE GALANDI À BORD DE LA CORVETTE L'INCONSTANTE

劝说那位农民继续挖下去，并给了农民几皮阿斯特（piastres）的钱，好让他来满足自己的要求。当时出土的是雕像的下部连同一堆单独的残片，某些残片显然是从这尊雕像上掉下来的，如发髻、衣褶和髋部的某些碎片。无论随后流传的关于这一发现的情况的传闻是怎样的，武提埃就地为这些被挖出的碎块所做的素描图都清楚地表明，维纳斯出土时是没有胳膊的。当这位航海者向法国驻米洛斯领事路易·布莱斯特（Louis Brest）报告此事时，那位农民已经接着清理完了现场，在已经出土的残片之外又新挖出了一些别的东西。在这些东西中，有两根雕像方柱（后来又有第三根被发现）、胳膊的一些碎片、一只拿着一个水果的被截断的手和两块刻有铭文的石头。武提埃的草图记录了在雕像复原——这是后来被我们认为具有重大意义的一次复原——过程当中最初发现的两根胸像方柱以及那些铭文的存在。而被挖出的第三块独立的带有铭文的石块又进一步丰富了此次发现。[……]

当布莱斯特还在犹豫是否考虑为法国买下这尊雕像时，岛上的一位显贵正在给那位农民施加压力，目的是让他为一位希腊人要人——君士坦丁堡兵工厂的译员，古物收藏家尼古拉斯·摩鲁西（Nicolas Morusi）保留这尊雕像，以便博得摩鲁西的欢心，而这位显贵此时亟需摩鲁西的恩宠。不过，在武提埃的坚持下，领事官使乔治答应了等待法国驻土耳其大使里维埃尔侯爵（le marquis de Rivire）的决定。是迪蒙·迪尔维叶最先将此事告诉了里维埃尔侯爵的。迪蒙·迪尔维叶当时在利凡特舰队的另一艘舰上任海军中尉，他可能在雕像发现几天后就见到了雕像。随后他希望能引起对雕像的重视，却未能如愿。而后武提埃服役所在的那艘军舰的舰长罗贝尔（Robert）又将此事告诉了里维埃尔

里维埃尔侯爵。





侯爵。里维埃尔侯爵急遣一名使馆秘书马尔塞吕斯伯爵（le comte de Marcellus）与发现物的持有者进行商谈。真险哪！那位希腊农民已屈从于施加给他的压力而与译员摩鲁西的代表达成了协议。当马尔塞吕斯和武提埃乘坐的船进入米洛的停泊场的时刻，装载着雕像的一艘小艇正在向一艘名为“银河号”（*Galaxidi*）的“阿尔巴尼亚”船驶去，该船将要把雕像运往君士坦丁堡兵工厂。法国人立即进行干预，惊动了岛屿当局。他们的干预得了手，当前的活动被勒令延缓。接下来便是空泛的议论和商讨。最后，经过若干混乱的事件和多种多样的商谈，交易达成了：有些人说，这笔交易是在没有可靠证明的情况下粗暴地达成的；还有些人确认道，它仅仅是通过外交，通过加重的外交达成的，的确，它是在战舰到场的情况下达成的。在正式付款之后，这尊大理石雕像变成了里维埃尔侯爵的私人财产，它被直接从“银河号”转移到了法国船上。

A. 帕斯基埃（A. Pasquier）：
《*米洛的维纳斯和卢浮宫的阿芙罗蒂忒诸像*》
(*La Vénus de Milo et les Aphrodites du Louvre*)，
国立博物馆会议(Réunion des musées nationaux)，
1985 年。



1871年复原时被放置在箱子里的《米洛的维纳斯》。

*维纳斯雕像于1821年3月1日被献给了路易十八(Louis XVIII)，这位国王又把它赠送给了卢浮宫。*

## 德国的要求

巴伐利亚王储路易（Louis）已经获得了米洛斯剧场的发掘权，这里似乎正是维纳斯雕像被发现的地方。无论如何，这些都是巴伐利亚要求得到雕像的根据。

巴伐利亚的路易在1821年7月6日致列奥·冯·克兰策的信中说："我恳请您写信给伽乌[Gau，居住在巴黎的德国建筑师]，让他给您提供一些关于《胜利的维纳斯》(Vénus Victrix)的说明。它是在哪里被发现的？不是问在哪能一地区，而是问在哪能个具体地点。它被推断为菲狄亚斯的作品。它能与哪件著名的作品相媲美？我很想知道这些。"

列奥·冯·克兰策在回信中向路易保证："希望能够为陛下和我们的祖国要求归还这样一件作品的念头令我十分幸福。"

但是德国人始终没有为他们的归还要求提出证据；只剩下了维纳斯的一只脚为巴伐利亚得到。一位宫廷雕刻家在为国王的情妇劳拉·蒙苔丝（Lola Montés）塑像时，即从维纳斯的这只脚上获得了灵感，塑出了蒙苔丝的脚。

R. 艾蒂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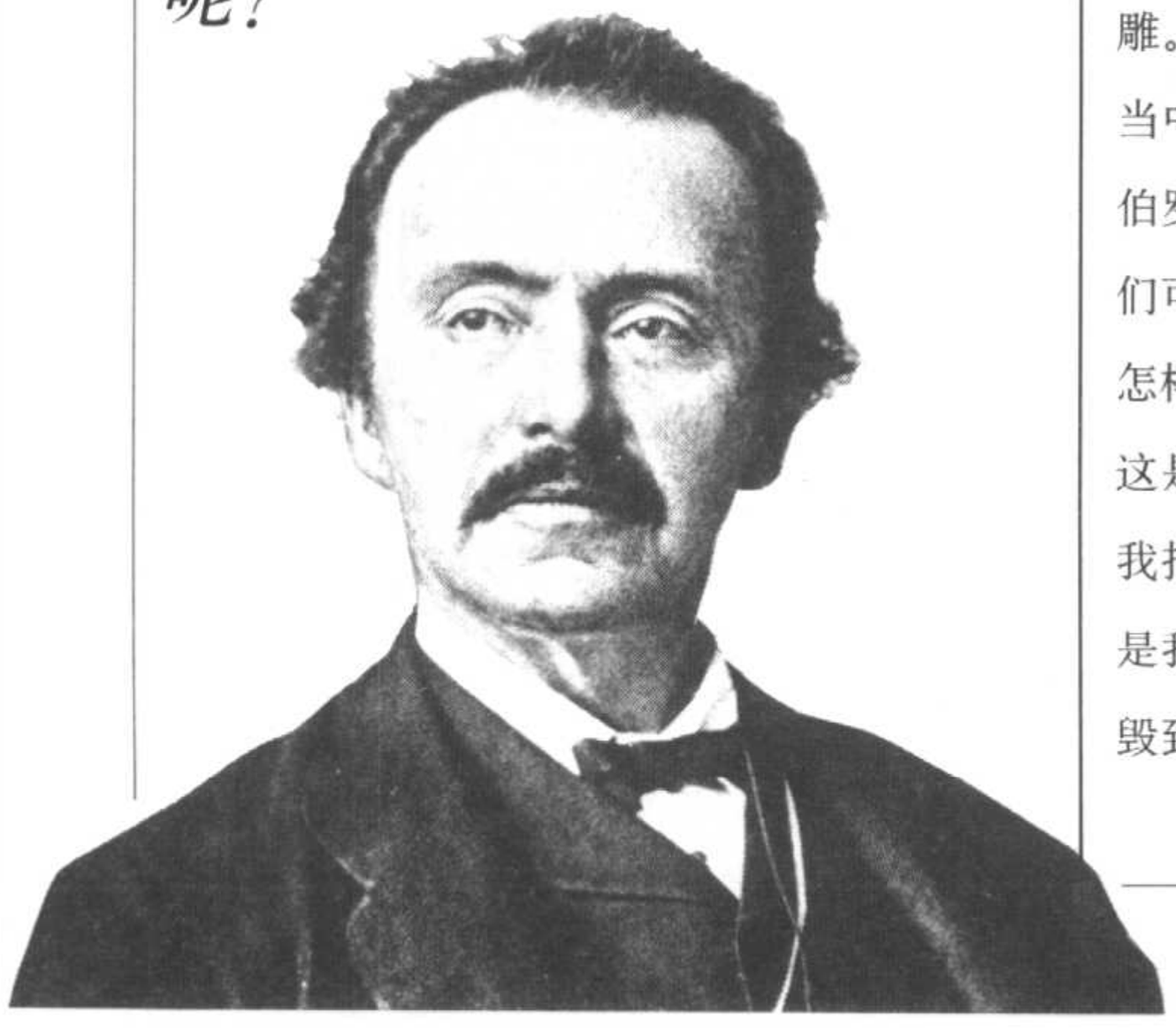
## 希腊人不要求归还维纳斯

我们认为要求博物馆放弃所有来自外国的收藏品是不合适的。我们已经坚持不懈地重申了这一点。应该承认，《米洛的维纳斯》是一件独立的艺术品，是一尊本身完整的雕像。芭苔侬神庙的大理石雕刻则是一座异乎寻常的宏伟建筑的一部分，而这座建筑的完整性却遭到了破坏。

梅丽娜·麦尔库里应英国广播公司之邀所作的访谈，1983年2月13日

# 考古学家可靠吗?

*假如要想成为诡诈而危险的作假者，那么任何人都比不上有经验的考古学家。从15世纪起，安科纳的齐里亚科就把真假文献混杂在一起。从这一视点来看，有两个知名人士表现得最为突出，他们是18世纪初的修道院院长富尔蒙和19世纪的海因里希·施里曼。我们应该想到拉伯雷(Rabelais)说的这句话："没有良心的科学不过是对灵魂的毁灭。"是谁驱使考古学家丧失灵魂的呢?*



## 一位身为修道院院长的施行家

1728年，正值路易十五在位，富尔蒙和塞万(Sevin)两位修道院院长都是铭文和文学院(l'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院士，两人动身前往君士坦丁堡。自文艺复兴以来，这种对希腊和东方手抄本的不懈搜求的动因是学者们坚信大量在西方失传的古典著作都保存在君士坦丁堡宫廷图书馆里，该图书馆是以前拜占廷皇帝的图书馆（可以证实在19世纪素丹宫中并未藏有人们认为他拥有的那笔财富)。这一事业以失败而告终。在不可能被允许进入素丹宫廷的情况下，两位学者分道而行。富尔蒙离开君士坦丁堡赴希腊，因为在那里可能会收集到铭文，这一点吸引了他前往。他的计划是"获取铭文以阐明希腊历史的某些情况。"这一计划看来也使他步入了雅各布·斯蓬的后继者之列。雅各布·斯蓬曾怀有推动历史科学进步的令人钦佩的抱负。

修道院院长富尔蒙在16个月当中跑遍了希腊。在雅典和阿提卡，他获得了一批铭文和浅浮雕。正如他津津乐道的一样，这些铭文和浅浮雕当中有很多是为斯蓬所遗漏的。随后，他来到了伯罗奔尼撒，在那里他"发掘"了几个遗址。我们可以根据他的书信想象出这些"发掘"工作是怎样进行的："我尤其想在斯巴达进行些发掘；这是一个由刻有铭文的大理石构成的采石场，我打算无所顾忌地去采掘这些大理石。[……]于是我安排一些工人来将这座骄傲的城市一直拆毁到地基。今天，它已被彻底破坏，所剩的不过

是石头摞着石头。”在他的上司们的眼中，这无疑是在吹嘘，而一项他未曾获得委任的使命的费用则需要证实：“这些破坏是书本上的作伪，是使一次旅行出名的唯一手段，而这次旅行实际上已引起了如此的轰动”！他破坏的热情实际上达到了什么地步呢？70年以后，英国人多得威尔要在米斯特拉谈到这个法国人：这个法国人在抄写完铭文之后，便将这些铭文刻石一一打碎，结果给后人永远地抹去了历史的痕迹。

富尔蒙返回法国，声称他已收集了2600则铭文；即便他实际收集的铭文似乎还不到这个数量的一半，他的成果也相当可观了。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古物收藏家之一凯吕斯伯爵非常真诚地出版了拉哥尼亚（Laconie）（斯巴达、阿米克莱[Amyclées]）的铭文和浮雕。没过半个世纪，英国人里查德·佩恩·耐特——他以贬斥艾尔金而闻名，同时又是杰出的希腊学家——证明了这些斯巴达国王、行政官员和祭司的表录是非常明显的伪造文书。阿伯丁伯爵（le comte d'Aberdeen）揭露了另一桩关于一件浮雕的骗局：富尔蒙发现并复制了一些刀片和肢体，并以之作为拉哥尼亚存在人祭的证据，但实际上这不过是奉献给女性神用的梳妆用品。不过，也不要对这位修道院院长的整部著作过于失去信任。事实上，现代研究表明，为这部著作的大部分恢复名誉是合乎情理的。然而，人们还在继续追问驱使富尔蒙造假的原因。显然，他在考察终了的时候，心理有些失衡；在回法国之前，他迫切需要宣布他有某些轰动性的发现：因为在他眼中，他没有实际做到的，他就可以伪造。他的欺骗行为对他来说是毫无用处的，因为他在生前连那些真实的文献都没有公布，这便是命运的嘲弄吧。

Fr. 艾蒂安（Fr. Etienne）

*如果有人要因H. 施里曼在特洛耶（希萨里克）和迈锡尼的发掘丰富了我们的知识而感谢他的话，大家都会同意的。而他性格当中的某些更为不安的方面也正是考古学“创立”（"establishment"）的代表人物很早就暴露出来的东西。*

有关H. 施里曼的争论还没有完全平息。即使最初直截了当地反对他的声音已经沉寂很长时间，但它还总是会在有机会的时候引起反响，这种反响尤其来自于那些远离考古学以及不愿在对施里曼的盲目神化当中颂扬学者理想的人士。对于科学而言，功劳与错误都是可以感觉到的；人们今天能够依照这一尺度心平气和地权衡他的功劳与错误。人们也能够表达一种不带成见的评价，这种评价至少会得到那些能够科学地评判某些考古学问题的人士的赞同。[……]

[施里曼的]成就的确不是重新发现了一个被湮没的，直到那时都超出我们全部认识范围的世界。[……]科学将永远感谢施里曼这种无法否认和不可估量的贡献；他的名字始终与这个荷马的世界联系在一起。人们也会记住那位希腊妇女；她为丈夫慷慨地分担了一切辛劳，她也因此与他共享了成功和全部光荣。[……]

但是这枚闪光的奖章也有反面。从施里曼的全部禀性以及整个成长过程来看，他对整套

的科学思维方式和方法还很陌生。他没有历史观念，也没有艺术观念，他对普拉克西泰莱斯的《赫耳墨斯像》不感兴趣便说明了一点：遥远的时代、珍奇的事物、模糊的图象耗尽了他的兴趣。他正是一位完全词义上的，而且是褒义上的dilettante，意即“从兴趣出发的狂热的爱好者”；他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dilettante，意即“不得其法、缺乏基础知识而追求其目的的业余爱好者”。他就是这样一个考古发掘上的dilettante，他丝毫没有严密的方法和技术；同他在考古学上是个dilettante一样，他在建筑学上也是一个dilettante。（译者按：作者同时使用了dilettante一词的“狂热的爱好者”和“外行的业余爱好者”两个含义来描述施里曼一身兼具两种特点，故译文中保留原词以保持原文的语义和修辞效果，而下文中为行文方便则将两义结合在一起译作“狂热的业余爱好者”。）

A. 米哈埃利斯：

《19世纪的考古发现》（*Die Archäologischen Entdeckungen des neunzehnten Jahrhunderts*），1906年

## 狂热的业余爱好者和心理变态者施里曼

像许多天才的人物一样，施里曼的性格中有很多心理变态的因素。在他的生活和行动当中，他的行为暴露出了一点这方面的东西。童年的苦难致使他患上了持久性的幼稚症。这一点可从他一生中醉心于撰写自传和无休止地给名人们写信当中清楚地看到。如果这些信件正好构成他遗产的一部分的话，那么有多少封真正寄出去了呢？我还要加上另一个值得注意却被忽视的证据。在安克尔沙根（Ankershagen）墓地，有一个很大的十字架竖立在教堂的右边（当人们从西边看的时候）。十字架上的铭文是：

亨利·施里曼，

圣彼得堡人，献给他亲爱的母亲，

路易丝·泰雷兹·索菲·施里曼（Louise Thérèse Sophie Schlieman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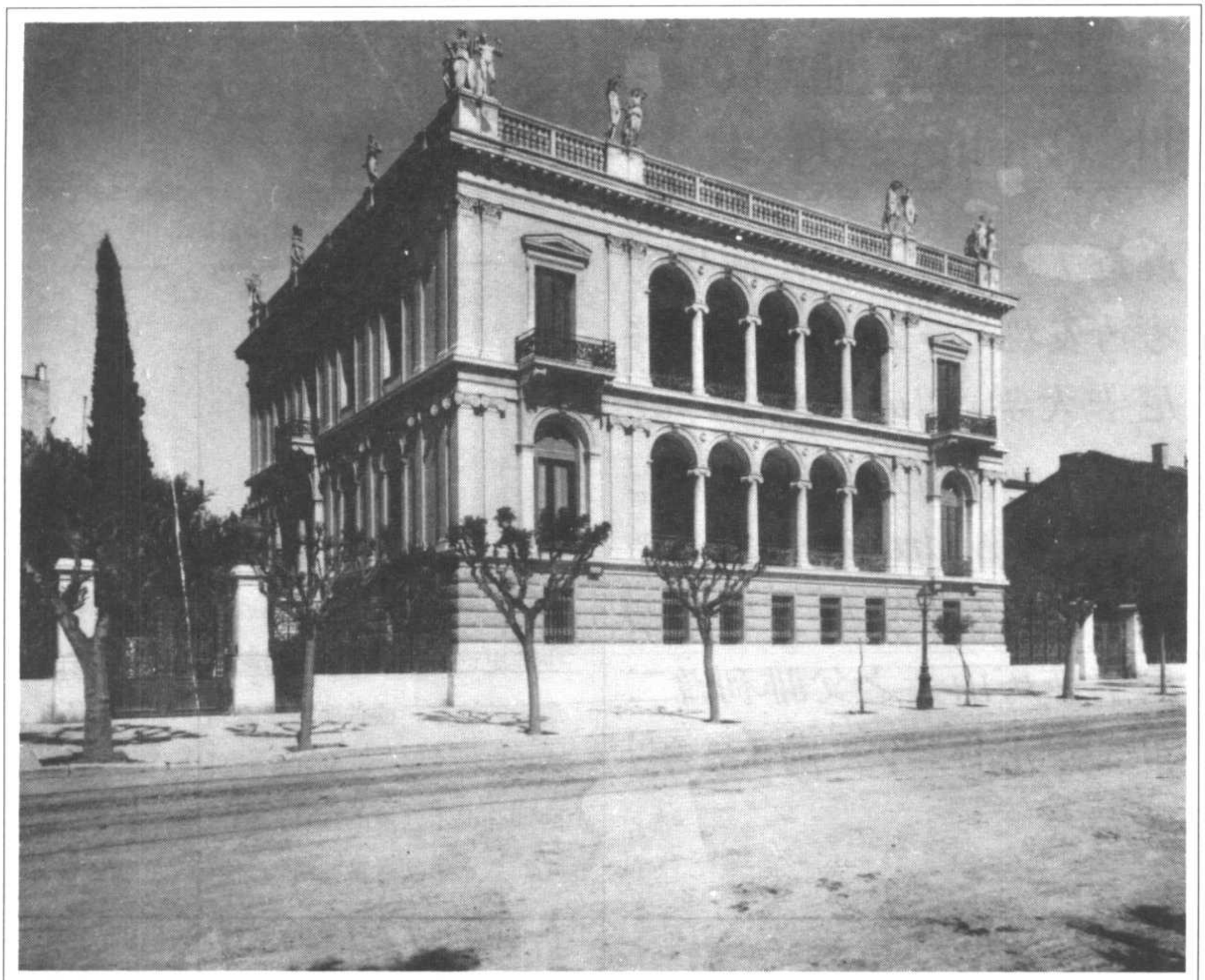
此位女公民

生于1793年5月18日，

卒于1831年3月22日。

采用英语化的名字，把他自己的姓名放在他母亲的姓名前，在一则刻于安克尔沙根的碑文当中提到他的居住地圣彼得堡，所有这些细节情况都使这个十字架与其说是纪念他母亲的，倒不如说变成了施里曼自己的纪念碑。

他缺乏道德心，这可能是从他父亲那里继承来的。命运的恩赐使他成了一个成功的实业家。他曾在片刻之间毫不犹豫地欺骗了一个同事。不管是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还是在美国内战期间，他都是一个贪婪的大发战争发财的人。1855年3月17日的一个梦鼓舞他独占了硝石市场，他便这样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赚取了财富。道德心的缺乏同样也使他成了一名成功的考古学家。政府禁止他发掘希萨利克，他发掘了希萨利克。那个山丘的地产业主禁止他发掘自己的山丘，他发掘了它。土耳其政府禁止他外运发现物，他把它们偷运到了雅典。在致荷兰女王索菲（Sophie）的一封信中，他提到赠给她12个古代小雕像，但又告诉她这盒雕像不能“通过直达船只”运送给她，“因为古物外运在希腊是被严格禁止的”。他将这些国家的政府都当成了商业竞争对手……



在什么事情上他的心理变态影响了他的考古学呢？人们不必怀疑他留下的毫不偏颇的发现物清单、对发现物的描述和素描图。很多东西可能要用那些保存下来的器物本身来检验。更确切地说，正是那些特别的解释需要质疑而且常常还需要排除。他日记和书信中的荒诞记述演变成了他发掘报告中的荒诞记述。一只在伊大卡发现的罗马玻璃杯里装着奥德修斯的骨灰。一批青铜时代的珍宝变成了美女海伦的首饰。一具不知名的木乃伊是阿伽门浓的尸体。驻雅典公使从施里曼的有线电报中得知他发现了一具“圆脸的尸体。这具尸体与长期以来我想象的阿伽门浓的形象完全相象”。施里曼再次创造了一项业绩。他向希腊国王发了一封喜出望外的电报。一名秘书给他回了电。对施里曼自传的批判性研究依然是一项紧迫的任务。如果不能运用外部资料进行检验的话，人们就需要质疑施里曼具有自传性质的著作中的每一句断言。

W. M. 考尔德 III（W. M. Calder III）：《施里曼谈施里曼：一项关于史料运用的研究》（Schliemann on Schliemann: a Study on the Use of Sources），载《希腊、罗马和拜占廷研究》（*Greek, Roman and Byzantine Studies*），第 13 期，1972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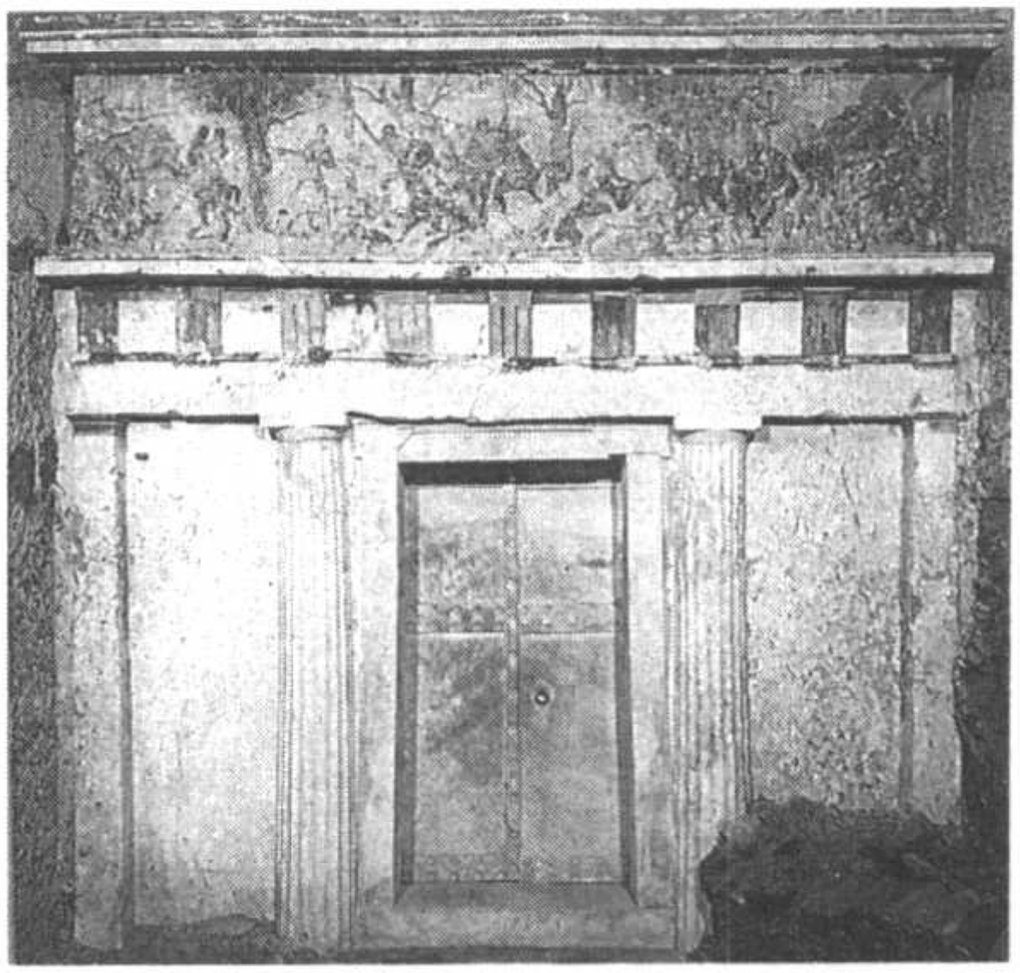
# 马其顿国王腓利普二世（Philippe II）其人

*最近15年中最引人瞩目的考古发现之一应归功于萨洛尼卡大学（l'université de Salonique）的M. 安德罗尼括斯(M. Andronikos)教授：他于1977年发掘了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之父腓利普二世（公元前359—前336年）的陵墓。*

## 发现时的激动之情

陵墓的开挖定于11月8日，这一天是东正教会的大天使米歇尔（Michel）和加百利（Gabriel）瞻礼日。[……]

陵墓拱穹的拱石没费太大力气就被取了下来，留下了一个34厘米大的开口；这样就足以首先看到其内部，并随后沿木梯下去。我首先观察了将主墓室和前厅分隔开来的大理石门的后面，而后又观察了墙壁。当时，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极度的失望。门的表面显得很粗糙，做工很差。墙壁没有装饰，甚至没经过粉刷，显然不具有马其顿灰泥粉饰式建筑上精心采用的那种精细的粉刷层。但当我的目光落到墓室地面上的时候，我几乎马上惊呆了。在第一份正式报告中，我迫不及待地努力来概述我那时的精神状



态。我写道："这里不是描述在发掘者的考古生涯里这一非同寻常的时刻他头脑中闪现的念头的地方。读者能够想象到，尽管发掘者需要保持沉着、冷静和全神贯注，以便担负起那些迫于处境的责任，但当他一看到这样一间墓室中的财富的时候，他还是心潮激荡，大为震惊：自从最后一系列葬礼完结，大理石墓门关闭的那一时刻起，这间墓室在很多个世纪当中都未曾受到破坏。长年研究丧葬习俗没有磨钝他的敏感，却使之变是如此敏锐，以至于他能依靠片刻的激情而生活；而当赋予他机会，让他进行一次穿越数千年历史的游历，让他亲身经历般地去触及往昔那活生生的事实的时候，那些片刻的激情便看不到了。发掘者感受到了一种学者的兴奋和一种渎圣者的内疚；自然，前一种心情超过了后一种。

我的目光停在了墓室的后部，确切地说是开口的下方。为死者冥世生活准备的全部物品都堆放在那里。位于我右面，在墓室的西南角，一些青铜和铁制的器物相互叠压在一起。青铜器因氧化而带上了美丽深暗的绿



腓利普二世墓中的金属罐、三足支架和盾牌发现时的情形。

锈。铁制品则颜色变黑。左面靠近北墙的地方放的银制碗盘在闪亮。在后墙的中心，正好处于我们打开的开口的下方，有一口大理石棺的方形石棺盖。旁边在我们对面的是散碎变黑的残存朽木，当中有一些闪亮的小碎片；此处闪光的是一些金箔。更远一些的地方有一副已氧化的红、黑颜色相杂的胸甲。地面的其他部分则没有放置任何东西。”

M. 安德罗尼括斯：

《维尔吉那王陵》（*Vergina, The Royal Tombs*），

1984 年

这真的像M. 安德罗尼括斯从一开始认为的那样是腓利普二世的陵墓吗？有人怀疑这一点，但在1983年国际考古学大会(Congrès international d'archéologie de 1983）上，三位英国学者、两位医生（布里斯托尔[Bristol]的J. H. 玛斯格瑞弗[J. H. Musgrave]和曼彻斯特[Manchester]的R. 尼弗[R. Neave]，他们分别是解剖学教授和面容复原专家）和一位曼彻斯特的考古学家J. 普拉格（J. Prag）制造了一起轰动：他们从研究墓葬中保存的骸骨出发，复原了死者的头部；这就是我们从一些画像中认得的腓利普的头部。

## 医学前来援助考古学

我确信尸骨能够表现出大量的不能归因于火的作用的解剖学特征和不均等性。[腓利普二世的尸体火化后，骸骨被精心装殓置于一副金箱即larnax（译者按：该希腊语词义为“箱”，“骨灰瓮”）当中。火的作用不能被绝对排除，因为要准确地预见尸骨受到高温时偶然发生的变化是完全不可能的。然而，经过仔细考虑，我还是感到自己倾向于将上述尸骨的解剖学特征和不均等性归因于一种创伤，或一种先天的异常，或两种因素的结合。

R. 尼弗和我本人在这一点上已经得到了某些有经验的外科医生、整形外科专家和口腔外科专家的赞同，我们已经给他们看了在曼彻斯特和布里斯托尔的模塑品和照片。如果导致上述尸骨的解剖学特征和不均等性形成的因素是尸骨原本的性质，而非火化作用的话，那么如下的假设就会引起人们很大的兴趣：这些尸骨的主人是一个在其死前18年右眼就已失明，右脸无疑受过重伤的知名人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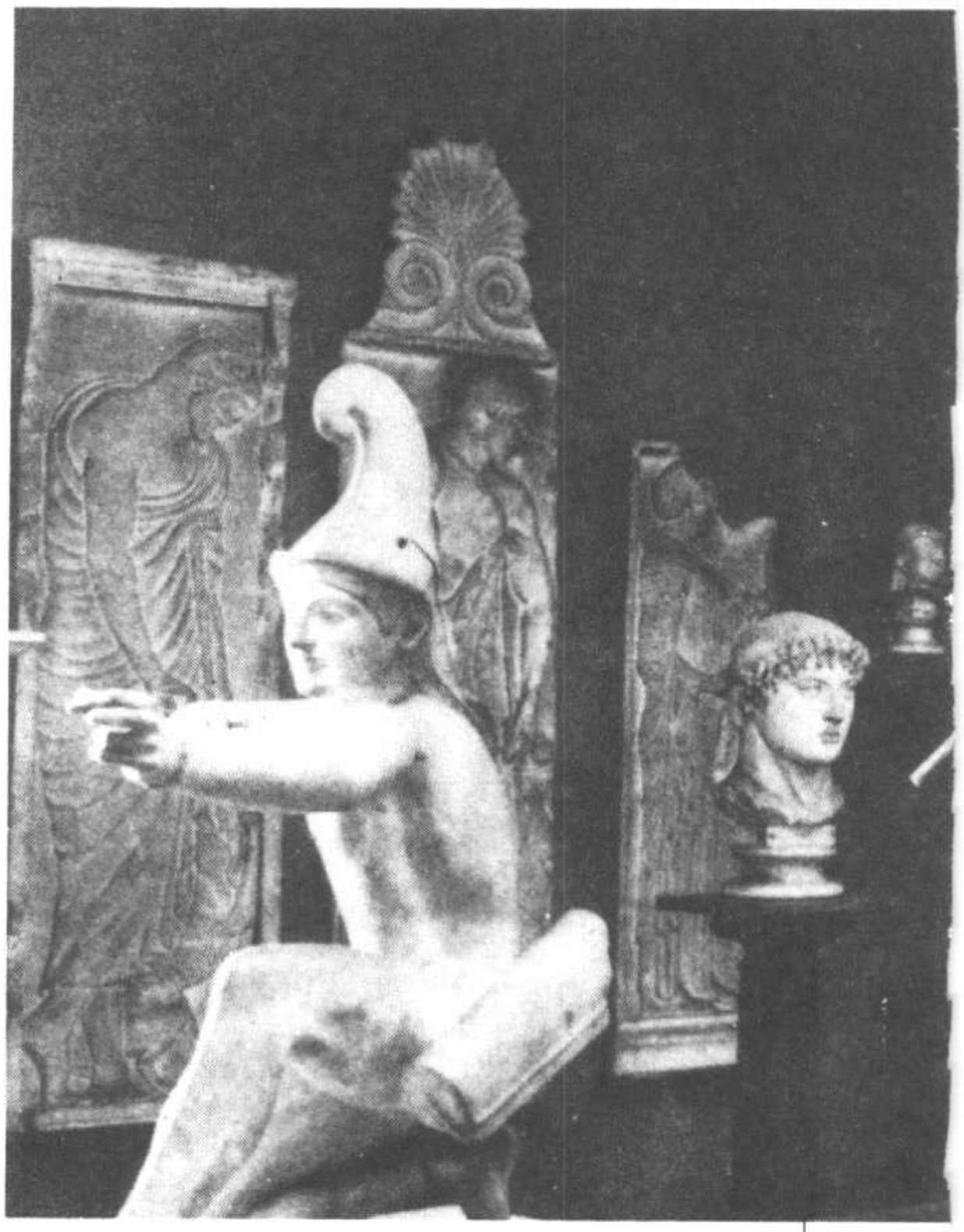
J. H. 玛斯格瑞弗，

《希腊研究杂志》（*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

1984 年

## 通过模塑品发现希腊

*光发现是不够的，还应该让人们了解那些被发现的东西。著名古物的模塑品就发挥着这样一种普及古典文化的作用。自从16世纪以来，一直到20世纪，在各收藏场所和像卢浮宫这样的大型博物馆当中，原件的旁边有时会陈列有模塑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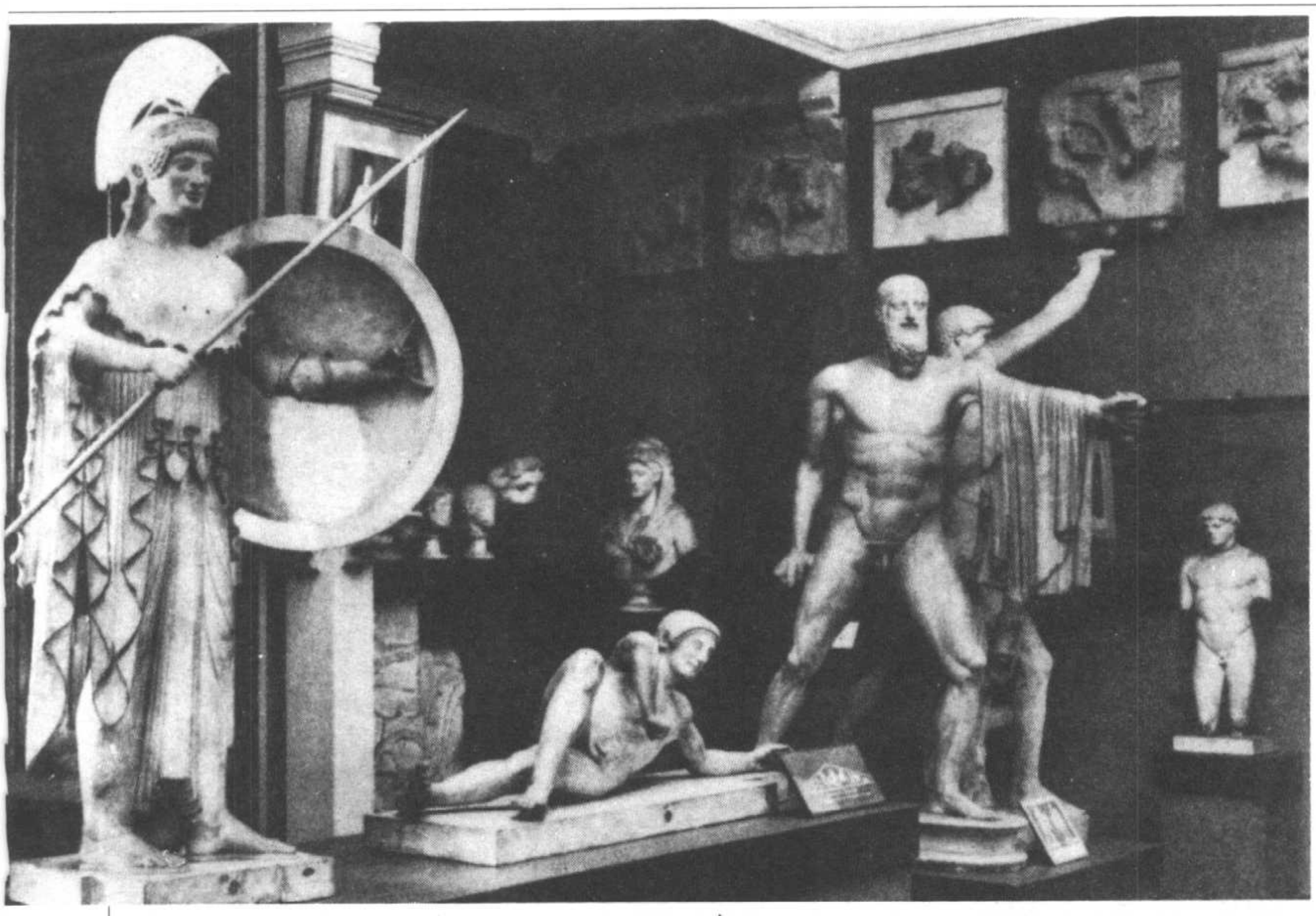


### 里昂的老博物馆和新博物馆

那是在1893年，国民教育和美术（l'Instruction publique et des Beaux-Arts）部长（忘记提起这一职衔是不对的）决定在里昂的正在建造中的大学楼的三楼建立一家古物模塑品博物馆。该博物馆随于1899年落成，主要收藏品已被展出。人们不知道该楼的造价，但在1903年亨利·莱哈特（Henri Lechat）估计其收藏品价值达100 000金法郎。[按当时模塑品价格，替代费用估计可能达1300万法郎。]我将要着重谈到的不是这笔遗产的价值，而是在该世纪之交一家模塑品博物馆的组织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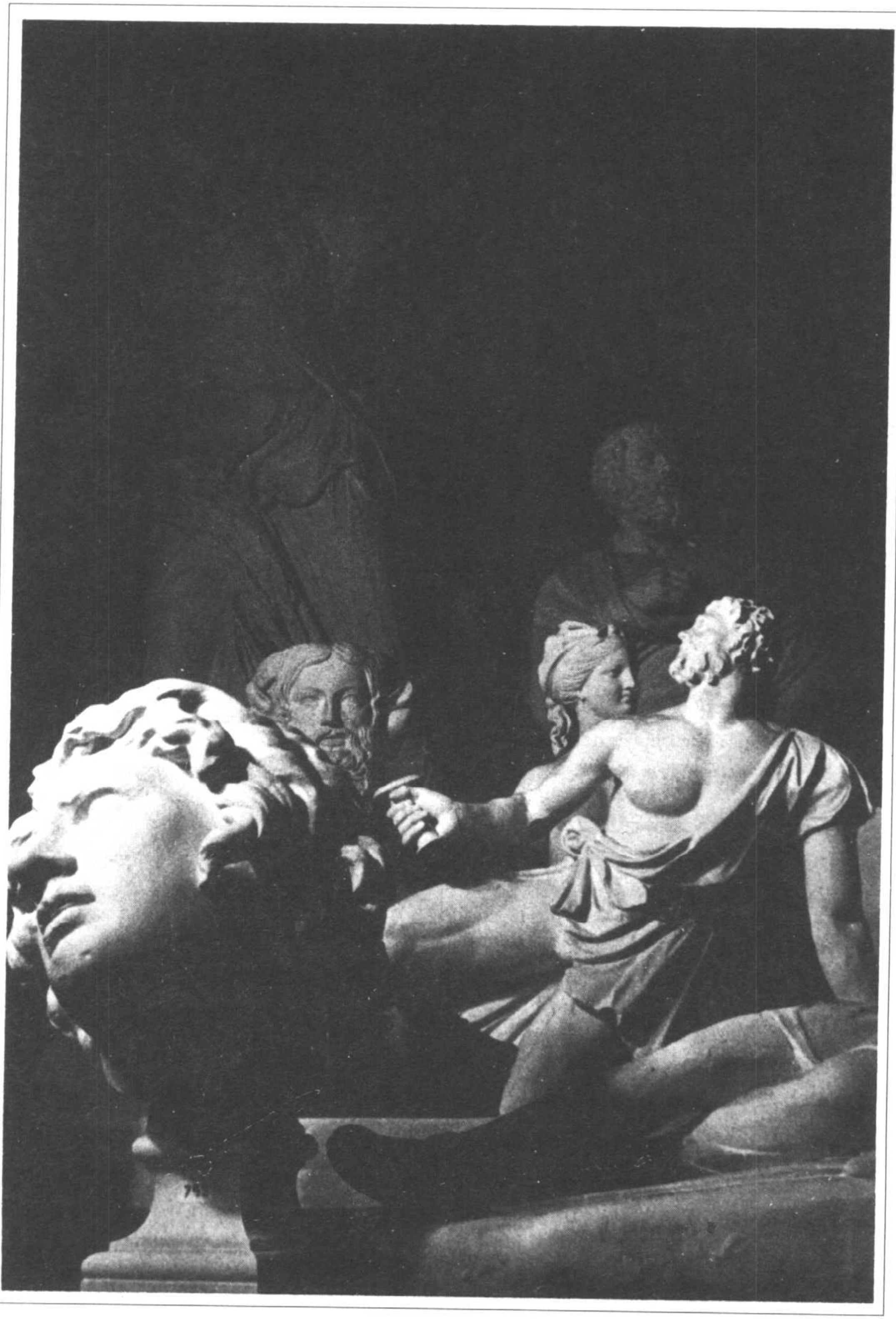
我们首先强调的是欧洲（奥地利、希腊、意大利、英国……）所有博物馆中同类馆藏的组建所能展现出的非同寻常的发展历程。

*出于某些教学目的，各美术院校（巴黎于1834年）和大学都建立了专门的石膏像馆（斯特拉斯堡于1872年，里昂于1893年，巴黎于20世纪20年代）。继而原作欣赏终于在美育当中占据了优势。视听设备似乎又使石膏复制品变得没用。而让具有重大价值的古代遗产重获尊重也是正当合理的。*



里昂第二大学模塑品博物馆旧馆（l'ancien musée des moulages de l'université Lyon-II）：前排为艾吉那三角楣和《刺杀僭主的双雄》（Tyranoctonnes）。

随着考古发掘的发展，新的艺术杰作的出土，博物馆得以购入新的模塑品，这种购买也标出了博物馆的生命节律。这样，西福诺斯（Siphnos）宝库的中楣是于1893年在德尔菲发现的，1894年的《希腊通报》（*Bulletin de correspondance hellénique*）报告了这一发现。象里昂博物馆的创建者M. 奥洛（M. Holleaux）这位大学者在一封信中披露的那样，1895年里昂博物馆中陈列出了该中楣的一件模塑品。人们在1894年以前已经知道了《那克索斯人的斯芬克斯像》的某些部分，但其头部到这一年才被发现。稍后这一斯芬克斯到达里昂，因为在1901年世界博览会上该像的标本被赠予里昂博物馆（musée de Lyon）。这样，这家博物馆反映了1890年代和1900年代考古学的突出发展。当人们知道其第一任馆长亨利·莱哈特是一位古代希腊艺术的专家的时候，人们就不会惊讶于有那么多雅典卫城的少女像（Korai）陈列于里昂了。作为法国雅典学院的年青成员，他自1888年以来汇报了在雅典卫城上的新发现。不过卫城的系统发掘是由卡瓦狄亚斯在1885年着手进行的。里昂博物馆跟踪着发掘的进展情况，普及了希腊文化的所有才被发现的新面貌的有关知识；1900年代，人们又发现了统一的希腊文化中存在的种种差异。这样一家博物馆被描述为一个典范；Ed. 波提埃（Ed. Pottier）便是这样描述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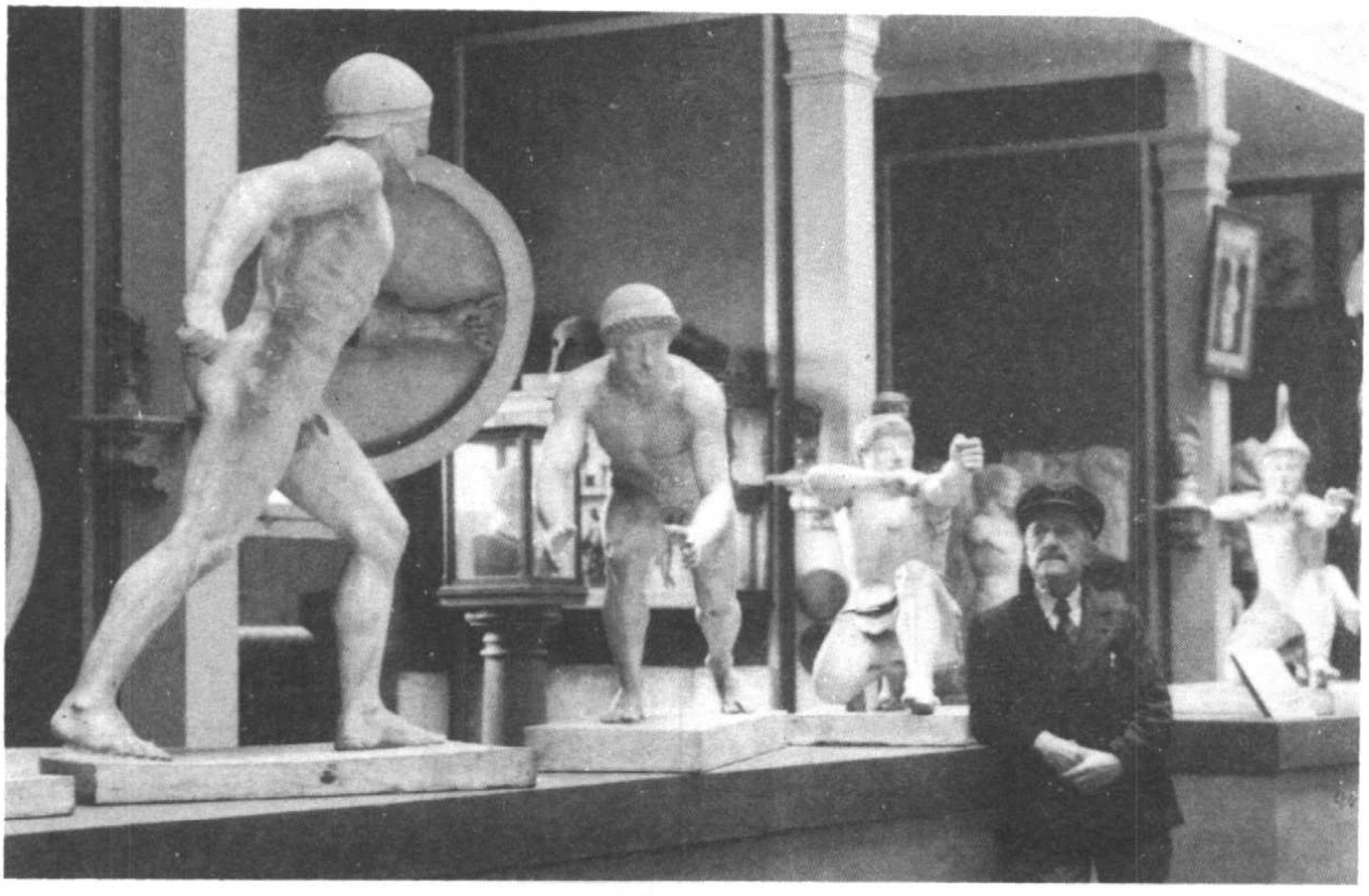


博物馆的，他以此来证明它于1900年被授予金质奖章是当之无愧的："评判委员会希望将这家博物馆作为一个典范推荐给其他大学，并且干脆单独来考虑它，把它置于其竞争者之上。"

为了支持收藏，人们毫不吝惜金钱的投入：这座博物馆在文学院和法学院的三楼占地1600平方米。雕像和浮雕按历史时代的顺序分别陈列于10个大厅，其中一个巨大的圆厅收藏的是5世纪的艺术品。其天花板以下的高度为6米至7米，采光通过玻璃天棚：最优良的技术手段均被用于此处。为了打破隔墙因千篇一律均被磨光而呈现的单调，建筑师把空间分割为若干小的陈列室。分割小陈列室的隔板的末端而是采用带有附饰物并被粉刷为灰色的柱子装饰。墙壁的颜色是庞贝城艺术中运用的那种红色，柱子的灰色与之形成对照而显得颇为突出。人们选择了一种具有新古典主义风格的陈列式样，闪亮的地板也给人以置身于收藏者家中的感觉。

R. 艾蒂安：
《里昂第二大学模塑品博物馆新馆》
(Le Nouveau Musée de moulages
de l'université de Lyon-II)，
载《模塑品》（1987年4月10-12日
国际讨论会专刊）[*Le Moulage* (Actes du
colloque international des 10-12 avril 1987)]，
1988年

*老博物馆已被改造为大学区。其收藏品现在被安置在一座不适于收藏它们的楼房中。当我们的欧洲邻国热衷于经营其模塑品收藏事业的时候，法国尚未制定一项政策。凡尔赛博物馆新馆（nouveau musée de Versailles）的波折经历证明了这一点。从1978年以来，尽管法国博物馆总馆长S. 贝克夫人（M^me^ Besques）做出了种种努力，但是凡尔赛博物馆新馆的布置工作从1978年以来仍受阻中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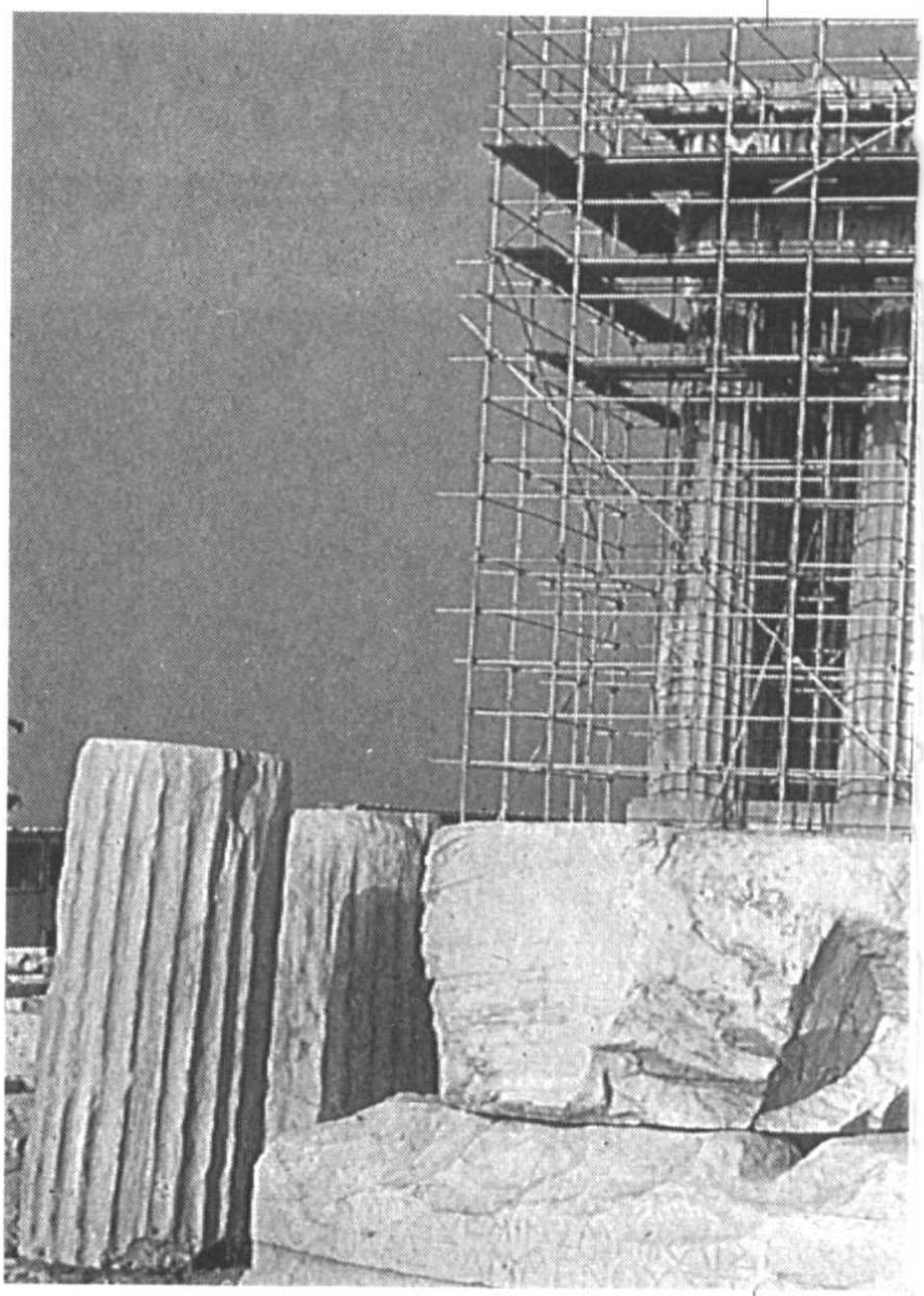


# 抢救雅典卫城!

*考古学并不限于发掘和科学成果的发表，考古学也应该保护和展示其新发现。关于保护和展示古迹的争论既充满着激情，又触发着人们的激情；希腊最著名的古迹雅典卫城成了这一争论的焦点。*

*重要的不单单是要讨论仿真技术的运用和资金的数量，遗址在现代城市系统中的地位也被付诸讨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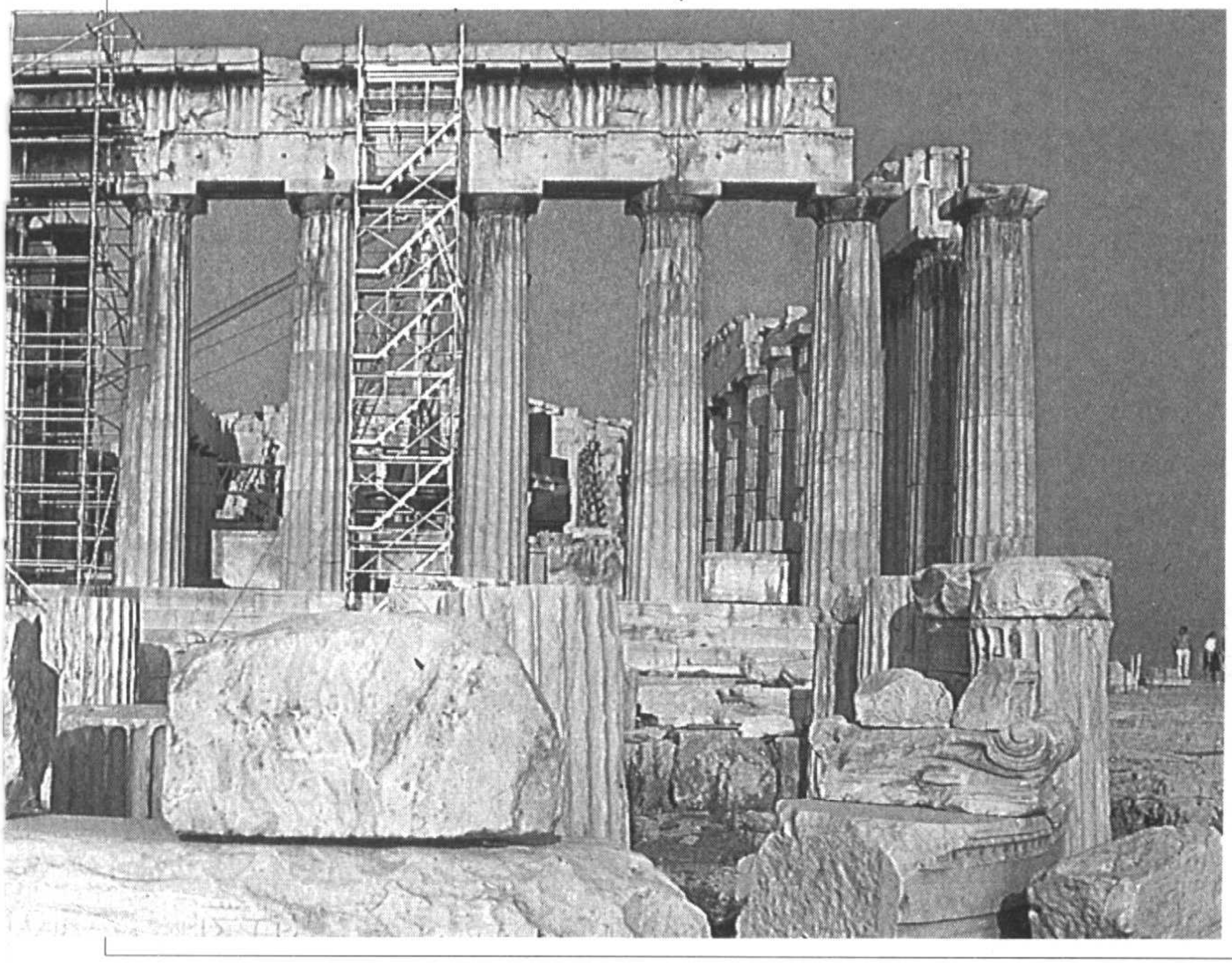
一直到2000年，雅典卫城的神圣山岩给人的印象将一直是一个布满脚手架、机械和工人的巨大工地。这一景象可能与卫城在伯里克利时代呈现出的景象不会相差太远，那时我们的祖先建造了这样一片无与伦比的宏伟建筑群。这是人们今天无法回避的一种景象，因为只有这样，这些古代世界的壮丽建筑才能在未来的各个世纪中得到保护，而这些建筑不仅是希腊人的，而且也是全人类的遗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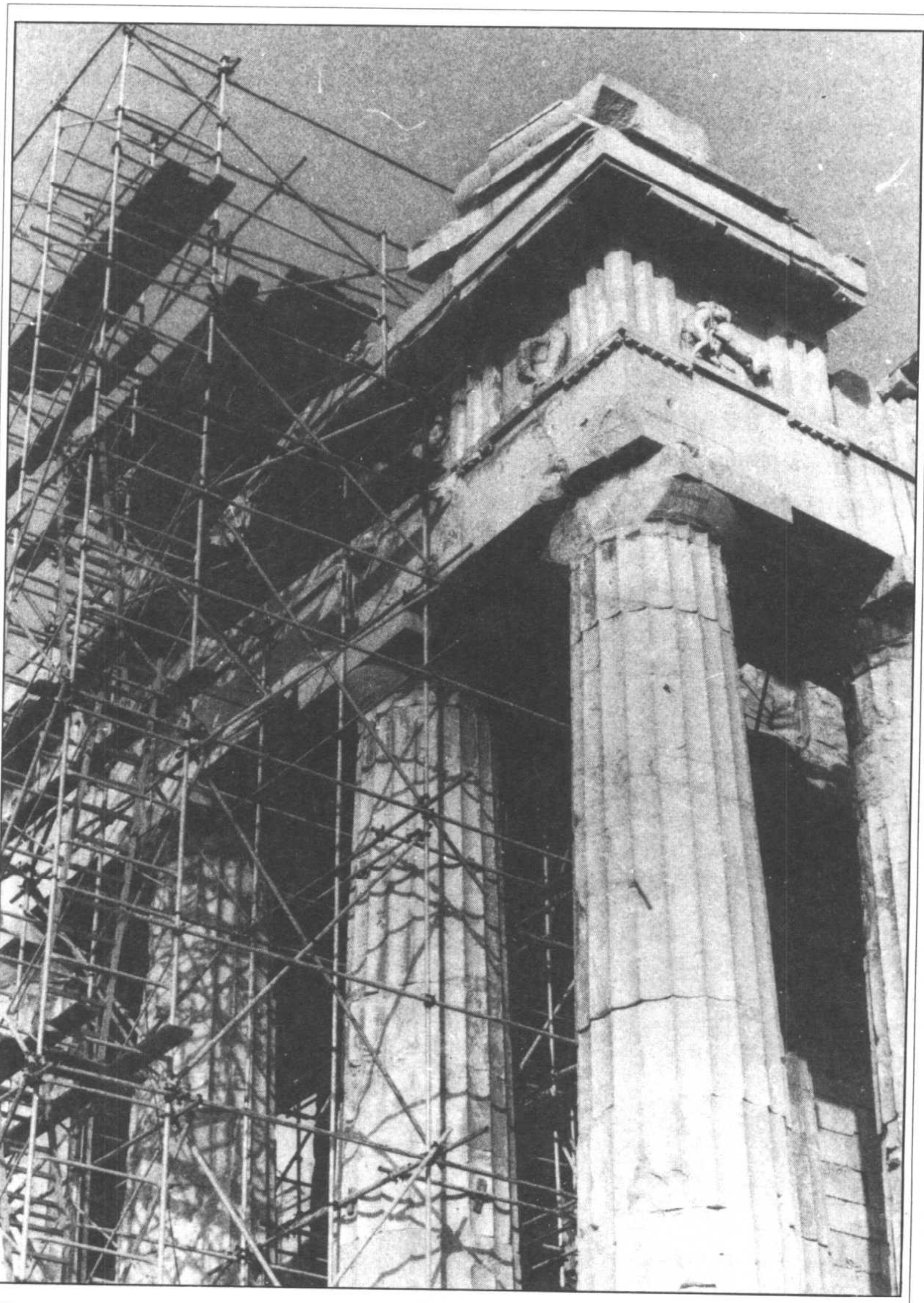


修复中的芭苔侬神庙东面。

卫城的建筑物在差不多2500年当中抵制住了自然灾难、人为影响以及自然的老化，然而在最近几十年中 -- 主要是从 1940 年以来 --，它们面临着严重的问题：大理石表面出现破口、裂缝和蚀变。1971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份专家报告强调了这一形势的严重性。当然，作为文化部所属希腊考古管理局的下属部门的雅典卫城监督处（l'éphorie de l'Acropole）在其所掌握的资金和技术手段有限的情况下，试图找到一种应付上述灾难性紧急危险的办法。1975年，人们已完全意识到切实行动起抢救这些古建筑的必要性。这便是文化部召集考古学家、建筑学家、工程师和化学家组成了一个委员会即“卫城古建筑保护委员会”（Commission pour la conservation des monuments de l'Acropole）的缘起。该委员会接下来的职能是对古建筑群修复的各项必要工作进行研究、规划、监督和实施。

为了使这项计划付诸实施，该委员会在获得任命的随后就建立了一个由各个不同专业学者组成的技术办公室。这项的确很重要的工作就这样开始整整12年了，其耗资将达几十亿德拉克马[10亿德拉克马=5千万法郎]！第一批经费已于1977年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国际捐款筹齐，并已用于建立一座大理石保存实验室。此后，特别是在1983年和1985年之间，欧洲共同体又提供了部分捐款。但这不过是杯水





修复中的芭苔侬神庙。

车薪。这样，从1985年开始，该项工程的经济重负由文化部来承担。修复工程由希腊学者来完成。修复小组有6名建筑师、3名工程师、3名化学家、3名考古学家、5名绘图员、1名艺术品修复员和关于大理石的各类技术专家参加。

据卫城古建筑保护委员会最近出版的新闻公报报道，1975-1977年这一时期构成该工程的严格意义上的研究阶段。在这些年当中，他们仔细编制了他们已彻底研究的问题的清单；最重要的问题是：

a）19世纪和20世纪两次修复中使用的铁质材料的腐蚀；

b）最近30年来古建筑周边空气污染的加剧所引起的大理石表面（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蚀变；

c）古建筑的静阻力；

d）无数参观者走过所造成的山岩的损坏。

在其他科学组织的帮助下，卫城古建筑保护委员会推动了对于所有建筑物的静态研究、山岩的地形记录和图示绘制以及关于分散石块的研究。而且，卫城山岩的状况也得到了系统研究，人们还在实验室里做了若干关于大理石表面蚀变成因的研究。同时，人们也采取了第一批临时性保护措施。例如，在女像柱和芭蒂依神庙的西中楣上加盖木顶，将芭蒂依神庙西三角楣的雕塑转移到卫城博物馆中安放于为之提供了若干专门条件的地点，实施了某些局部净化大气的措施，严禁游客进入古建筑内部，严禁车辆驶至卫城之下。第一阶段计划已于1977年底完成。

需要整修的第一座重要的古建筑是埃瑞克透斯神庙。修复工程于1979年开始，到1986年底结束。整座建筑都被拆卸开来，在实施了各种被认为必不可少的修整措施后又被复原。[……]

1983年，杰出的建筑师M. 考莱（M. Korre）和C. 布拉斯（C. Bouras）发表了《芭蒂依神庙修复研究》（L'Etude pour la restauration du Parthénon）。在这一研究著作中，他们特别提出，芭蒂依神庙的一些散落的残片应该被拾掇起来，放回其在该建筑上的原位；在必要的地方，被毁的部分还应预先用新大理石补齐。

M. 摩莱提斯（K. Moraitis）：

《晚报》*(Vradyni)*，

1987年11月9日

# 要重建埃瑞克透斯神庙吗?

*古建筑需要修复到什么地步为止呢?伊文思修复了克诺索斯王宫;人们指责这一修复没有建立在充分可靠的科学的基础之上,另外还指责这一修复不可逆转,从而妨碍了对王宫各真迹部分的任何核查。但在另一方面,难道要允许以科学的名义让某些古建筑保持这样一种广大观众对之无法了解的状态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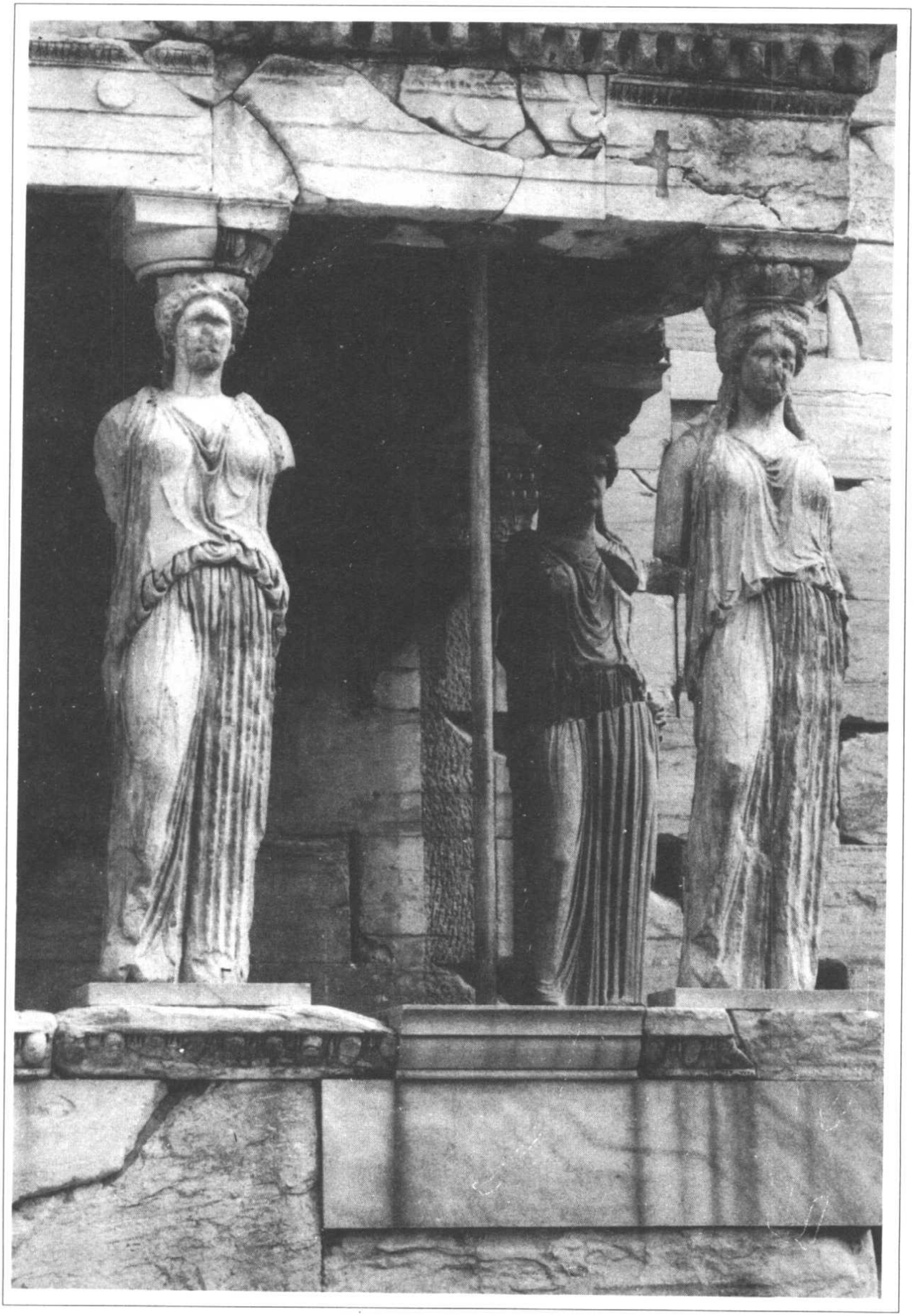
修复前的埃瑞克透斯神庙的女像柱廊台。

格外大胆还是非常保守?经过八年的研究和施工,于1987年底完成的埃瑞克透斯神庙修复工程究竟属于哪种情形呢?对该建筑物实施的修复措施最终取决于其修复后的外观,关于这一外观的讨论并非新近的事情。不过,意见分歧仍未超出卫城古建筑保护委员会的会议、某些学术交流和私人争论的范围。今天,这些分歧被第一次展示给公众,更有甚者,它们被披露于英国的新闻及出版物当中。

最近,身为卫城前管理主任和卫城古建筑



保护委员会成员的考古学家G. 东塔斯（G. Dontas）在从雅典寄往《泰晤士报》*(Times)* 的一封信中认定，《威尼斯宪案》（la Charte de Vinise）（1）——古建筑修复的圣经——的原则已被破坏，修复措施太过头了。这种看法大体上代表了希腊和外国考古学家中老派卫道士的立场。他们认为，古建筑应当被维持和保护而免遭补缺或修复的灾难，人们应当保持其被发现时的原状。前天的《星期日泰晤士报》*(Sunday Times)* 发表的篇幅占一整版的文章则为相反的观点作辩护。在文中，S. 詹金斯（S. Jenkins）坚持认为埃瑞克透斯神庙的修复者“拘囿于对学术权威的尊重”。他继续谈到，这样“卫城将成为考古学保守主义的一座陵墓”，乃至于他用这些话作结尾：“至少对于伯里克利时代的一座宏伟的建筑而言，如果人们能够打破考古学的精神垄断，能够恢得其全部辉煌，那该多么吸引人啊。我们对于其如画残迹的喜爱已令我们头脑发昏，我们害怕正视对其过去情形的现实主义的再现。”



介于这两种对立观念之间的是经卫城古建筑保护委员会决定后而最终采取的解决方案，该解决方案由综合技术学院（l'Ecole polytechnique）教授C. 布拉斯主持。其基本原则是在两种主张和委员会决定之间保持一种平衡：委员会决定，对于只要有物质材料存在下来的部分，都要尽可能地修复，即便是这种物质材料藏于大英博物馆，如该建筑物西北角的第六根柱子。这样，这座古建筑已缺失的部分就以复制品来填补（正是在这一点上，G. 东塔斯和文化部古建筑修复主任I. 戴马括普洛斯[I. Demakopulos]均保留了不同意见）。

而S. 詹金斯要求的不止是加一根柱子，补一些新大理石，将一些散落的石块放回原位，以及恢复埃瑞克透斯神庙的形态连续性，他还有更多的主张。这位英国记者是从古建筑应能够为广大民众所了解的理念出发的。为了阐明他的主张，他补充道："伟大的古建筑（如克诺索斯、沙特尔大教堂[la cath é drale de Chartres]等）之所以活了，呼吸了，是那些努力赋予它们一部分其原有感官效果的人的功劳，而不是由那些仅仅要求把石头精确地一块又一块重新垒起来的人所为。"他还说："今天对埃瑞克透斯神庙的半修复不如一种理应进行的完整修复更为接近真实。至少后一种修复考虑到了其最初建筑师的意图而会接近真实。"在这一点上，詹金斯举出了美国雅典学院对阿塔洛斯柱廊（Stoa d'Attale）（2）实施的完全修复的例子。他补充说："考古学和现代技术会使我们能够还原卫城艺术杰作的初始意义，同时也会使我们能够让这些艺术杰作不受损害。要消失的将会是废墟，废墟是历史偶然性任意所为的产物。"

这位45岁的记者一贯关心着古建筑修复事业，并多次参与为英国的古建筑维护提供建议。[……]他的文章获得了希腊方面的积极欢迎；然而人们还是坚持了业已选择的平衡解决方案。这种解决方案重视考古学理念，只在绝对必须的情况下才对古建筑的各建筑构件进行完整的恢复。它没有使遗址的特征发生异化，并且有助于没有考古学知识的人理解古建筑的美。

《新闻》（*Ta Nea*），1988年1月5日

（1）《威尼斯宪章》（1964年）是关于古建筑修复的一整套国际规则总集。

（2）阿塔洛斯柱廊是由帕伽马国王阿塔洛斯二世（Attale II）于公元前150年在古代雅典广场上建造的一道柱廊。该建筑在1953-1956年由美国人完整修复，并被用作博物馆。其原来的石块则被放置于某些非展品存放室中。

埃瑞克透斯神庙的雕像和建筑饱经岁月的摧残。

# 还应当进行发掘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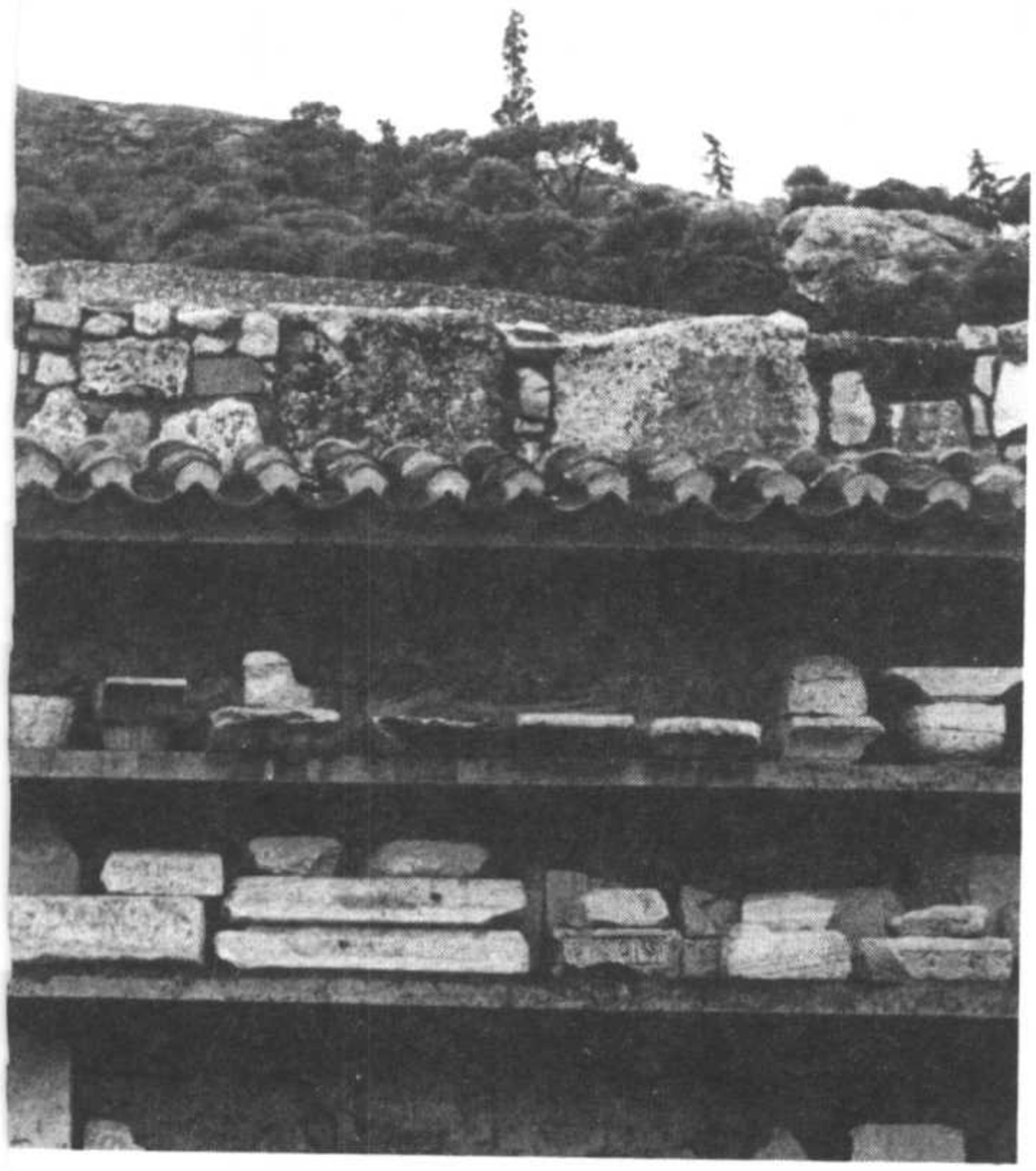
*剑桥大学教授A．斯诺德格拉斯（A．Snodgrass）是英国考古学派最杰出的代表之一，其著作论及希腊早期时代直至古风时代，颇具权威性。在这里他大胆地对希腊考古学这门学科的前景提出了一些意见；他敢于触及一个可能会引发或再次引发一场巨大争论的根本性问题。*



所有情况都会导致对于我将提出的关于未来在希腊的考古工作的形式的诸问题赋予一定的紧迫性。[……]我已顺便提及了希腊考古管理局在工作中遇到的困难，我希望对这一话题稍加发挥一点不会带有过于傲慢的嫌疑。对希腊物质遗产的非选择性保护从根本上来讲是一件值得重视的事情，以至于几乎没有人愿意公开反对，但它也导致了另一种不甚明显的危机。

今天参观希腊的游客都了解它的历史，当地博物馆的数量和展览的质量自然会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们不可能估计到——而且我想甚至那些作为非考古学家的古典研究专家也不可能估计到——的是实际展示出来的东西只不过是一座看不见的冰山的美丽的峰尖。

几乎所有的希腊博物馆都必须在其非展品存放室中保存大批的，而且是每年都以惊人的



速度剧增的不可能展出的东西，它们常常是没有被公布，并注定了将保持这种不被公布的状态。虽然考古管理局得到了或是工资上的、或是人员上的补偿，但这不过是考古管理局为国家旅游业所做出的巨大贡献的一个微小的百分比，而此时人们可能料想压力也许会减小。在这种情况下，唯一的前景却是压力迅速增大。甚至为了跟上希腊文化遗产“十分之九处于埋藏状态”的增长率，希腊考古管理局其实需要以相当客观的辐度增加人员。很多藏品想必都积存在一些临时性的、不便于研究的设施当中；这是其收藏者为应付今天的紧急发掘的更为迫切的需要而实施的权宜之计。”[……]

在希腊的外国考察团以他们的行动帮助考古局减轻了一部分负担，他们在需要的时候承担了某些抢救性发掘。由于这些发掘的所得物必然需要被同样安置在博物馆当中，它们不可避免地加重了其他负担，助长了 apothèkes（“非展品存放室”）中那些人们无法见到的器物“山峰”的增高。这一问题不单独存在于希腊，但是由于希腊拥有格外丰富的考古遗产，在那里该问题表现得最为尖锐。每一次发掘，甚至于在地方城市中建造一片不大的办公建筑群时在其中的10米内进行的发掘，都可能出土一大堆在时间上涵盖几千年而非几个世纪的属于各个不同时代的器物。这个问题的一些答案应该会在不久的将来找到：选择对除紧急发掘以外的所有发掘实施延期偿付经费的做法通常不过是存在于大学生作业中的一种假设，现在也开始被认真加以考虑。此时我们应当询问的是我们对于新发现的器物的渴望——在考古学国际会议上还可以经常听到的祈祷语Kala vrémata!(“愿有好东西发现！”）即包含了这一渴望——是否是一件可以无限制满足的东西。这种渴望就不能与对于新知识的完全合理而适当的渴望分离开来吗?

A. 斯诺德格拉斯：
《希腊考古》（*An Archeology of Greece*），1987 年

## 年　表

### 古代希腊（公元前 5000– 公元 395 年）

| | | |
|---|---|---|
| 新时期时代<br>早期希腊底 | 5000-2600<br>2600- 约 1950 | 爱琴 - 安纳托利亚文明 |
| 中期希腊底 | 约 1950- 约 1580<br>约 1950- 约 1750 | 在克里特，最初的米诺王宫。<br>在大陆，希腊人的到来。 |
| 晚期希腊底 | 约 1580- 约 1125<br>约 1580- 约 1400<br>约 1400<br>约 1200-1125 | 约 1500：桑托里尼火山喷发，阿克洛提里地点被毁。<br>在克里特，第二批米诺王宫。<br>在大陆，迈锡尼文明的发展。<br>克里特被迈锡尼人征服和迈锡尼文明的鼎盛。<br>迈锡尼王宫被毁。 |
| 铁器时代 | 自 1125<br>约 1125- 约 900 | 多里斯人的入侵（？）。<br>过渡时期和“几何陶”艺术的出现。<br>约 1000：希腊人在小亚细亚的定居。 |
| 古风时期 | 约 900-490 | 776：奥林匹亚运动会创立的传统年代。<br>自 750 始：希腊人在西方的殖民。<br>750-700：荷马史诗定本。 |
| 古典时期 | 490-338 | 490-480：希波战争。<br>431-404：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br>338：希腊城邦被马其顿的腓利普击败。<br>326-323：亚历山大的统治和他对波斯的征服。 |
| 希腊化时期 | 321-31 | 马其顿、埃及（拉吉戴王朝，Lagides）、叙利亚和小亚细亚（塞琉古王朝，Séleucides）和帕伽马（阿塔洛斯王朝，Attalides）的希腊人王国的形成。<br>200：罗马干涉希腊。<br>146：罗马人毁灭科林斯，罗马马其顿行省建立。<br>88-86：苏拉包围并毁灭雅典。<br>31：屋大维，即后来的罗马皇帝奥古斯都，在阿克兴（Actium，在西希腊）战胜安东尼。 |
| 罗马帝国时期 | 31-395 | 希腊世界成为罗马行省组织的一部分。<br>奥古斯都统治时期，斯特拉波在希腊和罗马帝国旅行。<br>约 150 年：鲍萨尼亚斯在希腊旅行。<br>267：来自巴尔干半岛的黑鲁利人蹂躏雅典。<br>391：基督教成为国教。 |

## 拜占庭和法兰克时期的希腊（395–1456 年）

| 标志性历史事件 | 考古学史 |
| --- | --- |
| 395 罗马帝国分裂为两部分，即西罗马帝国和东罗马帝国，后者发展成为拜占庭帝国。 | 393 奥林匹亚运动会最后一次举行。 |
| 529 查士丁尼敕令：关闭哲学学校，将神庙改为教堂。 | 529 神庙被改为教堂（芭苔依神庙、忒修斯神庙）。 |
| 7-9 世纪 斯拉夫人入侵。 | |
| 867-1081 拜占庭的马其顿王朝：希腊的复兴。 | |
| 1054 教会分立：罗马天主教会与希腊东正教会分裂。 | |
| 1080 法兰克人的首次入侵，西西里诺曼人的入侵。 | |
| 1204 第 4 次十字军东征。君士坦丁堡的拉丁帝国建立。希腊被威尼斯人（得到伊奥尼亚诸岛、爱琴海诸岛、克里特、伯罗奔尼撒地区的商行）和法下的。公瓜分（建立雅典公爵领地、摩里亚公国）。 | 1204 希腊学者逃往西方（特别是意大利）。 |
| 1261 拜占尔皇帝米哈埃尔八世·帕莱奥罗果斯（Michel VIII Paléologue）光复君士坦丁堡。 | |
| 1262 米斯特拉、摩奈姆瓦西亚（Monemvasie）和马尼再次落入拉丁人之手。 | |
| | 1435-1448 安科纳的齐里亚科在希腊旅行。 |
| 1453 土耳其人夺取君士坦丁堡，拜占庭帝国灭亡。 | |

## 土耳其统治下的希腊（1456–1820 年）

| 标志性历史事件 | 考古学史 |
| --- | --- |
| 1456 土耳发现是非常惊卡。 | 15 世纪后半期 希腊学者加快向西方移居，同时古代文学在希腊复兴（柏拉图学派哲学家盖米斯托斯·普莱松在米斯特拉讲学）。 |
| 1460 芭苔依神庙被改作伊斯兰教清真寺。摩里亚（除威尼斯人的属地）被征服。 | |
| 16 世纪 奥斯曼人进行新扩张，威尼轮战车御阻止像群，而败。 | |
| 1566 开俄斯、塞浦路斯和基克拉迪群岛被征服。 | |
| 1571 莱庞托战役（在科林斯湾）：基督教列强联合歼灭土耳其舰队。 | |
| 17 世纪 威尼斯 - 土耳其战争。 | 17 世纪 宗教修会被派驻希腊（嘉布遣会和耶稣会）。 |

| | |
|---|---|
| 1645-1669 土耳其人占领希腊（包括克里特）全部领土。 | |
| | 1674 努安特尔侯爵的游览，芭苔侬神庙雕刻的素描图。 |
| 1687 在伯罗奔尼撒的征服者，威尼斯总督莫里西尼(Morisini)的率领下，威尼斯人夺取了雅典。 | |
| | 1733 伦敦艺术爱好者协会成立。 |
| 18世纪 俄土战争（俄罗斯想使其对土耳其帝国内基督教徒的保护权得到承认）。希腊人多次起义均以失败而告终。 | 18世纪末 希腊哲学家科拉伊斯颇有影响，他定居于巴黎，在菲尔曼·迪多（Firmin Didot）出版社出版希腊古典作家的著作。 |
| | 1788 修道院院长巴尔泰勒米出版《青年阿那卡尔西斯的旅行》。 |
| | 1800-1805 艾尔金勋爵在雅典。 |
| | 1811 艾吉那三角楣的发现。 |
| 1814 秘密革命组织“友谊会”（Hétairie）在奥德萨（Odessa）成立，准备进行解放战争。 | 1812 在巴塞的发掘和中楣的发现。 |
| | 1820 米洛的维纳斯被发现，并为法国购得。 |

## 独立战争（1821—1832年）

| 标志性历史事件 | 考古学史 |
|---|---|
| 1821年3月 希腊反对土耳其起义。<br>希腊人最初在伯罗奔尼撒和诸岛屿上的胜利。 | 欧洲形成强大的支持希腊的潮流。 |
| 1822 在埃庇道罗斯宣布希腊民族独立。<br>希腊人失利，开俄斯的大屠杀，土耳其人开始包围米索隆伊。 | |
| 1823 希腊军人党和政客党之间的内战。 | 1823 “伦敦希腊人委员会”（London Greek Committee）成立。 |
| 1824 拜伦勋爵逝世于米索隆伊。 | 1824 “法国支持希腊委员会”（Comité philhellénique français）。 |
| 1825 易卜拉辛·帕哈（Ibrahim Pacha）率领土耳其-埃及军队在摩里亚登陆，企图镇压希腊。 | |
| 1826 米索隆伊陷落。土耳其人重新夺取由法布维埃（Fabvier）上校的志愿军守卫的雅典及其卫城。 | |
| 1827 卡波狄斯特里亚任希腊共和国总统。大国为终止敌对行为进行调停。在土耳其拒绝的情况下，盟国击败了土耳其-埃及舰队，令其全军覆没：纳瓦兰战役（在伯罗奔尼撒西南）。 | |

| | |
|---|---|
| 1828 法国远征摩里亚。 | 赴摩里亚科学考察团伴随远征军前往摩里亚。 |
| 1830 独立的希腊国家建立，其北部边界为沃罗湾和阿尔塔湾（les golfes de Volo et d'Arta）。 | |
| 1831 卡波狄斯特里亚遇刺。 | |
| 1832 列强将巴伐利亚血统的君主制强加于希腊。巴伐利亚的奥托在那夫普里翁登基。 | |

| 当代希腊(1832—1974年) | |
|---|---|
| 标志性历史事件 | 考古学史 |
| 1832-1862 奥托一世在位，定都雅典。 | 1834 希腊考古管理局成立。<br>雅典卫城上的晚近建筑物被拆除。 |
| | 1835 雅典娜·尼凯神庙复建。 |
| | 1837 希腊岛阿波罗圣所的质的考古学会。国家委员会会议、受责成出版《考古公报》，这是希腊第一份考古学杂志。 |
| 1843 雅典发生革命。奥托接受宪法。 | 1846 法国雅典学院建立。 |
| 1862 无政府状态，巴伐利亚王朝被废黜。 | |
| 1863-1913 丹麦的成果相当世在位。 | |
| 1864 英国将伊奥尼亚诸岛让与希腊。 | |
| 1868 克里特反对土耳其的起义失败。 | 1866-1889 雅典国家博物馆建立。 |
| | 1874 德国考古研究院成为帝国的一个机构。<br>德国雅典研究院建立。 |
| 1881 君士坦丁堡条约：忒撒利亚及埃庇洛斯（Epire）的一部分被让与希腊。 | 1882 美国考古学院建立。 |
| | 1885 英国考古学院建立。 |
| | 1896 第一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举行。 |
| 1908 克里特宣布并入希腊。 | 1909 意大中世纪的建筑立。 |
| 1912-1913 巴尔干战争：希腊它们妨碍到发掘部和建筑物南部以及爱琴海上的大部分岛屿。 | |

| | |
|---|---|
| 1917 在政府首脑 E. 维尼泽罗斯（E.Venizélos）的影响下，希腊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协约国方面作战。若干条约将除君士坦丁堡之外的色雷斯(Thrace)和斯米尔那地区给予希腊。 | |
| | 奥地利、加拿大、丹麦和瑞典在希腊已有或正有常驻性考察团。 |
| 1920-1922 希土小亚战争和斯米尔那的丧失。小亚希腊难民出逃。 | |
| 1922 革命和君主制的衰落。 | |
| 1924-1935 希腊宣布成立共和国。政治上的无政府时期。 | |
| 1935-1936 君主制复辟和麦塔克萨斯(Métaxas)将军的独裁。 | |
| 1940-1944 意大利入侵，希腊人的成功抵抗和 1941-1944 年希腊被德、意军队占领。 | |
| 1944-1949 希腊内战。 | |
| 1946 国王的返回。 | |
| 1947 意大利将“十二岛”让与希腊。 | |
| 1949-1967 动荡时期。 | |
| 1967 军事政变和上校独裁。 | |
| 1974 土耳其出兵干涉塞浦路斯。希腊恢复民主制。 | |

# 参考书目


**当代希腊史**

L. 马通、R. 马通：《雅典及其名建筑，自 17 世纪至今》(L. et R. Matton, *Athènes et ses monuments, du XVII^e siècl à nos jours*)，1963。

N. 斯沃洛诺斯：《现代希腊史》，属《我知道什么？》丛书，法国大学出版社（N. Svoronos, *Histoire de la Grèce*, 《Que sais-je ?》P.U.F.），1975 年。

A. 瓦卡罗普罗斯：《现代希腊史》（A. Vacalopoulos, *Histoire de la Grèce*, Horvath），奥尔瓦（Horvath）1975 年。

**希腊考古学史**

R.比昂奇 - 邦迪奈利：《古典考古学批判性导论》（R. Bianchi-Bandinelli, *Klassische Archäologie, eine kritische Einführung*），1978 年。

R. M.库克：《希腊绘饰陶器》(R. M. Cook, *Greek Painted Pottery*)，1960 年。

W.拉尔菲尔特：《希腊铭文学》（W. Larfeld, *Griechische Epigraphik*），慕尼黑 1914 年。

A. 米哈埃利斯：《19 世纪的考古发现》（A. Michaelis, *Die Archäologischen Entdeckungen des neunzehnten Jahrunderts*），1906 年。

展览：

- 《柏林和古代》（《Berlin und die Antike》，柏林 1979 年。
- 《考古学家》（《Der Archäologe》），明斯特（Munster）1983 年。

**赴希腊的旅行家**

E: 罗维奈斯科：《19 世纪在希腊的法国旅行家》（E. Lovinesco, *Les Voyageurs français en Grèce au XIXe siècle*），1909 年。

K. 西摩普罗斯：《在希腊的外国旅行家，公元前 333 - 公元 1821 年》（K. Simopoulos, *Les Voyageurs étrangers en Gréce, 333 ap. J.-C. – 1821*），5 卷（希腊文版），1970-1981 年。

F. M. 齐伽库：《重新被发现的希腊》（F.M.Tsigakou, *La Grèce retrouvée*），塞格尔斯（Seghers）1984 年。

展览：《巴黎 - 罗马 - 雅典，19 世纪和 20 世纪法国建筑师的旅行》(《Paris-Rome-Athènes le voyage des architectes français au XIX^e et au XX^e siècle》)，巴黎 1982 年（M.-F.

比耀、P.弗莱斯、M.-C.海尔曼，M.-F. Billot, P. Fraisse, M.-C. Hellmann)。

未刊稿：
-G. 拉巴尔：《15世纪旅行家眼中的密科诺斯、提洛、莱内亚》(G. Labarre, *Mykonos, Délos, Rhénée, vues par les voyageurs du XVe siécle*)，里昂大学硕士论文，1984年。
-M. 塞沃：《旅行家和艺术家关于阿哥斯城市和阿哥斯古物的见证（16-19世纪）》(M. Sève, *Témoignages de voyageurs et d'artistes sur la ville d'Argos et les antiquités d'Argos (XVIe-XIXe siècle)*)，楠泰尔大学（l'universitéde Nanterre）学位论文，1979年。

**第1章**
R. 比昂奇 - 邦迪奈利：《罗马——权力的中心》(R. Bianchi-Bandinelli, *Rome, le center du pouvoir*)，伽利马尔（Gallimard），1969年。
C. 哈比希特：《鲍萨尼亚斯：古代希腊的导游》(C. Habicht, *Pausanias, Guide to Ancient Greece*)，伦敦1985年。
M. R. 沃伊奇克：《海尔库拉纽姆的纸草别墅》(M. R. Wojcik, *La Villa dei Papiri ad Ercolano*)，
1986年。

**第2章**
A. 邦：《法兰克人的摩里亚》(A. Bon, *La Morée franque*)，1969年。J. 科兰：《旅行家、商人、人文主义者安科纳的齐里亚科》(J. Colin, *Cyriaque d'Ancône, le voyageur, le marchand, l'humaniste*)，马卢瓦（Maloine）1981年。

**第3章**
L. 德·拉博德：《15、16和17世纪的雅典》(L. de Laborde, *Athènes aux XVe, XVIe et XVIIe siècles*)，1854年。
P. 摩尔佛普洛斯：《法国旅行家笔下的希腊印象》(P. Morphopoulos, *L'Image de la Grèce chez les voyageurs français*)，1947年。
H. 欧蒙：《17、18世纪在东方的考古使命》(H. Omont, *Missions archéologiques en Orient aux XVIIe et XVIIIe siécles*)，1902年。
H. 旺达尔：《努安特尔侯爵的旅行》(H. Vandal, *Les Voyages du marquis de Nointel*)，巴黎1900年。

未刊稿：S. 德莫尔奈克斯：《17世纪的博学者斯蓬：生平与著作》(S. Demornex, *Un érudit du XVIIe siécle, J. Spon, sa vie et son oeuvre*)，里昂大学硕士论文，1966年。

**第4章**
集体著：《约翰·约阿西姆·温克尔曼，1768-1968年》(Collectif, *Johann Joachim Winckelmann, 1768-1968*)，巴特·戈德斯堡（Bad Godesberg）1968年。
L. 奥特科尔：《法国古典建筑史》(L. Hautecoeur, *Histoire de l'architecture classique en France*)，巴黎1943-1957年。
K. 波米昂：《收藏家、爱好者和集珍者，巴黎-威尼斯：16-18世纪》(K. Pomian, Collectionneurs, amateurs *et curieux, Paris-Venise : XVIe-XVIIIe siècle*)，伽利马尔1987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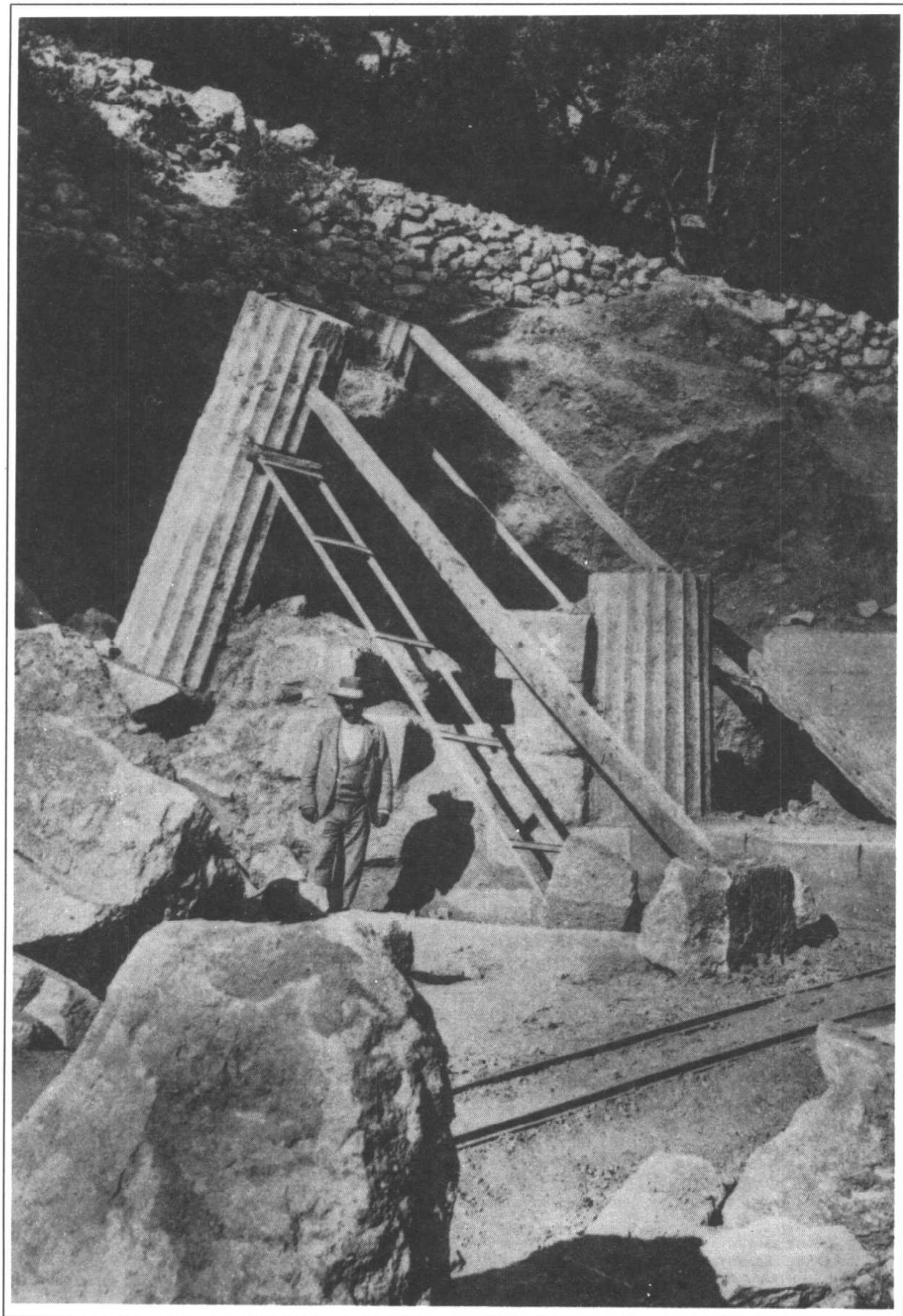
**第5章**
B. F. 库克：《艾尔金大理石》(B. F. Cook, *The Elgin Marbles*)，1983年。
C. 若莱：《当斯·德·维优瓦宗与希腊文化在法国》(C. Joret, *D'Ansse de Villoison et l'hellénisme en France*)，1910年。
G. 鲁：《卡尔·哈勒尔·冯·哈勒尔施坦因，巴塞神庙》(G. Roux, *Karl Haller von Hallerstein, le temple de Bassae*)，1976年。
W. 克莱尔：《艾尔金勋爵——抢走芭苔侬神庙大理石雕刻的人》(W. Saint-Clair, *Lord Elgin, l'homme qui s'empara des marbres du Parthénon*)，马居拉（Macula）1983年。
R. 施耐德：《卡特勒梅尔·德·坎西及其艺术活动(1788-1830年)》(R. Schneider, *Quatremére de Quincy et son intervention dans les arts (1788-1830)*)，1910年。

展览：
-《卡尔·哈勒尔·冯·哈勒尔施坦因》(《Karl Haller von Hallerstein》)，纽伦堡1986年。
-《考古学家列奥·冯·克兰策》(《Leo von Klenze, der Archäologe 》)慕尼黑1986年。

**第6章**
R. 卡纳：《古代希腊的复兴》(R. Canat, *La Renaissance de la Gréce antique (1820-1850)*)，1911年。
B. 佩特拉括斯：《希腊考古学会，1837-1987年》(B. Petrakos, *La Société archéologique d'Athènes, 1837-1987*)(希腊文版)，1987年。
G. 拉代：《法国雅典学院》(G. Radet, *L'Ecole française d'Athènes*)，1901年。



**第7、8章**
N. 布维埃：《波伊索纳斯，一个摄影家的王朝，1864-1983年》(N. Bouvier, *Boissonas, une dynastie de photographes, 1864-1983*)，1983年。
集体著：《亚瑟·伊文思和米诺斯王宫》(A. 布朗)(Collectif, *Arthur Evans and the Palace of Minos* (A. Brown))，阿什莫尔博物馆（Ashmolean Museum），1983年。
集体著：《古代克里特：意大利考古一百年，1884-1984年》(Collectif, *Creta antica: cento annidi archeologia italiana, 1884-1984* (M. Di Vita))（M. 迪·维塔），罗马1984年。
J. 伊文思：《时代与机遇：A. 伊文思及其前辈的故事》(J. Evans, *Time and Chance, the Story of A. Evans and his Forebears*)，1943年。
U. 严岑：《雅典研究院一百年，1874-1974年》(U. Jantzen, *Einhundert Jahre Athener Institut*, 1874-1974)，1986年。
V. 罗泽曼：《国家社会主义与古代》(V. Losemann, *Nationalsozialismus und Antike*)，汉堡1971年。
W. A. 麦克唐纳：《荷马希腊的发现》(W. A. Mc Donald, *The Discovery of Homeric Greece*)，1976年。
L. 普尔、G. 普尔：《发现特洛耶的施里曼》(L. et G. Poole, Schliemann à la d é couverte de Troie)，1969年。(这本“圣徒传记”般过分美化的传记应该用W. M. 考尔德III和D. A. 特雷尔著的《神话、诽谤与历史：关于H. 施里曼的争论和迈锡尼日记的第一版》(*Myth, Scandal and History, The H. Schliemann Controversy and a First Edition of the Mycenaen Diary*, W. M. Calder III and D. A. Traill, 1986) 来矫正。)
H. 沃特豪斯：《英国雅典学院：最初一百年》(H. Waterhouse, *The British School at Athens, the First Hundred Years*)，1986年。



## 封面

封一 雅典卫城山墙西面复原图，路易-弗朗索瓦·布瓦特（Louis François Boitte）作，1864年送审作品。巴黎美术学院。

书脊 纳克索斯人的柱子复原图，水彩画，阿尔贝·图尔内尔（Albert Tournaire）作，1894年送审作品。藏址同上。

封四 希腊人与阿马宗妇女的战斗，巴塞阿波罗神庙中楣。伦敦，大英博物馆。

## 扉页

1 发现于德尔菲的斯芬克斯雕像，照片。法国雅典考古学院。

2/3 萨摩斯赫拉神庙的发掘现场，照片，1902年。雅典，希腊考古学会。

4/5 提洛岛陡岸房屋中的束锦带者像，照片。法国雅典考古学院。

6/7 一尊古风时代的男青年雕像发现于德尔菲，照片，1893年。同上。

8 亚瑟·伊文思在克诺索斯，照片。牛津，阿什莫尔博物馆（Ashmolean Museum）。

9 测量德尔菲圆庙（Tholos）柱子的建筑师，照片。法国雅典考古学院。

11 吕西克拉泰斯歌舞队纪念碑，素描，阿尔弗雷德·博蒙（Alfred Beaumont）作，1834年。雅典市博物馆。

## 第1章

12 鲍萨尼亚斯《希腊周游指南》书名页，佛罗伦萨，劳伦奇亚那（Laurenziana）图书馆。

13 波吕克莱泰斯《持矛者像》头部的罗马青铜复制品，出土于海尔库拉纽姆纸草别墅。那不勒斯考古博物馆。

14 阵前的雅典娜，罗马大理石复制品。同上。

15上 达那奥斯之女，大理石雕刻，出土于海尔库拉纽姆纸草别墅。同上。

15下 静坐的赫耳墨斯，青铜雕刻，出土于海尔库拉纽姆纸草别墅。同上。

16/17 “奥林匹亚的障墙”，版画，J. 里戈作，载修道院院长热杜安译《鲍萨尼亚斯：希腊历史旅行》（*Pausanias ou voyage historique de la Grèce*），巴黎，1731年。

18/19 希腊地图，帕特里克·梅里安纳（Patrick érienne）作。

## 第2章

20 琉卡斯地图，载克里斯托佛洛·布昂戴尔蒙蒂著《海上列岛之书》，1420。巴黎，国家图书馆。

21 塔索斯的神圣议事女神（la Hiéra Boulé），素描，安科纳的齐里亚科作。牛津，波德莱恩图书馆（Bibliothèque Bodleian）。

22/23 墨多内港，彩色版画，载伯恩哈特·冯·布莱坦巴赫（Bernhard von Breytenbach）著《圣地之旅》（*Voyage en Terre sainte*），1486年。国家图书馆。

24/25 希腊的岛屿，载克里斯托佛洛·布昂戴尔蒙蒂著《海上列岛之书》，1420年。同上。

25下 优提凯斯制作并署名的雅典娜胸像，宝石凹雕，柏林古物博物馆。

26 缪斯，素描，安科纳的齐里亚科作。牛津，波德莱恩图书馆。

27 安科纳的齐里亚科作于提洛岛上的速写。

28上 芭苔依神庙西面，素描，安科纳的齐里亚科作。

28下 亚里士多德胸像，素描，安科纳的齐里亚科作。牛津，波德莱恩图书馆。

29 提洛岛古风时期的墨丘利像，素描，安科纳的齐里亚科作。

## 第3章

30 芭苔依神庙中楣，红粉笔素描，雅克·卡雷（Jacques Carrey）作。国家图书馆。

31 希腊人头像，素描，雅各布·斯蓬作。同上。

32 1478年土耳其军队围攻莱姆诺斯，素描淡彩，载奇戈尼亚（Cigogna）手稿，约1600年。威尼斯，科莱尔（Correr）博物馆图书馆。

32下 希腊贵族，版画，载尼古拉·德·尼古莱著《东方航海和旅行记前四卷书》（*Les Quatre Premiers Livres des navigqtions et pérégrinations orientales*），1568年。

33上 希奥斯岛妇女，版画，出处同上。

33下 希腊商人，版画，出处同上。

34 雅科波·斯特拉达像，提香作，1586年。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

35 芭苔依神庙排挡间饰，红粉笔素描，雅克·卡雷作。国家图书馆。

36/37 1687年的雅典卫城景色。同上。

38 正在研究以弗所的一篇铭文的斯蓬和魏勒，版画，载雅各布·斯蓬、乔治·魏勒著《意大利、希腊和利凡特游记》，阿姆斯特丹，1680年。

39 斯蓬和魏勒在雅典，版画，同上。

40上 古代头像，素描，斯蓬作。国家图书馆。

40下 风塔，素描，斯蓬作，载雅各布·斯蓬、乔治·魏勒著《意大利、希腊和利凡特游记》，海牙，1724年。

41 芭苔依神庙在1687年9月26日遭受威尼斯

军队轰炸，素描淡彩，根据吉亚科莫·米优·维尔内达（Giacomo Milheau Verneda）的绘画作。威尼斯，弗拉里（Frari）档案馆。

## 第4章

42 正在为埃瑞克透斯神庙绘制素描图的斯图亚特（局部），水彩画，詹姆斯·斯图亚特作，1751。伦敦，英国皇家建筑师研究院。

43 风塔浅浮雕饰带上表现的西风（Zéphyr），版画，R. 达尔东（R. Dalton）作，载《希腊和埃及的文物古迹和景色》（*Antiquities and views in Greece and Egypt*），伦敦，1791年。

44 阿尔凯达摩斯岩洞，水彩画，威廉·帕尔斯作，1764年。伦敦，大英博物馆。

45 菲洛帕波斯纪念碑（局部），水彩画，詹姆斯·斯图亚特作，1751年。伦敦，英国皇家建筑师研究院。

46/47 废墟上的人物，水彩画，威廉·帕尔斯作，1764年。伦敦，大英博物馆。

48上 吉亚（Zia）岛上的复仇女神像，版画，载J. 皮通·德·图尔纳佛尔著《利凡特旅行记》（*Relation d'un voyage du Levant*），1717年。

48下 那克索斯“巴库斯（Bacchus）神庙柱廊”景色，水彩画，托马斯·霍普作，约1795年。雅典，贝那奇（Benaki）博物馆。

49 萨洛尼卡的古迹，水彩画，詹姆斯·斯图亚特作，1751年。伦敦，英国皇家建筑师研究院。

50/51 雅典忒修斯神庙景色，水彩画，詹姆斯·斯图亚特作，1751年。同上。

52/53 雅典哈德良拱门景色，水彩画，詹姆斯·斯图亚特作，1751年。同上。

54/55 正在为巴库斯神庙绘制素描图的斯图亚特，水彩画，詹姆斯·斯图亚特作，1751年。同上。

56/57 哈德良和安托尼努斯（Antonin）建造的建筑的遗迹，版画，勒·巴（Le Bas）作，根据勒·鲁瓦著《最美丽的希腊古迹废墟》作，巴黎，1770年。

58 雅典风景，素描淡彩，路易·弗朗索瓦·卡萨（Louis François Cassas）作。阿泽-勒-费隆城堡（Chateau d'Azey-le-Ferron）。

59 在古代废墟画素描的妇女们，水彩画，于贝尔·罗贝尔作。巴黎，卢浮宫，素描陈列室。

60 猴子古董收藏家，绘画，让-巴蒂斯特·夏尔丹（Jean-Baptiste Chardin）。图尔美术博物馆。

61 约阿西姆·温克尔曼像，绘画，安通·拉斐尔·蒙斯（Anton Raphael Mengs）作。纽约大都会博物馆。

## 第5章

62 米洛的维纳斯，雕塑，卢浮宫。

63 拉奥美东（Laomedon），来自艾吉那阿法亚（Aphaia）神庙的雕塑。慕尼黑雕刻陈列馆。

64/65 路易一世令人展示古物和艺术品，壁画，威廉·冯·考尔巴赫，1848年。慕尼黑绘画陈列馆。

66《拉奥孔》进入卢浮宫，瓷瓶画。塞夫勒（Sèvres）出产。

67 柱头残部，素描淡彩，路易·弗朗索瓦·塞巴斯蒂安·佛沃尔（Louis François Sébastien Fauvel）作。国家图书馆。

68左 法国驻雅典领事M. 佛沃尔的宅邸，石版画，路易·迪普雷（Louis Dupré）作，1819年。

68右 石板，素描淡彩，路易·弗朗索瓦·塞巴斯蒂安·佛沃尔作。国家图书馆。

69上 迈锡尼狮子门（局部），水彩画，路易·弗朗索瓦·塞巴斯蒂安·佛沃尔作。同上。

69中 1801年的芭苔依神庙，素描，威廉·盖尔（William Gell）作。伦敦，大英博物馆。

69下 从东南面看的芭苔依神庙，水彩画，约翰·凯姆·霍布豪斯（John Cam Hobhouse）作，载《旅行》（*Journey*），1813年。

70/71 从西南面看的埃瑞克透斯神庙，仿水彩蚀刻，1830年，根据爱德华·多德威尔（Edward Dodwell）在1801-1805年间作的一幅素描作。

72 拜伦勋爵像，绘画，Th. 菲利普（Th. Philips）作。伦敦，国家肖像画廊。

72/73 大英博物馆中对“艾尔金大理石”的异想天开的展出，素描淡彩，J. 斯蒂潘霍夫（Stepanhoff）作，1819年。伦敦，大英博物馆。

74 “艾尔金大理石”于1819年在大英博物馆中临时展出，绘画A. 阿彻尔（A. Archer）作。同上。

75上 “爱好者协会”会员的签名。

75下左 查尔斯·罗伯特·考克瑞尔于1811年在艾琉西斯，素描，卡尔·哈勒尔·冯·哈勒尔施坦因作。

75下右 卡尔·哈勒尔·冯·哈勒尔施坦因像，素描，奥托·马格努斯·冯·施塔克尔堡作。

76/77下 巴塞阿波罗神庙中楣，版画，根据奥托·马格努斯·冯·施塔克尔堡的一幅素描

作。
77 上 巴塞阿波罗神庙景色，水彩画，约翰·福斯特作，1846年。伦敦，大英博物馆。
77 右 来自艾吉那神庙西三角楣上的戴头盔的雅典娜。慕尼黑雕刻陈列馆。
78/79 巴塞阿波罗神庙内部景色，素描，查尔斯·罗伯特·考克瑞尔作，载《艾吉那和菲伽利亚的神庙》（*Temples d'Egine et de Phigalie*），伦敦，1860年。
79 艾吉那的泛希腊朱庇特神庙，素描，查尔斯·罗伯特·考克瑞尔作。
80 奈普顿（Neptune）的马车，素描淡彩，载卡特勒梅尔·德·坎西著《奥林匹亚的朱庇特》，1814年。
81 瓦尔哈拉圣堂，素描淡彩，卡尔·哈勒尔·冯·哈勒尔施坦因作。慕尼黑，拜恩州图书馆（Bayerische Staatsbibliothek）。
82/83 雅典卫城，绘画，列奥·冯·克兰策作，1846年。慕尼黑新绘画陈列馆。

## 第6章

84 尼科拉基·米特罗波洛斯（Nicolaki Mitropolos）1821年的肖像，石版画，路易·迪普雷作。
85 《摩里亚科学探险》的卷首插图，版画，布卢埃（Blouet），巴黎，1831年。
86 民兵，石版画，罗多维科·利帕里尼（Lodovico Lipparini）作。
87 国王奥托进入雅典，石版画，A. 格拉塞（A. Grasset）作。
88/89 希腊之梦，绘画，卡尔·弗里德里西·辛克尔作，柏林，国家博物馆。
90 正在修复当中的雅典的雅典娜·尼凯神庙的景色，石版画，克里斯提安·汉森（Christian Hansen）作，载路德维希·罗斯著《雅典卫城》（*Die Akropolis von Athen*），柏林，1839年。
91 左 雅典考古学会会刊创刊号的书名页，1838年。雅典，希腊考古学会。
91 右 皮塔奇斯像，照片。同上。
92 上 提洛岛阿波罗圣所（局部），水彩画，亨利-保罗·内诺（Henri-Paul Nenot）作，1882年送审作品。巴黎美术学院。
92 下 皮德纳的墓葬，石版画，载L. 厄泽（L. Heuzey）、H. 多梅（H. Daumet）著《马其顿考古学考察》（*Mission archéologique de Macédoine*），巴黎，1876年。
92/93 同上。
93 上 芭苔依神庙滴水，水彩画，马塞尔·朗贝尔（Marcel Lambert）作，1877年送审作品。巴黎美术学院。
93 下 皮德纳的墓葬，石版画，载L. 厄泽（L. Heuzey）、H. 多梅（H. Daumet）著《马其顿考古学考察》（*Mission archéologique de Macédoine*），巴黎，1876年。
94/95 奥林匹亚朱庇特神庙横切面复原图，水彩画，维克多·拉卢作，1883年送审作品。巴黎美术学院。
96/97 根据遗址实况和古代文献所作的德尔菲圣所透视复原图，水彩画，阿尔贝·图尔内尔作，1894年送审作品。同上。
98 刮汚者像，雕塑。罗马，梵蒂冈博物馆。
99 赫拉克勒斯与克里特公牛，奥林匹亚宙斯神庙排挡间饰。卢浮宫。

## 第7章

100 迈锡尼的发掘，水彩画，威廉·辛普森（William Simpson）作，1877年。伦敦，英国皇家建筑师研究院。
101 萨摩色雷斯的胜利女神，雕塑，卢浮宫。
102 在希腊山区遭受袭击的旅行者，居斯塔夫·多雷为埃德蒙·阿布著《山地之王》作的插图，1882年。
103 科林斯地峡的盗墓贼，版画，载《插图伦敦新闻》（*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1877年。
104 抄录德尔菲多角墙铭文，照片，1896年。
105左 德尔菲的御者雕像被发现，照片，1896年。法国雅典考古学院。
105右 德尔菲的御者雕像1904年在雅典，照片。布洛尼（Boulogne），阿尔伯特·卡恩（Albert Kahn）收藏品。
106 建筑师和考古学家小组在提洛岛，照片，1910年。自左至右：加布里埃尔（Gabriel）、普尔森（Poulsen）、皮卡尔（Picard）、马尔（Maar）、哈茨菲尔特（Hatzfeld）、杜尔巴赫（Durrbach）、瓦卢瓦（Vallois）。
107 1891年在达芙妮的发掘队，照片。雅典，雅典考古学会。
108 1896年对芭苔依神庙的维修，照片。
109 少女像，雕塑，雅典卫城博物馆。
110 上 戴着特洛耶首饰的索菲娅·施里曼像，照片。
110 下 约1870年的海因里希·施里曼像，照片。
111 迈锡尼狮子门，照片。
112 上 发现于迈锡尼一座墓葬中的被称为“阿伽门浓的面具”的墓葬金面具。雅典，国家博物馆。
112 下 1894年在特洛

耶的维尔海尔姆·道尔普菲尔特像，照片。
113 克里特的克诺索斯王宫的北入口，照片。
114 上 蓝色贵妇图（局部）、克诺索斯王宫壁画。赫拉克利昂（Héraklion）考古博物馆。
114 下 A. 伊文思在克里特，照片。牛津，阿什莫尔博物馆。
115 1896年在雅典举行的第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广告画。

## 第8章

116 在芭苔依神庙前站在梯子上的弗雷特·波伊索纳斯，照片。加德·博雷尔 - 波伊索纳斯（Gad Borel-Boissonas）档案。
117 阿耳忒弥西昂海角的小马夫，雕塑。雅典，国家博物馆。
118/119 提洛岛上的雕像，照片，弗雷特·波伊索纳斯摄。
119 卡鲁佐夫人像，照片。
120 1936年柏林奥运会期间对来自奥林匹亚宙斯神庙的雕塑的修复，照片，1935年。
121 阿特拉斯（Atlas），雅典娜的画师的油瓶（lécythe）上的绘画，雅典，国家博物馆。
122 所谓的“拉班骑士头像”，雕塑。卢浮宫。
123 里昂的少女像。里昂美术博物馆。
124/125 美国人1931年在雅典广场的发掘，照片。
126/127 阿克罗提里遗址的放有坛子的仓库，照片。
128 拳击手，阿克罗提里遗址出土的壁画。

## 见证与文献

131 桑托里尼岛上阿克罗提里发掘的情景。
132/133 线形文字B，派罗斯。
135左 里亚切的青铜雕像B，雕塑。雷焦·迪·卡拉布里亚（Reggio de Calabre）博物馆。
135右 里亚切的青铜雕像A，雕塑。同上。
136 年轻时的艾尔金勋爵，素描。
138上 穿着形成褶裥的宽大衣服的两位妇女的坐像，雕塑。伦敦，大英博物馆。
138下 讽刺“艾尔金大理石”被变卖的漫画。同上。
140 《米洛的维纳斯》的发现，迪蒙·迪尔维叶墓碑上的浅浮雕，孔代 - 絮尔 - 努瓦罗（Condé-sur-Noireau）。
141上 《〈米洛的维纳斯〉被从“银河号”船上转装到双桅纵帆帆船“传令兵号”上》，版画。
141下 里维埃尔侯爵，细密画，让·盖兰（Jean Guérin）作。
142 米洛的维纳斯，雕塑。卢浮宫。
143 1871年复原时被放置在箱子里的《米洛的维纳斯》。
144 海因里希·施里曼像。
147 海因里希·施里曼在雅典的住宅，版画。
148 马其顿的腓利普二世的陵墓入口。
149 马其顿的腓利普二世的陵墓中的青铜器。
150/151 里昂第二大学考古研究所模塑品博物馆展厅。
152 里昂第二大学模塑品博物馆中的雕塑。
153 里昂第二大学模塑品博物馆保管员。
154/155、156 芭苔依神庙的修复工作。
158/159 埃瑞克透斯神庙的修复。
160 埃瑞克透斯神庙的女像柱。
162 雅典广场发掘出土的器物。
170 德尔菲，马尔马里亚（Marmaria），1901年的发掘情景，载Th. 奥莫尔著《德尔菲的发掘》（*Les Fouilles de Delphes*），1923年。

## 索引

### A-B-C


阿布（About）86, 87, 102, 103。
雅典卫城（Acropole）24, 36, 37, 39, 41, 45, 55, 56, 58, 68, 71, 72, 83, 86, 89, 90, 93, 108, 109, 110, 122, 123, 136, 154-157。
哈德良（Hadrien）拱门53。
阿伦德尔伯爵（Arundel, comte d'）35。
神甫巴班（Babin, pére）36、37。
修道院院长巴尔泰勒米（Barthélemy, abbé）58, 59。
贝拉尔，V.（Bérard, V.）123。
布昂戴尔蒙蒂（Buondelmonti）21, 24。
拜伦（Byron）63, 69, 72, 73, 75, 86。
卡诺瓦（Canova）74, 78。
卡波狄斯特里亚（Capodistria）86, 88。
卡萨（Cassas）58。
凯吕斯伯爵（Caylus, comte de）60。
昌德勒（Chandler）44, 47, 56, 79。
舒瓦瑟尔 - 古菲埃侯爵（Choiseul-Gouffier, comte de）43, 57, 68, 72。
考克瑞尔（Cockerell）67, 75, 76, 78-81。
安科纳的齐里亚科（Cyriaque d'Ancône）21, 24-29, 144。


### D-E-F


多德威尔（Dodwell）69, 71, 72。
艾尔金勋爵（Elgin, lord）67-69, 71-74, 86, 88, 90, 136。
埃瑞克透斯神庙（Erechthéion）16, 43, 56, 69, 71, 88, 158-161。

伊文思，A.J.(Evans, A. J.) 103, 110, 113, 114, 120, 132, 158。
佛沃尔（Fauvel）58, 67, 68, 72。
福斯特，J.(Foster, J.) 75-77。

## H-K-L

哈勒尔·冯·哈勒尔施坦因（Haller von Hallerstein）65, 75, 77, 78-81。
萨摩斯的赫拉神庙（Héraion de Samos）121。
希罗多德（Hérodote）28, 43。
卡鲁佐，S.(Karouzou, S.) 119, 120。
卡瓦狄亚斯（Kavvadias）108, 109, 119。
克兰策（Klenze）75, 81, 83, 90。
耐特，R. P.(Knight, R. P.) 73,74。
库马努狄斯，S.(Koumanoudis, S.) 108。
克劳斯，M.(Kraus, M.) 33。
勒·鲁瓦（Le Roy）56, 57,59,79。
卢谢里（Lusieri）68, 71, 72, 75。
吕西波斯（Lysippe）14, 98, 99。

## M-N-O

麦尔库里，M.(Mercouri, M.) 137, 143
吕西克拉泰斯（Lysicrate）纪念碑 37, 40, 118。
菲洛帕波斯（Philopappos）纪念碑 45, 58。
穆勒，K. O.(Muller, K. O.) 98, 104, 123。
尼古莱，尼古拉·德(Nicolay, Nicolas de) 33
努安特尔侯爵(Nointel, marquis de) 35, 35。
海罗戴斯·阿提库斯音乐堂（Odéon d'Hérode Atticus）36, 55, 58。

## P-Q-R

克诺索斯王宫（Palais de Cnossos）113, 123。
帕尔斯，W.(Pars, W.) 44, 47。
芭苔侬神庙（Parthénon）23, 29, 31, 35, 37, 39-41, 56, 64, 68, 69, 72, 75, 81, 88, 90, 93, 107, 108, 136, 138。
鲍萨尼亚斯（Pausanias）13, 16, 17, 27, 31, 37, 39, 40, 61, 80, 109。
菲狄亚斯（Phidias）17, 37, 40, 41, 61, 74。
皮通·德·图尔纳佛尔(Piton de Tournefort) 48
皮塔奇斯，K.(Pittakis, K.) 91。
波吕克莱泰斯(Polycléte) 13, 98。
普拉克西泰莱斯(Praxitéle) 61, 80, 98。
卡特勒梅尔·德·坎西(Quatremére de Quincy) 66, 74, 80, 81, 92。
朗加贝，A.(Rangabé, A.) 91。
瑞维特，N.(Revett, N.) 43, 49, 53, 56, 59, 81。
罗贝尔，H.(Robert, H.) 59。
罗斯，L.(Ross, L.) 83, 90, 91。

## S-T

狄迪马（Didymes）阿波罗（Apollon）圣所 47
提洛（Délos）阿波罗圣所 93。
德尔菲（Delphes）阿波罗圣所 95, 104。
科林斯地峡（de l'Isthme, Corinthe）圣所 80。
辛克尔（Schinkel）75, 88, 89。
施里曼（Schliemann）101, 103, 110-113, 120, 144, 146。
苏弗洛（Soufflot）49, 59, 80。
斯蓬（Spon）36-41, 56, 74, 79。
施塔克尔堡(Stackelberg) 75, 76。
斯特拉波（Strabon）27。
斯图亚特，J.(Stuart, J.) 43, 45, 49, 53, 55, 56, 59, 81。
巴塞（Bassae）的“援助者”阿波罗(Apollon Epikourios)神庙 78。
那克索斯（Naxos）的阿波罗神庙 48。
雅典娜·尼凯(Athéna Niké) 神庙 40, 56。
艾吉那（Egine）的神庙 64, 79。
雅典人（Athéniens）的神庙 118。
德尔菲（Delphes）神庙 31。
“奥林匹亚的朱庇特”(Jupiter olympien) 神庙 58。
派斯图姆（Paestum）的神庙 49。
奥林匹亚（Olympie）宙斯（Zeus）神庙 95, 99。
“忒修斯神庙”(《Théséion》) 23, 53, 58, 59, 90, 93
风塔 40, 56。

## V-W

文特里斯，M.(Ventris, M.) 132, 133。
海尔库拉纽姆的纸草别墅（Villa des papyri, Herculanum）14。
当斯·德·维优瓦宗(Villoison, d'Ansse de) 48。
维斯康蒂（Visconti）56, 74。
魏勒，G.(Wheler, G.) 38, 39。
温克尔曼，J.J.(Winckelmann, J. J.) 60, 61, 65, 66, 74, 81, 98。

## 图片来源

艺术档案馆(Archiv für Kunst)，柏林70/71，120。加德·博雷尔－波伊索纳斯档案馆(Archives Gad Borel-boissonas)116。阿尔西科(Arsicaud)，图尔58。尼马塔拉艺术图片社(Artephot/Nimatallah)，巴黎34，9 8，109，114上，121。艺术陈列馆(Artothek)，慕尼黑64/65，82/83。阿什莫尔博物馆(Ashmolean Museum)，牛津8，12，114下。国立高等美术学校图书馆(Bibliothèque de l'Ecole nationale supérieure des Beaux-Arts)，巴黎28上，8 6。国家图书馆(Bibliothéque nationale)，巴黎9，16/17，20，22/23，24/25，30，31，35，36/37/38，39，40上，40下43，48上，56/57，67，68右，69上，78/79，84，85，90,102。图片档案馆(Bildarchiv)，柏林25下，63，88/89，110下。波德莱恩图书馆(Bodleian Library)，牛津21，26。大英博物馆(British Museum)，伦敦44，46/47，69中，69下，72/73，74，77上。达利-奥尔蒂(Dagli-Orti)，巴黎127，128左、右，11，27，29，41，75，76/77，79上，80，81，87，92/93，103，104，108，117，118/119，124，125。法国考古学院(Ecole Française d'Archéologie)，雅典1，4/5，6/7，105左。出版传媒社(Edimédia)，巴黎32下，33上，33下，72。阿尔贝-卡恩基金会(Fondation Albert-Kahn)，巴黎105。弗朗科·玛利亚·里奇出版社(Franco Maria Ricci Editeur)，米兰15上，15下。古罗东(Girandon)，巴黎封四。肖像馆(Icona)，罗马12，13，14，28下。大都会艺术博物馆(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纽约61。贝那基博物馆(Musée Benaki)，雅典48下。美术博物馆(Musée des Beaux arts)，图尔60。体育馆(Presse-Sports)，巴黎115。国立博物馆会议(Réunion des Musées nationaux)，巴黎59，62，66，77右，101，122。罗热－维奥莱(Roger-Violler)，巴黎32，111。英国皇家建筑师研究院(royal Institute of British Architects)，伦敦42，45，49，50/51，52/53，54/55，100。希腊考古会(Société archéologiqu grecque)，雅典2/3，91左，91右，107，119上。乌尔施太因图片社(Ullstein Bilderdienst)，柏林110上，144，147。

## 外围合作人员

地图绘制：帕特里克·梅里安讷(Patick Mérienne)。版面设计：卡特琳·勒·特罗基埃(Maquette Le Troquier)

肖像搜集：安娜·索托(Anne Soto)。

## 致谢

赫拉克利昂历史博物馆(Musée historique d'Héraklion)馆长路易萨·卡洛凯里诺斯(Luisa Kalokérinos)夫人、建筑师卡洛皮西斯(Kalopissis)先生、雅典国家奥尔科斯出版社(les éditions Olkos Athènes)为本书的完成提供了帮助，伽利马尔出版社(Les Editions Gallimard)为此向他们致以衷心的感谢。

作者谨志对其友人保拉·斯塔拉基(Paola Staraki)和吉尔·图谢(Gilles Touchais)的谢意，他们曾帮助作者搜集希腊文原始资料。库伦布里－伽扎尔(Kouloumbri-Ghazal)夫人乐于审校希腊语文本的译文。法国雅典学院院长O.皮卡尔(O.Picard)、秘书长J.-Y.昂珀勒尔(J.-Y.Empereur)和照片档案室负责人J.维奇图妮(J.Vitsiloianni)都直接参与了插图的制作。我们在里昂和蒙彼利埃的同事M.-F. 珀雷(M.-F. Billot)、G.肖梅(G.Chomer) 和 M.-P.马松(M.-P. Masson)以及M.-F.比约(M.-F. Billot)为我们提供了某些图片资料。M.塞费(M.Sève)和G.拉巴尔(G.Labare)亲切地让我们参阅了他们的未刊著作。我们也接受了贝那基博物馆女馆长F.-M.奇伽库(F.-M. Tsigakou)的宝贵意见。最后，埃马努埃勒（Emmanuelle)、勒内(Renée)、里夏尔(Richard)、罗贝尔·艾蒂安和韦罗妮克·艾蒂安(Robert et Véronique Etienne)J.-C.莫西埃尔(J.-C. Mossière)和J.-L.萨维(J.-L. Savy)还认真地阅读和评论了我们的书稿。

封面页
版权页
正文